




坦克格勒

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1950年代）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s—1950s**

“苏联，苏联”系列 | [瑞典] 伦纳特·萨缪尔森 (Lennart Samuelson) 著 郑洁岚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作者简介

[瑞典] 伦纳特·萨缪尔森

Lennart Samuelson

瑞典著名经济历史学家，自2008年起担任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6年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6—2001年，在瑞典国防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2011—2012年，在哥德堡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1992年苏联绝密档案开放后，对苏联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发展及军事经济的真实面貌，研究成果获得了多个机构的奖励。2014年，荣获瑞典皇家文学、历史和古物学院著名的雷蒂格奖，以表彰他对苏联档案材料的突破性研究和创新性运用。也是俄罗斯友谊勋章的获得者。

译者简介

郑洁岚，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获学士、硕士学位，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获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俄语专业讲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s–1950s
by L. Samuelson, edition: 1

Copyright ©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11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Springer Nature Limited.

Springer Nature Limited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made liable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苏联，苏联”系列

坦克格勒

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
(1900—1950年代)

[瑞典] 伦纳特·萨缪尔森 (Lennart Samuelson) 著
郑洁岚 译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s–1950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2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
1950年代 / (瑞典) 伦纳特·萨缪尔森著；郑洁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 4. — (苏联，
苏联). — ISBN 978-7-108-08300-5

I. K512.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FH7383 号

策划编辑 叶 彤

责任编辑 周攻龄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陈 格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2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260 千字 图 110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9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苏联，苏联”系列总序

晚清以来的中国变革史表明，外部世界的影响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沙俄、苏联及当代俄罗斯这三个相互区隔但又一脉相承的俄国，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他者角色之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宏大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国和三个俄国的复杂关联；同样，世界读懂中国和中国读懂世界，似乎也离不开三个俄国的中介作用。

1991年底，雄踞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骤然解体。以“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权力转移为核心进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发端，中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此。

苏联作为国家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苏联”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资源的彻底消亡。作为曾经深深嵌入并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参与了当代中国诸多历史进程的关键大国，苏联的成败兴亡可以给我们提供反观自身和与时俱进的历史镜鉴。因此，对于中国而言，苏联研究的重要性在苏联解体后反而进一步增加了。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国家能力和国际角色同步发生了深刻变化，“走出苏联”并建构起中国的主体性是这一历史性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走出苏联”的重要前提在于理解苏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把握苏联之于中国的意义。倘使不能摘下偏振眼镜，真正走进苏联，也就谈不上彻底“走出苏联”。

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我曾呼吁重构苏联解体研究的中国议

程。彼时，国内同仁也都已经意识到这一领域需要深入发掘“真问题”，提升新档案、新文献、新资料的使用力度，加大理论对实证研究的支持，增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以形成足以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甚至超克其不足的基本格局。

现在，国内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强调回到历史的脉络和情境中去理解和掌握苏联的深层知识，并在政治、安全、外交等议题上取得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引起国际同行瞩目的重量级成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苏联研究在议题的覆盖、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还有不少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对于理解苏联问题至关重要的社会领域等属于低阶政治的边缘向度理应有更多投入，因为这恰恰可能是苏联最终解体的关键所在。

我们相信，处于崛起关键节点的中国尤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其未来的责任和担当相匹配的理性、冷静、成熟、健全的关于外部世界和自身角色的系统性认知。在此意义上，关于苏联的尽可能客观、中立、扎实、丰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多多益善。

我们希望，“苏联，苏联”系列可以成为一个窗口，为中国更全面地解读世界历史的进程、更稳健自信地活跃于世界舞台，从知识的供给侧提供小小的助益，为读者不断深化对苏联的理解、对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和中国变革的正当性的理解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我们期待，经由知识的积累、反思、批判和重构，中国能够带着日益丰厚的历史积淀、更加全面的历史认识，在不确定性空前突出的国际失序格局中确认并坚定前进的路向，勉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

杨成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2020年6月29日

献给 Elza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车里雅宾斯克：20 世纪俄罗斯的一面镜子 …… 1

第二章 从国内战争到五年计划 …… 12

南乌拉尔的内战 …… 19

车里雅宾斯克战役（1919 年 7 月至 8 月） …… 26

农村劳动力军事化和对农民的压迫 …… 30

“新经济政策”背景下的复苏 …… 36

新工业格局的形成 …… 37

农村改革：集体化和去富农化 …… 44

第三章 工业城市：社会主义愿景和苏联现实 …… 63

20 世纪 30 年代车里雅宾斯克的变革特征 …… 72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小城：社会主义愿景 …… 77

“棚户区”中的产业工人营房 …… 83

医疗和教育 …… 86

体育 …… 91

第四章 拖拉机厂的民用生产和军用潜力	95
外国专家	104
拖拉机厂对红军的重要意义	110
军事理论的演变	114
战争经济动员：20世纪30年代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	118
第五章 恐怖风暴中的停滞（1936—1939）	124
党内大清洗（1937—1938）	128
镇压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干部	133
大规模镇压运动	139
贝利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精简	143
第六章 车里雅宾斯克的生产备战（1939—1940）	152
苏联在1941年的备战情况	162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开始生产坦克	164
第七章 乌拉尔地区重型坦克的生产条件	170
“坦克格勒”的建立	178
决战柏林	198
第八章 南乌拉尔地区：战争后方的1418个漫长日夜	203
工厂撤离和转产	205
“坦克格勒”的工作条件	211
德裔苏联人新建了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	221

车里雅宾斯克的战俘	225
乡村	226
乌拉尔的政治信息领域	233
1945 年南乌拉尔胜利日	236
第九章 冷战时期车里雅宾斯克的新型军工综合体	239
战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重新改造	241
劳动力情况	244
住房条件	247
“坦克之王”职业生涯的终结	250
战后车里雅宾斯克的青年抗议活动	252
车里雅宾斯克州封闭的“原子城”	255
第十章 今日车里雅宾斯克的历史记忆与研究	261
注释	272
参考文献	317
索引	334

序 言

1991年之前，大多数学者都不曾预料到，这15年来能有这样的条件，让我们通过档案来研究俄罗斯20世纪历史。多年来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我有幸能研究这个令我着迷多年的主题：乌拉尔地区在苏俄历史中的重要性。

我在莫斯科和车里雅宾斯克的档案研究得到了多项资助，最初是斯德哥尔摩汉德银行的扬·瓦兰德和托尔·布劳尔德基金会，2001年后又得到了瑞典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哈坎·林德格伦（Håkan Lindgren）的讨论也使我深受鼓舞。2004年8月在伯明翰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罗伯特·W.戴维斯和他的同事对我的论文中有关20世纪30年代末车里雅宾斯克工厂镇压运动的内容提出了中肯的评论。

然而，如果没有车里雅宾斯克州联合国家档案馆（OGACHO，以下简称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管理人员的热情支持，我是不可能开展这样的研究的，毕竟这座城市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92年一直不对外国人开放。1996年夏天，我开始在那里就我博士论文中的几个主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关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末重整军备和将民用工厂转变为军事生产中心进行备战的情况。档案馆馆长亚历山大·菲诺季耶夫（现任车里雅宾斯克州档案委员会主席），档案管理员加林娜·基比特金娜（现任该委员会副

主席)、伊戈尔·维舍夫(现任该档案馆馆长)、伊琳娜·扬吉洛娃、伊莲娜·卡林基娜、伊莲娜·图洛娃和已故的拉夫卡特·瓦列耶夫一直都愿意帮助我查找能对我的研究有所启发的资料或与我讨论资料中出现的问题。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博物馆是我在1994年5月最早发现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就经常与尤里·皮瓦诺夫和塔吉扬娜·普什卡廖娃讨论工厂的历史。建于“二战”期间的车里雅宾斯克优质钢铁厂也有一个博物馆,我曾非常有幸在拉丽莎·雅罗什的带领下参观过那里的陈列品、模型和历史档案。我还于2000年参观了位于下塔吉尔市的乌拉尔货车厂博物馆及其展陈的老坦克,并于2003年与阿拉·皮斯列金娜和谢尔盖·乌斯季安采夫讨论了该厂的战时历史。车里雅宾斯克科学图书馆地区历史部的图书管理员在查找珍贵期刊和出版物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历史学家给了我很多启发,并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博热、弗拉基米尔·科布佐夫、尤里·马克西莫夫、伊戈尔·纳尔斯基、弗拉基米尔·诺沃肖洛夫、娜杰日塔·帕列斯基赫、安德烈·帕斯、妮娜·什马科娃和维塔利·托尔斯季科夫。我与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和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国立大学的维尼亚明·阿列克谢耶夫、米哈伊尔·格拉瓦茨基、根纳季·科尔尼洛夫、鲍里斯·利奇曼和安德烈·斯别让斯基进行了有意思的讨论。下塔吉尔师范学院的维克多·基里洛夫和奥尔加·波什涅娃向我介绍了他们的研究项目,特别是与苏联时期政治镇压史和1917年的革命形势相关的研究。此外,由于我定期访问拖拉机厂区第59号学校的玛丽娜·萨尔米娜以及她的同事、学生们(其中一些人如今已是历史教师),故得以了解到更多有关“俄罗斯当代史”基础教育课程的信息,这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书中仍然存在的任何错误和不足由作者本人承担责任。

最后,我要向艾尔莎·沙赫林诺娃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书是献给她的。因为正是她引领我饶有兴致地不断探索她的国家的现代历史。在这一点上,她的功劳无人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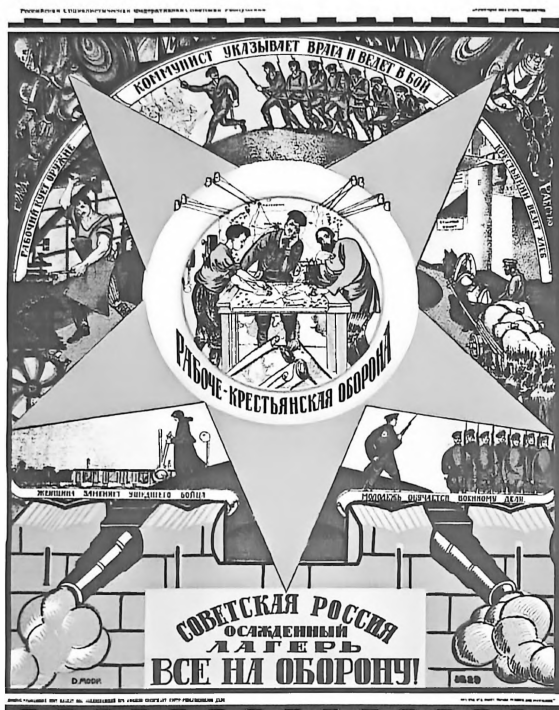


图1 “苏维埃俄国是一座被围困的堡垒！一切为了国防！”这是 D. S. 摩尔 1919 年创作的上面这幅海报上的主要文字（该海报印了 20000 份），它采用了俄罗斯流行的艺术风格——怀旧的民间木版画风格。画面展现的是“工农保卫战”场景——共产党员直指敌人、领导战斗，工人锻造武器，农民运送粮食，妇女代替男人参加生产，青少年学习军事知识

第一章 车里雅宾斯克：20 世纪俄罗斯的一面镜子

“他们对战争有什么看法？”“他们没有准备好，尤其是车里雅宾斯克的工厂。军队准备好了，但农业国还没有。”1932 年 10 月 21 日，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¹和生于俄国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鲍里斯·苏瓦林²之间进行了这次对话。巴别尔凭借小说《红色骑兵军》获得了苏联文化领域的至高地位，这部作品描写了内战期间传奇骑兵布琼尼的军队。苏瓦林尽管是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因持反对意见于 1924 年 7 月被开除党籍。

他们都非常了解斯大林不断变化的政策和 1929 年后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情况。对话中的关键词——战争、军队、工厂和农村农民——也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元素。

苏联曾多次遭受战争威胁。1927 年，苏联受到英国的威胁；1929 年，受到中国威胁——中国军阀控制了曾由沙俄占领的从西伯利亚通往太平洋、途经满洲里的中国东方铁路³；更持久的威胁来自日本，这个 1931—1932 年占领了满洲（中国东北）的国家；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也对苏联构成了持续威胁。这些年间，苏联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革，强制工业化（forced industrialisation）和农业集体化是变革中的首要任务。

• 当指中东路事件，但作者的表述欠严谨。——编者

那么，苏联是如何备战的？这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工农红军是如何建立的？那些经历过社会变革的人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胜利，这与1941年夏天德国“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时西方许多人所预判的恰恰相反。要解释这一矛盾，首先要描述新的苏维埃国家是如何在革命和内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我们将考察社会的变化，研究苏联特有的经济军事化是如何开展的，以及苏联教育系统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

本书介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冷战第一阶段的车里雅宾斯克。书中描述了车里雅宾斯克特有的经济军事化、教育系统现代化以及文化生活。

1736年9月13日（儒略历4日），上校A. I. 捷克利夫和他的600名士兵在米阿斯河上建立了一个要塞，并将其命名为车里雅宾斯克。18世纪40年代，布罗多卡尔马克和车里雅宾斯克要塞之间修建了一条公路。当时，这些要塞位于俄罗斯最东边的边界。到1800年，要塞周围居住着大约2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哥萨克人、商人和工匠；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但也有谷物磨坊、制革厂、铁匠铺和肥皂制造厂。在整个19世纪，车里雅宾斯克一直是俄罗斯帝国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小城镇，而在19世纪40年代，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开始了小规模淘金活动。

附近的兹拉托乌斯特、卡斯利和米阿斯镇很快开始生产钢铁。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车里雅宾斯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车里雅宾斯克到库尔干和鄂木斯克的西线延伸段于1894年竣工，这使得车里雅宾斯克成了通往西伯利亚的门户——成千上万农民希望迁往西伯利亚，去耕种新农田。沙皇俄国不仅为移民提供如优惠贷款这样的便利，还提供了有关西伯利亚各地区的大量信息。这也是大臣会议主席彼得·斯托雷平努力使农民成为富农的一项改革内容。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附近还建立了一个“移民点”。在这个专门为移民建造的村庄里，可以居住3万多人。村里有一个管理机构，负责为所有移民建立土地登

注册和确认所有权归属。1894—1909年间，有400多万人途经车里雅宾斯克，前往新家园。³

这些新的交通设施将车里雅宾斯克从一个人口不足一万的贫穷小镇变成了一个拥有工商企业的快速发展中的城市。

车里雅宾斯克及其周边省（州）在很多方面都是整个苏联的缩影。⁴ 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这个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城镇首次出现了政党，工人们成立了苏维埃。但在随后一段时期，所有政治活动都被专制政权压制。1917年革命激发了人民民主运动。1917—1918年的冬季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代表了民主，但布尔什维克拒绝接受制宪会议的选举结果，开始了专政统治。虽然布尔什维克肯定能在广大人民群众和产业工



图2 20世纪20年代布罗多卡尔马克的周六集市，该村是车里雅宾斯克省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18世纪初，为了保护卡尔马茨基岔道，人们在特查河附近建立了一个非农奴人口城镇。村民们的任务是巩固沙皇通往乌拉尔的防线。到1816年，布罗多卡尔马克有150个农场和907名居民、两座教堂、一所学校和一个集市。1924年，布罗多卡尔马克成为地区中心，到2000年，其人口已增至约4000人

• 就行政区划的名称，大体而言，车里雅宾斯克在1919—1923年称“省”，在1923—1934年称“专区”“区”，1934年正式建“州”。——编者

人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在当时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他们的支持者却少得多。

1918—1921年的激烈内战巩固了1917—1918年出现的一党制国家，这场战争不仅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战争，也是红军与自发组成的农民武装之间的战争。1921年以“新经济政策”形式进行的改革是布尔什维克与大多数人（农民、小企业家和商人）之间的妥协。

20世纪20年代末起，苏联共产党^{*}在社会各领域强推变革。他们的意图是使国家尽可能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农业集体化旨在说服人们从非生产性的家庭农场迁移到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企业。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点，是认为个人的消费在未来将大大提高。他们没有预见到，集体化的实施方式实际上会导致集体农庄出现饥荒，并使其条件比家庭农场更加恶劣。

本书讲述的是生活在南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的人的故事。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初建造了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1992年后更名为“乌拉尔拖拉机厂”）并在此工作。全书描述了城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以及1941—1945年战争年代“坦克格勒”的日常生活，主要目的是具体再现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如何开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苏联原先对车里雅宾斯克发展的所有设想。本书以车里雅宾斯克及周边地区的几家工厂为例，具体呈现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历史。这些工厂也是苏联经济动员模式的缩影。

书中的每一章都阐释了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军事化的情况并分析了其原因。在最近开放的档案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揭示了苏联社会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这些关于苏联日常生活和工业发展的新材料从多方面展示了推动苏联历史这一阶段发展的力量。

* 苏联共产党在1918—1925年（11月）称“俄共（布）”，在1925—1952年称“联共（布）”，此后至1991年称“苏联共产党”。作者出于叙述的方便，有时并不严格依照某个时段的准确称谓，读者当可参之。——编者



图3 车里雅宾斯克 20 世纪初的市中心全景

即使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的大多数城市实际上仍不对外国人开放。研究苏联建筑史的法国专家阿纳托尔·科普 1978 年曾说，人们无法前往斯大林时代建造的伟大工业城市，“这些我们只知道名字的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如今面貌如何？斯大林时代结束时它们又曾有怎样的面貌？”。科普不得不借助明信片并发挥他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些城市的真实面貌。⁵

1970 年，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下塔吉尔和乌拉尔军械库的传奇钢铁厂，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神秘。作为莫斯科大学的交换生，校长问我在为期一年的访问中想看到什么，我立即回答说我想去乌拉尔旅行。校长的回答同样简洁，他说这样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多年来，我不得不发挥我的想象力，去想象伏尔加河流域以外地区的重工业状况。几乎没有统计数据、文献资料能帮助我充实想象的画面，照片也很稀缺。20 世纪 80 年代，在“公开性”（glasnost）政策下，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成为第一位有机会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在他的伟大作品《磁山》中，科特金展示了 20 世纪 30 年代

这座城市是如何在乌拉尔南部的大草原上建立起来的。同样，我希望本书能提供—些新的视角，让读者了解 20 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期间该地区中心城市车里雅宾斯克的生活。⁶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记者兼作家威廉·亨利·张伯伦（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1897—1969）就在其著作《俄罗斯之谜》中向西方公众介绍了“坦克格勒”—词。⁷然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外国人才有可能访问这座城市。苏联时期，—些城市甚至连苏联公民都不能自由访问，居民的行动范围是严格受限的，不过车里雅宾斯克并非其中之一。生产核武器部件的所谓“原子城”是限制更严的城市。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就有几座“原子城”，如奥焦尔斯克和斯涅任斯克，它们也被称为“车里雅宾斯克-40”和“车里雅宾斯克-70”。无论是关于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本身的历史，还是关于其工业在“二战”和冷战期间的作用，研究都相对较少。本书将更清晰地展示—个具体的苏联工业城市的演变过程，它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苏联的遗产及其对当今俄罗斯的影响，这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俄罗斯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发展战略。

本书通过—个特定的工厂来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工业化，这是俄罗斯人进行国民经济动员以保障战争需要的典型案例。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第—个五年计划期间迅速建造起来的数百家大型工厂之—，书中也叙述了苏联引进美国生产线时因缺乏合格产业工人而遇到的严峻困难。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宣传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例如：

我们正在从工业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全速前进，正将俄罗斯几个世纪的落后状况甩在身后。我们将成为—个工业化国家，—个汽车化和拖拉机化的国家。当我们把“苏联”放上汽车，把农民放上拖拉机，那么那些受人尊敬的资本家就只能努力追赶我们；他们大声谈论他们的文明，那我们就看看，哪个国家是文明的，哪个国家是先进的！⁸

6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1950 年代）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遭遇大萧条。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实行国家监管的观点，甚至提出了应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采取一些计划措施。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曾于1930年拜访流亡土耳其的列夫·托洛茨基，与其讨论俄国革命的命运，他们还对苏联进行了长期访问。在他们的巨著《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中，韦伯夫妇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苏联的国家制度、计划经济体系以及苏联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他们的书大多基于苏联的官方资料，因此，该书成为西方人如何受愚弄以至相信苏联官方神话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的书被谴责的次数多于实际被查看的次数。其实，书中有许多关于“秘密警察”作用的段落，“秘密警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被称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

几十年来，“计划”的概念被视为福利国家混合经济的典范，广受欧洲大陆工党和社会主义者称道。许多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在某些领域的指导作用可以成功结合。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毕竟苏联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之前就实现了经济高增长率。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斯大林式计划经济可以实现较高的增长率，并能根据总体目标引导投资，实现长期发展。换句话说，苏联经济在获得高增长率方面具有优越性，尽管它显然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设想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之间的“趋同”，也是该观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短短几十年间，苏联经历了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而这仅仅用统计数据是难以表达的。第三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市因人口大量涌入而彻底改变，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让当地政府不得不应对的问题。1930年，一座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大型工厂开始动工。与苏联其他地区一样，工厂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居民楼、托儿所、学校、医院和休闲活动设施也同步建造起来。整个城市都是在企业

* OGPU 存在于1923—1934年。——编者

和政府的合作下发展起来的。

开始生产拖拉机的同时，为工厂工人建造的周边地区也在加速建设。20世纪30年代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城镇，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主妇、儿童和老人的居住问题。然而，微薄的资源仅够建造少量房屋。实际上，在工厂开工后的几十年里，只能为产业工人及其家属提供营房。尽管如此，普通人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和对未来的憧憬，正是他们想要捍卫新家园的原因之一。

苏联领导人强调，工业化是国防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采矿、重型机械制造是重中之重。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应包括民用部分，特别是消费品和耐用物品的生产。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苏联这种模式的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更高的增长率，而不是实现资本和消费行业的平衡增长。消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较低水平，以便从较高的技术层面收获成果。20世纪30年代，国家进入了对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密集开发期，在此之前，这些资源甚至还没有被完全勘探过。领导层选择在内陆地区发展几个主要的工业区。当然，这也有国家长期发展计划中关于国防方面的重要考量。第四章以拖拉机厂为例，介绍了人们如何为实现工业化而努力。

第五章阐述了斯大林领导下的大规模镇压、清洗活动让看似成功的发展中断了。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共产党、工厂和国家机关对被认为是国家实际或潜在敌人的人进行了大清洗。大清洗活动在1937—1938年达到顶峰。1939年，秘密警察机构发生了变化^{*}，前几年的许多非法行为和不正当行为都受到了惩罚。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任务是生产一种特定类型的拖拉机，并在战争情况下为军队提供坦克和火炮牵引车。第六章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工业动员计划的变化情况。最初的设计是，整个工厂可以很容易地从履带式拖拉机的批量生产转向轻型坦克的批量生产，传送带上的大部

* 典型事件是叶若夫失势，贝利亚取而代之。——编者

分设备都具有相同的尺寸。工厂的动员计划还包括弹药、手榴弹以及坦克和飞机备件等物品的生产。其他战时物品的生产任务被分配给大量非军工企业。

战争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停止了拖拉机的生产。取而代之的是，工厂获得了从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苏联欧洲部分其他城市撤离的设备，开始大规模生产重型坦克。要大规模生产中型和重型坦克，与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叶卡捷琳堡）和下塔吉尔市其他企业的合作也至关重要。1941年秋，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和哈尔科夫柴油机厂的大部分设备撤离至车里雅宾斯克。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工人及其家属也随之撤离。当时，该拖拉机厂更名为“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这座城市开始被称为“坦克格勒”。不过，苏联的报纸和广播从未提及他们的武器是在哪里生产的，报纸上的照片也只是提到“N市的一家工厂”或“在后方纵深生产”。

短短几十年间，苏联领导人就将沙皇军事体系转变为能抵御世界历史上最猛烈攻击，并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强大国防力量。“二战”初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纳粹德国迅速战胜了波兰和法国。“闪电战”概念指的是在敌方领土后方进行长距离空中打击，以支持装甲部队的纵深突破。就算是最狡诈的秉持“闪电战”想法的德军将领，如海因茨·古德里安——他曾与苏维埃俄国有过实际交战经验——在20世纪40年代初也低估了苏联红军的能力。“巴巴罗萨行动”几乎被一致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德国及其法西斯盟友的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占领苏联的后勤保障。

第七章描述了“二战”期间坦克生产的变化。当设备从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莫斯科撤离到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下塔吉尔后，苏联大规模生产了坚固、耐用、高效的坦克，其规模远远超过德国。苏联工业的战时效率是其计划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战争年代，数百万人丧生，大量农民从敌占区撤离，这给乌拉尔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压力。

第八章介绍了1941—1945年苏联后方的一些情况。数以万计的疏散

人员、难民和伤兵被从苏联的欧洲部分送往车里雅宾斯克地区。他们的住房问题只能勉强解决，一家人安置在本就狭小的房间和公寓里，或是住在城郊的酒吧间或防空洞里。当地在如何养活增加的人口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不过，改建后的拖拉机厂生产效率提升，武器产量激增。这成了战争初期遭受灾难性损失的苏联红军所拥有的相对优势。

冷战期间，车里雅宾斯克在苏联军工综合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重要的铀工厂就设在离城市不远处，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米阿斯——另一个根据战时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工业改造的城市——开始生产潜艇弹道导弹。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今天的南乌拉尔国立大学）有几个专业明确以军事工业为导向。第九章介绍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冷战初期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本书的最后一章专门介绍了乌拉尔地区的历史学家和档案馆近年来如何研究本地区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列昂尼德·科马洛夫等人通过查阅档案资料、采访老兵等方式，首次对拖拉机厂进行了详细描述。苏联事关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的苏德战争）的史料数量庞大、内容详尽。然而，由于战争年代的许多方面都是禁忌或秘密，任何官方历史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开性”改革中都被认为是近乎伪造。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乌拉尔地区乃至整个苏联的军事、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学家才能对这些年的历史进行更丰富、更详细和更真实的描述。第十章阐述了全方位发展的车里雅宾斯克在某些方面的情况，探讨了该地区档案管理员在解密档案和出版原机密档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当前俄罗斯最有前途的一点在于年轻一代对历史充满浓厚兴趣。高年级学生定期参与全国范围的历史学科竞赛，从这些青少年选择的主题可以预判，俄罗斯未来还会有积极变化。



图4 亚历山大·阿普希特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一周年创作的海报。海报上写有“无产阶级专政年（1917年10月—1918年10月）”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二章 从国内战争到五年计划

人们通常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所发生的事件来描述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和 1918—1921 年的内战，因为这两座城市是历史事件的中心。而本章的重点则是车里雅宾斯克市及其周边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的变化，以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南乌拉尔地区建立的情况。1917 年 11 月，赤卫队和工人苏维埃接管政权，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工人苏维埃与其他社会群体——商人、农民，尤其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国内战争中的许多决定性时刻都发生在南乌拉尔地区。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似乎在短时间内为国家的复兴和“混合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模式，但 1928—1929 年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改变了这一切。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决定要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极大地改变了乌拉尔农村的面貌。“从农村到城市去”是决定 20 世纪 30 年代新工业用地特征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经过巨大的努力和人民的艰苦奋斗，乌拉尔地区创建了新的重工业，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

本章介绍的人物所属的政党和团体可被称为“历史的赢家”。20 世纪初，俄国开始出现复杂的政党制度。然而，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的“相互替代方案”并未在历史上出现。¹最终，最激进的社会民主工党人——布尔什维克——成为内战中唯一的胜利者。

12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1950 年代）

19世纪90年代末，社会民主工党在车里雅宾斯克成立。190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在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然而，乌拉尔的社会民主工党人并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分裂，他们热切地与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开展政治行动。乌拉尔的地方组织甚至可以同时吸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成员。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社会民主工党在乌拉尔地区的党员人数达到了顶峰，为14300人。1906—1907年的大规模反革命逮捕和流放，几乎摧毁了该党。党员们好不容易才印刷出传单，并于1908年出版了三期“非法”报纸《工人之声》。乌拉尔地区的党员人数在1908—1911年间减少到2300人，在1912—1916年间减少到约1200人。在车里雅宾斯克、奥伦堡和南乌拉尔的其他城市，该党在1912年的党员人数不到500人。一些故事可以说明乌拉尔地区社会民主运动的早期历史。

萨缪尔·莫伊谢耶维奇·茨维林（1891—1918年4月2日）于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他参加了西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的革命活动。他被捕后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减刑为五年监禁。服刑期满后，茨维林成为朵伯利斯克、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等城市的社会主义鼓动者。1914年，他应征入伍，但很快就开始在士兵中传播布尔什维克的反战言论。

索菲亚·克里瓦娅（1894—1919）于1902年迁居至车里雅宾斯克。她还在上学时就加入了激进组织，帮助过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后关押在车里雅宾斯克中转监狱的政治犯。14岁时，她第一次因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联系而被捕，但因年龄原因很快获释。不过，她被学校开除了，后来她当过教师和药剂师，还组织过护士工会。1915年，她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并加入了该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德米特里·科柳申科（1881—1918年6月3日）在教区学校学习几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应为1903年。——编者

年后，在沃罗涅日的一家葡萄酒厂当铁匠学徒。1903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到车里雅宾斯克当机械师。1910年，他开始在“斯托尔 V. G. & K.”公司当铁匠，后来又当车工。1912年，他组织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了首次“五一”游行，抗议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屠杀工人。1914年，科柳申科作为罢工领袖被捕，但在工厂工人的强烈抗议下获释。

叶夫多基姆·瓦森科（1882—1918年6月1日）是市工人运动的另一位著名人士。他拥有叶卡捷琳堡矿业学院的文凭，曾在邮电局担任职员。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他积极参与工人运动，被判入狱四年，关押在新罗西斯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森科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

这些都是沙皇俄国统治时期试图从事激进政治活动的典型人物的生平。

在兹拉托乌斯特、米阿斯和上乌拉尔斯克等老工业城市，强大的社会民主团体和工会也组织了起来。

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车里雅宾斯克和全国各地都激发了爱国气氛。大多数政党都支持沙皇对德宣战。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鼓动反对战争的政党是布尔什维克。战争到1916年还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却给沙皇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大城市工人的吃饭问题变得越来越难，普遍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年年底愈演愈烈。²

1917年2月，俄国精英团体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这是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几周后，临时政府成立。俄国革命的特点是双重权力结构，一边是临时政府，另一边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委员会（苏维埃）。1917年3月初，车里雅宾斯克也出现了这样的结构，权力从总督和沙皇政府手中转移到地方议会领导人和市杜马主席手中，他们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代表。与1905年相同，工人和士兵苏维埃重新出现，其中也有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萨缪尔·茨维林当选为该市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主席。车里雅宾斯克的局势仍然不明朗，

充满了不安，几个新机构实际上相当无力。由于革命破坏了警署和法院等机构，因此来自工业、贸易、自由职业、工会和工人党的代表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委员会。在车里雅宾斯克，该委员会发展成为一个平行的权力机关，直到临时政府控制了整个国家。在情况类似的乌拉尔其他城市，此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战斗部队所需物资的生产。³1917年，各种各样的工会和协会自发地发展壮大起来。在车里雅宾斯克，一些新的机关、工会、团体和委员会在民众的广泛支持下成立。根据各种资料，1917年2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乌拉尔南部有550—900名成员。几个月后，车里雅宾斯克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有600名党员，该党随后被允许合法活动。1917年4月弗拉基米尔·列宁从瑞士流亡归来后，布尔什维克公开表示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4月下旬，乌拉尔地区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已拥有10000多名党员，这还不包括1560个同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

然而，车里雅宾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并未真正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因为1917年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哥萨克人和商人。当时，社会革命党得到了最多农民的支持，但在“党是应支持农民自发接管或没收地主财产，还是应等待议会颁布新的土地法”这一问题上，党内意见不一。乌拉尔南部的奥伦堡地区有强大的哥萨克组织。

组织了第一支赤卫队的德米特里·科柳申科是二月革命后该市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要人物之一。弗拉基米尔·莫吉利尼科夫（1895—1918）是工人武装组织的另一位领导人。他于1914年应征入伍，在喀山士官学校接受培训，之后被派往车里雅宾斯克第169步兵团。1917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在该市组织了赤卫队。索菲娅·克里瓦娅是车里雅宾斯克第一支赤卫队的另一位成员。

茨维林早先曾因在该市士兵中进行反战宣传而被捕，后当选为俄共（布）乌拉尔支部的领导人，并参加了第六次党代会。在1917年8月的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多数选票，他们在乌拉尔其他地区的选举中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将军领导的建立

军事独裁的行动得到了乌拉尔军官们的热情支持，赤卫队被动员起来与反革命威胁做斗争，“拯救革命委员会”由茨维尔来领导。科尔尼洛夫的举措使赤卫队完全合法化，布尔什维克不久后多次试图夺取政权。到7月，乌拉尔地区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人数已增至27000人，到秋季，随着他们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夺取政权，人数增至35000人。1917年9月车里雅宾斯克的布尔什维克人数还只有2100人，但党的领导核心仍试图武装夺取城市政权。叶夫多基姆·瓦森科是1917年和1918年间车里雅宾斯克大多数事件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他曾在彼得格勒参加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苏维埃宣布接管政权。回到车里雅宾斯克后，瓦森科当选为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当苏维埃成功夺取彼得格勒政权的消息传到车里雅宾斯克时，布尔什维克宣布该城市的所有权力应移交给苏维埃。瓦森科领导了该市新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并任内务委员。他组织领导了一次农民和哥萨克代表大会，批准了革命变革，尽管这些新机构的权力只能维持到10月30日。应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大众社会主义党、社会革命党和哥萨克等的请求，一支由526名官兵组成的部队在N. N. 季托夫的指挥下抵达车里雅宾斯克，以瓦解工人苏维埃。苏维埃接到了最后通牒，被要求将权力归还给市杜马，解散苏维埃和赤卫队。布尔什维克接受了这些要求，并做出了解散赤卫队的决议。但与此同时，他们呼吁其他城市向车里雅宾斯克提供军事支持，因为该市已被哥萨克部队包围。社会革命党人则呼吁哥萨克领导人不要在该市投入更多的军队和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与工人卫队的大规模战斗。瓦森科领导了与季托夫率领的哥萨克的谈判，并找到了将权力交还给市杜马的方案。几周后，革命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瓦西里·布柳赫尔（1890—1938）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他是武装接管彼得格勒政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从彼得格勒被派往车里雅宾斯克，并从伏尔加地区调来强大的赤卫队，以牢固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布柳赫尔巩固了车里雅宾斯克的苏维埃



图5 瓦西里·布柳赫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他是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接管彼得格勒政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随后，他被派去帮助赤卫队在车里雅宾斯克建立苏维埃政权。1917年12月2日起任车里雅宾斯克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政权，自1917年12月2日起，布柳赫尔担任该市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经过10月至11月这些事件，弗拉基米尔·莫吉利尼科夫成为车里雅宾斯克新组建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副局长。

对布尔什维克最激烈的武装抵抗是由哥萨克领袖“阿塔曼”亚历山大·杜托夫（1879—1921）组织的。他是一位贵族，是伊利亚·杜托夫少将的儿子，曾在涅普卢耶夫士官学校和尼古拉骑兵军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此后，他在哈尔科夫电力学院获得学位。他参加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并于1908年毕业于总参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托夫指挥奥伦堡哥萨克第一骑兵师，1918年晋升为中将。1917年，杜托夫被任命为奥伦堡哥萨克主席，并由临时政府委任负责乌拉尔地区的粮食供应。杜托夫不承认苏维埃接管了彼得格勒或其他地方的政权。1917

年11月，他在奥伦堡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军事政权，并首先逮捕了数十名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杜托夫试图组织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来支持倒台的临时政府。他宣布整个车里雅宾斯克省和奥伦堡省进入紧急状态，权力移交给仍认可临时政府的合法性的哥萨克军事委员会。11月15日（公历28日），奥伦堡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被捕了，但很快他们就设法逃出了监狱。杜托夫得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暗指1917年8月在车里雅宾斯克成立的类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以对抗科尔尼洛夫将军和军事独裁的威胁。

杜托夫的主要支持者是数百名哥萨克军官。他们设法召集了7000名士兵，并夺取了奥伦堡、特罗伊茨克、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权。然而，大多数奥伦堡哥萨克对支持杜托夫的行动犹豫不决。他们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有些哥萨克人甚至表示同情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这些哥萨克人中，有伊万（1890—1937）和德米特里·卡希林（1888—1938）兄弟，他们成长于一个哥萨克大家庭，1909年之前一直在奥伦堡容克学校学习。1917年，伊万成为俄共（布）党员。二月革命后，他先后担任了一个陆军师的党委会主席和奥伦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夏，伊万的部队与杜托夫将军的部队和捷克军团作战。他在乌拉尔领导了一支新的游击队，在加入正规红军部队后，他晋升为红军方面军第三集团军旅长。⁴

伊万的另一个兄弟尼古拉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革命后，他成了团苏维埃主席，后组建了上乌拉尔斯克哥萨克志愿部队。1918年7月16日至10月，他任乌拉尔游击队司令，1919年1月起指挥东线第30步兵师。1920年，尼古拉被任命为南线红军军长。⁵

布尔什维克从彼得格勒、莫斯科、乌法、萨马拉和莫托维利基调集了工人和赤卫队。当这些优势兵力逼近奥伦堡时，杜托夫的军队被迫在车里雅宾斯克至特罗伊茨克的铁路沿线和上乌拉尔斯克进行无望的撤退作战。随后，正规部队被解散，分成较小的武装自卫队，分散到图尔盖

地区大草原上的哥萨克村庄中。萨缪尔·茨维林在一次与哥萨克部队的战斗中阵亡。

南乌拉尔地区局势的特点是，车里雅宾斯克、兹拉托乌斯特和米阿斯等工业城市的激进苏维埃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在农村，哥萨克是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最狂热、组织最严密的对手。在1918年12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在大多数农民区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支持。

南乌拉尔的内战

1917年11月之后，苏维埃政权在全俄建立。车里雅宾斯克是1918年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第一个大城市，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历史事件。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战俘被释放，以便返回欧洲为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战俘们被编入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装备和武器精良的军团。他们乘坐火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远东，然后从那里经海路返回欧洲。这支捷克军团被分到整条铁路上的几十个火车编队中，但许多捷克人担心红色统治者会拖慢他们穿越俄国的行程。在车里雅宾斯克的火车站，有几个火车编队被拦住了。这支部队约有12000名士兵，由谢尔盖·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1883—1951）指挥。他于1912年毕业于总参谋学院，并晋升为沙皇军队的中将。从1917年夏天开始，他领导捷克军团的参谋部，也是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关键人物。

载有捷克官兵的火车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延误了，捷克官兵和当地苏维埃发生了许多冲突。指挥官中流传着士兵将被送回德国囚禁的谣言。在5月14日的一次小规模冲突中，另一列向西行驶的火车上的一名匈牙利战俘被打死——这一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迅速向车里雅宾斯克苏维埃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解除捷克军团的武装，但强壮的捷克士兵拒绝了。当地苏维埃随即逮捕了10名涉事的捷克士兵。捷克指挥官认为这是非法行为，于5月17日派出一队士兵进入市中心。

正规红军士兵于1918年春开始接受训练，但他们在车里雅宾斯克的

总人数不超过 1500 名士兵和 120 名军官。即使有赤卫队加入，这些弱小的部队也无法与久经战场、装备精良的捷克军团抗衡。结果，捷克军团占领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包围了驻军，并解散了赤卫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就落入了捷克军团的手中——这次暴乱是俄国内战的开端。⁶ 1918 年 5 月 27 日，弗拉基米尔·莫吉利尼科夫被捷克人逮捕，并于 6 月 3 日被处决。⁷

捷克暴乱后，科柳申科立即被捕，与莫吉利尼科夫在同一天被哥萨克人用军刀处死。其他主要革命者，包括 M. A. 勃雷科、P. Ia. 特里亚什金、Sh. I. 格兹奥斯基也被处决了。⁸ 白军很快就完全控制了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6 月 1 日，权力正式移交给该市的驻军，几天后成立了人民政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各政党、宗教团体和哥萨克的代表组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可以在市内自由开展活动。这些政党就包括在 1917 年 12 月全俄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社会革命党。其他活跃在车里雅宾斯克的政党还有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和俄罗斯复兴联盟党。1918 年 8 月，人民政权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国家未来的政治制度。这几个月里，车里雅宾斯克实行自治，并选举产生了各种议会和机构。许多人都赞同《乌法宣言》中提出的目标，即召开制宪会议。乌法领导机构最初得到了杰尼金将军的支持，他领导的志愿军是当地主要军事力量。然而，鉴于国内的紧张局势，奥伦堡的哥萨克领导人和武装部队中的其他人士转而支持建立直接军事专政。军事专政方案作为打击布尔什维克在国家中心和乌拉尔工业城市的势力的唯一手段，曾被广泛讨论。

因此，捷克军团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叛乱取得了成功，同时还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当时，1918 年 4 月被任命为全俄哥萨克战地总司令的杜托夫将军在南乌拉尔建立了一支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军队。谢尔盖·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是车里雅宾斯克-叶卡捷琳堡地区捷克军团的指挥官，1918 年还担任萨马拉地区捷克军团的指挥官。

布尔什维克对捷克军团的叛乱和西伯利亚铁路的易手迅速做出了反



图6 哥萨克领袖“阿塔曼”亚历山大·杜托夫是一位贵族，是伊利亚·杜托夫少将的儿子。他在涅普卢耶夫士官学校和尼古拉骑兵军事学院接受教育，之后在哈尔科夫电力学院获得学位。他参加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于1908年从总参谋学院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托夫指挥奥伦堡哥萨克第一骑兵团，1918年晋升为中将军。

应。1918年5月，工人苏维埃被疏散到叶卡捷琳堡。瓦森科没有逃脱，他在附近的阿尔盖什村被捕，在被带回车里雅宾斯克时被白军军官勒死。捷克军团几乎控制了从萨马拉到海参崴的整条西伯利亚铁路。为打击捷克军团，红军领导人组建了由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指挥的东方方面军。⁹伊万·卡希林的部队在南部山区作战，并成功抵达昆古尔市，与东方方面军的正规第三集团军会合。那些未能逃离捷克军团部队的红军士兵与布柳赫尔一起解散了自己的部队，甚至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敌方——白军。

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对资产阶级采取大规模恐怖措

施”。乌拉尔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工作人员在叶卡捷琳堡、彼尔姆和车里雅宾斯克逮捕了数百名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8月，有人企图刺杀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此后全国各地的“红色恐怖”愈演愈烈。¹⁰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1874—1920）是一名海军军官的儿子，曾在圣彼得堡古典中学和海军士官学校接受教育。他参加过极地探险，参加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海军中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于1917年辞职，前往美国留学。他接受了英国海军的邀请，并被派去控制中东铁路（从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海参崴）。英国和法国政府支持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并多次试图将1918年夏秋与红军作战的各路军队联合起来。他们的行动之一是支持海面上将高尔察克担任反布尔什维克武装的最高领导人。1918年10月，高尔察克从中国前往西伯利亚，被任命为鄂木斯克全俄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长。次月，在英法顾问的支持下，高尔察克宣布对全俄实行军事专政。这导致了在高尔察克统治下，俄国部分地区合法和有组织的政治生活荡然无存。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还发动了一场白色恐怖，矛头直指所有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

白军方面很快就放弃了法治和民主的所有原则，他们不仅关注布尔什维克和积极的社会主义者，还关注平民中既不接受也不支持苏维埃的人。白军还对农民实行严苛的粮食征用政策。¹¹

1918年6月，车里雅宾斯克的新统治者宣布布尔什维克非法。作为回应，布尔什维克成立了一个地下委员会，到1918年冬至1919年，该委员会已有数百名积极分子，还分发由地下印刷厂印刷的传单。然而，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撼动新的军事秩序。一次，布尔什维克试图组织工人武装起义，但因内奸泄露计划而失败。1919年3月，60名布尔什维克被处决。索菲娅·克里瓦娅是车里雅宾斯克地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积极分子之一。她于1919年3月29日被捕，在乌法监狱受到

• 原文如此，疑误。高尔察克似只担任过黑海舰队司令。——编者



图7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是哥萨克家庭的孩子，他和兄弟尼古拉（1888—1938）都曾在奥伦堡军校接受基础教育。从1917年起，伊万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二月革命后，他先后担任陆军师党委员会主席和奥伦堡区苏维埃主席。1918年夏，伊万·卡希林与杜托夫的部队和捷克军团作战。他率领乌拉尔游击队中的一支部队，后在内战中担任红军第三集团军旅长。从1920年起，他一直活跃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警察机构中。农业集体化期间，他领导了对伏尔加地区农民的镇压行动。1937年大清洗期间，他被捕并遭处决。

图8 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海军军官之子，在圣彼得堡古典中学和海军士官学校接受教育。他曾参加极地探险、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海军中将，并担任黑海舰队司令。他于1917年辞职，开始到美国访问学习。随后，他接受邀请加入英国海军，并接管了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英国和法国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赌注押在高尔察克上将身上。1918年，他与英法军事顾问一起穿越中国前往西伯利亚。同年11月，高尔察克宣布在俄国实行军事专政。





图9 在南乌拉尔参与与高尔察克军队战斗的年轻铁路工人。照片拍摄于1920年4月22日

严刑拷打和审讯，并于5月17日至18日晚间的某个时刻在狱中死亡。¹²

许多1917年前积极参政的人都在内战中死去了。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人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党的领导人所设想的社会变革有着不同的、往往更加模糊的印象。离苏维埃中心越远，他们就越重视苏维埃政府的税收、工资和物价政策，以及地方领导人对地区的态度。1918年冬至1919年春，高尔察克上将领导的白军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取得了最广泛的控制权。他们与捷克军团一起，几乎控制了西起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整个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他们还控制了从巴什基尔的乌法到整个南乌拉尔山区的地区。1919年2月，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车里雅宾斯克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西发起大规模进攻。



图 10 内战期间红色游击队中的护士尤多西娅·达维多娃（左）和泰西娅·库兹涅佐娃（右）。照片摄于 1919 年



图 11 位于科姆纳街和埃尔金街的迪亚丁旅馆，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后的繁荣时期当地最舒适的旅馆。该旅馆由商人米哈伊尔·迪亚丁兴建于 1908 年。内战期间，这所房子首先被白军征用，1919 年被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工作人员征用。照片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与此同时，红军正在策划反攻，以迫使高尔察克的部队离开乌拉尔。1919年，红军在乌拉尔的推进非常成功。春夏两季，第五集团军在年轻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的指挥下，胜利地通过了南乌拉尔山脉的山口。红军还能在高尔察克部队的前线后方发动颠覆行动。

车里雅宾斯克战役（1919年7月至8月）

白军指挥官放弃并撤出了乌法、兹拉托乌斯特和特罗伊茨克之后，期望于1919年8月在车里雅宾斯克进行一场决战。整个战役是从车里雅宾斯克以西200多公里的兹拉托乌斯特打响的。图哈切夫斯基的第五集团军拥有32000名士兵、100门火炮和713挺机枪，而谢尔盖·沃伊采霍夫斯基（1883—1951）指挥的西伯利亚白军几乎同样强大，装备精良。红军向车里雅宾斯克方向发起正面进攻，同时向特罗伊茨克西南方向发起小规模进攻。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突破了白军第35军的防线，向车里雅宾斯克推进。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随即改变了战术，下令快速撤退。西伯利亚白军各师重新集结并加强了兵力，来攻击车里雅宾斯克市内的红军部队，“把他们像装麻袋一样装起来”。当时的计划是，白军发起反攻，将红军逼退到乌拉尔山之外。

经过一番激战，红军于7月24日攻克了车里雅宾斯克，但第二天白军就发起了南北两路反击。红军在南部顶住了白军的进攻，但白军在北部取得了成功。白军强行楔入两个红军师之间，切断了从车里雅宾斯克到叶卡捷琳堡的铁路。此举威胁到了红军的支援和后方。8000名工人被动员起来加强红军部队，另有4500人被编入工人卫队。图哈切夫斯基集中了这些兵力，开始了他的反攻。7月29日至8月1日，他们消灭了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最重要的几个师。这使得第五集团军得以继续作战，巩固了对该市的控制。车里雅宾斯克战役极为血腥，双方各有约40000人丧生。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周，城内有小规模战斗，城外也有大规模交锋。

车里雅宾斯克战役是俄国内战中的关键战役之一，也是东线最血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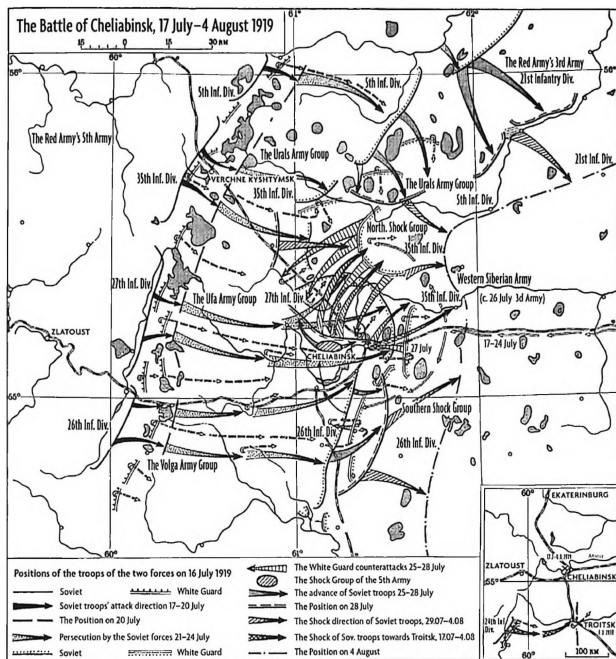


图 12 1919 年 7—8 月车里雅宾斯克战役示意图

的战役。然而，即使包括游击队或农民军在内，这些战役中的人员伤亡也只占这些年死亡士兵总数的一小部分。斑疹伤寒、发烧和疟疾等疾病夺走了更多的生命。同样，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人数也远远低于因营养不良或对流行病的免疫力低下而死亡的平民人数，尤其是这段时间流感肆虐（“西班牙流感”）。¹³

图哈切夫斯基因成功策划和实施第五集团军在南乌拉尔的决定性行动而被授予红星勋章。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又待了几个星期，以便计划第



图 13 26 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戴着经典的“布琼尼帽”，这是以传奇的红色骑兵指挥官谢苗·布琼尼的名字命名的。1919 年初夏，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东方军第五集团军穿过乌拉尔山脉，并在 1919 年 7 月至 8 月的车里雅宾斯克战役中战胜了沃伊采霍夫斯基将军的白军部队

五集团军在西伯利亚的下一步行动。¹⁴1919 年整个秋季，红军在车里雅宾斯克周边地区继续对哥萨克部队和高尔察克师的残余势力进行小规模清剿。红军重新征服了南乌拉尔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 1920 年。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是众多有沙俄军队背景的红军军官之一。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晋升为将军。1917 年，他从德国被俘归来，1918 年春，他自愿加入红军，并很快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就如何在国际上传播共产主义以巩固革命表达了激进的思想。图哈切夫斯基被委以重任，负责指挥规模越来越大的部队。1920 年，他指挥西线军队反击约瑟夫·毕苏斯基指挥的波兰军队。俄国内战和 1920 年俄波战争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开始重新思考现代战争的环境。他希望找到 1920 年 8 月红军在华沙城

外战败（“维斯瓦河奇迹”）的原因，这促使图哈切夫斯基提出了利用最新武器技术进行机动作战的新思想。几年后，他将这些想法与利用快速机动装甲部队和空军进行机械化战争的思想相结合。¹⁵

高尔察克上将的部队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场重要战役中失利，他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也被削弱了。白军被分割为南北两翼且无法相互配合，因为红军已经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和特罗伊茨克。西西伯利亚较富裕的农民起初支持高尔察克政权，但其严酷的军事专政统治导致农民转而反抗白军。这进一步削弱了白军在西伯利亚的力量，使红军能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迅速推进。1920年1月，高尔察克辞去最高指挥官职务，向东撤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逮捕了高尔察克，并将他交给布尔什维克审讯。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对他进行审判，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却以局势紧张不允许公开审判为借口，决定处决他。高尔察克于1920年2月7日被处决。车里雅宾斯克战役后，杜托夫将军的哥萨克部队也通过西伯利亚撤退，并设法到达了中。1921年3月，杜托夫本人被契卡士兵杀死。许多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工程师和知识分子也决定与高尔察克的部队一起逃离，即使他们并非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反对者。

因此，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政权几经更迭，从红军、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到要求根据1917年12月选举结果重新组建制宪会议的反布尔什维克政权，再到高尔察克的军事独裁政权。有时，南乌拉尔的一些地区被所谓的自由哥萨克控制。当白军控制一个地区时，他们执行反农民政策，不认可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性变化，这导致了白军后方的农民起义。当物质生活条件逐月恶化时，持续的政权更迭对普通民众越来越没有意义。白军从车里雅宾斯克和兹拉托乌斯特撤走了大量工业设备和生产物资，总共用了43列火车、4000多节车厢。白军领导人知道，他们没有时间将这些物资全部撤离，因此他们放火焚烧了火车。

红军在1919—1920年内战中取得的胜利使乌拉尔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通过工农会议，苏维埃得以重建，并成为新权力体系的基

础。¹⁶然而，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遭到了其他农民的反对。农民抗议强征粮食，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曾遭到红军和白军双方强征粮食。农民家庭经常遭到掠夺。其他群体则对强迫劳动制度、配给制度和取消货币制度表示抗议。1919年8月29日，省革命委员会成为车里雅宾斯克的领导机构。9月3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了新成立的车里雅宾斯克省的边界，该省包括原车里雅宾斯克、库尔干、库斯塔奈和特罗伊茨克等县（uezd）。1919年至1920年冬，布尔什维克在南乌拉尔地区维持了革命秩序，并成立了与反革命斗争的省特别委员会。安德烈·科罗辛是车里雅宾斯克的第一位地方肃清反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他在开展秘密警察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奉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之命到车里雅宾斯克消灭高尔察克军队的残余势力，并控制对农民粮食的征用。

南乌拉尔地区的粮食状况比很多内战期间人口锐减的城市都要好。1920年5月，一列满载400多吨粮食的火车从车里雅宾斯克开往莫斯科，准备分发给其他地区的饥民。

农村劳动力军事化和对农民的压迫

南北战争快结束时，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与其仅仅遣散红军部队，不如保留士兵，并形成所谓的劳资关系。¹⁷1月10日，红军第三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马蒂亚舍维奇将军也建议最高军事领导层将其部队改编为“共和国第一革命劳动军”。几天后，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组建“乌拉尔劳动军”。这支劳动军将重新集结，负责总体经济的恢复任务，特别是铁路网的重建。全国其他地区也组建了几支劳动军，还制定了一整套规则。乌拉尔劳动军在车里雅宾斯克从事公共工程建设。1920年4月15日至7月1日，250多万红军士兵参与了这类经济活动。乌拉尔劳动军最初由托洛茨基领导，他于1920

*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的创始人。——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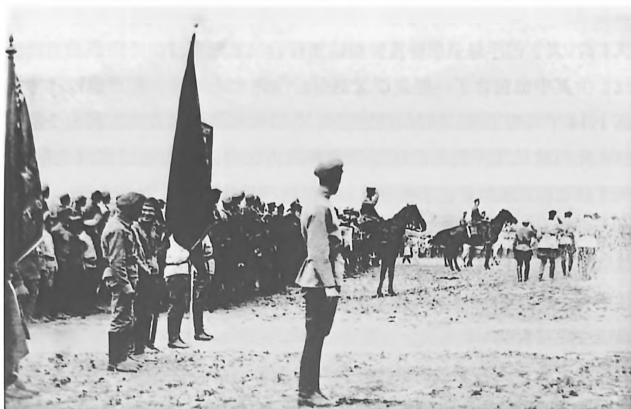


图14 1920年7月20日，特罗伊茨克举行阅兵式，庆祝在乌拉尔战胜高尔察克部队一周年。争夺乌拉尔的战斗始于1919年6月，当时东方面军在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首先攻克了山区的兹拉托乌斯特和米阿斯等老工业城市。随后，车里雅宾斯克战役于7月24日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展开了血战，战役于8月4日结束，红军取得胜利

年3月到访车里雅宾斯克，后来由格奥尔基·皮达可夫指挥。¹⁸乌拉尔第一劳动军重建了铁路线，组织了粮食、农场饲料和供暖工厂木材的供应。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从事这类性质的工作，还参与建造房屋和修缮工厂。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1921年劳动军解散。

事实上，这些劳动军是由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领导的——例如，乌克兰的约瑟夫·斯大林和彼得格勒的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这表明共产党在革命后的过渡阶段非常重视军事化劳动形式的使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年，纯粹军事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在绝望情况下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在红军复员时避免工人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方式。托洛茨基是将“劳动军”描绘成“未来事物的先驱，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的雏形”的人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卡尔·考茨基曾严厉批评俄国革命的恐怖和非民主方式，托洛茨基针对他的批评提出了一

系列支持劳动军事化的论点。尽管托洛茨基题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的小册子主要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论战,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提倡强制劳动的论点。同样,列宁也批评考茨基1914年背叛了第二国际反战纲领。¹⁹当时布尔什维克内左派人士尼古拉·布哈林热情洋溢地论述了暴力和武力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作用。列宁热切而积极地评论了布哈林书中的这些具体段落。²⁰

事实上,沙俄政府早在1916年就开始推行不立即向农民支付款项的强制征用。1917年,临时政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1918年,布尔什维克政府曾一度试图将征用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延伸,是能迫使富农向贫农委员会交出粮食的一种方式。

布尔什维克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试图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公平、直接的产品交换。从1919年9月到1920年4月,80万吨粮食和3.2万吨肉类被征用,它们本应被兑换成纺织品、糖、火柴和肥皂的家庭配额,但由于工业品的数量减少,征收往往变为无偿没



图15 1919年车里雅宾斯克省沙德林斯克的强制征用。这些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农产品和其他产品的特殊措施直至1920年仍在继续,随后在俄国各地引发了数次农民起义。在南乌拉尔,农民组成“蓝军”,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粮食征用

收，这导致了红军控制地区的广泛抗议。在南乌拉尔地区，1920—1921年发生了有组织的农民起义。在库尔干地区，农民组成了所谓的“蓝军”，红军在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后才将其镇压。

最有组织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来自从红军叛逃出来的士兵，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军事部队，与车里雅宾斯克的新政府对抗。据当地媒体报道，1919年11月至1920年11月间，共有30230名逃兵被抓获；而农民武装叛乱分子的实际人数可能要多得多。这些组织松散的团体通过“打倒共产主义者！”“废除强征！”“恢复自由贸易！”等口号团结起来。车里雅宾斯克省最大的农民军自称“蓝军”，拥有约50000名士兵，主要来自南部的哥萨克村庄。然而，他们并没有形成组织严密的军事编队，红军和契卡很快就平定了该地区。契卡处置了143名叛乱农民，其中60人被处决，其余的人被关押入狱。革命后被称为“教养院”的车里雅宾斯克监狱在1920年共关押了10097名囚犯。内战结束后，特罗伊茨克、库尔干和上乌拉尔斯克也关押了数百名囚犯。

内战期间，米阿斯、上乌拉尔斯克、特罗伊茨克、库尔干等地建立了集中营，作为战败的哥萨克人和其他农民军政治犯的拘留所。²¹1921年3月，车里雅宾斯克修道院的几百名修女被判长期监禁。由于苏联历史学家没有研究过这些早期的政治犯集中营，因此对其特点知之甚少。这些集中营在1914—1917年间曾被用于关押德国战俘和其他战俘。²²大多数集中营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大多数被拘留的农民在短期关押后获准回家。关押哥萨克家庭的乌拉尔集中营很快被解散。更“复杂”的苏维埃政权反对者，如前白军官员或哥萨克领导人，一直受到契卡的监视。政治反对派也被特别登记在册。在1930—1932年的肃反运动和1937年的大清洗时期，这些名单经常被用来决定哪些类别的人应该成为各类“大规模行动”的目标。²³

1921年春，列宁成为第一个公开承认早期经济制度失败的共产党员。“新经济政策”出台，赋予农民在缴纳实物税（以粮食或其他产品的形式）后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剩余产品的权利。然而，这些变革来得太晚了，无

法避免一场灾难性的饥荒。大饥荒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俄罗斯南部许多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²⁴与此同时，一些小企业被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某些贸易和工业领域允许私人所有制存在。外国所有者在俄罗斯的企业也获得了优惠。

在“新经济政策”产生效果之前，内战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食品出现灾难性短缺，城市死亡率急剧上升。在车里雅宾斯克省，饥荒和抵抗力下降直接导致3万多人死亡。车里雅宾斯克市的人口从1920年的62654人降至1923年的55735人。²⁵

两个俄国组织和几个外国组织向受难人民提供了帮助，它们向伏尔加河地区和其他地区运送了食品和药品，还建造了避难所和食堂。最主要的救援组织是美国救济管理局（ARA），它向该省的8万多人和车里雅宾斯克市的7000多人分发了食物。食物由当地的7个食堂分发。随美国救济管理局而来的美国医生对当地医院缺乏合格人员感到震惊。例如，在车里雅宾斯克，一名理发师负责综合医院的工作；在叶卡捷琳堡，一名普通的企业工人承担了这一职责；而在乌法，一名兽医承担了同样的职责。这些人都不掌握该地区最常见疾病或流行病的可靠信息。美国人分发药品，希望这些药品至少有一些用处。²⁶与此同时，美国救济管理局的人员，尤其是那些美军军官，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他们怀疑这些美国人在开展慈善活动的同时也在从事情报工作。

与经历了7年战争的苏维埃俄国其他地区一样，20世纪20年代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有大量孤儿和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被称为 bezprizorniki（孤儿）。据政府估计，1920年苏维埃俄国有超过125000名孤儿。1921—1922年大饥荒之后，这一数字增加到50多万。到20世纪20年代末，仍有13万名孤儿生活在大约2000家孤儿院中。

这些孩子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亲戚可以照顾他们。一些儿童被送往寄养家庭，另一些则被送往工厂、手工业商店或农民家中工作。政府努力为这些儿童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能接受基础教育和基本职业培训。20世纪20年代，苏联尝试了许多激进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针对在大城市中流



图 16 在车里雅宾斯克夜间避难所等待登记入住的民众。1921 年，俄罗斯 40% 的领土遭受了灾难性的饥荒，造成 2000 多万人食不果腹。许多人逃往西伯利亚较偏远、受灾较轻的地区，绝望的人聚集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1921 年，车里雅宾斯克疏散中心登记的人数超 10 万。这一年，有 600 多名儿童从车里雅宾斯克的饥荒区疏散到西伯利亚粮食丰富的地区



图 17 制鞋、捆扎、编织和裁缝车间是数百名年轻人的第一所劳动学校

审作案的青少年犯罪团伙。安东·马卡连柯的教学法就是苏联人试图从这失落的一代中培养新公民的一个例子。秘密警察还建立了儿童劳教所。²⁷

本节涉及苏俄历史的一个维度：战争如何改变了俄国社会，以及社会军事化的后果是什么。正如著名的匈牙利—苏联经济学家叶夫根尼·瓦尔加在一本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中所写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强调了内战期间苏维埃政权的暴力、恐怖和报复行为对人民及其新领导层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下一个维度涉及巴别尔和苏瓦林在巴黎讨论的问题，即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如何为预期的下一场大战做好准备。

“新经济政策”背景下的复苏

1921年推出的“新经济政策”给予农民在缴纳实物税后交易剩余粮食的自由。小企业可以被其原所有者收回，而大型企业则仍属于国家财产。事实上，这种混合经济的确在几年内重振了经济，使贸易在经历了1918—1921年的灾难性时期后蓬勃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期，车里雅宾斯克再次成为繁荣的贸易中心，周边村庄的农民在这里开展交易，人口自1923年起大幅增加。这反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在经历多年苦难之后，往往会出现补偿性的高出生率。战争结束后，车里雅宾斯克的畜牧业也得以重建。1920年有21万匹马和24.9万头牛，但1922年下降到8.2万匹马和8.9万头牛。马匹存量到1927年还没有恢复，当时只有19万匹马。但牛的数量得到了恢复，仅在车里雅宾斯克专区（okrug；这只是车里雅宾斯克省的一部分区域）就有31.5万头牛。

“新经济政策”在1926年前都是成功的。然而，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比产业工人快，城市失业率激增，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提醒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正在削弱苏维埃政权。“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新贵们出手阔绰、惹人注目，已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同样，富农也被认为是农村的剥削阶级。

然而，贸易对市场各种动向也很敏感。对农民不利的价格结构导致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减少。国际冲突和战争恐慌导致1927年秋季价格投机性上涨。尽管收成情况或市场动向发生了变化，但国家没有提高其固定收购价格。

党内领导层普遍认为，主要工业企业为国有制，因此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工人的要求必须得到更优先的考虑。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领导层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模式已经耗尽了其潜力。苏联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国内消费，这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太小，消费工业无法获得足够的长期增长需求。

新工业格局的形成

自18世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建立炼铁厂以来，俄国就一直在开发乌拉尔的自然资源。威廉·张伯伦写道：

俄国有一个经典的笑话说，如果一个学生答不上来“某种贵金属蕴藏在哪里”这个问题，他可以直接猜“乌拉尔山”，一定能答对。乌拉尔山脉除煤炭储量低，几乎所有矿产都很丰富：铁、铜、金、铂、镍、铋、铅、锌、钴、钒和钾——这只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矿产。²⁸

19世纪末以后，乌拉尔地区出现了许多工业项目，但根据经济测算，这些项目并不盈利。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西南部和乌克兰的工业比乌拉尔地区要发达得多。地缘政治因素使得重要的工业必须向内地迁移，远离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因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这些地区可能会在外国轰炸机的轰炸范围内。

布尔什维克的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始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军事战略思想（认为最有可能的威胁来自敌对势力联盟）对关于工业增速和增长率的辩论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²⁹ 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决定了战时至关重要的工业应分布于国家内陆，而非集中在乌克兰易受攻击的地区。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乌拉尔地区的老工业工厂进行了重建，增加了新的车间，还从西方购买了现代化设备。这些很多都是延续了沙皇时代科学家和资本家想做的事情。然而，这些项目在沙皇时期未能完成，因为他们缺乏商业动力。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的战略优势在于苏联将拥有第二个冶金基地，以弥补与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现有钢铁厂相比较高的投资成本。

20 世纪 30 年代和“二战”期间，碳化铁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尤其是用于生产优质钢时。然而，木炭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紧缺产品，阻碍了乌拉尔冶金业的发展，使乌拉尔的冶金业无法与乌克兰的相提并论。³⁰

苏联精英、党员干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制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建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数百座新的工业厂房。然而，在这些厂房投入生产之前遇到了许多问题：原材料极其匮乏，而且几乎没有合格的工人和专业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摆脱落后状况，达到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生产水平。用了十年的时间，苏联完成了当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描述的“以巨大代价取得的巨大成就”。卡尔指的是 30 年代创建的超过 9000 家的工业企业，这是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决定性因素。³¹ 钢铁厂、铝厂、镍厂以及机械制造厂位于伏尔加河以东和乌拉尔地区，为未来的武器生产奠定了工业基础。³²

1927 年 12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草案。最高经济委员会发言人瓦列林·库伊比舍夫、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弗·尼·安德龙尼科夫都认为，从国防角度来看，乌拉尔地区的进一步工业化非常重要。³³ 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倾向于继续投资乌克兰煤矿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政党领导人。当时一位美国苏联问题研究者休伯特·克尼克博克于 1930 年指出，布尔什维克在讨论规划这个新兴工业国家时，是从清晰的地缘战略视角出发的。³⁴

20 世纪 30 年代初，苏联军事领导层担心，下一场大战可能会让苏联



图 18 阿伊河和特斯马河上漂浮的木材。20 世纪 30 年代，车里雅宾斯克的炼铁厂继续使用木炭。每天约有 10000 立方米的森林被砍伐用于制造木炭

卷入其中，东部可能要对战日本，西部可能要对战大国联盟。因此，应该在与这两个潜在战区处于安全距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工业基地。1934 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前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格列布·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认为，军事工业应尽可能远离边境，并将乌拉尔的工业基地称为“我们的国防支柱”。

尽管 20 世纪 30 年代频繁宣称要发展乌拉尔地区的军事工业，但实际未能做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必须先建立工业基础，才能保障国防工业在原材料、半成品和机械方面的需求；其次，工业化本身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相反，按照“一五计划”，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的矿山和自然资源；最后，乌拉尔地区缺乏投资资金，因此不得不大幅扩建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乌克兰的现有工厂，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因此，一方面，负责制定规划的国家机构制定了“要将新的国防工业设在内陆”的战略；另一方面，根据军事宣传，苏联领土上只会发生短期的小规模冲突，之后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会被击退并在他们自己

的领土上被击败。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等地都新建了生产炮弹和其他弹药的工厂。1939年之前，很少有军人敢于表达不同于官方表态的其他观点，而官方表态是“敌人的推进距离不会超过装备精良的西部防线（所谓的斯大林防线）100公里”。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情报部门对外国入侵的速度和入侵苏联领土时能到达的纵深程度有着更为真实的认知，而20世纪30年代，最高司令部更为自信。这种对苏联军队实力的盲目自信几乎是致命的。³⁵

引进西方技术并进一步发展技术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苏联大范围开展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培训，通过考试的工程师被派往新的工业城市。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确定，要看他们是在沙皇时代接受的培训，还是在更加政治化的苏维埃精神下接受的培训。1928—1932年间，专业人员遭到镇压，被送进劳改营或被处决。他们经常在表演性审判中被描绘成阻碍工业化的替罪羊。实际上，阻碍工业化的众多问题是政治决策导致的。事后看来，这可以解释成在工程技术界强制进行的代际更替。

最初的五年计划是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1927年12月党代会的指示制定的。然而，这些指导方针很快就被修改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最初，国家为整个乌拉尔地区制定了切合实际的目标。1929年夏，莫斯科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根据已经捉襟见肘的投资计划，提出更高的目标。同年晚些时候，这一计划又进行了调整，因为工人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建议”。一个包罗万象的“大乌拉尔计划”包纳了早期商业企业的许多建议、电气化计划和该地区五年计划的最新草案。该计划于1929年9月被讨论，1930年4月获批。苏共中央委员会1930年5月15日决议中《关于乌拉尔地区的冶金任务》即指该计划。“大乌拉尔计划”最终于1930年获得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批准。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份特别大胆的规划文件，即使是接近计划要求的生产水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1933—1937年的“二五

计划”更稳妥，更符合实际情况。

经过数年的论证，国家决定在乌拉尔南部马格尼特山铁矿附近建造一座新的钢铁厂，而非选址于俄罗斯南部传统工业区。煤炭将从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地区的卡拉干达盆地运来。乌拉尔的这一设想是对莫斯科已批准计划的进一步发展。乌拉尔领导人为他们的项目进行了游说，该项目被称为“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康比纳特联合项目”³⁶。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几个类似的尝试之一，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否则该地区的资源将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个长期愿景是对北乌拉尔地区资源的工业利用——扩大铁路网，以扩大林业产品的出口。³⁷

如前所述，五年计划中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之一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该钢铁厂以创纪录的速度建成。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该厂的铁矿石产量达到583万吨，铸铁产量为155万吨，钢产量为149万吨，轧铁产量为118万吨，达到了预计的最大产能。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两个钢铁厂对军事工业意义更大，因为它们以巴卡尔的较纯铁矿石为基础，并使用木炭进行加工。阿沙优质钢铁厂首先建成。1938年，萨特卡工厂和阿沙工厂共生产铸铁14.3万吨，阿沙工厂还生产了5.7万吨优质钢。

几年后，巴卡尔的优质钢铁厂开始利用当地的矿石资源进行生产。几年来，建设工程按计划发展，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相辅相成。1932—1934年间，米阿斯河上的一座新公路和铁路桥、一个机械车间、一个锯木厂和几个车库相继竣工。然而，由于缺乏资金，工程于1935年停工。直到1941年初，与德国的战争似乎已是板上钉钉，军事工业对钢铁的需求增加，工程才重新开始。

需要强调的是，除铁矿石外，许多其他矿产对现代机械制造和军事工业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铜、锌、铝、镍、钴、钨、钼和其他金属，就不可能生产出比铁、铸铁和钢更容易处理和锻造的特种钢和许多其他合金。镍、铬、钨和钛比铁更硬，可以帮助生产出极其坚固的合金。20世纪30年代，铝的大规模生产使现代飞机工业成为可能。当时上述所有金属都是在乌拉尔地区开采的。³⁸

车里雅宾斯克锌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工厂设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原因是决定同时建造一个区域性燃煤发电站，因为锌的电解精炼非常耗能。发电站的建设始于1930年，但由于缺乏资源，如低质量钢的钢筋数量供应不足，发电厂施工进度一直被推迟。到1932年，锌厂本应完工并达到其预计产能的一半（每年10000吨锌）。但事实上，甚至连厂房本身都没有建好。直到后来，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调整重点工作方向，锌厂才得以完工。³⁹

新建成的车里雅宾斯克发电站对于这里的锌厂和其他有色金属厂等对能源有需求的企业有重要意义。该发电站的发电量为99000千瓦时。

20世纪30年代，车里雅宾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发电站只能部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与此同时，车里雅宾斯克以东的科佩伊斯克（科尔基诺和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开始开采褐煤。新工业需要大量运输工具，大部分铁轨需要翻新，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而其他既有线路和一些全新的铁路连接线需要复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南段（萨马拉—乌法—车里雅宾斯克）经维修和设施更新，一直延伸到托木斯克，并在那里与北段（雅罗斯拉夫尔—维亚特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相接。随着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兹拉托乌斯特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发展，南乌拉尔地区铁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铁合金厂（后称为车里雅宾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在20世纪30年代对国防工业至关重要。工厂于1931年8月落成，第一批熔炉于1930年11月7日开始烧制合金，到1933年，工厂共生产铁合金12710吨，其中包括3451吨优质合金。总体而言，除优质合金生产外，工厂基本能完成计划产量。在使用新设备的初期，生产曾多次中断，原因往往是电力供应不足或电极磨损而未更换。30%的停产是因设备需要维修而导致的，1933年熔炉的使用时间不到12000小时。⁴⁰1938年，工厂生产了15.7吨铬铁、12.8吨硅铁、2.5吨钨铁和1160公斤钼铁。⁴¹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和西西伯利亚的工厂都需要铁合金厂的产品，以供装甲金属板、建筑工具和其他需要加固的物品所用。

42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195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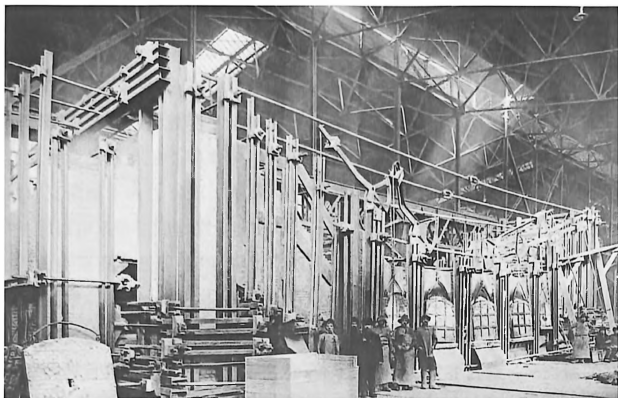


图 19 1926 年兹拉托乌斯特老冶金工业城的机械厂。该企业的大部分设备都是从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运回的，内战期间白军曾将这些设备运往那里。1919 年，生产从较低水平重新开始

铁合金厂的一份内部报告生动地描述了新兴产业的情况：

与许多其他企业一样，工人和职员流动性也很大。1932 年，工厂共有 1416 名工人和 308 名职员，当年 1253 名工人和 284 名职员离开了工厂。车间的通风系统失灵，夏季酷热难耐。由于许多窗户坏了，且车间之间的门几乎总是开着，因此出现了交叉气流。许多人离开工厂的另一个原因是承诺的住房尚未建成。工厂的食堂没有自己的厨房，所以食物都是用保温桶装了送来的。有报道称，稀汤、粥和其他饭菜都不能让人满意。有时，工人们干脆不吃这些食物。没有完善的工资制度来鼓励工人留在工厂工作。除了瓦尔特是工厂的技术负责人外，所有管理人员都是刚毕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在 1931—1932 年完成学业，在工厂开始他们的第一份工作。⁴²

一整章的篇幅不足以描绘出强制工业化的问题和其进程的全貌。然而，一份简明的该地区建造的工厂清单却藏着工业动员的基础，因此也隐现了苏联为 1941—1945 年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

位于乌法莱斯克的镍矿厂于 1933 年竣工。⁴³与此同时，车里雅宾斯克研磨工具厂也新建了一个机械生产园区。1933 年，机械制造业获得了 42 吨切割片和磨片以及 1610 吨颗粒状明矾。次年，在卡缅斯克-西纳尔斯克建成了一家新的轧钢厂，在车里雅宾斯克建成了一家电极厂。⁴⁴1935 年 5 月，现代化的奥尔忠尼启则机械制造厂在车里雅宾斯克落成。虽然其基本生产线是重型机械，但该企业也有一个工业动员计划，战时将生产炮弹和其他弹药。⁴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工作重点是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长率，而到 1933—193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工作重点转向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单就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言，问题很多。⁴⁶

加强农业现代化与加强国防潜力这两者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冲突。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能更好地协调不同领域的企业？不同工厂之间的联系以及金属和机械制造领域中相互关联的企业之间的分工都是统一计划的，目标是实现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并在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实现不断增长。然而，长远来看，乌拉尔的工业结构过于单一，“二战”后必须纠正这种不平衡，以生产更多消费品。乌拉尔地区地域辽阔，跨越地区（州）边界，缺乏规划。部委层面（1946 年前为人民委员部）的每项决定都涉及其他几十个部委的工作，地区一级也是如此。

农村改革：集体化和去富农化

在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激烈讨论中，各委员会提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草案。随后，在中央政权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该计划被修订。乌拉尔地区将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与此同时，20 世纪 20 年代末，党的领导人就如何进行农村改造展开了辩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市场上的粮食盈余更多，既能养活

44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1950 年代）

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同时还能出口农产品。除了木材和谷物，苏联几乎没有能带来可观出口收入的商品。五年计划假定，工业机械的进口将由农产品出口提供资金，因为苏联不可能指望获得条件优厚的外国贷款。

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是，以斯大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为何不再接受在“新经济政策”框架内，一方面在农村构建富裕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建立国有、合作和私营农业的想法。根据他们的解释，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已经丧失了扩张的可能性。农业以自给自足的耕作为主，因此被视为工业增长的阻碍。上市农产品的相对份额确实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因为所有权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家庭现在是独立、自给自足的单位，没有动力扩大生产以面向市场销售。换句话说，国家无法依靠这种农业体系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直到1929年，按照计划，农业集体化应与推广新技术同步进行，以实现大规模产量。然而，农民与国家定价政策之间的矛盾在1927—1928年间导致了一场销售危机。国家对那些不同意按固定低价交粮的农民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危机暂时得到了解决。斯大林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率队前往全国各地，强迫农民出售更多的粮食，否则农民就会面临“投机倒把”的指控，这是苏联刑法中所规定的罪行。1928年冬，这种所谓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强迫交粮法”重现了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普遍做法。这一时期，布哈林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继续主张与农民建立更柔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联系。

“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农民在缴纳固定的实物税或货币税后，可以自由进行剩余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交易。在经历最初的困难时期后，贸易迅速扩大，但人们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

价格的变化对农业不利，就导致市场上的粮食数量减少。1927年的国际冲突和人们的战争恐慌心态导致当年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然而，无论作物产量和市场走势如何，国家都拒绝改变其定价政策。1927年秋天，城市在食物供应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决定对被控囤积粮食用于投机目的的农民采取镇压措施的直接背景。在秘密警察（当

时叫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下,1928年冬季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开展了没收粮食的运动。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1928年城市发生饥荒,并被批准为临时和非常措施。然而,第二年秋天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政府不得不广泛采用武力。上层农民被描绘成反对农业现代化和集体化的社会力量。斯大林领导集体一步一步地敦促加快集体化的速度,速度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仅有小幅增长。

20世纪20年代末,在乌拉尔地区,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被组织起来,这些合作社主要是消费者合作社和手工业者合作社。当粮食供应计划未能实现时,人们的意愿和“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就产生了分歧。1927年冬至1928年春,全国的粮食供应形势令人担忧。据报道,矿业城市科佩伊斯克出现了面包短缺的情况,人们为了能在早上商店开门时买到面包,半夜就排起了长队。在矿山,工人们在讨论:如果面包短缺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否要举行罢工。1928年4月26日,434名矿工罢工。⁴⁷1928年1月至2月,乌拉尔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大清洗,1157名工作人员被解职,并经常以各种罪名被捕。农民被迫交粮,不交粮的惩罚包括罚款、限制用水和炉灶、不让孩子上学及减少医疗服务。这些措施导致大量抗议信涌向政府。尽管如此,到1928年5月,这些计划也只完成了83%。⁴⁸1928年11月的粮食交付量仅为上一年的58%。农民拒绝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更多的粮食,因为政府规定的价格仍然很低。“新经济政策”进入了死胡同,因为工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无法生产出足够的商品来刺激农民出售更多的粮食以购买工业产品。

国家要么采取镇压和强制征用的手段,要么向农民让步,即改变定价政策,以便将粮食推向市场;这可能意味着会留出更少的粮食用于出口,相应地,能用于金融投资的资金也会减少。1928年,国家通过推行“自征税”,引入了一种新的强制向国家支付的手段。自征税不超过农业税总额的25%,由农民自己在公开会议上确定。1929年1月,一项新的指令允许自征税高达土地税的50%,这几乎等于完全没收了农民的财产。⁴⁹

1929 年的前九个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整个乌拉尔逮捕了约 1000 人，其中 380 人根据《反革命法》第 58 条以“反革命行为”被判刑，而其他许多人则在普通法院受到指控，并因其他罪行被判刑。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加快农业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1929 年的强征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除粮食外，还包括奶制品和肉制品。⁵⁰

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首先是从农业集体化开始的，即通过频繁使用强制手段，用比原定计划快得多的速度在农村推行集体化。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因为发展的先决条件是通过几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和集体化来实现机械化和技术先进的农业，拖拉机和机器将逐步取代马匹和其他役畜。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党的领导人奉命确保迅速建立集体农庄，但这些农庄很少有从一开始就拥有现代化设备的。

斯大林的目标得到了核心领导层的支持，他们将工业化视为巩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基本前提的途径。斯大林在这些事件中的个人作用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周围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这些党的干部与斯大林持有相同的观点，有时甚至比他更渴望对农村的富裕阶层采取严厉措施。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即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工厂、发电站和矿山。许多政治会议讨论了对播种和收成的预测以及粮食需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党的最高机关就集体化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第一批集体农庄大多是由贫苦农民建立的，而且确实是以自愿协议为基础的。然而，从 1929 年夏天开始，一种更具压迫性和强制性的方法开始实施。1930 年 1 月，政治局决定，凡是粮食过剩的地区，都要建立集体农庄。在混乱的几个月中，农村当局强迫农民把马匹和机器交给新成立的集体农庄。当时的目标是在 1930 年春播之前全面建立集体农庄。几周之内，许多村庄就完全实现了集体化。然而，许多农民强烈抗议集体化。其中一种抗议方式是大规模屠宰牲畜；农民宁愿屠宰自己的牲畜，也不愿把它们交给新集体。马、牛和山羊被大规模屠宰。1929—1934 年，马的数量从 134 万匹减少到 31.5 万匹，牛从 207 万头减少到 122 万头，绵



图 20 1927 年，在特罗伊茨克区，一台拖拉机正驶向田间。1926 年，整个乌拉尔地区只有 555 台拖拉机，其中大部分归机械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所有。车里雅宾斯克地区计划建立 6000 个新的定居点，农民可以在那里获得贷款、社会福利和牲畜饲料，这样就可以建立新的村庄



图 21 车里雅宾斯克地区街道上工人合作社的百货店

羊和山羊从 330 万只减少到 118 万只。尽管在随后的几年里情况有所恢复，但车里雅宾斯克州 1937 年的牲畜数量还是比 1926 年减少了（马的数量减少了 24.8%，牛的数量减少了 57.7%，猪的数量减少了 51.5%，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减少了 57.7%）。⁵¹

1929、1930 年之交的冬季，参与抗议活动的农民远远多出了那些直接受到征用威胁的农民。因此，共产党领导层被迫放慢集体化进程，强调自愿过渡到集体农庄。斯大林在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中，将错误和过激行为归咎于地方领导。1930 年第一次运动期间建立的许多集体农庄基础薄弱，政府一宣布加入集体农庄是自愿的，许多农民就选择离开。在集体化的下一阶段，政府制定了更合理的目标，对个体农民使用了更少的强制手段和更多的经济杠杆。到 1932 年，乌拉尔地区的集体农庄农民人数下降到约 7 万人。1931 年和 1932 年，乌拉尔地区发生了许多抗议事件：有人印制和散发传单，呼吁消灭苏维埃政权，而流亡的政治团体则实施了各种恐怖行为。

在集体化期间，乌拉尔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整体下降，总收获量（按收获时计算，不考虑后来实际驳运和储存的数量）从 1928 年的 494 万吨降至 1932 年的 335 万吨。牲畜数量减半，从 1270 万匹 / 头马和牛减少到 530 万匹 / 头。⁵²



图 22 1930 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国营农场用马收割



图 23 1930 年夏天的巴兰查国营农场。自 1929 年以来，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共成立了 17 个国营农场

1931 年的歉收和 1932 年同样糟糕的收成预测迫使乌拉尔当局削减了城市的口粮，甚至削减了集体农庄成员的口粮。与此同时，乌拉尔地区开始出口食品。1931 年，有 5 吨黄油、6.5 吨熏肉、345 车鸡蛋和活禽被运往国外，其中包括：438500 只母鸡、275000 只鹅、25000 只鸭子（比 1930 年增加了 80%）和 552933 只野味；49 吨肉脯（98000 罐）；49.3 万罐鱼脯；22.5 吨冷冻高山红点鲑和 18.4 吨冷冻三文鱼。这可能是因为某些部门负责出口，某些部门则负责内部采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党委无权改变中央决定的出口计划；中央认为从外贸中获得硬通货更为重要，即使这会导致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⁵³

尽管 1932—1933 年之前收成不佳，但这一时期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饥荒并不像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那样严重。乌拉尔的大部分地区（143 个地区中的 70 个）经历了饥荒，这被委婉地称为“粮食问题”；换句话说，饥荒导致了普遍的乞讨和偷窃集体农庄财产的现象。“特殊定居者”，即来自其他地区的被驱逐的富农，在这个冬天遭受了灾难。

1932年，随着收获季节的临近，通过了一项法令，人们称之为《五穗法》。8月7日颁布的这项法令中，对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处以严厉的惩罚——从强制劳动到死刑不等。饥肠辘辘的农民从自家田里“抢走”的粮食远不止几个玉米。农民和全家人（往往有20—30人）会在晚上拿走几十公斤的粮食，然后藏起来。斯大林在给另一位党的领导人的信中说，这项法令主要适用于这类群体。根据这项法令，乌拉尔地区有2.77万人因在粮食收获期间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和其他不轨行为而被判刑。从1932年8月到1933年5月，763人被判处死刑，961人被处以最高10年的监禁，305人被判短期监禁，165人被判处在原工作单位劳动（收入减少）。大多数被判刑的人是集体农庄的普通人，即所谓的中产阶级和贫农。⁵⁴若干年后，许多人的刑期得到了减免，不再被统一关押。

纵火焚烧集体农庄财产和草垛的现象十分普遍。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委员会向南部的特罗伊茨克发出命令，要求可靠的集体农庄成员组成卫队，日夜保护田地和干草垛。秘密警察的地方机构负责粮食收割。⁵⁵

与此同时，集体农庄的新干部也在大清洗中经受了考验。1932年秋天，许多地方领导人自己建立了粮食储备，为的是在冬季为集体农庄的家庭提供粮食，而不是完成国家交付的配额。地方党组织在一封信中威胁说，如果不首先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将受到严厉惩罚。没有完成配额的集体农庄被迫放弃他们预留的少量储备。⁵⁶1933年，3万多人被解雇，其中包括担任集体农庄高级领导职务的人和许多普通人（机械师、拖拉机手等）。⁵⁷

1934年车里雅宾斯克州成立时，全州共有4199个集体农庄，26.8万个家庭，118个国营农场。1933年，除了37000个家庭被迫离开集体农庄外，还有13100户自愿离开集体农庄；只有21800个家庭加入了集体农庄。约有100个机械拖拉机站为集体农庄提供了4780台拖拉机和1115台联合收割机。1934年10月，有11.9万个家庭不属于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换言之，69.5%的人口实行了集体化。⁵⁸从1934年起，剩下的125395个个体农民家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要加入集体农庄的近27万个

农民家庭中去的压力。⁵⁹ 1934 年底，共有 4780 个集体农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总数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南乌拉尔地区的去富农化

20 世纪 20 年代，政府甚至试图找到经济标准，将富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1930 年的法令根据经济和政治标准，将最富裕的农民群体分为三类——最“反革命”的农民被送进劳改营，他们的家人被驱逐出村庄；第二类富农被驱逐到乌拉尔北部偏远地区或西伯利亚；第三类富农仅被驱逐到该地区的偏远地带。通过各种措施，富农的财产被转移到集体农庄。拥有较小农场的富农在村外获得了新的财产，有时还在远离铁路和河流的地方建立了新的特殊定居点。

1930 年 2 月 2 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提到了“清算富农”。在这一点上，有必要简短地说明一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作为一个阶级



图 24 米尼亚尔区的苏哈亚·阿蒂亚特殊定居点。虽然被驱逐的富农及其家人在特别村落是隶属于古拉格管理体系的，但他们的地位与劳改营囚犯不同。一段时间后，这些村庄拥有了包括学校在内的发达基础设施。根据 1936 年的一项法令，富农及其子女原则上可以享有与普通苏联公民相同的权利，只是他们必须留在自己的村庄里。青年们感到很苦恼，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接受同样的入伍前的训练，甚至无法通过流行的伏罗希洛夫神枪手徽章的测试。那些嫁给附近自由公民的女性，她们被驱逐的身份得以解除，可以离开这个特殊的村庄。条件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领导及其态度，而非成文的法律法规。当条件艰苦林区的一些特殊定居点蒸蒸日上、范围扩大时，某些领导甚至会谈论去富农化的风险。针对富农的特殊定居点制度于 1948 年被废除

消灭”意味着要消除富农重新崛起的社会和经济先决条件。在俄国内战期间，一名契卡工作人员曾吹嘘说，1918年的红色恐怖要“消灭资产阶级”。列宁斥责他不懂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红色恐怖的任务绝不是消灭资产阶级个人，而是消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先决条件。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讲话和对富农的威胁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与当时纳粹德国的宣传和苏联的其他描述相反，去富农化的目的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身体健康的农民。富农只是在苏联社会中被降格为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被迫从事指令性工作，领取以实物支付的最低工资。⁶⁰

各个小组的名单上都注明了村里哪些人参加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这些人被称为富农或中农，他们的财产被充公，还连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村庄。富农被迫把牛和工具交给集体，然后跋涉数百公里。最初决定将车里雅宾斯克专区2200户人家的财产充公，而且每个村庄都有名单。当时的口号是“过度去富农化的村庄总比去富农化不足的村庄要好”，尽管“富农”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富农的房屋、农具和牲畜被没收。原则上，允许一个富农家庭保留他们的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床上用品、厨房设备以及林业和捕鱼所需的工具，外加三个月的食品及被驱逐期间的500卢布费用。不过，其他村民没收富农个人物品的情况也很常见。

乌拉尔地区共有3万多个家庭被定为富农，他们的财产要被征用。南乌拉尔地区（包括车里雅宾斯克及其周边地区）占了其中的4000—5000个。最终，“反革命富农家庭”的数量被确定为4685个。这些家庭中的父亲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甚至被处决。车里雅宾斯克专区的这类富农家庭有700个。第二类富农将被送往偏远地区，整个乌拉尔地区有15200个家庭，仅车里雅宾斯克专区就有2250个家庭。

富农的财产征用和驱逐大多由秘密警察机构执行，有时还得到红军的支持。根据官方报告，这些决定大多是在与贫农和集体农庄举行的公开会议上通过的。除上述两类家庭外，另有700个农民家庭被驱逐出农庄，但获准在同一专区重新定居，即在附近但不在集体农庄内。⁶¹

为了增加充分集体化地区的数量，乌拉尔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3月8日决定，将剩余的富农从占集体农庄总面积40%的地区驱逐出去。所有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家庭都因政治态度而被归到标准模糊的“富农”里——无论其经济状况是否符合该类别的原始标准——并被驱逐出该地区。1931年，乌拉尔地区有12000个农民家庭被遣离，次年又有5000个家庭遭遇同样的命运。与此同时，大乌拉尔州接收了来自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乌克兰的123000名被驱逐的富农。这使得乌拉尔地区成为苏联被驱逐富农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去富农化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许多人设法逃离了自己的村庄，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勤俭持家的农民们已经过上了一定程度的幸福生活，在村子里也受到尊重，但他们却被迫离开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在严酷的条件下重新开始。他们的家人不得不在贫瘠的林区开始新的生活，住进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的特殊定居点。驱逐区的地方苏维埃和党组织并没有为开展这种劳教做好充分准备。1930年和1931年的冬天，无数儿童和老人死在了特殊定居点。即使用最新的史料，也无法计算出当时乌拉尔地区到底有多少人注定要死亡。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随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后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接管这些特殊定居点，粮食供应情况最终还是稳定了下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劳改营和富农家庭特殊定居点，他们负责提供食物，建造学校和文化场所，并征用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在这些地方从事各种工作。这仅能使生活条件略有改善。例如，1932年1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将140人定罪，据称他们以投机性的高价出售了4万吨粮食，而这些粮食本应分配给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特殊定居点。尽管如此，被驱逐者的人口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即使在1935年1月，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的“特殊定居者”中，死亡人数（1292人）也多于出生人数（743人）。

那么，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果呢？就为什么苏联领导层在斯大林的最高指导下进行残酷的集体化，人们给出了很多



图 25 上纳辛斯克特殊定居点的政治保卫总局管理者与努力完成每日锯木配额的年轻人在一起

原因。根据斯大林本人晚年对集体农庄制度最失真的描述，更稳定的食品供应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成果。这与早期试图通过生产机械化和现代化来提高粮食产量的观点不同。自农业集体化之后，领导层可以实施他们计划中的工业化，而无须过多考虑农村直接生产者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些生产者的地位因集体化而发生了变化，1932年实行的新护照制度使农民陷入了一种精致的“农奴制”，他们无权离开家乡，只能在国营农场或附近的建筑工地从事计划中的工作。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施耐德从军事角度解释了残酷的集体化，认为这是斯大林试图融合亚历山大·斯维钦和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等军事战略家关于现代社会要为全面战争做好经济准备的思想。如果没有安全的粮食采购来源，苏联将无法在现代战争中抵御装备精良的敌人。施耐德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因素，可以阐明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和30

年代实施新战略背后的一些原因。在其他方面，斯大林提到了俄国内战的经验以及稳定可靠的后方的重要性。⁶²

维克托·泽姆斯科夫对各类特殊“劳教人员”进行了详细研究。根据1930年8月18日的一项法令，政府打算通过去富农化让农民去北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劳教，并发展该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林业。然而，1931—1932年起，流亡农民更多地被派往建筑工地或工业工厂，因此被视为一种普遍的劳动力队伍。⁶³

1932年，乌拉尔执行委员会就如何安置特别移民发出了指示。这年，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工作场所、住房、伙食和学校等事项。情况比1930年和1931年要好一些，此前成千上万的被驱逐者（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儿童）死于饥荒和疾病。⁶⁴苏维埃地方政府有义务为定居者



图26 科佩伊斯科的褐煤矿，长12公里，宽11公里。该煤矿1904年被发现，1916年开始开采，1918年国有化。1901年，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生产轨道式挖掘机，这种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

• 著名的基洛夫工厂的前身。——编者



图 27 被驱逐的富农家庭抵达车里雅宾斯克东部褐煤区的矿场。截至 1935 年，共有 2671 个家庭（10776 人）被送往科佩伊斯克。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几乎 50% 的被驱逐者在几年内就逃离了该地区。1931 年共有 2913 人逃离，1932 年 6038 人，1933 年 3070 人，1934 年 460 人。科佩伊斯克矿工城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不断扩大，到 20 年代末已拥有约 3.1 万居民。被驱逐的农民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工人村，村里有大约 2300 座营房和 1263 个防空洞

的子女提供文化和教育设施。必须修建七年制学校，或者每 9000 名居民至少有一所学校。在大一些的特殊定居点，阅览室和读书俱乐部也设立了，有经验的教师——最好是党员——被派往这些定居点。⁶⁵ 根本动机是让孩子们在与所谓的反革命父母分离的环境中接受教育。⁶⁶

来自乌克兰和伊万诺沃中部工业区以及大乌拉尔州的 180 万富农及其家庭成员（30 多万户）被驱逐出原居住地。1931—1932 年，许多人反对驱逐判决提出上诉，但只有一小部分上诉得到直接批准。例如，如果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红军中服役，该农民就不会被“去富农化”。在其他情况下，委员会将对有关农民身份的申诉进行调查。只有不到 10% 的抗议者获准返回家乡。还有一些人被宣判驱逐罪名不成立，并获得了补偿，但被说服留在驱逐地。随着新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些地方不再被称为“定居者村落”（spetsposëlok），而是“劳动者村落”（trudposëlok）。1934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劳改营和劳动村管理总局提交了一份地区报告，对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这类村庄进行了描述。这份报告长达 150 多页，包括每个村庄的地理位置和专业化程度、人口结构、富农的再教育情况以及托儿所和医院的数量等数据。

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这部分古拉格劳改营由 34 个劳动村组成，居住着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乌克兰和乌拉尔其他地区的被驱逐

农民。共有 52256 人和 14532 个家庭居住在那里，分布情况见表 1。⁶⁷

表 1*

地点：车里雅宾斯克州（活动）	村庄数量	家庭	居民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马格尼托建设）	4	6842	24104
米尼亚尔斯克（林业）	4	301	1121
萨特卡（马格内齐特工厂）	1	376	1373
-’ -（巴卡尔矿山和工厂建筑）	2	429	1612
卡拉巴赫（铜矿）	3	681	2790
卡米谢尔（砖厂）	1	360	1421
兹拉托乌斯特（建筑、矿山）	4	537	1997
卡缅斯克（西纳尔建设）	1	465	1880
-’ -（采矿）	2	531	1951
克什特姆（乌维尔迪的渔业公司）	1	23	84
车里雅宾斯克（托米诺-索夫乔斯）	1	146	323
-’ -（内务人民委员部刑罚和强迫劳动）	2	906	1922
总计	34	14532	52256

这些村庄分散在一个有 250 万居民和数千个普通村庄的地区，在那里，集体农庄是主要的组织形式。“特殊定居者”满足了多地的劳动力需求——如米尼亚尔斯克地区的林业和伐木业，卡拉巴赫、萨特卡、兹拉托乌斯特、科佩伊斯克和卡缅斯克的矿石和煤炭手工开采工作，以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卡缅斯克新工厂的挖掘及建筑工程作业。在一些建筑工地，多达 60% 的工人是“特殊定居者”。

这些村庄的平均居住面积为每人 1.88 平方米；其中 47199 人住在不

* 该表数字加总结果有误，疑原书丢失条目。——编者

适合居住的防空洞中，53693人住在有一个公共休息室的营房中，101556人居住在每户都有单独房间的标准营房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还显示，条件最差的是偏远地区，那里的成年人从事伐木活动。1935年，每个工人每月可领取5公斤面粉、0.5公斤谷物和0.3公斤糖。人们还注意到，“特殊定居者”很少有机会用正常方法获得食品，许多老年人只能吃其他东西替代，把食物留给孩子们吃，甚至偶尔还有人吃人的报道。1932年11月，一个由140人组成的团伙因盗用4万吨本应运往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给“特殊定居者”的粮食而被定罪。⁶⁸

几年后，情况稳定了下来。定居者们从防空洞搬进了自己建造的房屋，这些房屋通常有几个房间。在那些森林已被砍伐的地区，土地用于耕种，粮食状况略有改善。许多被驱逐的农民参加了职业培训，尤其是采矿和建筑专业的培训。尽管如此，煤矿工人所在城市科佩伊斯克的生活条件还是不如附近的车里雅宾斯克。该市5万居民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从车里雅宾斯克来的旧水管是木头做的，有腐烂的风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认为，科佩伊斯克的供水问题需要在几年内解决。⁶⁹

共有7632个家庭的24916人被驱逐到科佩伊斯克煤矿。由于住房和生活条件恶劣，1931年有2913人逃亡，1932年有6038人逃亡，1933年有3070人逃亡，1934年人数大幅减少到460人。总共有12481人——占被驱逐的富农的50.4%——逃离了科佩伊斯克的这些特殊村庄。定居点在最初几年死亡率极高。1931年，被驱逐者中有800多人死亡，1932年有1130人死亡，1933年有704人死亡，1934年有336人死亡。仅因流行病，这几年就分别有283人、416人、24人和12人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车里雅宾斯克负责人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⁷⁰有一组数据可以作为对比，有6886个富农家庭被驱逐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造冶金厂，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总人口为24063人，其中13447人是能干的劳动力。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最初建设阶段，这是一个边缘但重要的群体。

截至1935年1月1日，车里雅宾斯克煤矿管理局统计出2671个家

庭和 10776 名家庭成员，其中 4551 人被认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总共有 4888 人受雇，煤矿工作之外，他们还在农业部门和车里雅宾斯克的手工业商店工作。这些被驱逐的农民约占科佩伊斯克煤矿总劳动力的 45%。即使在 1934 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特殊定居者”的死亡率也高于出生率——当年有 1292 人死亡，只有 743 人出生。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由当地的内务系统为古拉格中央当局撰写的。哪些数据可能被篡改，哪些数据地方当局为了不惹麻烦可能隐瞒？他们是否低估了死亡率，只列出了部分死亡人数？他们是否因未报告婴儿的死亡而得出错误出生人数？主要的问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特殊定居点的领导是否会向人口登记机构和地区统计局提交数据不真实的报告。

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仔细验证，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准确的答案，因此对一些人口和生产数据应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1934 年，车里雅宾斯克煤矿报告说，许多由原富农组成的大队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在这一年，就有 114 名劳动表现非常积极的富农重新获得了公民权利。如富农能提出生产合理化和如何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建议，还能获得金钱奖励。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车里雅宾斯克煤矿都在努力缓解科佩伊斯克的住房问题，并修建了一些体育设施和普通教育设施。然而，与车里雅宾斯克的条件相比，该地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仍未受到足够重视，处于落后状态。

20 世纪 30 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州被迫城市化，与整个苏联社会一样经历了成长的痛苦。南乌拉尔地区的城市仍未形成稳固的人口结构。每个市镇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农村移民的生活习惯和举止特点。

另一股移民潮是由 7100 个家庭（包括家庭成员 33158 人）组成的，他们自愿从俄罗斯贫困地区迁往车里雅宾斯克州。其中 5985 户加入了集体农庄，403 户后来决定返回家乡。1940 年 4 月 21 日，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再将其他地区的 1 万多个家庭转移到车里雅宾斯克州。截至 1941 年 1 月，已有 10420 个家庭抵达，其中 2410 户于 2 月 15 日返回家乡。⁷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逃离农村。在1921年和1922年的饥荒时期，许多农民家庭背井离乡，迁离了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强制集体化开始后，移民人数急剧增加。1930年，特罗伊茨克的45947所房屋有一半以上（23056所）被废弃。到1935年，该地有17000多所房屋登记为空置三年以上。一些被驱逐的富农作为移民来到车里雅宾斯克，他们得到了这些废弃的房屋。一些人在不属于集体农庄的土地上造了房子。其他“特殊定居者”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不得不在短暂的夏季建造第一所房子，通常使用的是用干草、亚麻布和其他材料混合制成的特殊砖块。

1926年，车里雅宾斯克及周边地区83.8%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到1939年，这一数字下降到57.8%。从绝对数字来看，农村人口从198万减少到162万，而城市人口则从38.2万增加到118.2万。根据1939年1月17日的人口普查，1938年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面积为163500平方公里，人口为2802904人。这意味着自1926年以来，总人口增长了18.34%（1926年该地人口为2368460人）。南乌拉尔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政策性人口增长。这主要包括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他地区迁移到乌拉尔新工厂的产业工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被驱逐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他们在1930—1933年的强制集体化中失去了大部分财产。

有目标地长期建设大型工业企业（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和车里雅宾斯克的大量金属和机械制造企业）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农业集体化的一个主要影响是损失了最有生产力的农民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去富农化意味着成千上万拥有多年农业经验的最为节俭的农民不得不放弃参与地区发展。然而，最终国家与广大农民总体上达成了妥协，为不断发展的城市确保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因此，斯大林可以合理地宣称，他已经实现了在战争情况下确保后方安全的条件之一。不管怎样，斯大林显然认为国家利益比人权和个人财产更重要。



图 28 “社会主义建设”——尼·科托夫 1927 年创作的海报

第三章 工业城市：社会主义愿景和苏联现实

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尤其是对民主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看法）与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孟什维克）的基本看法不同。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意义的意识形态理念作为指导方针，显然存在风险。即使在苏共政权解体后，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在争论如何最好地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并以各种形式存续到 1991 年的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人们不加限定地使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来描述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那么这种用法与斯大林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的术语用法是一致的。此后，人们讳莫如深地质疑在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国家能否建立起以前在欧洲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党内确立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标准只涉及财产关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农业和其他领域的企业归国家或合作社所有，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战胜了私人资本主义。斯大林宣称：1936 年通过了新宪法，建立了社会主义，对这一点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提出疑问。瑞典斯拉夫主义者安东·卡尔格伦教授等人就提出了疑问。在《斯大林传》中，卡尔格伦描述了苏联社会是如何实际保留和发展典型阶级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实现平等和其他社会主义目标的。卡尔格伦描述了苏联的日常生活和高层政治，指出了新的特权阶层和被剥削阶级的形成。他甚至谈到了“政党资产阶级”是新的统治阶级。¹ 卡尔格伦的观点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的论

争早了几十年。后来的论争是由持不同政见的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万·吉拉斯及其著作《新阶级》引发的。该书认为，一个具有沙皇和西方社会特征的制度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的。总体而言，那些不接受苏维埃统治者所塑造的自我形象的西方观察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没那么多幻想，并能更好地描述这个国家在斯大林时代前后的历史演变。²

今天，通过查阅秘密警察的报告以及苏联公民的日记和通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讨论和质疑远比西方学者过去想象的要多得多。列宁和1917年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并不指望将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社会转向社会主义方向，除非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发生革命。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识到，他推动全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失败，俄国内战的胜利并没有为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转型创造先决条件。如何实现俄国经济现代化的问题就更不清楚了。在列宁最后的著作中，他悲观但现实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描述为俄国的原型。列宁曾研究过德国著名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德国战时经济的著作，并期待与他会面。然而，1922年，列宁中风，拉特瑙遇刺身亡。当然，历史上还有其他的选项，但由于所谓的意外情况，这些选择都没有实现。³ 20世纪2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斗争在执政党内愈演愈烈。斯大林设法让党内更多的追随者接受他的思想，即通过工业化和彻底改变农村生产条件在苏维埃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使他在党内精英中的理论领袖地位合法化，同时也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社会主义理想似乎是一盏指路明灯，这样，党的宣传就可以灌输一种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从而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牺牲意愿。

那么，斯大林主义能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版本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抽象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基于某种理论）与具体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也要严格区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传统）的模式（有时称为理想）与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的具体形式。

当然，历史上俄罗斯这一地区的环境与社会主义社会模型的差距相当大。因此，地区层面的案例研究只能阐明发展的复杂性。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的转型可以更好地解释为领导层努力实现国家生产力的军工动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领导层希望发展教育，推动科技进步，以确保国家不受内外对手和敌人的威胁。

共产党人独一无二的权力地位意味着可以引导和控制社会的所有信息。苏共将社会革命的纲领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苏联决定在1924年为列宁的遗体举行入殓仪式，并为他建造一座陵墓，作为朝圣之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世纪传统的回归，东正教有时会将圣人的遗体作为神迹展示。不过，苏维埃俄国也纪念在内战中阵亡的普通人，在乌拉尔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人们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街道和广场，并制作雕像来纪念革命先驱。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个中心广场上，人们为阵亡的赤卫队和红军士兵修建了墓地，就像1917年10月至11月在莫斯科阵亡的士兵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场围墙边的陵墓中一样。苏联的群众游行和传统的东正教宗教游行也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都有领导人或神灵的肖像。

1917年，在与几乎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进行军事对抗后，苏共在乌拉尔的政权更为巩固。南乌拉尔的地方领导人所设想的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未来幸福王国的乌托邦。相反，他们看起来像一群成长中的工业领袖，尽管乌拉尔的基础设施落后，但他们仍希望以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让乌拉尔在苏联占据中心位置。尽管党的决议和许多具体活动中充斥着意识形态口号、官方演说，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共在实际工作中的务实、效率和活力。在分析地区档案资料（20世纪30年代的决策调研和会议记录）时，这种对比尤为明显。

苏共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重要职位的提名由提名委员会掌握，这份任命名单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像车里雅宾斯克这样拥有几十万居民的城市，则由当地的共产党干部管理。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工业和城市规划中，有许多经过精心筹备的决策。这些决策基于对形势的精

确描述，并附有详细的行动计划。车里雅宾斯克共产党人设想的不是抽象的工人王国，而是现代化的工业、最先进的西方技术和发达的教育体系。即使这被描述为社会主义，我们也不应忽视现实和社会条件。即使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概念，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分析。⁴

直到1934年，车里雅宾斯克及其周边区域一直是庞大的乌拉尔州的一部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18年前称叶卡捷琳堡）的党委成功地游说了对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项目的大量投资。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了许多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将使乌拉尔地区的城市在国家未来的工业结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随着这些企业的建立和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仅靠一个中心来管理整个乌拉尔地区显然是不可能的。1934年，该地区被划分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彼尔姆（后为莫托洛夫）和车里雅宾斯克州。新的地区权力中心随之形成，它们或多或少地受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控制。这样，车里雅宾斯克就被纳入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决策机构。从1934年起，当车里雅宾斯克的机械制造业得到巩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厂建成后，南乌拉尔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经济地理单元。后来，该州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东部的一些农业区被划至1941年成立的库尔干州，州界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邻近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以钢铁工业为主，这使得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该市的日常组织事务中变得与共产党组织同等重要。另一方面，车里雅宾斯克的工业结构更为复杂，各工厂和城市各区的党委工作联系非常广泛。1934年后，州委（obkom）是实现计划的最终责任人。各企业的共产党员服从工厂、人民委员部和强大的州委的领导。与工业或其他投资的具体成果相比，任命和晋升更容易控制。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平行信息机构的存在并没有使研究变得更加容易。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幸运的是，当时的许多现实情况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新的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是库兹马·伦丁。伦丁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代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内战和建立一党制国家



图 29 东乌拉尔地区地图，自北向南为主要城市。图中显示了 1934 年的行政边界

期间组成了一个团体。他的人物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在 20 世纪 30 年代领导强制工业化的人。他的命运也为 20 世纪 30 年代末党内的大清洗提供了背景。因此，对他一生的描述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伦丁如何在共产党内发展，以及他如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期间完成领导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任务。本书第五章记录了其在 1937 年的活动和命运，是恐怖活动如何在地区层面蔓延的例证。伦丁的职业生涯、领导风格和领导层中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与 20 世纪 30 年代其他党内官员进行比较的背景。

库兹马·瓦西里耶维奇·伦丁于 1893 年出生于乌法省（现巴什科尔

托斯坦共和国)的耶伊尔村。1915年,他开始在西姆市的炼铁厂工作,同年晚些时候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次年,他协助组织了该市青年工人的“五一”集会。由于有可能因此被捕,他搬到了雷夫达,然后又搬到了北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在那里找到了一份铁匠的工作。⁵

1917年二月革命后,伦丁回到西姆,成为该市革命委员会成员。苏维埃被白军镇压后,他开展了反对高尔察克独裁统治的地下抵抗运动。1919年,红军在乌拉尔击败了高尔察克的部队,伦丁被任命为乌法地区契卡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为维护国家安全而成立的打击反革命的强大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拥有广泛而特殊的权力,可以在没有司法审判或判决的情况下惩罚任何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敌人的人。接下来的一年里,伦丁还担任了红军西方面军政委,该方面军由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于1920年挺进波兰。

内战结束后,伦丁回到乌拉尔,并在党内开始了职业生涯。1921—1922年,他在工业城市兹拉托乌斯特担任党委书记;1923—1924年在下塔吉尔担任党委书记;1925—1926年在彼尔姆担任党委书记;1927年起在乌拉尔担任州委书记。他的经历是许多在内战时期被塑造出来的党员干部的典型——他们从未有机会接受扎实的教育,却在执政党内展现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和组织能力。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领导的党内右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伦丁站在了斯大林的一边。20世纪20年代末,统治集团再度以与内战时期相同的方式来设想社会变革。1928—1929年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论战反映了执政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斯大林随后制定了激进的政策,在许多方面让其他人想起了被打败的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所呼吁的: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对更富裕的个体农民施加经济压力。从1929年起,伦丁成为党的监察委员会成员,这意味着他经常检查干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可靠性。他参与了对莫斯科党组织内的布哈林追随者的清洗。

1930年后,莫斯科州委由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893—1991)领导,他是20世纪30年代工作最努力的官员之一。他曾任政治局书记、交通



图 30 1936—1937 年，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库兹马·伦丁领导了对党的干部和行业领袖的第一次清洗。1937 年夏，伦丁是三人委员会（三驾马车）的成员，该委员会根据臭名昭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00447 号法令对前富农和罪犯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数千名无辜者被处决。伦丁本人于 1937 年 10 月 12 日被捕。经过严刑审讯，他“供认”了在所谓的“右翼—托洛茨基分子集团”中的反苏维埃活动，并于 1938 年 2 月被判处死刑。1956 年 3 月，伦丁被正式平反

运输业人民委员和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似乎是伦丁的理想榜样，伦丁至少有一次称他为“我的老师”。1936 年 9 月，伦丁建议将该市更名为卡冈诺维奇格勒，但被斯大林拒绝。20 世纪 30 年代，布尔什维克将许多城市、山脉、发电站、企业和集体农庄以自己或新近去世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重新命名。这种习惯始于 1919 年内战期间，可能有拜占庭意识形态的根源。这些习惯显然是有限制的，斯大林拒绝了一些改名提议。车里雅宾斯克市组织了一场改名运动，该市名称来自鞑靼语，意为

“洞”。有人建议，城市名称应与布尔什维克的光荣历史有关，称为“科巴”，这是约瑟夫·朱加施维利⁵在20世纪初使用的革命名称。然而，斯大林这次拒绝了改名。总体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所谓个人崇拜似乎是他自己控制的，既是为了大众，也是为了共产党人。斯大林曾说，大众可能需要“一个小上帝”。当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有一次在演讲中多次提到“领袖”时，斯大林喃喃自语，说这是过度的赞扬。他没想到莫洛托夫会这么说，而他对莫洛托夫的尊敬显然高于对其他许多党员。

伦丁的职业生涯与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负责过大项目的人一样具有典型意义。作为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他负责监督国防工业、钢铁工业和冶金工业。1929—1932年，伦丁在工农检察院莫斯科分院工作。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监督机构，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抑制政府和企业的官僚主义。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检察院逐渐成为另一个只会加剧官僚主义的组织。⁶自1930年起，伦丁一直是中央委员会成员，最初是候补委员，1934年苏共十七大后成为正式委员。1932年，他回到乌拉尔领导下塔吉尔党委，1934年被任命为新的车里雅宾斯克州委书记。换句话说，伦丁是新的上级任命的干部代表，也就是说他是由上一级党组织任命的。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党是如何自我管理的。斯大林在1934年9月13日给卡冈诺维奇等人的信中写道，伦丁是那些变成了“小蛊惑者”、对干部过于温顺的地方书记之一。斯大林说，应该让伦丁严格按时完成计划，否则他将面临指控并被解职。1934年9月30日，政治局批准了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正是斯大林此前所建议的），并从莫斯科向车里雅宾斯克派出了一批主要官员。⁷卡冈诺维奇对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进行了视察，检查当地向国家运送粮食的进展。10月7日至9日，他安排了一次与车里雅宾斯克州委成员以及机械拖拉机站站长的会议。他呼吁他们回忆15年前内战期间的斗争。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

• 斯大林的原名。——编者



图 31 1935 年 5 月 4 日，斯大林在红军院校期末庆典上的讲话中总结道：“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在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资本中，人民、干部是最有价值、最具决定性的资本。”“干部决定一切！”，古斯塔夫·克鲁齐斯（Gustav Klutsis）在这幅海报上写道。这是两组人的合成照片：一组人挥舞着鲜花欢呼雀跃，另一组人则默默无闻地站在领袖的脚边。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些口号显得有些怪诞。20 世纪 30 年代初，数以千计“背景可疑”的企业和军队专家遭到清洗——有时是在表演性审判之后——被判处长期监禁或遭处决。几年后，数以万计的专家再次成为斯大林操纵的新一轮恐怖浪潮的受害者，这股浪潮席卷了党、经济管理部门和军队

议，其中不仅描述了存在的不足之处，还将其归咎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即参加过高尔察克和杜托夫军队并渗透到集体农庄领导层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系统奉命加快处理这些暴露的人员，并在当地报刊上公布其判决。⁸

20 世纪 30 年代车里雅宾斯克的变革特征

几年间，车里雅宾斯克的中心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阔的街道上有树木将开阔的人行道与中间的公路隔开。市中心许多旧建筑被拆除，多层楼房取代了原有的小木屋。

东正教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消失是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布尔什维克的反宗教政策是战争期间所有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激进的。自东正教会支持反革命、捍卫沙皇统治，并于 1918 年宣布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实行政教分离以来，这一政策变得更加严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和其他地方广泛开展了一场反对所有宗教的运动：基督教、



图 32 1928 年，工农街和公社街在修建新房。背景是天主教堂、耶稣升天修道院教堂（其塔楼已被拆毁）和曾是女子中学的木制建筑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被视为不应再妨碍人类意识的社会制度。⁹1922年，该党发起了一场反宗教运动，特别是针对东正教神职人员。人们没有庆祝复活节，而是被要求工作，几天后再放假。反宗教斗争包括集会、演讲和示威、展览以及“反复复活节”或“反圣诞节”等行动。分发的通俗教科书中也有无神论宣传。党员和共青团员是“战斗无神论者同盟”的主要成员。¹⁰

20世纪20年代末，反对神职人员和宗教的斗争愈演愈烈。犹太教堂和所有东正教教堂（除一座外）都被拆毁。1921年，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市中心的一座女子修道院被关闭。一些修女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并被送往劳改营，年老的被送进了养老院。1926年，市政府接管了修道院建筑，并打算将其重建为议会大楼，不留任何原用途的痕迹。然而，由于缺乏资金来实施这一宏伟的建设计划，修道院和沃兹涅先斯基教堂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南乌拉尔酒店。1932年，大教堂——基督诞生教堂被拆毁，圣三一教堂被重建为博物馆。其他教堂则被拆毁或改建，用作印刷厂或另有他用。清真寺也因此被关闭，供俱乐部使用，犹太教堂则被改建为宿舍。¹¹

木屋和教堂被拆除的地方建起了多层楼房。中心广场上建起了一座七层楼高的行政大楼，作为州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办公楼。在更西边的斯巴达克斯大街上建有“契卡之家”——整个街区包括独栋公寓、餐馆、电影院和服务设施。它最初只供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使用，但实际上也供党员干部和工程师使用。¹²当时，该市有十个桑拿浴室和澡堂，还有三家洗衣店。

政府还扩建了有轨电车和公交网络，以满足工厂工人的需求¹³；修建了更多的街道或在原有路面上铺了沥青——总计修建了50万平方米的路面，给48000平方米的路面和市中心的四条街道铺上了沥青；斯巴达克斯大街东西走向，拓宽至50米，还铺设了宽阔的人行道，人行道与主路之间用树隔开。城市里修建了公园，种植了许多树木。例如，仅在1937年就种植了9840棵树。市内公园进行了翻修，一个新的休闲文化公园落成，周围有供散步的树荫区。迪纳摩体育场可供足球比赛和田径比



图 33 南乌拉尔酒店建在赫德戈利亚修道院的旧址上。最初的计划是建造一个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巨大会议厅。这与在莫斯科河附近的基督教世主大教堂旧址上建造大会堂的计划是一脉相承的



图 34 人们设计公园并沿街植树。这张 20 世纪 30 年代的照片展现了车里雅宾斯克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人们清扫地面、修剪树木的情景

赛使用。总体而言，所有建筑项目的支出都比预计的要高得多，公共建筑、学校和医院的计划与实际之间始终存在差距。¹⁴

本章的这一部分会讲述车里雅宾斯克主要街道、建筑和一些企业的情况。

强制工业化期间有许多城市是围绕着一个大型企业建立起来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就是这样的城市之一，此前那里都是农村。车里雅宾斯克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二线城市，也在工业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市中心和新居民区是在建筑风格发生变化时建成的。因此，车里雅宾斯克市中心和新的工厂区的建筑中既有苏维埃构成主义风格（如邮政总局和第一文化宫），也有所谓的斯大林新古典主义风格（如革命广场大楼、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歌剧院和剧场）。邮政总局及其电报局是根据尼·伏图科夫绘制的图纸建造的，采用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建筑风格，于1936年投入使用。它坐落在基洛夫大街上，有三层楼的侧翼和一栋带阁楼的四层转角楼。这是车里雅宾斯克最后一幢构成主义风格的建筑。¹⁵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维埃俄罗斯建筑呈现出独特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花环、屋顶和饰带上都有柱子和装饰。这些对比鲜明的建筑风格要求我们对建筑所反映的社会进程加以分析。¹⁶

要理解新社会的阶级分化，可以将人口按照地位自上而下分为干部（由共产党管理的领导官员）、技术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和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从“突击手”到工资远高于平均水平的优秀工人），再往下是水平不高的季节性工人，他们大多在工业企业从事建筑活动。¹⁷可以说，被称为斯大林新古典主义的特殊建筑风格符合新统治阶级的品味和精英阶层的野心。当国家花费巨资为全国人民创建新工业社会的同时，建筑是这个社会经典、不朽的一面，将永远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建筑》（1978）一书中分析了从构成主义到斯大林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转变。法国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建筑的变化反映了生产关系的重构，而这一时期生产关系在所有主要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相同，



图 35 始建于 1936 年的邮政总局是该市最后一座采用构成主义风格设计的建筑。1935 年，建筑一角竖起了 1934 年 12 月 1 日在列宁格勒遇刺的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的雕像



图 36 “斯大林帝国晚期”风格。这张摄于 1936 年的照片显示，在斯巴达克斯大街（今天的列宁大街）和革命广场上修建了一座七层楼高的大楼，内有中央美食店和地方苏维埃干部公寓。20 世纪 50 年代前，里面还有一座墓地，有烈士、阵亡的革命者和红军士兵的坟墓

尽管它们被社会主义叙事和意识形态所掩盖——社会主义叙事和意识形态被有意无意地用来使新制度合法化。如今，俄罗斯对斯大林主义建筑的重新评价越来越多。人们对它的评判不如以前那么挑剔，因为它已经落伍了，就像莫斯科的高层建筑一样，它们被轻蔑地称为“斯大林蛋糕”。人们不再强调城市规划中的“极权主义”特征，而是更多地强调具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思想。¹⁸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小城：社会主义愿景

苏维埃政府有着建设社会主义模范城市的愿景。尼古拉·米留京在《社会主义城市》（1930）中提出了合理规划苏联城市的宏伟构想。¹⁹在许多方面，苏联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先驱国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宏伟建筑项目收到了勒·柯布西耶和瑞姆·加博等著名西方建筑师以及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建筑师的方案。²⁰他们的设计可以体现在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新工厂建筑和居住区中。由现代主义建筑师设计的整个城市或城区中，最著名的是伊万·列昂尼多夫设计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后命名为高尔基市）。工人们能在多层建筑中获得独立的公寓，而妇女们将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因为每个街区都会配备食堂、洗衣房和日托中心。然而，对于当代学者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宏伟的工业发展计划并不总是与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投资相匹配。²¹

与上述城市不同，车里雅宾斯克的城市规划并不周密。1928—1932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在该市建立若干工厂。拖拉机厂位于市中心以东、铁路以南，厂址以北是住宅区。然而，很快就有更多的工厂建成。例如，奥尔忠尼启则机械制造厂位于拖拉机厂的南面，其住宅区位于拖拉机厂的下风向。其他几家冶金企业在选址时也没有仔细考虑与居住区的距离和风向问题。直到 1935 年，政府才努力在“社会主义模范城市的要求”与“现有和未来的产业结构”这两者之间实现了更好的平衡。²²



图 37 1925 年 9 月 13 日开通的 1 号线上的一辆公交车，该线路从市中心延伸到火车站，再延伸到科柳申科工厂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车里雅宾斯克通过了扩建总体规划，规划中考虑到了该市以西风和西南风为主。因此，工人区应位于工厂以西，如位于佩尔沃湖边的拖拉机厂住宅区。社会主义模范城将建在新工厂和地区发电站周围。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社会主义模范城项目由安德烈·布罗夫（1900—1957）设计，他是 20 世纪 20 年代现代建筑师协会的主要建筑师之一，也是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集团的成员。1931 年，他被派往底特律福特工厂学习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之后设计了拖拉机厂。最初，社会主义模范城项目包括日常生活的全面社会主义化，其中也包括文化和教育计划。

社会主义模范城项目包括整栋的家庭公寓和具有所谓共产主义住房原则的住宅区，后者被称为住宅联合体。然而，创建这种“公社”（俄语 коммуна 暗指社会主义传统，如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的想法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模范城试图将个人生活与公共场所相结合。有些房屋是根据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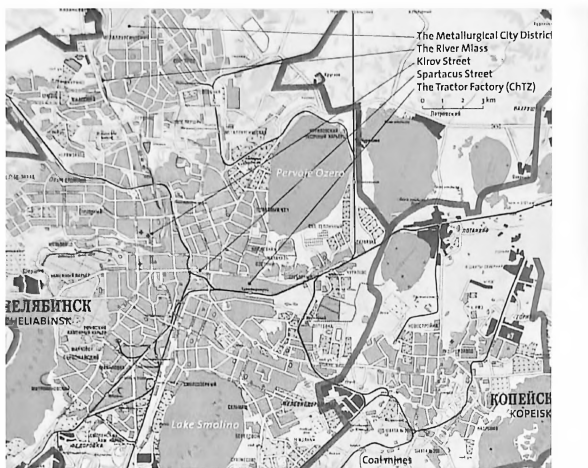


图 38 更新后的车里雅宾斯克及其东部工业区地图



图 39 1932—1933 年的工农街（1935 年起被称为基洛夫大街）。前景为苏联时期在车里雅宾斯克市中心建造的第一批拥有独立公寓的街区之一



图40 拖拉机厂工人、工程师和职员的五层公寓楼。此时，斯巴达克斯大街两侧的树荫路已被压缩，以便为四车道公路上的繁忙交通让路

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公寓这样的设计建造的。厨房与同一层楼的其他人共用。每栋房屋都有一个公共餐厅，由专门的厨师提供早餐或晚餐。不过，公共餐厅后来改成了东方餐厅。只有高尔基大街上的一栋房子是完全按照“公社原则”建造的；在其他房子里，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厨房。服务和娱乐场所都很方便。除商店外，市内还有一个洗浴中心、一所带宿舍的职业学校、一家电影院（如今名为“基洛维兹”^{*}电影院）和两个俱乐部（后来并入文化宫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剧场）。布罗夫的项目是苏联最早按照构成主义原则建造整个城区的项目之一。²³

20世纪30年代，许多车里雅宾斯克家庭主妇参加了工作。然而，许多孩子无法得到日托，因此仍有大量家庭主妇没有参加工作。1933年，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28.5%；在建筑业中，这一比例略低（19.3%）。换言之，几乎三分之一的妇女都加入到了劳动力队伍中。²⁴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晋升到管理岗位的408名工人中，只有31名妇女。这一点受到了市委的批评。同样受到批评的还有仅一名妇女晋升为车间主任。²⁵

* 基洛维兹（Kirovets）是苏联一款著名重型拖拉机的“名字”。——编者



图41 “打倒厨房奴隶制！给我们新的日常生活！”
一张海报论证了美食广场、餐馆和儿童日托中心如何将妇女从家庭劳作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够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拖拉机厂所在的区域，有几栋房子就是按照这种模式建造的，里面有公共餐厅、洗衣房和幼儿园。然而，这些集体主义生活形式从未占据主导地位

在政府的各种报告中，对车里雅宾斯克市总居住面积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然而，所有这些报告都体现了1941年战争前住房紧张的局面。1928—1938年，城市人口从6.7万增长到31.2万，但同期的总居住面积仅从29.86万平方米增长到82.6万平方米。曾有预计，到1933年人口将增长10万，人均居住面积将从3.4平方米增至6平方米。但实际上，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平方米左右。战争年代，情况急剧恶化，成千上万的外地家庭被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只能与本已拥挤不堪的居民共用同一空间。²⁶

中央监察委员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关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住房和生活条件》的报告，其中以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企业

是如何忽视住房问题的。许多房屋严重破损，而管理部门既没有对房屋进行维修，也没有建造足够数量的新房。用于建造住房的预算补贴几年来都没有用完，预定的建造计划几乎没有完成。1934年共增加了52824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但在随后的三年中，随着员工人数大幅增加，只扩充了23134平方米的居住面积。与此同时，1929—1930年建造的总面积为26500平方米的营房被拆除，因为这些营房已经破败不堪。实际上，这意味着居住面积减少了3366平方米。截至1939年1月1日，拖拉机厂仅为48.3%的工人提供了公寓，其余15366人则没有现代化的住房。

报告还详细描述了一些最恶劣的生活条件。在第六区，14个家庭（共40人）住在一间129平方米的宿舍里。9个带着婴儿的工人家庭住在总面积为35平方米的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一到春天，地下室就会积满水。委员会称，2134名工人及其家属，包括幼儿，“居住在不合适的、潮湿和寒冷的地下室”。958个工人家庭住在从附近工厂租来的半拆除的营房里。由于住房短缺，拖拉机厂附近出现了7个工人村，主要由半截楼房组成。在这些工人村里，17467名工人和职员与家人住在一起。委员会在报告中多处使用“有危害性”一词来形容导致大面积霉菌破坏的建筑材料。下水道系统使用木质材料而非金属，缺少排水管道，屋顶漏水，电力系统经常出现故障。

报告还指出，1938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消除有危害性的建筑所造成的后果”。拖拉机厂计划用于住房的510万卢布中，实际只用了270万卢布。类似的“有危害性”还体现在拖拉机厂所在区域道路沿线的供水管道和排污管道建设上。工人们为自己的公寓和房间支付了近300万卢布的租金，而工厂却只为市政用途拨款81.6万卢布。尽管租金提高了，但营房里的工人却无法定期获得淡水，连续几天都无法正常洗漱。

工人人们的伙食很差。所有就餐地点都在车间附近，工人只能在工作时间就餐。工人村里只有一家餐厅，无法提供大规模的餐饮服务。村里唯一的食堂已经关闭。

恶劣的生活条件是导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最重要因素。1936年有

17419 名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64.5%）离开了工厂，1937 年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有 18192 名工人（占工人总数的 66%）离开了工厂。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这份调查报告被提交给了机械制造人民委员利沃夫、拖拉机工业局局长泽尔诺夫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厂长乌曼涅茨。他们认可委员会对所有问题的结论，然后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企业住房和市政服务的建议。²⁷基本上，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该市在住房方面一直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没有像生产和规划目标那样受到重视。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好转，某些城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居住条件的等级也更加分明。

“棚户区”中的产业工人营房

建设一个以现代工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范城市，这样的愿景很快就消失了。当务之急是建立工厂，这意味着工人及其家人必须继续住在营房、棚屋和防空洞里。营房里住着三四十人，宿舍里有上下铺。不仅在车里雅宾斯克，在乌拉尔的其他城市和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地区，大多数工人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单身男女和已婚夫妇混住在营房里，睡觉的地方只用毯子或地毯隔开。条件较好的营房有木床或铁床，而不是双层床，但床上用品供应不足。

拖拉机厂周围的许多人都住在营房里，这些营房最初只是临时的单楼层建筑。拖拉机厂约 48% 的工人年龄在 23 岁以下。²⁸在第一批营房街区以北，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建造每家每户的独立房屋（如一户一栋楼房，或每家拥有独立公寓的公寓楼）。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开发了佩尔沃湖以东地区，这里多年来一直是小村庄。这些建设工程没有经过规划，即使按照当时的苏联标准，这些建筑也是建造得仓促而混乱，目的是缓解营房短缺的问题。²⁹

国家政策导致 20 世纪 30 年代初社会苦难不断，而地方领导实际上不可能缓解这些苦难。如果他们无法实现工业生产和建设目标，他们的

职业生涯就会受到威胁；而如果没有实现计划中的社会福利目标，这往往会被中央所忽略。在视察了新西伯利亚工厂周围营房的悲惨状况后，一位党组织领导感叹道：“工人们为什么不反抗呢？”一个原因可能是工人们明白，投诉可能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诽谤指控可能会导致工人在条件更加恶劣的营房中强制劳动。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多数新工人刚从农村来，那里的情况更糟。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尽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年，但领导一直告诉工人们“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人们用劣质建筑材料快速、粗枝大叶地建造起营房和四五层高的公寓楼，这导致了车里雅宾斯克严重的住房危机。1932—1939年，城市人口从5.9万增加到27.4万，而居住面积仅从56万平方米增加到104.3万平方米。在车里雅宾斯克，每个人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2.8平方米。³⁰1937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车里雅宾斯克的情况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检查报告对住房和生活状况进行了负面描述。市郊有6个相对较大的村庄，内有营房和防空洞，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修建的。这些村庄里居住着5万多人。位于城市东南部的一个村庄叫“亚瑟港”，是以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著名的远东要塞命名的。该村最初于19世纪末在铁路以东杂乱无章地发展起来。到1937年，有17000名居民在第78机械制造公司和拖拉机厂工作。

城南的科卢帕耶夫卡村始建于1900年，在20世纪30年代，该村大部分是半地下掩体，有6000多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科柳申科工厂的工人。梅德韦杰夫卡村完全是为不同工厂的临时工建造的防空洞，而市中心东北部的纳戈尔尼村也主要是防空洞，有1万多名居民在拖拉机厂工作。奥佐尔尼村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市东部，靠近佩尔沃湖南端。该村与拖拉机厂同时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习惯称其为“游击队村”，因为该村离拖拉机厂很远，而且主要由杂乱无章的壕沟组成。20世纪30年代中期，奥佐尔尼村约有5000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拖拉机厂的工人。

• 实为我国旅顺港。——编者



图 42 工人们为拖拉机厂的临时雇员建造的简易营房和小屋

约有 6000 人居住在城北的基尔萨罗伊村，其中许多人只有临时工作，那里犯罪分子猖獗。这些村庄没有自来水，只能挖简易的水井取水做饭，卫生条件极差。许多营房被拆毁，窗户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是纸或纸板。8—10 平方米的半掩体能容纳规模在 10—12 人的两个家庭。大多数防空洞潮湿透风，附近也没有洗衣店。由于没有文化或娱乐场所，报告指出，村里年轻人的主要消遣是打牌、酗酒和打架，尤其是在节假日。通信不畅也是造成居民与城市生活隔绝的一个因素。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引用了人们抱怨的一些话，称这些村庄的路不行，连救护车也到不了病人身边。由于距离医院太远，妇女们经常在“不卫生，没有助产士的条件下”在家中分娩。她们的抱怨很多，也很坦率，例如：“晚上，我们根本无法离开该死的基尔萨罗伊村。到处一片漆黑。进城或去俱乐部太远太危险。流氓太多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还引用了“亚瑟港”工人村妇女的话。一位名叫佩尔希娜的年轻女士感叹道：

他们没有为妇女做任何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信教。哦，在我们这些家庭主妇中，有多少人不愿意加入合唱团或缝纫小组？

我和许多像我一样的人都渴望从事社会工作，但一切都不可能。当在报纸上读到妇女如何参加学习小组并事业有成时，我感到羞愧，我哭了，因为在这里注定是不可能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的结论是：“这些村庄已被苏维埃和社会组织遗弃。这些村庄是无知、酗酒、流氓和犯罪活动的大本营。”³¹ 奥佐尔尼村的孩子们不得不步行5公里去上学。市政府迟迟没有在村里建学校，也不考虑是否能让儿童免费乘坐有轨电车。奥佐尔尼村根本没有警察。许多家庭主妇想去工作，但因为无处安置年幼的孩子而无法去工作。此外，这些村庄的工人必须步行5公里以上才能到达拖拉机厂。工人们向市苏维埃和市议会抱怨交通设施太差，乘坐有轨电车需要多次换乘；有时，根本就没有电车。工厂锻造车间的科诺瓦洛夫说，由于路灯经常坏掉，工人们不得不在工厂过夜。商店里缺货的抱怨声不绝于耳。面包和食品总是不足，总是要排长队。稀缺商品的“投机倒把”活动十分猖獗。孩子们常常没有衣服穿。³²

城市报纸经常刊登对这些状况的批评，政府也不时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³³ 然而，这些广受认可的批评意见也经常因市里严峻的经济形势而被驳回。³⁴

医疗和教育

20世纪30年代，普通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真正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新建了23所学校，其中有3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5所技术学院。所有儿童的基础教育都得到了保障。为成人扫盲也是一项任务。许多人加入了帮助成年人学习读写的学习协会。美国工程师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曾在附近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作过几年，下面这段话体现出，人们都充满学习热情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每天晚上6点到12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街道的汽车和公交车上都挤满了成年学生，他们腋下夹着书和笔记本，匆匆忙忙地往返于学校与住所之间，讨论着莱布尼茨、黑格尔或列宁，跪在地上做题，就像纽约地铁里考试周的中学生一样。然而，这些学生并不是青少年，现在也不是考试时间。他们只是苏联人口中的一部分，在弥补几个世纪以来失去的时间。³⁵

师范学院成立于1934年，设有历史、物理、数学、地理和文学系，还有一个专门的自然科学系。到1939年，已有1400多名学生学完了师范学院的日间课程，还有同样多的学生作为校外学生参加了夜校课程。“工人系”招收了180名学生，150名学生作为免费旁听生学习了教师课程。师范学院有100多名教师，其中17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获得理学士学位。³⁶

由于师资严重不足，车里雅宾斯克师范学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学校有3万多名学生，他们分两班甚至三班轮流上课，每班有30多名学生。教师们也参加了“扫除成年文盲”的运动。³⁷但实际上，扫盲运动无法覆盖所有人。拖拉机厂应该参加读写课程的535名工人中，169人没有参加。在参加课程的工人中，85%—90%的人没有按时上课。³⁸需要有新的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拖拉机厂负责这项工作的党员受到了纪律处分，并被勒令在十天内组织“日常的、系统的读写课程”，并在五天内为学习小组找到新的教师。拖拉机厂的共青团员中必须出40人来协助开展这些基本的读写训练课程。³⁹

1931年，车里雅宾斯克开办了一系列职业学校：汽车和公路建设学校以及能源和建筑学校。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学校变成了拖拉机和食品工业学校。⁴⁰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师资需求，成立了一个夜校部，下设两个方向：一个面向党员，一个面向共青团青年。夜校部从拖拉机厂招收了150名学生，从地区发电站、铁合金厂和镍厂招收了190名学生，从煤矿招收了100名学生，此外还从该市其他组织招收了250名学生。⁴¹



图 43 工厂附属学校的职业教育。图为乌拉尔铁路第二学校的木工课程。1928—1929年，由于工厂与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职业教育得到了新发展。工厂为学校提供了新的设备和工具。在车里雅宾斯克，12所专业学校聘用了18名专业教师



图 44 车里雅宾斯克市图书馆成立于1898年。图为铁路工人参观图书馆



图 45 斯达汉诺夫式工人与妻子出游。拖拉机厂根据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直接指令购买了汽车，希望给工厂最优秀的工程师和工人一定的优待



图 46 师范学院学生宿舍。在全市 278 名教师中，只有 13 人受过高等教育，31 人只有小学基础

该市还通过了一项扩大工厂附属医院的总体规划。市立医院的床位数从1928年的不到300个增加到了1932年的1700多个。旧的市立医院于1935年进行了全面翻修。车里雅宾斯克的医院门诊部经改造后可容纳625名病人，其中外科和治疗科各200人。除了医院本身，还为主任医师、外科医生、助产士和财务主任建造了公寓。护士长有了自己的公寓，科室护士和外科护士有了单独的房间，而其他普通护士则住在最多可容纳40人的宿舍里。车里雅宾斯克市建了一家拥有60个床位的眼科诊所，一个献血中心，一个地区卫生防疫站。⁴²

1933年6月，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第一任厂长卡齐米尔·洛文向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部申请了预算拨款，以保证该工厂附属的固定和流动综合诊所为工厂的所有员工提供充分的医疗保健服务。在此之前，只在营房里有一个卫生所，那里破败不堪，缺乏设备和器械，人手也经常不足。⁴³拖拉机厂综合诊所进行了修缮，墙壁、屋顶和天花板都进行了加固和粉刷，供水系统也得到了改善。⁴⁴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医疗保健的发展水平体现在多个方面——医生、护士和病床数量增加了，参加疗养的工人数量增加了，参加旅游和其他休闲活动的人数也增加了。⁴⁵

战前，车里雅宾斯克州有6家疗养院，共有1800张床位。其中包括戈尔科伊湖边的两家浴疗法（用泥巴包裹身体）疗养院、松古尔的氡疗养院、乌维尔德的结核病疗养院和特罗伊茨克的气候疗养院。此外，还有十多家儿童结核病疗养院。这18家疗养院总共有近4000个床位。战争期间，这些疗养院主要用作伤兵医院。⁴⁶

1936年上半年，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南乌拉尔地区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在车里雅宾斯克州，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人数。城市的总体情况与农村相同。预计新的流行病将在夏季到来之前暴发，与此同时，儿童医院也在减少收治病人的数量。因此，每天有5—7名儿童被拒绝入院，即便如此，50张病床还是收治了80名儿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有该州较小城市的详细情况，那里的情况更糟。

医生的缺乏和错误用药导致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报告总结道：尽管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卫生部门和检察机关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要求任何人承担责任。⁴⁷ 1936年7月，州委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和提高医务人员能力”的决议。⁴⁸

车里雅宾斯克市政治保卫局向党委书记伦丁报告了索斯诺沃过滤泵站给城市和新工厂的供水情况有多糟糕。目前的供水中断导致生产无法完成，而不够清洁的水导致了传染病的传播。报告指出，没有医务人员参与净水工作，水只经过氯化处理，而且每天只进行一次检测。净水站本身没有加盖，这意味着附近工作场所和建筑工地的灰尘和污垢会被吸入水池。而且净水站的电缆是在1932年安装的，电力供应也经常中断。

这些材料可以反映出供水存在的大量问题，新任书记必须对此做出反应。秘密警察全权代表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直接向地方有关当局和政治保卫总局（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汇报。然而，那年夏天，伦丁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工业用水和饮用水供应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多次突击检查和领导指示使情况有所好转。⁴⁹

体 育

20世纪20年代，人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足球等大众体育。1922年成立了奥林匹克足球队，在市中心的公园⁵⁰进行比赛。直到1930年，足球俱乐部才有了自己的体育场。体育教育可以满足国家长期国防需要，而足球比许多体育项目更能体现这一理念。球赛如战斗，一支足球队就好比一个排，都需要团队精神。因此开展体育运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职责。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办了自己的足球营。⁵¹ 1936年7月，拖拉机厂拨款80万卢布建造体育场，预计在1937年7月1日前投入使用，并拨款10万卢布建造青年工人宿舍，预计在同年8月完工。厂里还拨款7万卢布，在新近开放的公园附近建造一个文化基地。⁵²

最初，举办斯巴达克运动会是对“资产阶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反击。

8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斯巴达克运动会，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还有一些来自西欧。不过，许多人也是欧洲共产党的成员。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些优秀运动员被派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参加预选赛。

政府决定将由迪纳摩俱乐部在冬季组建一个可租用300双溜冰鞋的溜冰场。此外，还将建造一个带跑道的曲棍球场、一个单独的儿童溜冰场和一个可租用500双滑雪板的滑雪基地。同样，捷尔任斯基俱乐部也将安排溜冰场地，并提供400双溜冰鞋和1000双滑雪板供出租，还将为儿童建造一个配有旋转木马和滑道的游乐区。这些举措的目标是让至少3000人能够参加名为“为劳动和国防准备着”的体育考试。同样，所有其他企业、学校和技术机构也接到指示，要建立规模较小的滑雪和滑冰基地。车里雅宾斯克全市各地举办了许多滑雪和滑冰比赛。⁵³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也是车里雅宾斯克日常生活的生动注脚。许多电影吸引着观众，其中既有苏联影片，也有进口影片。工厂的“文化宫”里也演奏着古典音乐、爵士乐和其他现代舞曲风格的音乐。



图47 从米阿斯到莫斯科（1800公里）的自行车比赛，米阿斯黄金挖掘厂的一支车队参加了比赛



图 48 流动电影
放映队走遍乡村



图 49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一个爵士乐队在拖拉机厂剧院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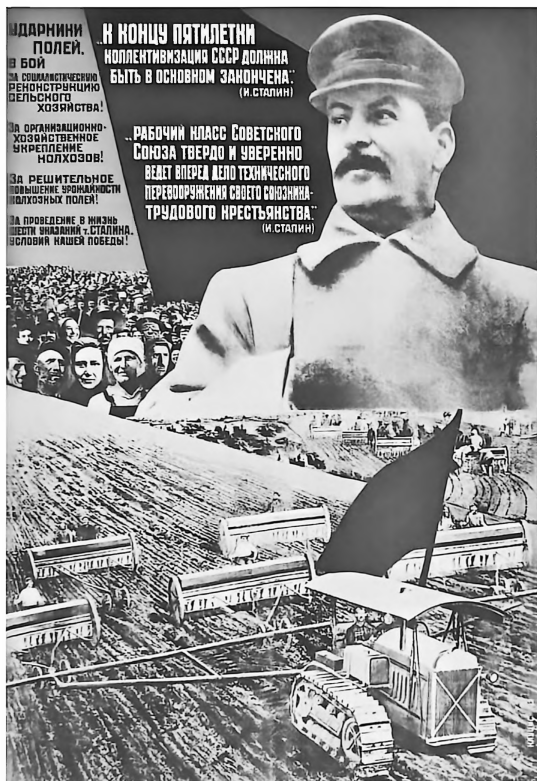


图 50 古斯塔夫·克鲁齐斯 1932 年的海报展示了四匹马牵引一台播种机如何被一台履带式拖拉机牵引五台播种机所取代。工人阶级将领导其同盟者——农民——的技术发展。斯大林提出的口号是“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必须基本上完成集体化进程”。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农民抵制财产和生产形式的集体制，1931 年和 1932 年粮食歉收，最终集体农庄的严格征用措施导致 1932—1933 年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南乌拉尔等地发生大规模饥荒，造成数百万受害者

第四章 拖拉机厂的民用生产和军用潜力

“拖拉机化”是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怪词语之一。“自动化”和“无线电化”也是新词，指的是汽车和收音机的大规模消费。第一个五年计划显然将大规模解决农业问题作为目标。按照国际惯例，农业机械化被认为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当务之急。然而，在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中，许多事情都比计划的要混乱得多。本可以模范农场作为集体农庄的理想模型，逐步向机械化农业过渡，实际情况则是，人手不足的集体农庄系统配备了所谓的机械拖拉机站。成千上万最节俭的农民，而不是专家和积极进取的集体农庄成员，被驱逐到了遥远的森林，他们没有找到可以超越其原有农民文化的新生活方式，相反，新的生活方式让许多人想起了过去的农奴制。许多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的工厂和建筑工地这些新工作场所工作，他们带来了一种“乡村心态”。到访的旅行者对苏联城市中的乡村元素感到惊讶，社会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去城市化”的一种形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共建造了近9000家工业工厂。这些企业在创办过程中普遍都遇到了人才问题，工人或多或少直接来自农村，水平相对不足。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管理人员、

* 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纳粹德国人侵而中断。——编者



图 51 1929 年 11 月，为未来的拖拉机厂车间竖起了第一根电线杆。工厂设备的大部分设计工作是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底特律办事处完成的，40 名苏联专家和 12 名美国专家在那里利用了他们在美国的先进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方面的经验

专家和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格勒就开始生产轮式拖拉机。1929 年，政治局决定，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和车里雅宾斯克要建造履带式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与卡特彼勒公司签订合同建造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则是在万国收割机公司的协助下建造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与该市的机车厂合作紧密，这家机车厂还生产了第一批苏联坦克。根据这些计划，苏联拖拉机工业的最高年产量应超过 10 万台。在乌拉尔地区建造拖拉机厂的指令由中央制定，充分考虑到该地区有钢铁厂可供应原材料。煤炭是在科佩伊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盆地的露天矿开采的。该地区的燃煤发电站满足了企业的能源需求，附近还有大量的建筑材料。

最终，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计划生产能力超过了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工厂的总和——每年可生产 4 万台拖拉机。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苏联工业化的典型代表，它从美国、德国或英国引进了最新技术。但该厂与许多其他建设项目不同的是，整个项目都是由工厂自己的专家负责完成的。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一个重点项目。最高国民经济会议（1932 年后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政治局的一些领导都关注着工厂的建设。



图 52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现场的数据测量。1929 年 6 月，根据列宁格勒国家钢铁厂设计院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底特律办事处专家共同制定的计划，挖掘工作开始进行

1931 年 5 月 23 日的一项决议提到了建设计划中的不足之处。本应该用于该厂的高质量进口金属被运至其他地方。1931 年 9 月 15 日，政治局对此加以谴责。检察官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处罚了有罪人员。¹ 5 月 23 日，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快拖拉机厂竣工的决议。² 供水、排污、供暖、通风和供电等卫生设施的施工被推迟。在拖拉机生产开始之前，不得将工程技术人员从该建设项目调往其他工厂。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也必须为工厂提供设备。这时工厂的最初计划产能已提高到每年 2 万台拖拉机。20—25 名检查员被派往该拖拉机厂的设备供应方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负责为该厂提供建筑材料。³ 1932 年 11 月 28 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工厂最终完工的决议。⁴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重要的强制集体化项目之一，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密切监督了所有相关企业的协调工作。⁵

最高领导层不光是从企业获取情况汇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警察有一个专门的经济局（EKO），负责收集和分析信息，然后将其提交给党领导层的一个小组。无论是建设期间还是投产后，秘密警察都定期报告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进展。⁶中央对生产依然集中管理。1933年9月30日，因许多拖拉机被送往农业以外的领域，斯大林批评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斯大林强调，建设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农业需求，但1365台履带式拖拉机，集体农庄和机械拖拉机站只收到了600台。轮式拖拉机和载重汽车的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分配给集体农庄和机械拖拉机站的数量太少。⁷

拖拉机厂建设时期为苏联劳动力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实例。招募到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接受了新职业速成培训。许多人在这一时期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他们被鼓励参加培训，从建筑行业转入机器制造业。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几年前才从农村来到这里。建筑工地和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遇到了许多问题，因为这些前农民很难适应工厂的节奏和纪律。⁸

1929年11月的一天，卡齐米尔·彼得洛维奇·洛文和他的助手们来到了位于车里雅宾斯克东部的新工厂所在地。洛文于1893年出生在维捷布斯克省的苏什基村。他14岁时开始在圣彼得堡工作。从1912年起，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接触，并在1917年的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洛文参与了战后彼得格勒发电站的重建和莫斯科国立发电站的建设。在一所技术学院完成学业后，他于1925年被任命为莫斯科联合发电站站长，后被任命为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建设项目负责人。1930年，他和其他几位专家前往美国，考察卡特彼勒和艾利斯·查莫斯等企业的拖拉机工业发展情况。

洛文参观了英国和美国的几家企业，就这样，俄国人有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拖拉机的模型，并对万国收割机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其他



图 53 卡齐米尔·洛文（1893—1937）在 1929—1933 年间负责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建设，此后担任该厂第一任厂长，直到 1937 年因被诬陷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而遭到起诉并被处决

公司的许可生产条件进行了评估。苏联驻纽约贸易代表苏美贸易公司（Amtorg）积极与卡特彼勒公司开展合作洽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苏联方面只愿意考虑以技术援助的方式合作，不愿接受美国人的进一步要求。其他复杂因素还包括：图纸只能用英文绘制，所有的度量衡都是英制（码、英寸、磅等）而不是公制。因此，俄国人在底特律租下了一幢摩天大楼中的一整层，建立了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办事处，并在本国专家和美国专家的合作下，设计出了新工厂。车里雅宾斯克市的 40 名合格工人被派往美国，学习拖拉机、建筑材料的最新生产方法和流程。⁹

这些由党组织提名的工人接受了英语培训。党委书记格里戈里·特留博夫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所有人第一次出国，他们在莫斯科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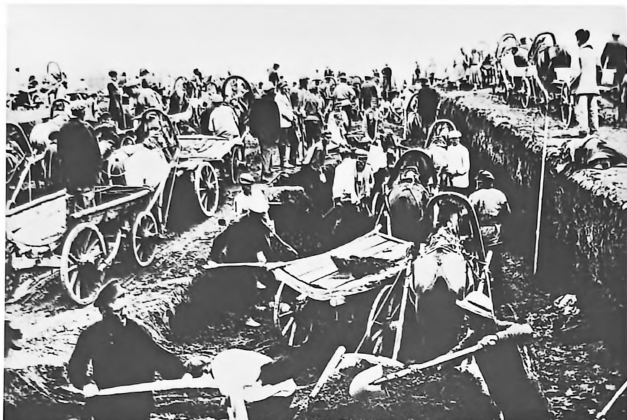


图 54 装载碎石和建筑材料的马车。这种劳动密集型方法是苏联工业化的特点

到了新衣服，并得到了临行前的指导。代表团中还有工人来自筹备中的下诺夫哥罗德（1934—1992年间名为高尔基市）福特汽车厂，他们将在美国公司学习汽车生产流程。苏联代表团经由汉堡或勒阿弗尔前往美国。

前往美国学习拖拉机生产知识的人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特留博夫出生于1896年，其他人则出生于1900年后。其中一些人曾在车里雅宾斯克发电站工作过，其他人则是从遥远的地方应聘而来。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很快就晋升为领班或主管，但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出国访问还带来了其他后果。特留博夫和其他几个人购买了托洛茨基新近出版的自传《我的一生》。¹⁰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党籍，后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境。他一直是俄国革命和内战时期的传奇人物，因此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专家们热衷于阅读他的书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似乎都没有隐瞒自己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看法。1936年8月

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表演性审判之后^{*}，大清洗开始了，他们的直言不讳让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车里雅宾斯克的项目小组开始为工厂绘制蓝图之前，他们已经走遍了密歇根州的汽车、拖拉机和发动机企业。其中一些工人与美国公司签订了长期学习和工作合同，在那里他们掌握了生产过程中某些方面的技术。1931年，当这些技术人员和工人回到车里雅宾斯克时，他们开始根据在底特律绘制的图纸组装和启动工厂生产线。在很多方面，车里雅宾斯克生产的第一台拖拉机是1925—1931年卡特彼勒60马力拖拉机的仿制品。不过，俄罗斯人称之为“斯大林涅兹-60”。

1934年，洛文被任命为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厂长。工厂的干部自然会受到政治审查。秘密警察代表人民委员部对所有将被任命的工厂干部的履历都进行了核查。每个人在工作单位都有档案，这将伴随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共产党和安全机关会定期任命委员会，进一步检查个人档案中有关其过去、亲属、在外国可能的联系人的资料，还有其在1917年革命前后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料。¹¹

仅在1929年12月，就有1754名来自农村的人在车里雅宾斯克的职业介绍所登记。这大约是新登记工人人数的一半。1930年1月1日，登记的工人人数为3336人，其中2808人为不合格工人，包括1644名妇女。1931年，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工业企业和矿山工作的人数超过了3万人，当局预计这一数字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翻一番。¹²

1930年4月9日，乌拉尔地区劳动局致函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集体农庄联盟和主管部门，命令将2.7万人输送到新的工厂，彻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据估计，集体农庄有不同工种的18117人适合被招募来建设工厂。集体农庄的农民不能随意离开，他们必须先获得迁徙许可，才能在车里雅宾斯克职业介绍所登记。¹³

拖拉机厂建设阶段，劳动力大量流失。1930年1月上级决定，7000

* 苏联当局彼时认定季诺维也夫伙同托洛茨基组建了“托-季反党联盟”。——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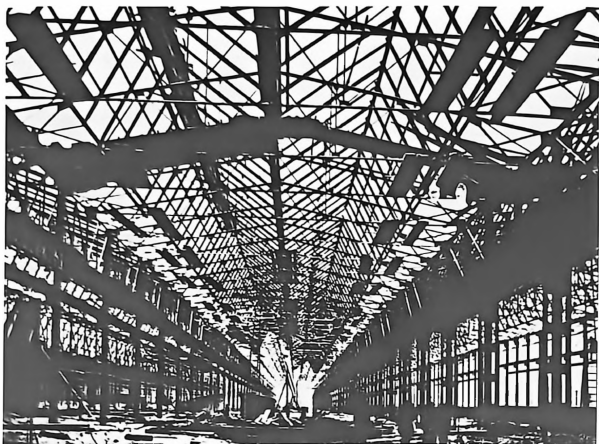


图 55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正在建造的车间之一。由于从一开始就使用了坚固的钢结构，因此在“二战”期间，传送带和移动装置可以迅速地从一间车间转移到另一间车间，用于生产重型坦克

名共青团员和 3000 名贫农要接受培训，成为建筑工人，来建设工厂厂房。¹⁴ 1930 年底，就业人数为 10504 人，低于建设计划中预估所需的 14941 人。仅在 10 月，就有 2614 人被雇用，其中 1801 人是自愿加入的，279 人是由厂代表招募的，205 人是强制用工，通常是来自该地区劳改所的轻罪犯。然而，在同一个月里，有 3120 名工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该厂，如没有分发工作服或工作鞋，或对住房条件不满意等。同月还有 19249 起违反劳动纪律（工作时间、缺勤等）的情况被记录在案。¹⁵

乌拉尔建筑工地上的劳动力构成情况各有不同。拖拉机厂建筑工地使用的强迫劳动力不多，而乌拉尔其他城市使用的强迫劳动力较多。下塔吉尔的钢铁厂和轨道车厂主要是由被驱逐的富农建造的。在邻近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刑事犯和政治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占有劳动力的很大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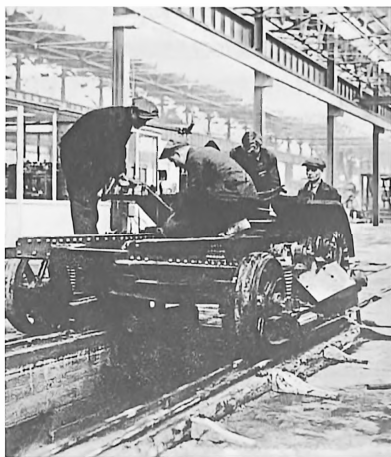


图 56 拖拉机装配车间的传送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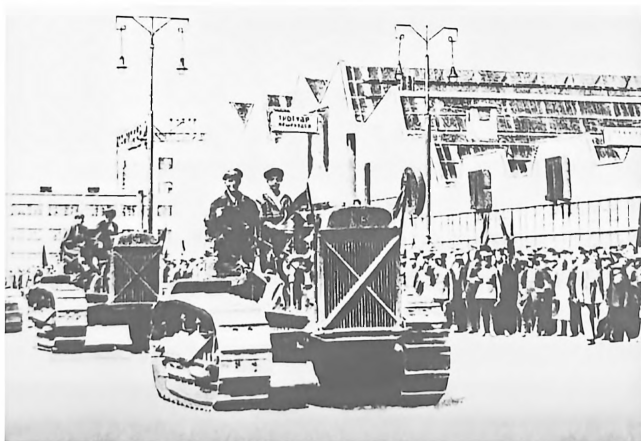


图 57 第一批量产的拖拉机在出厂途中

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界倾向于夸大强迫劳动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古拉格在斯大林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并不重要，近年来的档案研究印证了这点。1940年，古拉格仅贡献了全部工业生产的1.2%，90%的工业建设工作由自由劳动力完成。¹⁶

20世纪30年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发生了变化。自1935年起，以掌握合理的劳动方法、加大劳动强度来提高产量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取代了早期以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产量的“工人突击手”方式。实际上，“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优秀的工人不仅能获得更高的工资，还能享受特殊待遇和更好的公寓，并经常被任命担任工厂的行政职务。1937年8月1日，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有21135名员工，其中17841人为工人，有6060名工人参加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些人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可以买到游乐园和文化公园的门票，图书馆的书可以送到家里，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在很多情况下还不用排队买饭。工厂为参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优秀工人建造了15套公寓，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广播点”——房间内有扬声器。这些工人还可以获得补助，来建造他们自己的乡村小屋。¹⁷

外国专家

在工业化期间，外国专家在苏联的许多城市发挥了关键作用。苏联代表招募来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并非所有前往苏联的工人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大萧条对一些国家的打击非常大，因此能去苏联就业是有吸引力的。据估计，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4万多名外国工人受雇于苏联各行各业，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共产党员。外国工人大多受雇于乌拉尔、库兹巴斯盆地和哈尔科夫的大型工厂，这些工厂由重工业人民委员部（1932年前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领导。如今有大量的回忆录——自1992年以来，还出版了很多文献——介绍各类移民和政治难民对苏联的日常生活、工厂条件和政治氛围有怎样的体验和感受。¹⁸

一些人逃离了德国和美国遍地失业的环境，一些人逃离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专制政权，他们在回忆录中对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宏伟建设项目进行了描述。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专家、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培养第一代苏联产业工人做到精确、仔细和守时的。外国工人和工程师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充满工作热情但过于自以为是共产党员经常试图超越既定做法的限制，无视基本的技术要求。这经常导致昂贵的进口设备损坏，不得不花高价修理。¹⁹

在车里雅宾斯克有数百名德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往往拖家带口，在这个拓荒时代的城市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市中心看起来仍然和其他地方市镇一样，都是低矮的木制房屋。然而，在东面几公里处，一个全新的城区拔地而起，那里有长长的工厂车间和四五层高的公寓楼。²⁰现代工业技术与原始工作形式之间的巨大反差给外国工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爱德华·J.特里是当时最重要的外国人之一，他是拖拉机厂建设的首席顾问。²¹

拖拉机厂落成后，许多外国人离开了车里雅宾斯克。1934年，大约有180名外国工人和专家留了下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总人数约为300人。其中，有128名德国人或奥地利人、17名英国人、5名匈牙利人、1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127人已婚，41人单身。只有22人是苏共党员，16人是预备党员，31人是其他国家共产党党员，4人是共青团员。1934年，60名英国人和德国人组成了两个政治学习小组。50名外国工人分到了自己的花园，总面积达3.5公顷。一支德国“鼓动队”及其管弦乐队曾前往一个苏联国营农场，还参加了在该市发电站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观众超过500人。一个体育俱乐部里有24名外国成员，他们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兹拉托乌斯特和车里雅宾斯克参加比赛。

外国专家与苏联工人经常开会讨论劳动问题、工厂组织形式和如何提高工人的技术技能。外国专家还访问了卡什塔克和铁合金厂，与200多人会面。1934年5月，约100名外国人参加了关于中国局势的讲座，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久前完成了“长征”，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

追击。针对外国人中的女性还特别举办了一场关于纳粹德国局势的讲座。12名外国专家组成了一个管弦乐队，该乐队每周为工厂的工人们举办8次音乐会。当地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图书馆，收藏了2000多本英文、德文、匈牙利文和捷克文书籍。7月份，20名专家还参与了统一组织的夏令营，孩子们也能参与苏联儿童组织（儿童团）的夏令营。外国专家获得了25张前往克里米亚、俄罗斯南部和高加索地区温泉的门票；4人前往西伯利亚；10人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的疗养院休养。工厂管理层中有一名官员负责外国专家的工作。²²

苏联当局对外国专家进行严密监管。任何收集情报的迹象都会被追踪，政治观点和其他个人问题也会被仔细记录。例如，美国人爱德华·J. 特里（生于1893年）于1930年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驻美国办公室工作，从1931年起成为车里雅宾斯克的主要专家。他被当地秘密警察称为“反苏分子”，因为有人报告，他曾对俄国人让拖拉机厂投入生产的能力提出质疑，还拍摄了大量建筑工地和车间的“暴露照片”。至少有10名外国专家被描绘成有敌意、不称职、可有可无的人。然而，据说登记在册的大多数外国人那里都“尚未发现泄密文件”。²³

对苏联工业化近乎抒情的描述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官方宣传国家将通过拖拉机实现大规模集体耕种，从而实现现代化和自给自足。诗人、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1931年5月至6月间与其他作家一起访问了车里雅宾斯克和已奠基的拖拉机厂。他在给妻子齐娜伊达·涅高兹·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写下了自己的印象，拿拖拉机厂的建筑工地和埃及的金字塔做了比较，但他同时还讽刺性地描述了拖拉机厂在作家们抵达前所做的虚假修饰。帕斯捷尔纳克和其他诗人、作家在为工厂工人举办的诗歌晚上朗诵诗歌。²⁴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经验表明，在批量生产之前应先进行小规模试产。根据计划，拖拉机传送带将于1933年工厂正式落成时启动。此前

• 作者这里对“长征”时间的表述有误，请读者留意。——编者



图 58 拖拉机厂于 1933 年 6 月 1 日正式落成

建立了一个较小的机构，称为实验和测试厂（下称实验厂）。实验厂最初由美国人约翰·塞恩和他的助手领导，这两人都曾在卡特彼勒公司工作过。该厂拆解和研究了市面上所有品牌的拖拉机，所有有用的设计都被运用于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设计中。当时还招募了尽可能多的工人，让他们在这个 1930 年 11 月开工的实验厂里积累经验。实验厂有 4000 多名员工在 1933 年后转入主厂。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来自底特律的 100 多名美国工人，他们是实验厂的第一批监工。

1933 年 6 月 1 日至 3 日，工厂举行了庄严的落成典礼。按照当时的标准，该工厂规模庞大。数千名拖拉机厂工人、建筑工人和城市卫戍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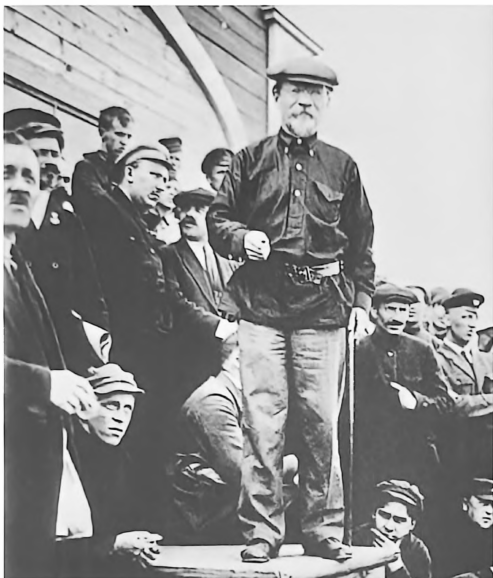


图 59 1933 年 6 月，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加里宁在工厂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

队的士兵聚集在一起，聆听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加里宁和地方上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当十余台拖拉机从装配车间驶出时，管弦乐队奏响了乐曲。当地举办了三天的庆祝活动，人们在附近的公园里载歌载舞。几周后，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与乌拉尔州委书记伊万·卡巴科夫一起参观了拖拉机厂。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工人人数从 1933 年第一季度的 3247 人增加到年底的 11943 人。1934 年，员工人数从 12761 人增加到约 16700 人，到 1939—1940 年，蓝领和白领员工人数总计约为 15000 人。工厂成立之初问题重重，在质量控制方面始终存在缺陷。1934 年，即生产的第一

年，平均 9.6% 的产量（按价格计算）被废弃。1936 年的废品率下降到产值的 5.7%，但随后两年的废品率增长速度惊人。1938 年，废品导致的生产损失为 3430 万卢布，占产值的 10.6%。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如何组织传送带生产线缺乏明确的认识。还有一个原因是劳动力流动性大，新工人在上岗前只接受了初级培训。上述原因都导致了工厂生产质量不高，成本远高于预期。此外，个别车间很难维持工作纪律，保证工作效率。

原来负责拖拉机厂建设的洛文因疾病缠身、疲惫不堪，不再担任该厂领导，改任莫斯科能源工业总局副局长，这也更符合他原来的背景。1934 年 3 月，奥尔忠尼启则任命亚历山大·布鲁斯金为新厂长。伊兹拉尔·涅斯捷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列·阿·梅克辛任副总工程师，伊·格·马尔哈索夫任总设计师。

亚历山大·布鲁斯金（1897—1939）出生于赫尔松，1922 年在哈尔科夫理工学院机械技术系完成工科学业。之后，他于 1923 年和 1924 年在德国的理工学院学习。他在哈尔科夫担任过机械师和设计师，1927 年升任该市拖拉机厂车间主任，同时还在哈尔科夫技术学院任教。从 1929 年起，他担任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建设项目的总工程师。1930 年，他被派往美国为哈尔科夫和车里雅宾斯克的新工厂订购机器、进行厂区设计。随后，他被任命为技术总监，并于 1932 年成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厂长。1934 年 3 月，他被奥尔忠尼启则任命为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新厂长。在布鲁斯金任职期间，铸造车间发生了变化，其他车间和装配线之间的协调也得到了改善，到 1936 年，拖拉机的日产量达到了 100 台。换句话说，年产量接近 3 万台。与此同时，工厂进行了重建，以生产性能更强的 S-65 柴油拖拉机。

到 1937 年第一季度末，工厂共生产了 69261 台煤油拖拉机。车间重建后，自 1937 年第三季度开始生产柴油驱动的 S-65 拖拉机。从 1938 年起，工厂在生产 S-65 拖拉机的同时，还生产了配备柴油蓄能器的 S-65G 拖拉机。

拖拉机厂对红军的重要意义

1930年11月，红军代表帕夫洛夫斯基对筹备中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进行了几天的参观考察。他在报告中提到，实验厂于11月7日开工制造拖拉机，同时培养合格的工人，这样做是为了规避其他地方尤其是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帕夫洛夫斯基按照工农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的要求，下了两台拖拉机的订单。订单要求拖拉机的最高时速为9或12公里。由于机身没有弹簧，因此还无法达到更高时速；但从长远来看，军队需要速度更快的拖拉机。因此上级决定，实验厂还应研制速度更快的四轮拖拉机。

表 2

20世纪30年代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拖拉机产量

单位：台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第一季度	—	1174	4475	6497	8002	2731	1699	2815
第二季度	52	2281	4560	7575	—	3562	3726	2403
第三季度	610	2008	5354	7160	1372	2678	2760	2270
第四季度	988	3637	6061	7827	3611	2672	3074	1069
全年	1650	10100	20450	29059	12085	11143	11259	7757

帕夫洛夫斯基还认为，拖拉机厂在建设阶段应接受红军的监管，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满足国防人民委员部对厂房和未来生产线的要求。²⁵ 工业企业中设有军方代表成了苏联工业体系的一种制度。军方代表对送往军队的产品的审批有最终决定权，并对生产有重大影响。首先，在主工厂准备就绪之前，军方代表就被派往位于车里雅宾斯克的实验厂监督 T-24 坦克的生产。T-24 坦克是哈尔科夫机车厂生产的苏联第一辆坦克 T-12 的改进型号，于 1931 年开始批量



图 60 1936 年，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柴油驱动斯大林涅兹 -60 拖拉机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亮相，并获得了大奖。1936 年，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履带式拖拉机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测试：7 台拖拉机在伊库提亚的雪地上行驶了 2000 公里，另一组斯大林涅兹 -60 拖拉机在帕米尔高原爬上了海拔 4000 米的高山。这些拖拉机还根据采矿业的需求进行了调整，并作为红军的火炮牵引车而生产

生产。它的炮塔和前部采用厚度仅为 20 毫米的铆接铁板，总重量为 18.5 吨，装有一台 300 马力的 M-6 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为 22 公里。T-24 坦克只生产了 20 辆，因为 1931 年苏联政府决定仿制开发一种美国克里斯蒂型号的高速坦克，并已获得生产许可证。在对这些坦克进行国际比较时，应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是发动机在履带式或轮式操作下的效果问题。其次，苏联出于多种原因，选择并成功研发出了一种功率足以用于重型坦克的柴油发动机。这在“二战”期间被证明是相当有利的。苏联坦克的易燃性较低，所需精制柴油较少。最后，比较装甲的厚度和火炮、机关枪等武器装备质量也很重要。

克里斯蒂坦克由于其配置以及轮式和履带式的结合，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苏联的第一种改进型坦克被称为 BT-2（BT 为俄语“高

速坦克”的首字母缩写)。它配备一台进口或根据许可证生产的 400 马力“自由”发动机，轮式最大时速 72 公里，履带式最大时速 52 公里。沃尔特·克里斯蒂本人在美国曾实现过高得多的速度，但在苏联取得的成果足以满足红军对新装甲车辆的要求。BT-2 坦克有一门 37 毫米霍奇基斯炮和一挺 7.62 毫米机枪。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设计师对这种快速移动的轻型坦克进行了改进，其总重量为 11—14 吨，型号分别为 BT-5 和 BT-7。²⁶

美国坦克最初所采用的一些设计理念后来被成功运用到 T-34 坦克的设计中。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红军一直倾向于使用轮式和履带式相结合的坦克。然而，这不仅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降低了在不增加坦克总重量的情况下加强装甲的可能性。

20 世纪 30 年代，装甲的生产方法有所发展，可以将一些特殊部件制造得更厚。手工焊接技术使装甲板上可以铸造和焊接零件。这是朝着生产出能够承受炮弹打击的坦克迈出的重要一步。至于厚度方面，重要的是水平方向的有效厚度。图 62 对此做了说明。

60 度的倾斜度意味着水平方向上的有效厚度是其深度的两倍。炮弹的穿透角度取决于炮弹的发射方式以及坦克是否在水平方向上移动。在实践中，坦克前部的倾斜角度超过 45 度意味着炮弹会改变方向并反弹到装甲上。炮弹即使穿透了厚厚的装甲，也会损失大量动能。作为对策，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种带箭头的炮弹，速度更快，无论倾斜角度如何，都能穿得更深。

在苏联对 BT-2 及其后续型号的改进中已经包含了这些改动。最后的型号 BT-7 和 BT-7M 实现了机动性、装甲和火力的完美结合，它们是设计师米哈伊尔·科什金设计中型 T-34 坦克的基础。²⁷

柴油发动机的功率足以支持几十吨重的坦克，这是使红军在“二战”期间比敌人更强大的另一个技术因素。柴油发动机有两个明显的优点：它使用辛烷值低的柴油，而且燃料箱本身不易燃，即使被炮弹击中也不会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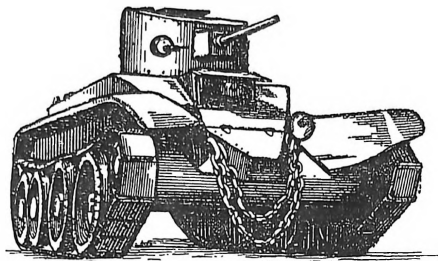


图 61 BT-2 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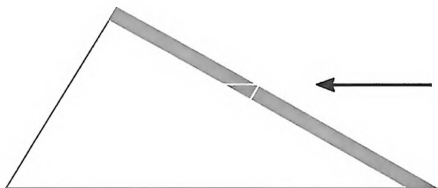


图 62 通过将装甲板降至 30 度角，有效厚度增加了 2 倍。
炮弹更容易从坦克上弹开，其打击能力也降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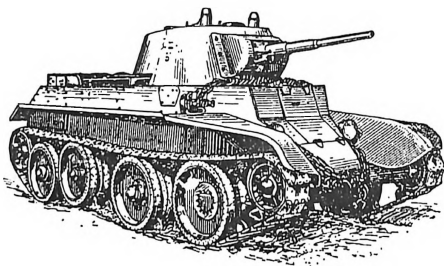


图 63 BT-7 坦克

军事理论的演变

军队如何分析过去的战争，如何预测未来战争的轮廓，这在任何战争结束后都非常关键。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特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败者和局外人——德国和苏联——进行了最深入的改革，而战胜国——法国和英国——却发现自己在技术和理论方面处于被动的保守地位。在异常艰苦的大战中，第一批坦克出现了，为战斗带来了机动性。英国人用“水箱”运输这些车辆，因此装甲炮车被称为“坦克”（英语中与“水箱”为同一个单词）。坦克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重大影响的几种新型武器之一，飞机和新型化学武器也改变了战场的态势。

1926—1932年，红军和德军之间进行了秘密的互利合作。在开始合作时，两支军队就已经为装甲车辆的使用提出了类似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并无关联。军事历史研究已经明确了德国装甲理论与英国人富勒和里德哈特提出的未来战争理论的背景。苏联的新理论并不是对富勒或里德哈特思想的模仿，更不是像西方文献中有时声称的那样是德国闪电战的翻版。²⁸

20世纪30年代苏联武装力量的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纵深作战理论基础之上的，该理论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长期的，并将涉及许多国家。因此，战争将包括大规模机动战斗和长期僵持的局面。制服敌人的主要方法是采取进攻行动，包围或分割对方军队。成功的关键在于向主攻方向深入推进，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机械化部队应通过快速坦克、BT型坦克和后来的T-34型坦克实现强大的机动性。

作战和战略研究已经表明，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作战暂停的情况，届时敌人就有时间重新建立阵地防御。因此，机动作战应从突破敌方战术区的周密防御开始。研究表明，机械化部队的这种突破会让敌方部队疲于奔命，从而无法发动自己的突破形成作战纵深。因此，

• 作者指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战争的举动。——编者

一个进攻型方面军中必须有一个梯队专门负责突破敌人的战术防线，然后机械化部队可以通过该防线，取得初步胜利。

部队第一梯队的基礎是步兵，因为必须在敌人的战壕里与之作战。首先，应用大炮摧毁敌人的防御阵地。然而，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大炮也只能消灭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因此，坦克是支援步兵前进的必要手段。这将清除敌军在战术纵深内抵挡住初期炮火攻击的射击阵地，然后为下一个师深入作战区域开辟道路。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红军认为T-26轻型坦克将是支援步兵前进的主要武器，突破区每公里最多可配备60辆坦克。

T-26是英国维克斯坦克的改进型，由总设计师M. A. 齐格尔在苏联完成了改进。该坦克重9.4吨，1933—1936年在列宁格勒的伏罗希洛夫工厂生产，如爆发战争也可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生产。它配装一门1932年型45毫米火炮和136发炮弹，还配有一挺7.62毫米机枪。T-26坦克装有16毫米厚的装甲（炮塔装甲为25毫米）和一台9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其最大时速为30公里。T-26坦克有多种型号，既可用作自行火炮，也可用作火焰发射车。1939年夏，T-26坦克在与日军的诺门坎战役中被成功使用。从1931年到1941年德国入侵期间，共生产了11000多辆T-26坦克。不过，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没有生产过其中任何一辆，该厂只详细记录了最新的设计变化，这是一种工业备战措施。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红军的军事理论发展十分迅速。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技术层面，这一时期都是最富成果的。人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国和参战军队意想不到的变化展开了相对开放的辩论。弗拉基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1894—1931）是苏联最有影响力的新型机动作战*战法的支持者之一，他撰写了许多开创性的文章和书籍。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这些文章和书籍成为红军的主要指导方针。1931年，特里安达菲洛夫死于一场飞机事故，他的主要工作在副国防人

* 指著名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编者

民委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指导下由其他人继续进行。²⁹“战役艺术”概念对红军重建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概念定义了战术与战略之间的一个层次。一场战争不再可能通过一场普通的战斗决出胜负，由于出现了新的通信方式，单一的战术胜利很容易遭到敌人反扑。³⁰

红军逐步形成了用快速移动和快速射击的坦克进行纵深战斗的新思想。这些坦克能够突破重兵防守的防线，向敌人更深的防线推进；而速度较慢（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实现机械化）的步兵则会向前推进，以巩固对所征服地形的控制。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拥有强大的装甲部队已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尽知。苏联于1935年、1936年先后在基辅和明斯克举行了演习，演习中数百辆坦克与伞兵部队和步兵协同作战，给许多外国观察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苏联的装甲理论领先于其工业的实际能力，它推动了国防工业的不断现代化。几年后，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工厂才生产出完全符合军队技术和战术要求的坦克。苏联设计师克服了苏联工业的落后状况，设法改进了英美最先进的坦克的内部状况。1940年，经过一系列改装并配备了苏联原装柴油发动机后，苏联设计师推出了后来成为传奇的T-34坦克。这款坦克被认为是“二战”中最好的坦克之一。斯大林强制推行的工业化为生产数以万计的坦克以及无数其他军事装备创造了必要的生产能力，这在战争期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³¹

反坦克炮的迅速发展使得部队急需能够抵御敌人密集炮击的不同类型的坦克。因此，坦克的装甲更加厚重。重型坦克当时被认为只适用于突破作战。苏联第一批重型坦克是为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小规模生产的（T-28和T-35）。现在，必须大规模生产重型坦克。³²

红军曾两次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的镇压。1930—1931年，数以千计的军官遭到清洗，其中许多人经验丰富，职业生涯往往可以追溯到沙皇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判处长达十年的强制劳改。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中国和西班牙爆发了战争，苏联分别向北京国民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军提供了专家和武器援助。³³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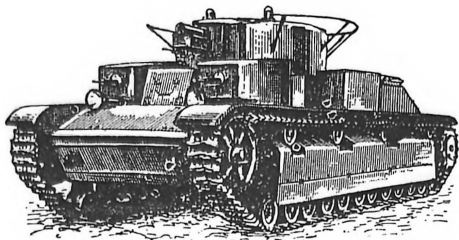


图 64 T-28 坦克

将领还对这些战争进行了仔细分析。³⁴ 这些分析也受到了红军内部高层大清洗的影响。大清洗还涉及国防工业。与坦克工业相比，航空和火箭工业的工程师在古拉格劳改营丧生或被处决的人数更多。

这些军人中的大多数都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正式平反，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有关他们案件的一些档案资料才被公开。雅罗斯拉夫·廷琴科分析了鲜为人知的“春日行动”，这个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展的行动主要针对那些在内战期间被招募到红军，后被认为有“反革命思想”的军官。莫斯科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教授、上校奥列格·苏韦尼洛夫对 1937 年和 1938 年红军中的大清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尼古拉·切鲁舍夫上校在莫斯科的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出版的著作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研究成果。通过他们和其他历史学家对档案的研究，如今人们对 1937 年红军高层中的恐怖浪潮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要了解斯大林及其周围政治领导人的意图，文献资料仍然太少。

大清洗对红军的理论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1937—1938 年间，数以千计的军官被处决，其中包括一些开创了机动作战、战役艺术和纵深作战新理论的人。此后在讨论这些新概念时，不得不遮遮掩掩。一些坦克设计师在 1937—1938 年间得以逃脱被镇压的命运，但尼古拉·采茨是众多遭诬告并被处死的人之一，他是重型坦克的研制者。后来，亚历山大·莫

罗佐夫（1904—1979）和米哈伊尔·科什金（1898—1940）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改进了他的设计思路，并于1938年造出了T-34坦克的原型。约瑟夫·科廷*（1908—1979）和尼古拉·杜霍夫（1904—1964）是列宁格勒工厂的坦克设计师，他们后来成为改进苏联重型坦克的领军人物。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坦克工业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在技术上甚至比德国更先进。

战争经济动员：20世纪30年代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

“动员”一词通常与士兵和军官被征召到集结点有关。士兵和军官在集结点从动员预备队领取军装和武器，然后通过铁路、卡车或飞机经可靠的路线被送往相应的部队。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这种动员方式在欧洲大陆得到了高度发展，人们还能计算出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向国家边境派遣多少个万人以上的师。这些计算为20世纪初柏林、巴黎和莫斯科的战争规划奠定了基础。

不过本书中的“动员”主要指的是“工业动员”。这是一个在战争期间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指国家如何调整其经济以满足未来全面战争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要让整个经济、运输和金融体系以及内外贸易做好准备，以应对下一场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情况。³⁵ 欧美军事院校的教科书中都有关于工业动员经验的内容，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就对此进行了研究。³⁶

档案解密之前，西方学者对苏联的经济规划理论，包括如何在战争中调动各行业不甚了解。那些参与这部分规划的苏联经济学家对相关历史非常了解，但他们当然无法在普通的苏联经济刊物上探讨这些问题。近期这方面变化很大。研究“二战”期间苏联弹药生产的主要专家之一

* 也有“科京”这个译法。——编者

伊万·弗尼杜布写道：

工厂的动员计划是一份文件，它预先规定了和平时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以便在战争初期将生产量提高到规定的水平。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只是对必要的材料和设备、车间面积和劳动力资源的计算。它们往往忽略了工厂动员计划中所有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它们没有预见到生产阶段的不平衡，也没有拿出措施来处理这种不平衡。³⁷

本书也是一个案例研究，通过研究“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工业动员理论在车里雅宾斯克是如何有效落实的，可以为关于苏联工业发展的研究增添具体工厂案例。这些具体问题的灵感来自作者早先对战争情况下工业动员原则的研究。为工厂转型而制订的计划有多符合现实？乌拉尔的企业实际上是如何准备从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的？当许多男工应征入伍时，管理层是如何估计和考虑人力供应的变化的？

核心问题涉及苏联的军事经济备战情况，即要使经济、运输系统和国家基础设施做好准备，以适应战时条件。这项规划在军方和政府中都是秘密进行的，公开的新闻报道和出版物中很少有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战争爆发时，军事院校专门为那些被选中负责生产、分配、运输等方面转型工作的人开设了这门课程。

“二战”前，经济备战只是苏联企业活动的一小部分。厂长周边的一些人负责跟进工业动员计划及其更新，以配合军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斯大林领导下的强制工业化对苏联在“二战”中的持久力奠定了基础。其主要是依靠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和现代机械制造业的同步发展。与多数大国相比，苏联更深入地思考了下一场大战的一系列方案，以及这场战争将如何改变生产和生活条件。

我们对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经济备战情况的了解是基于企业档案中的清单。这些清单是1941年秋天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科的一个委员

会编制的（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所有国家档案馆都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³⁷）。委员会成员于 1941 年 10 月 16 日完成了对文件的检查，并提出了应粉碎和烧毁哪些企业文件的建议，特别指出要处理那些“从生产角度看缺乏意义或在其他地方有许多副本”的文件。这些材料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初拖拉机厂的总体规划、工业动员计划的方案和计算，甚至还有 1941 年 6 月 6 日的最后一份战前动员指令。莫斯科的其他档案馆也有这些资料，现在仍可查阅。然而，根据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动员计划改建车里雅宾斯克的详细方案却永远遗失了。

1941 年 6 月 11 日，车里雅宾斯克内务系统档案科已经检查并确认了车里雅宾斯克档案中哪些材料可以销毁。档案科的结论是，34 份档案具有“历史、科学和实际信息价值”，其余档案可以销毁。³⁸ 例如，其中有《机械》（1934 年 2 月 8 日）上一篇关于英国布莱克本工厂批量生产飞机的文章的译文，还有苏联专家的评论，即这篇文章需要负责批量生产的其他行业“仔细考虑”。实验厂的特别图书馆还藏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动员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公告。³⁹

自 1929 年开始建造拖拉机厂时起，上级就已经制定了关于竣工后的拖拉机厂应如何根据 S-30 动员计划组织战时生产的指示，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拖拉机厂应如何在全面动员的情况下组织与本市及其他地方的其他企业合作的指令。

工厂档案馆保存着 1930 年和 1931 年国防工业生产计划的指示，以及如何处理工业动员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计划的指令。所有这些最初都是按照 S-30 动员计划制定的，但后来又根据新的 MV-10 计划进行了调整。⁴⁰

值得注意的是，当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开始批量生产民用产品——拖拉机、零部件和设备时，其实验厂的特别部门已经收到了几本关于法国和波兰工业动员做法的小册子。1933—1934 年，图书馆还收到了一份关于军工生产的书目简报。

• 此处所指显然也包括其后身内务部。——编者

从1933年开始，档案中还有一份材料，要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制订出在战争情况下生产T-28坦克的生产计划，且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前，即1937年前完成该计划。尽管1941年委员会决定不销毁这份计划，但在地区档案馆有关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资料中并未发现这份计划。从1933年起，特别部门还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对新的M-3动员计划做出了指示。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特别车间负责对坦克生产动员计划进行长期跟进。然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计划在1941年战争真正爆发时就被取消了。档案委员会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动员计划已经过时，没有任何技术或历史价值，这也是工厂档案馆没有保留旧档案的依据。从1934年起，也就是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运行的第一年开始，红军动员局要求按照M-3动员计划生产。每个承担此类动员任务的企业都必须为全面战争的第一阶段制订最新的生产和技术计划。技术总监或总工程师负责制订企业动员计划。⁴¹

企业的动员计划将送交人民委员部总局审批。中央将对企业的动员计划进行协调，并将战争初期的最终计划发回工厂。在工厂，特别部门的一个受信任的小组要监督三件关键的事情：第一，动员计划要根据武装部队的最新要求进行更新；第二，工厂的机械设备要足够灵活，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战斗环境；第三，重要的原材料和其他货物始终要有库存。

伊兹拉尔·涅斯捷罗夫斯基（1898—1938）是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参与工业备战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乌克兰的赫尔松，9岁开始工作。在职业学校毕业后，他在赫尔松的普梯洛夫工厂找到了一份铁匠工作。1921年，他在赫尔松职业学校担任教师，几年后被任命为敖德萨职业学校校长，同时他正在敖德萨工业学院学习。随后，他成为该市一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之后又被任命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总机械师。1934年3月，他被调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担任总工程师。

1934年12月，被允许阅读绝密文件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实验厂厂长接到命令，要求该厂为战时生产坦克做好准备。他将研究列宁格勒

生产的 T-29 坦克的图纸。这项任务是由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好几个部门下达的。⁴² 1935 年 1 月 10 日，涅斯捷罗夫斯基向莫斯科特种机械制造托拉斯报告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还没有生产坦克”。莫斯科特种机械制造托拉斯询问了标准化问题，以使用相同的设备和图纸生产拖拉机和坦克零部件。

1935 年 1 月 12 日，布鲁斯金厂长向总局就生产三辆 T-29 坦克的命令提出质疑：“如您所知”，他说，“我们完全没有生产三辆 T-29 坦克的准备，因为还没有为此做好任何准备工作”。他要求将一辆坦克、一套设计图和具体图纸送到车里雅宾斯克。因此，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委托那些为该坦克制造部件的工厂将图纸送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并随时向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通报 T-29 坦克设计的最新变化。此外，还强调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专家应获得更多有关坦克实验和研究的资料。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测试和实验车间主任巴连诺夫在给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信中解释说，已向车里雅宾斯克的专家奥列尼科夫展示了有关该坦克的所有资料，并已于 2 月 26 日寄送了一套图纸。⁴³

1935 年 2 月，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讨论了战时应在拖拉机厂生产 T-28 还是 T-29 的问题。否则，工厂的动员计划就无法更新。2 月 25 日奥列尼科夫向基洛夫工厂提交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描述了装有 12 缸飞机发动机的 T-28 坦克，并汇报了 T-29 坦克的生产情况，后者是美国克里斯蒂坦克的进一步改进型号，采用轮式和履带式相结合的设计思路。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三四名工程师需要研究这两种坦克的所有图纸，才能决定在战时生产哪种坦克。⁴⁴

1935 年 2 月 26 日，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签署了第 51-ss 号命令（ss 表示绝密），命令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准备生产 T-29-5 坦克。厂里的两名机械师将前往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学习并参与该坦克的测试。基洛夫工厂的测试和实验车间将绘制出一套完整的坦克设计图和具体图纸，并将其送往车里雅宾斯克。⁴⁵ 七人——三名机械师、一名电工和基洛夫工厂装配线上的专家们——从列宁格勒赶来，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起

相关生产设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防工业一直集中在圣彼得堡及其周边地区，自 1928 年以来，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一阶段强制工业化期间，国防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那里。然而，更彻底的经济备战将这些知识传播到了其他企业。⁴⁶

从这些存于车里雅宾斯克实验厂的档案的描述可见，不是只有一些专家进行纸面上的规划。越来越多的苏联大型坦克生产商参与了备战。苏联还对相关岗位的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预见在工业动员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的所有措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人 1941 年能够在如此多的企业中建立起一套战时经济体系，从而超越了看似优越的德国经济。即使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民用生产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但工业动员培训却使得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得以完成。拖拉机厂与附近的第 78 机器制造厂一样，为战时生产炮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苏联决定绝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决不允许在新的全面战争中出现弹药不足的情况。

第五章 恐怖风暴中的停滞（1936—1939）



图 65 维克托·戈沃尔科夫设计的海报“1940年：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关怀着我们每一个人”。维多利亚·博内尔（Victoria Bonnell）（1977年，第168页）指出，这张海报印制了10万份，是向俱乐部和企业分发最广的海报之一。这一画面加深了人们对共产党总书记辛勤工作到深夜的印象。实际上，斯大林每天起得很晚，但起后都有严格的日程安排，会见来自各党政机关和企业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记录簿保存在档案馆中，使我们得以揭开斯大林工作日程的一些神秘面纱¹

镇压和恐怖在苏联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尤为严重。1937年，共产党、国家机器和工业企业内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当时的评论员对1936—1938年莫斯科公开审判党员领导的报道感到震惊。少数人认为这些指控和供词是基于现实的，其他人则对国家恐怖感到恐惧，并猜测老党员是如何被酷刑折磨，他们的意志力是如何被摧毁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泽斯·霍格伦（Zeth Höglund）就是这样一位当代见证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欧洲的巫师之夜》的书。²

从那时起，不仅学术界，作家和哲学家们也一直在争论大清洗的原因和推动力。俄国移民，包括自然科学家弗里茨·豪特曼斯（笔名弗雷德里克·贝克）和历史学家康斯坦丁·什捷帕（笔名W. 戈丁）以许多中肯的见解描述了恐怖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他们围绕受害者以及普通苏联公民提出的数十种解释展开了争论。³

自俄罗斯档案馆开放以来，对斯大林时代镇压行为的研究再次得到加强。每一代人自然都有自己对过去的表述。然而，欧洲政治组织关于“处理共产主义”的政治辩论中所需的信息，实际上以前就已经有了。档案所增加的是对历史的描述和更好的背景说明。

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专著《让历史来审判》是其中的先例。梅德韦杰夫的父亲是一名红军政治军官，1938年被关进古拉格劳改营，几年后去世。20世纪60年代，罗伊·梅德韦杰夫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时写下了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和解。他的书无法在苏联出版。事实上，他因批评正在进行的为斯大林平反的努力而被解职，并被开除出共产党。该书的俄文版包含了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的英文版中被删除了。⁴梅德韦杰夫的书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了更新，另一部经典作品——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也是如此。这两位学者的阐述都是基于1956年去斯大林化运动开始后苏联出现的许多回忆录和文章。梅德韦杰夫还参考了许多未出版的手稿和一些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曾被其他

历史学家用来撰写有关强制集体化、去富农化和大清洗的文章。《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解释框架与赫鲁晓夫的官方说法相近，即斯大林是一个篡权者，他歪曲了列宁制定的基本合理的长期社会主义改造计划。梅德韦杰夫和康奎斯特写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国家和经济管理部门的高级官员——所遭受的恐怖。梅德韦杰夫试图将斯大林专政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框架中，并通过社会和经济因素来理解斯大林绝对独裁成为可能的原因。

苏联的恐怖活动往往可以用斯大林或党和国家机构中少数领导人的意图、行动和命令来解释。然而，大规模的清洗和对揭露“人民公敌”的广泛支持也可以被视为社会中许多其他群体参与这些行动的证据。历史学家罗伯特·W. 瑟斯顿提出这样一种视角，也暗示了一个事实——大约15年前，这一事实备受争议，但今天更为人们所认可——社会中的许多群体根本没有遭受恐怖的清洗。瑟斯顿认为，冷战时期对苏联的主流描述弥漫着恐惧，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他的著作推动相关研究进入了新领域。⁵

俄罗斯的档案馆开放后，由于大量文件可供查阅，人们对镇压机制有了更多的了解。需要区分不同的层面——首先，镇压的对象是反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共产党领导人；其次，还有一些行动导致了对工业、农业和运输业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大清洗；最后，是所谓的“大规模行动”，它最不为人所知，但却是迄今为止受害者人数最多的部分。

莫斯科的三场大审判是在第一个层面进行的。这些审判是公开进行的，人们广泛讨论了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迫使被告认罪，即使是最难以想象的罪行。在这些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卡尔·拉狄克和布哈林，以及数十名布尔什维克“老卫士”被判处死刑，少数人被判处长期监禁。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七名将军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遭枪决。在这些审判之后，数百乃至数千名他们的追随者或亲属遭到清洗。⁶

20世纪30年代早期，该党曾定期清洗队伍，党员因持反对意见、违反纪律或道德败坏而被除名。不过，这些清洗行动很少会产生像劳改营

判决或处决这样的严重后果。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后，对党员观点的控制有所加强。任何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反对“总路线”的反对派团体的人都被怀疑有“反革命观点”，且很容易在一轮又一轮对前反对派共产党员的清洗中被镇压。1935年3月，对公共图书馆、政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工厂图书馆书籍的审查更加严格。早先的图书馆清理工作可能涉及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从这时起，所有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被指控与基洛夫谋杀案有关的人撰写或包含其文章的作品都将被移除。⁷

中间层面的一波镇压针对的是党内干部、经济管理部门和工厂的管理人员以及科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受害者（有的是死后）恢复了名誉，苏联报刊也对他们的命运予以披露，这时人们才了解到这些清洗波及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在苏共二十大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公开性”时期，学者才能对大清洗开展研究。研究结果中最为



图 66 1934年7月11日，辛纳特拉古拉格劳改营的管理者

人所熟知的是，社会政治地位最高的两个阶层中分别有数百人和数万人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在这一阶段，人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1937—1938年审查并签署批准了涉及4万多人的判决书，其中大多数人被判处死刑。在其他清洗行动中，政治局只对各类人员的定罪数量做出一般性指示，而将谁应被判处死刑和谁应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的最终决定权留给地方精英（通常是地方党委书记、秘密警察头目和检察官）。

人们曾经认为，1937年和1938年，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因政治罪而被捕和被判刑，就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这场大清洗被称为“叶若夫清洗”，它与雅戈达的继任者、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有关。这一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这场恐怖运动很小程度上是由秘密警察自己发起的。相反，从1936年底开始，斯大林和政治局中的几位领导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控制更为牢固。内务人民委员部只是共产党的一个执行机关。⁸

从1936年起，苏联国防工业（后来也包括民用工业）中的外籍工人遭到解雇，而且经常遭到镇压。尤其是秘密警察奉命将所有德国人赶出苏联工厂，无论他们是苏联国籍的德国人，还是来自纳粹德国的政治难民。这自然影响到乌拉尔地区，特别是车里雅宾斯克的重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⁹

党内大清洗（1937—1938）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讲话中提到，在1934—1938年间，139名中央委员中有110人被处决。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梅德韦杰夫提供了大量有关这些人物的生平资料。然而，该书的主题是“斯大林的邪恶和对权力的渴望”。根据这种观点，斯大林有一个预想的计划，要消灭国内所有曾经和可能反对他专制统治的人。因此，任何在20世纪20年代采取左派立场、反对斯大林的人都将首先被消灭——这包括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此后，大清洗继续进行，影响到更多的群体。从1937年初开始，“右翼托洛茨基分子”成为肃反

对象，其中包括在 1927—1939 年支持“布哈林路线”的党员，以及后来批评斯大林经济政策的党员。这些镇压措施可以隐晦地通过清除某些个人和突出问题行为来更新行政部门的干部。当然，管理上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些情况很少是由于工作疏忽造成的，而是系统性的问题。为避免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事故或生产质量低下而采取的其他手段往往作用不大，因为有关群体宁愿相互保护，也不愿实行政改改革。

在乌拉尔地区，党内清洗始于 1936 年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干部的指控。伊万·卡巴科夫在 1934 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却在 1937 年 6 月的全会上被除名。卡巴科夫被指控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玩忽职守，并被指控“代表右翼托洛茨基主义搞破坏”。经过长期审讯，卡巴科夫对所有指控供认不讳，于 1937 年 10 月 3 日被处决。除卡巴科夫外，被判刑的还有州委第二书记 K. F. 佩什尼金、党的工业部门负责人 G. G. 伊恩、州计划委员会主席 G. I. 克鲁明及其副手 Ia. A. 伊斯托明，以及彼尔姆、下塔吉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等城市的党委书记。他们虽案件各有不同，但都被指控在经济领域实施了广泛的破坏活动，据称其目的是破坏苏联的国防能力。



图 67 卡米肖夫的劳动改造营

• 原文如此，疑为 1929 年之误。——编者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认为，解除卡巴科夫的职务是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试图利用恐怖手段来瓦解卡巴科夫周围的“小王国”和腐败网络。根据哈里斯的说法，卡巴科夫控制了当地的内务系统，因此只有来自中央和党的高级机关的动议才能将该地区重新置于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¹⁰

对车里雅宾斯克党组织的清洗过程也有类似的解释。在20世纪20年代对季诺维也夫和党内其他左翼反对派成员进行表演性审判后，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肃反运动最初针对的是党内反对派组织的所有成员。州委书记库兹马·伦丁最初领导了肃反运动。1937年3月4日，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报告说，车里雅宾斯克有165名领导干部被揭发为“托洛茨基分子”，并被开除党籍。5月12日，伦丁通知人民委员叶若夫，一个名叫齐科夫的“反革命右翼组织”成员被判有罪并被逮捕。5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乌拉尔代表团，其中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的卡巴科夫和奇塔洛夫，以及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的伦丁。他们与莫洛托夫、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一起在斯大林办公室待了近三个小时。¹¹

1937年仲夏，车里雅宾斯克州党组织召开了会议，伦丁是主要发言人。几天前，安德烈·安德烈耶夫（1895—1971）代表政治局来这里进行视察和实施清洗。安德烈耶夫每天都向斯大林汇报情况，并与他商议对伏尔加河地区和乌拉尔地区的干部应采取何种措施。在萨拉托夫，安德烈耶夫逮捕了党组织、机械拖拉机站的一些领导干部。然而，在车里雅宾斯克，他只发表了一次谈话，对伦丁给予了轻微的批评。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安德烈耶夫要支持伦丁，反对个别党员的批评。如果让伦丁或其他领导干部成为城市中许多实际问题的替罪羊，那就太简单了。

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要求其所有地区机关与地区党委联合向中央通报本地区有多少“反苏分子”，以及从流放地返回的富农人数。然后，他们将提议其中有多少人应被判处死刑，有多少人应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这些决定将由“三驾马车”——当地的内务系统、党委书记以及地方检察官——做出。¹²

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许多其他领导人一样，伦丁呈现出双重甚至分裂的面貌。一方面，他努力了解和掌握有关车里雅宾斯克州发展的经济事务；另一方面，他发起了“揭露”反对者的运动，并对那些被称为“破坏者”或“间谍”的人实施严厉的报复。1937 年夏天，伦丁担任了领导“大规模行动”的三方委员会成员，根据恶名昭彰的第 00447 号命令处决了数千名“前富农和反苏分子”。但很快，丧钟也为伦丁敲响了，他于 1937 年 10 月 12 日被捕。他受到了长时间的夜间审讯，被迫承认了一系列捏造的指控。

有关这些审讯的文件很少。有日期为 11 月 17 日和 12 月 27 日的审讯记录，尽管他并没有在这两天接受审讯。另一方面，1937 年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28 日，他签署了七份审讯记录，对越来越多的“罪行”负责。伦丁供认，他在 1928—1934 年间领导了“反苏活动”，并自 1934 年起代表“右翼集团”在车里雅宾斯克组织了“反苏”恐怖活动。他承认 1935 年曾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党委书记萨里翁·洛米纳泽组成一个“集团”，后者后来为了躲避逮捕而自杀。审讯记录还显示，同年伦丁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格奥尔基·皮达可夫身边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并奉他们的命令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工业部门搞“破坏”。但实际上，伦丁在担任党政领导期间一直在推动扩大地方工业生产，并尽其所能进行监督。由于工厂存在一些问题且很多事情都没有按计划进行，事后看来很容易找个人当替罪羊，但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

根据这些审讯记录，伦丁最终承认自己自 1933 年以来一直是波兰情报部门的特工。所有这些捏造的罪名都是在 1937 年末到 1938 年初这个冬季强加给伦丁的，这些罪名都是这一恐怖时期被捕的大多数干部的典型罪名。1938 年 2 月 8 日，他被正式开除出共产党，两天后被处决。他的“供词”在该市和全州的党内会议上宣读。事后通过查阅其他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人员是如何将一些真实的会议、事件和问题混在一起，然后强迫被告——通常是通过酷刑——在全部文件上签字的。¹³正如苏联其他地区与大清洗受害者有关的会议一样，车里雅宾斯克市委于 1937 年 10 月 25 日开会谴责了伦丁。一项决议谴责了

“一伙雅努斯面孔”的破坏者”，并将斯捷潘诺夫、西蒙诺夫、弗里曼、克柳切夫斯基、拉斯金和其他一些当时被捕的人称为“人民的敌人”。决议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密切合作，多年来与波兰和德国间谍一起，从“车里雅宾斯克共产党员缺乏警惕性”中获利。他们占据了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所有重要职位，以便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据说，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阴险的两面交易、伪造和歪曲苏维埃法律来重建资本主义，从而使党关于生产计划的指示无法在工业和农业中得到执行。这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然后当地党的领导人镇压了批评社会弊端的人。在这群“法西斯军团”的统治下，裙带关系和奴役行为盛行。

事实上，伦丁“破坏者集团”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对整个地方党组织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决议说，这是因为当地共产党人忘记了“斯大林同志的一再指示，即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新的，甚至更尖锐的形式继续进行着”，而敌人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使用了更巧妙的手段。新的党组织对揭露伦丁的“右翼破坏分子集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叶若夫同志表示感谢。

新任区委书记德米特里·奥古尔佐夫仅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5月间领导该组织。他于5月7日在高尔基市被捕，被控“与人民的敌人勾结”，并被立即处决。接替他的是42岁的德米特里·安东诺夫，他曾在教区教堂度过两个冬天，13岁开始在矿山工作。革命后，安东诺夫有机会在哈尔科夫的工人学院学习，后来又在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他在共产党内的职业生涯包括担任该学院监察委员会主席，后又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外贸学院工作。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业局担任过几年副局长，负责燃料工业。¹⁴

从1935年起，安东诺夫成为党中央的一员，担任中央委员会工业部门及其燃料科负责人的助手。由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主要机械制造部门在1939年和1940年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安东诺夫被解职。官方的解释

• 指“双面人”，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有两张面孔。——编者

是他没有“清算”工业和行政部门的“破坏后果”。这可能指的是安东诺夫忽视了除煤矿和南乌拉尔地区矿产资源这些直接利益事项之外的所有事项。然而，安东诺夫并没有受到迫害。他承认自己没有处理好作为车里雅宾斯克工业领导人的角色，而且近年来危机加深了。从1940年2月起，他再次听从中央委员会的调遣。

几个回合下来，车里雅宾斯克的所有政治和经济领导人都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到1938年，几乎所有有经验的干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许多缺乏经验但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技术人员，他们被匆忙提拔。本章介绍了当年该地区的会议上的一些用语和思维方式，其中很多内容多年前就已为人所知。但历史学家近年来并未对莫斯科的表演性审判进行过讨论。在车里雅宾斯克出现的肃反模式在不同程度上与大清洗时期苏联其他地区的肃反模式相似。¹⁵

镇压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干部

对中层干部的整肃是有规律可循的：1936—1937年被捕的第一批人是那些早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或与皮达可夫及其他反对派有密切联系的人。下一轮逮捕的对象是20年代末真正支持或所谓支持布哈林较为温和的政策的人。从1938年初开始，中央委员会敦促地方党委停止党内清洗中的“过度行为”。然而，直到政治局于1938年11月叫停了肃反运动并解除了叶若夫的职务后，才对一些最无中生有的事件进行了部分重新调查。在新任内务人民委员的领导下，极少数人得到了平反或被释放。

1936年8月，亚历山大·布鲁斯金被任命为副重工业人民委员。他的前任皮达可夫被逮捕，并被指控挪用公款。这些看似荒唐的“蓄意破坏”指控往往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由于疏忽或长期使用，矿坑会坍塌，设备会损坏。苏联经济和运输系统中的许多事故都可以用“人为因素”来解释。然而，就连当局也意识到，这些事故并非如指控所称是“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造成的，更不是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或“复辟

资本主义”。但是，从1936年起的几年里，每当有领导干部被捕，报刊上就会公布其被捕的消息，并列举其所犯下的所有罪行。此后，此人的继任者和同僚会聚集在一起，通过一项决议或纲领，以“消除破坏的后果”。从本质上讲，这不过是换一种说法，即每个人都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遵守技术指令，检查质量标准，遵守时间表。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是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人民委员部，其领导机构管理着计划期间新建的所有重要工业企业和沙皇时代的老工厂。莫斯科的新城规划甚至包括拆除红场的瓦西里教堂，在原址为该部建造一座摩天大楼。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民委员部取代了1936年根据部门原则拆分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内部的分支机构。新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内部留下了一些分支机构，奥尔忠尼启则仍然是其领导人。其他企业则由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和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领导。几年后，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又分出了一个新的重型、中型和轻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到1939年，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又分出了弹药部、武器部、航空部和造船部。^{*}人民委员部（1946年后称为部）的数量增加到几十个。

1937年1月在莫斯科对皮达可夫等人进行审判后，内务人民委员部车里雅宾斯克地方系统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指控遭到了普遍的怀疑。有些指控显然毫无根据，比如南乌拉尔铁路局局长就被指控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在一次群众大会的报告中，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密者说：“NN坦诚地宣布，这些指控是虚假的，当局正在寻找替罪羊。现在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K，而实际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没有红军士兵在碰撞中丧生，他们只是踩着刹车的自由骑手。”¹⁶

秘密警察的报告提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工程师公开对指控表示怀疑，一名裁缝在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对他们任命的

* 全称分别为弹药人民委员部、武器人民委员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和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编者

人负责。据报道，还有人对一些在表演性审判中被定罪的人表示同情，特别是记者卡尔·拉狄克和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秘密警察的“特别调查”建立在苏联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情报网络基础之上。虽然这些报告并非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至少提供了社会各阶层各种意见的蛛丝马迹。这些报告更无法进行科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量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显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与苏联报刊和新闻报道中所指控的“挪用公款”“搞破坏”和“外国代理人的阴谋”大相径庭。

车里雅宾斯克的受害者中有前厂长卡齐米尔·洛文，此时他已被调到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能源局。他于1937年8月20日被捕，11月15日被判处死刑。他的继任者之一、前总工程师兼厂长伊兹拉尔·涅斯捷罗夫斯基在1938年7月3日第四次地区党组织会议期间被捕，8月29日被判处死刑。与大多数清洗活动的政治受害者一样，他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才获得平反。¹⁷

1934—1936年，伊万·A.克尼亚齐耶夫（1893—1937）担任南乌拉尔铁路局局长，后晋升为副交通人民委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拥有丰富的铁路管理经验。内战期间，他在红军中负责铁路运输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37年被捕，并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¹⁸1937—1938年，南乌拉尔铁路局的许多人被判处在古拉格长期服刑，原因显然是列车事故、出轨和延误被列为“反革命罪行”。¹⁹

泽林斯基是师范学院思想独立的先驱，是当地报刊一场运动的受害者。他被指控容忍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担任教师，因此被解职，随后被捕。他在刑讯逼供下承认了指控，但在“审判”期间试图抗议未果。1938年夏，他被处决。²⁰

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对1937—1938年大清洗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一观点在当时广为流传，历史学家对此展开了争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有时将毫无根据的镇压归咎于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许多普通苏联公民，无论是恐怖浪潮的受害者还是旁观者，都认为应该呼吁斯大林停止迫害。过去二十年间从共产党和秘密警察档案中获得的大量文件表

明，斯大林绝对知道大清洗。事实上，他发起并主导了许多个案件，并监督了“大规模行动”的开展。这些年里，斯大林经常与叶若夫会面，并收到审讯记录和将被判刑人员的名单。在对被指控的党员、工业专家和其他人进行橡皮图章式的审判时，由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决定应给予哪种惩罚——处决还是延长劳改营的刑期。然而，各地区的内务系统经常主动编造案件，伪造履历和其他数据，将一群无辜的人说成是与日本或波兰总参谋部有联系的“反革命恐怖组织”。1939年，当下一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接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许多类似案件被披露出来。

许多关于苏联历史的西方教科书经常包含这样的说法：“1937年，所有苏联公民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所有党员睡觉时都带着一个装满必需品的小箱子，以防夜间被捕，甚至他们睡觉时都在枕头下放一把左轮手枪。这些说法在纳粹进行反苏宣传时就在传播。²¹然而，许多概述都是基于强制劳动营的叛逃者或幸存者的回忆，他们将苏联的真实情况简单化了。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战俘或纳粹德国的劳动奴隶——后他们作为“流离失所者”被关押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进行的大规模访谈呈现出另一种模式。梅尔·费恩索德和巴林顿·摩尔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苏联的治理方式、制度驱动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大清洗是如何改变社会关系的。这些基于访谈的研究表明，很多人并不觉得1937年或其他任何特定年份特别体现了镇压机构的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属于社会的哪一阶层——农民会把20世纪30年代初描述为致命的年代，而许多工人则根本不认为这些事件是毫无根据的镇压行动。新的工业工人阶级约有2000万人，而农民仍然是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基于这一事实，在对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大恐慌”进行概括时，显然应该谨慎。

显然，在对各工厂管理层开展清洗行动期间，经济受到了影响，增长率低于预期。不过，如上所述，虽然在公共讨论中充斥着“破坏者”“间谍”这样的词语，但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许多未解决或被掩盖的问题都能得到直截了当的、客观的讨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37年9月

1日，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召开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当地所有大工厂的厂长都参讨论当时的经济形势。会议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没有新闻报道中的煽动性言辞。当然，讨论的工业问题没有一个是“破坏”的结果。伦丁主持了这次会议，但他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和建议。²²

如今，通过查阅俄罗斯档案，可以对个别企业、村庄、地域集团和种族群体在大清洗时代的情况进行微观研究。一些委员会确实在1937年对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许多报告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例如事故被隐瞒不报，有缺陷的产品被送往红军。一些列宁格勒工厂——包括基洛夫工厂、布尔什维克工厂和其他几家生产坦克的工厂——都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测试记录是伪造的，有时甚至得到了军方代表的批准。从这些报告可以判断，确实存在管理不善和普遍腐败的情况。委员会在开展这些调查之后，往往把存在的问题称为典型的“反革命破坏”。数十名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被解雇、逮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而其他人则在行为举止方面更加小心谨慎。²³ 这些关于苏联国防工业综合体主要工厂之一的报告尤其引人关注，因为战争年代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后来的厂长伊萨克·扎尔茨曼曾在清洗期间担任基洛夫工厂的总工程师，并于1938年被任命为该厂厂长。²⁴

这种情况不仅促进了更多忠于斯大林的人或新一代技术知识分子的成长，还使管理纪律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工厂的技术流程得到了更好的控制。约翰·斯科特是一位敏锐的当代观察家，他在1937年指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车里雅宾斯克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清洗浪潮和持续不断的“清算破坏后果”运动，新的管理层可以更加坦率地直言工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至少，他们不再倾向于美化现状和掩盖落后现实。

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扎尔茨曼于1905年12月9日出生于乌克兰文尼察的托马斯波尔村。他的父亲莫伊谢是裁缝，母亲是家庭主妇。莫伊谢在俄国内战期间西蒙·彼得留拉的匪徒实施的大屠杀中致残，于1928年去世。伊萨克只上了四年学，就开始在甜菜地和制糖厂工作。

1922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从共青团工会工作中获益匪浅，还获得了学习机会。1929年，伊萨克接受了基础教育和焊工职业教育。同年，他被送往敖德萨理工学院，四年后毕业。随后，他在传说中的“红色普梯洛夫工厂”（列宁格勒州委书记遇刺后，于1935年更名为基洛夫工厂）找到了工作，先是担任车间副主任，然后担任涡轮机车间主任、全厂总工程师，1938年担任基洛夫工厂厂长。

他在自传中写道：“33岁时，被委以重任，经营管理‘苏联最伟大的企业之一’。”扎尔茨曼强调，他的父亲是乌克兰一个偏僻小村庄的犹太裁缝，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有一天能在新俄国担任这样的职务。当扎尔茨曼开始负责基洛夫工厂时，大清洗运动已经达到了顶峰。前经理、主管和厂长们要么因为确实存在的技术问题，要么因为虚假的罪名而被淘汰。任何错误都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然而，扎尔茨曼的例子表明，在这些年里，苏联工业界还存在其他潮流。根据冷战时期宣传的主流观点，人们很容易肤浅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这些年里，苏联到处都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恐惧。而档案中的大量文件显示，无论是在工厂、农村，还是在教育和科学领域，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照常进行。不是每个干部，更不是工人，在读到或听到“肃反”“清洗”时都会为自己担惊受怕。偶尔，他们也会认为这些报道有一定的真实性。如果他们或他们的亲属成为镇压的受害者，他们会认为这是个人的错误。

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杜霍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基洛夫工厂的另一位人物，他在苏联坦克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母亲是一位贫困贵族的女儿，父亲是沙皇军队中的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尼古拉在加佳奇男子中学接受教育，学会了英语、德语和法语，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专家中非常罕见。他14岁开始工作，先是在村苏维埃委员会担任记账员，后来又在一家工厂工作。1926年，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土地测量和改良学院的“工人系”继续深造。从该学院毕业后，他被列宁格勒理工学院机械系录取。此后，1932年，杜霍夫开始在普梯洛夫工厂的设计部门工作，为批量生产的“通用”拖拉机和苏联第一辆轻型汽车“列

宁格勒-1”设计零部件。1936年，他晋升到基洛夫工厂的SKB-2特别设计局，改进了T-28坦克的变速箱。1938年底，杜霍夫提出了新型重型坦克的设计方案，并将其命名为KV（以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杜霍夫关于这种新型坦克的想法具有决定性意义，并在测试后获得了红军的批准。他的贡献也得到了未来敌人的认可——德国人将这些苏联武器称为“杜霍夫坦克”。KV坦克于1939年开始批量生产，当时杜霍夫是SKB-2的副局长。这些KV坦克在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投入使用，并在改进其结构、武器和发动机方面吸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1940年，杜霍夫经常作为新坦克的驾驶员出现在试验和射击场上。他的座右铭是：只有设计师才能作为工程师改进坦克，因为只有他知道坦克的特性。杜霍夫还主动指导其他设计师驾驶坦克。

苏联国防工业的某些部门，尤其是飞机制造业，受到了大清洗的严重打击。国防工业的其他部门，包括坦克和大炮的生产部门，受到的清洗较少。

大规模镇压运动

自俄罗斯的档案馆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将大清洗看作一种独特现象。过去的研究工作侧重于研究精英、干部和知识分子，但这些群体只占有受害者的一小部分。广义上的镇压——所谓的“大规模行动”——针对的是普通人，即工人和农民。研究大清洗的新视角强调1937年夏季的所谓“富农运动”，以及针对在国防工业工作的德国人（包括苏联国籍的德国人、居住在苏联的德国人和流亡的德国共产党员）的运动。²⁵

1937年秋天，一场针对前富农的“大规模行动”开始了。这些人从流亡中回到了原来的村庄，或在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绝密的第00447号命令要求对苏联社会底层那些没有稳定工作场所或住

房的被边缘化的小罪犯进行清洗，还要对“反苏分子”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其中的根本原因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1937年6月至7月，党的高级委员会就行动范围展开了辩论。初步数据和调查被送往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构。然后，秘密警察确定了要处决或送往劳改营的“富农、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的估算人数。根据政治局的指示，这一行动于1937年8月开始。其他“大规模行动”是针对德国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芬兰人等民族群体发起的，也就是与未来战争中最可能的敌人国籍相同的人。²⁶

1937—1938年，70多万人被处决，其中约4万人是党组织或国家机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被列入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或政治局其他成员批准的名单。这些干部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由所谓的“三驾马车”（检察官、一名地方党代表和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进行单独审判。

“大规模行动”的受害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反苏分子”、前富农和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罪犯；另一类是被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的民族团体，如德国人、波兰人、芬兰人和日本人。最高政治领导层向秘密警察下达了指令，规定有多少人应该被逮捕，以及他们将被判处什么刑罚。

人们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时期的各种不同现象，将它们都称为“大恐怖”，其实并不恰当。实际上，在1935—1939年间，一些行动是相互独立的，而另一些行动则彼此密切相关。其中一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的“守旧派”被悄无声息地清除，而其他人却被迫接受表演性审判。如今，许多审讯记录已经公开，它们为我们了解大清洗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要阐明对地方上党的领导人或企业管理人员的血腥清洗，还需要其他解释。学者们提出了关于社会工程和现代化的理论，以解释斯大林和政治领导层为何要将成千上万的人分门别类，如牧师、前贵族、富农和任何发表过批评苏联的意见的人。俄罗斯历史学家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注意到了一些很久以前就提出的解释，特别是对苏联社会中潜在



图 68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哈林和他的家人。尼古拉于 1896 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期间曾在不同的工厂工作。他结婚后育有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被捕时，他在南乌拉尔铁路波列塔耶沃一站的一个水站当技工。他于 1937 年 12 月被捕，被迫签字确认了“审讯记录”。他“供认”亚历山大·多罗霍夫曾让他在该水站为日本军事情报机构充当间谍，向日本提供有关远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军队动向的情报。他的“供词”称，他的“声东击西活动”是要摧毁为蒸汽机车供水的泵站。根据《刑法》第 58 节第 2、6、9 和 11 条，他被判处死刑。1957 年 12 月 3 日，他被平反，因为他从未从事过任何犯罪活动

的“第五纵队”的恐惧和扭曲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²⁷ 然而，这只是部分原因。在 1930—1931 年的农业集体化时期，政治保卫总局地方机构清除了农村中所有表示反对的团体。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戈达批评了那些对商人、企业家、教师和牧师进行社会清洗的政治保卫总局地方机构负责人。他强调，这些群体应稍后清洗，而不是与逮捕富农混在一起。²⁸ 1937—1938 年恐怖的镇压行动被解释为是如何消灭工人阶级的“敌人”相一致的后续行动，而不是出于全面战争的临近和对苏军后方出现“第五纵队”的恐惧。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1937 年和 1938 年有 70 多万人被处决，被判处长期劳改营徒刑的人数大致相同。劳改营系统被描述为与计划经济“融为一体”，据说经济规划部门会从劳改营向秘密警察分发“订单”和他们



图 69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卡西莫夫于 1886 年出生在上乌拉尔斯克地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7 年被捕时，他与妻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住在斯帕斯基村，并被指控参加了一个 600 人的反革命组织，该组织据称由两名“人民公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党委书记维萨里翁·洛米纳泽和阿尔佩罗维茨——领导。卡西莫夫于 1937 年 7 月 2 日被判刑，罪名是准备武装起义和计划在战争情况下摧毁钢铁厂的主要设备。根据 1937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一裁决，119 人被判“有罪”，并因捏造的指控被无辜判刑。1956 年，车里雅宾斯克地方法院为他们平反

新的对强制劳动力的“要求”，而秘密警察会找到理由逮捕无辜的人，并将他们“供应”给古拉格劳改营。大恐怖期间的实际情况似乎与这一说法背道而驰。

事实上，1937 年，古拉格在关于 1938—1942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提案中曾计算过，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古拉格的强迫劳动人数实际上会有所减少。然而，由于大清洗，古拉格的行政系统必须进行改革，以应对囚犯人数的增加。必须建立新的劳改营——主要是在森林里——以利用大部分不合格的囚犯。这些营地所需的投资最少。因此，认为镇压是

由对强迫劳动力的需求所驱动的似乎不合逻辑。如果假设劳改营制度是镇压的动机，那么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两年里有 75 万人被处决。更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和领导集团中的其他人是出于对体制内部敌人的偏执误解，而非出于扩张古拉格，才行此策略的。

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后，对古拉格劳改营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对道路、运河、水电站以及工厂建设的主要指令进行了修订。尽管古拉格劳改营中的政治犯人数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大幅增加，但应该记住的是，劳改营只占苏联工业生产的一小部分，90% 的建设活动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外的其他部门完成的。1938 年，苏联开始强制重整军备，当时国防工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所有其他部门。²⁹

贝利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精简

“斯大林时期进步与恐怖的矛盾结合”是历史学家未能充分研究的问题之一。尽管苏联问题研究的先驱之一巴林顿·摩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对极权制度进行了动态和辩证的分析³⁰，但最近出版的资料，如秘密警察给斯大林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解开这一悖论。有很多例子表明，苏联领导层在编造阴谋的同时，能够辨别并成功应对真正的外部威胁。例如，在一周内，斯大林可以阅读一份报告，其中包含一位被罢免的部长的“供词”，据称他奉日本总参谋部的命令破坏了苏联的国防工业；然后，他又可以研究一份根据截获的日本外交使团邮件所撰写的符合事实的报告。³¹

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统治具有奇怪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偏执狂和残酷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是高瞻远瞩和专业智慧。斯大林本人以及卢比扬卡安全部门总部的领导人是如何将他们自己虚构的内容（通常由调查人员自己撰写）与经济和对外情报中的真实事实区分开来的，这似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38 年 11 月，根据政治局的指示停止了大清洗，此后，很少有像以前那样捏造“罪行”的事例。确凿、

具体的证据才是主要证据，而不是被迫“供认”将要发生的事情。

关于大清洗的后果有一种常见的解释，可以根据新公开的档案内容加以修正。根据这一版本，一类又一类的人作为“社会异己分子”或“社会有害分子”遭到镇压。观点与斯大林不同的老布尔什维克是大清洗的首批受害者。数十万人在“大规模行动”中丧生。最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血腥大清洗清除了这么多人之后，秘密警察本身也成了审查和新一轮逮捕的对象，据称是为了“让目击者噤声”。一个没有真正“历史记忆”的全新社会就这样诞生了。这种说法的真实之处在于，新干部确实有了新的“历史背景”。新的集体记忆被印在发行数百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这本书是斯大林亲自精心编辑的苏共历史。

然而，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单。根据1938年11月政治局的决定，内务人民委员部受命停止“大规模行动”。在短时间内，政治领导层大幅改变了对秘密警察的指导方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经常被详细告知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个人、暴露的“组织”和“间谍网”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确信在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采取的镇压措施并没有带来更好的业绩。他们还读了许多党员、官员和普通民众对秘密警察滥用权力的投诉。因此，贝利亚领导的新一届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接到的指令是调查可疑案件，必要时释放那些因虚假理由被捕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自己队伍中前两年滥用职权的人进行了清洗。这些调查揭示了存在大量有意识的伪造行为，存在完全捏造“反革命集团”或更改个人资料（社会类别、国籍等）的现象，这样做是为了在“大规模行动”中完成指标。所有这些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清洗的情况都被仔细记录在案，这一事实证明“让目击者噤声”这一有关大清洗的普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车里雅宾斯克，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带来的创伤更为严重。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领导层对前两年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内部核查。³²

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分支机构一些负责人相关的材料表明，他们的工作目标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确凿证据，而不是掩盖事件。新任内务人民委

员贝利亚下令重新调查个别案件以及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事件。贝利亚的第 00762 号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给出了对秘密警察进行清洗的指导方针，该命令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起草的。虽然该决议和贝利亚的命令都没有公布，但可以看到它们在苏联各地导致的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主要事件。

大清洗时期在车里雅宾斯克领导内务系统的是帕维尔·奇斯托夫，他出生于 1905 年，是一名画家的儿子。奇斯托夫于 1926 年成为共产党员，并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秘密警察机构工作。他 1934 年来到车里雅宾斯克，并在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2 月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负责人，而这正是针对社会各团体开展“大规模行动”的时期。此后，奇斯托夫受命在库伊比舍夫修建水电站和大坝。1942 年，他在那里被进犯的德军俘虏，并被送往德国的战俘营。1945 年，他从毛特豪森集中营获释，并在波多利斯克用于管控和筛选的集中营接受审讯，直到 1946 年秋天。根据苏联刑法第 58-1b 条和第 58-11 条，他因向德国人提供秘密情报而被判处 15 年强迫劳动。他在苏联远东的马加丹服刑，直到 1955 年才被提前释放，但未获平反。因此，奇斯托夫没有被指控战前在车里雅宾斯克犯下非法行为，而是被指控作为战俘向德国人提供了秘密情报。

在车里雅宾斯克，前内务系统头子费多尔·拉普申及其两名副手卢戈夫采夫和沃龙奇欣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门的全权代表也被逮捕。他们被指控违反授权和指示，并根据苏联刑法第 193-17 条被正式起诉。拉普申、卢戈夫采夫和沃龙奇欣被指控实施了非法逮捕，还指使下属捏造“反革命刑事案件”，必要时还可以对被捕者进行教唆。报告提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捏造案件。在 1937 年和 1938 年，一些无辜的人被强迫静立数小时、浸泡在冰冷的水中或遭到棍棒殴打，他们的“供词”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有时，被捕者会在同狱犯人或教唆者的唆使下开始招供。在乌拉尔地区军事法院的军事准将律师伊古丁领导的调查中，发现有几份“调查记录”甚至是在没有审问被告的情况下写下的。在许多案件中，个人数据被伪造，阶级背景被篡改，以符合“大规模行动”中

的某些逮捕指标。比如，属于“贫农”或“中农”类别的普通农民被归为“富农”。

伊古丁在 1940 年的报告中指出，用非法手段获得和伪造的审讯记录是许多无辜者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长期服刑的依据。他提到，1937 年底，奇斯托夫捏造了一个“前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间谍和破坏组织”³³，共有 581 名成员，其中 494 人被奇斯托夫和拉普申领导的“三驾马车”处决。

调查显示，在至少 294 起不同的案件中，完全无辜的人被处决。其中一起案件中，整个家庭都被判处死刑：印刷工人日科夫，他的家庭主妇妻子，在综合医院当医生的 25 岁女儿奥尔加和在实验室工作的 21 岁女儿加琳娜。另一个例子是无辜的叶夫塞一家，包括父亲、母亲和女儿奥尔加（彼尔姆医学院学生）。1938 年春天，针对社会革命党人还有另一场行动。在没有任何反革命、反苏活动证据的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编造了一个“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组织”，称该组织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在另一起案件中，288 人因“反革命恐怖活动”被捕，其中 236 人被判处死刑。1937 年 12 月，奇斯托夫和他的合作者卢戈夫采夫编造了一个“反革命军官组织”，称有 231 名成员。当地的内务系统在根据斯大林和叶若夫的命令针对有波兰、德国、芬兰或其他血统的苏联公民嫌疑人或仅受监督的人执行所谓的“大规模行动”时，使用了许多手段来完成行动。任何犯有“可疑姓氏罪”的人都会被逮捕。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拥有法外处决权的“特别三驾马车”重新开始工作，当时拉普申负责监督导致 2430 人被处决的审讯，卢戈夫采夫负责监督导致 610 人被处决的流程。然而由于 1938 年 11 月的指示终止了清洗活动，其中 360 项判决没有执行。360 项判决中有 183 项被直接撤销，但伊古丁的报告没有提到另外 177 项判决后续是怎样处理的。³⁴ 1940 年 6 月，拉普申和卢戈夫采夫被判处死刑，沃龙奇欣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他们的同事库拉诺夫被判处在古拉格劳改营服刑 8 年。³⁵

在车里雅宾斯克制造大规模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逃过了这一内部审讯。伊古丁的调查结果表明，奇斯托夫下达了捏造案件、使用酷刑和执行大规模处决的指令。然而，奇斯托夫却被转移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的建筑工地——伏尔加河库伊比舍夫附近的水电站和大坝。德国入侵后，奇斯托夫成为战俘，他的名字和劣迹被纳粹大量用于宣传。战争结束时，他因在战争期间和战俘期间的叛国行为被捕并受到指控。他被判处在古拉格服刑 15 年；1955 年，他被释放，但没有恢复名誉。³⁶

这些关于 1939—1940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清洗的新资料至少能让我们部分修正传统观点，即新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只是让那些可能从内部目睹了大清洗的人保持沉默。相反，来自车里雅宾斯克和其他地方的联邦安全局档案文件显示，秘密警察恢复了“更良好的工作习惯”。在 1937—1938 年，人们被处决的原因仅仅是他们的社会阶级背景、过去的政治活动，或者更常见的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伪造的审讯记录。瑞典政论家泽斯·霍格伦在 1938 年发表的文章中说，这让人想起中世纪野蛮的猎巫运动。从伊古丁等人进行的审讯来看，当时至少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明白，他们是在伪造文件，而不是像以前训练的那样执行国家安全任务。有时他们辩称，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叶若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的认可，也得到了斯大林和中央领导层的认可。虽然秘密警察在 1938 年后肯定没有变得自由化，但对被捕人员（无论是艺术家、军人、技术人员还是音乐家）的指控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了。

根据德国对苏联战俘的审讯，历史学家加博尔·里特斯庇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许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确实相信苏联工业领域和行政部门广泛存在蓄谋搞破坏的现象，而且这些阴谋还和国外情报部门有关。然而，在车里雅宾斯克对被解职和被捕的内务系统的干部进行的调查并不支持这种解释。1937—1938 年秘密警察针对“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或法西斯”阴谋的许多行动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作家”蓄意制造的，且违背自己更为正确的判断。³⁷

当军工企业的老人们回忆起贝利亚时期，他们认为，与早先追捕“破坏者”相比，这是一个新时代。贝利亚决定，要让那些因虚假指控被捕或因技术失败而被判处极长古拉格刑期的专家尽快获得释放。为此，他重新采用了所谓的“沙拉什卡”制度，让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特别设计局负责飞机、弹药和造船工业。专家们被转移到工厂监狱，白天与自由人员一起工作。一旦这些专家成功试验了他们设计的飞机、枪支和其他武器，他们就会在两三年内从这些监狱中被释放，无须服满正式刑期所要求的8—10年。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于1937年被捕，但在1938年的强迫审讯中才慢慢承认了一些指控。同年年底，他被叫到贝利亚面前，要求他推翻自己先前的认罪供述。图波列夫起初怀疑这又是一次教唆，但很快就确信新领导希望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图波列夫被要求成立一个“沙拉什卡”来设计新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并招募他认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尽可能多的专家。几年之内，这些囚犯中的大多数都获得了大赦，重获自由。

1937—1938年大恐怖的历史解决方案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39—1940年贝利亚领导下的初步审查，释放了相对较少的受害者并清除了那些捏造无辜者罪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然而，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平反过程。贝利亚没有质疑“大规模行动”，只是质疑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和“违反社会主义法律的行为”。作为国家安全总委员，贝利亚在处决那些被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时更不会犹豫不决，例如在吞并波兰部分地区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之后。

斯大林逝世后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平反工作。新的集体领导对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的大规模镇压有一个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对于如何推进平反并减少清洗恐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却非常犹豫。许多领导人都积极参与过大清洗，尽管他们可能对全国范围内的镇压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他们要求国家安全和内务部提供信息。1953年12月11日，内务部向党的领导人递交了一份报告，内容与1921年至1953年上半年因政治罪被判刑的人员有关。³⁸ 1935—1940年间，1980635人被捕，其中688503

人被处决。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681692人——是在大清洗的两年中被处决的，1548366人在这期间被捕。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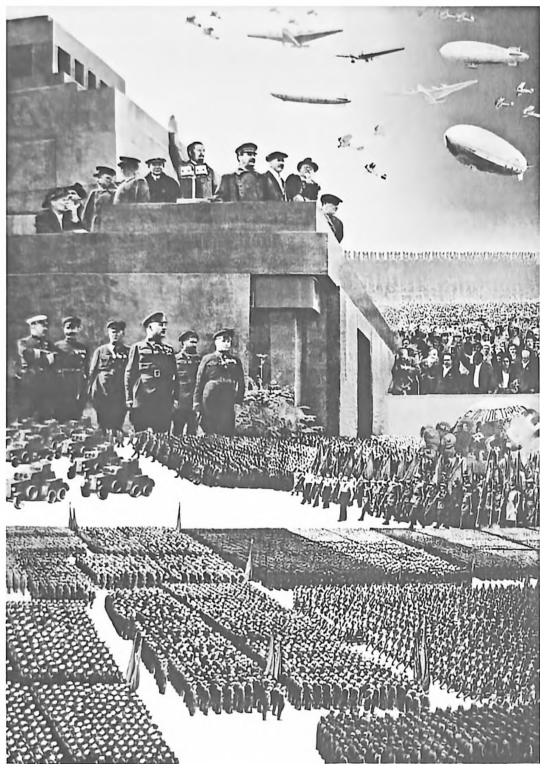
首先，几十万古拉格囚犯（主要是普通罪犯和轻罪犯）获得大赦。劳改营中的政治犯通常要再等三四年才能重新调查他们的案件。政治领导层对如何处理这些案件犹豫不决。由于元帅们的影响力很大，许多军人很快就得到了平反。个别党员、作家和艺术家也很容易被平反。然而，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来推动平反工作。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份未公布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谴责了在苏联肆虐的恐怖。除了他在讲话中提到的少数几个名字，以及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偶尔出现的内容外，大部分平反都是在非常谨慎的情况下进行的。苏联公众被蒙在鼓里，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法官、秘密警察和党的领导人都掌握了政治镇压的详细情况，官方将其委婉地称为“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

赫鲁晓夫在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秘密报告”中强调了对党员的恐怖清洗，并将其称为斯大林的阴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贝利亚的阴谋。其实赫鲁晓夫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针对几十万普通苏联公民的大规模恐怖活动，但他装作认为大清洗主要就是针对党员的恐怖清洗。自苏共档案解密以来，人们才知道，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反对赫鲁晓夫的表述。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的讲话节选本由党的特使在各机关、部队和工厂中宣读。他们报告说，许多人对赫鲁晓夫讲话中简单化的分析提出了大量质疑。他们要求有更好的解释，而不仅仅是谈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俄国历史上的这部分再次受到苏共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严格审查。没有学术著作提及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政治迫害，中小学和大学的教科书对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清洗也只是一带而过。这种审查制度导致受教育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戈尔巴乔夫和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领导层明白，只有坦诚面对苏联的过去，才能恢复苏共的声誉。“公开性”政策背景下揭露的第一批事件涉及苏联官

方史学中最令人发指的被篡改或否认的内容。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要求更好地查阅档案的呼声显然再也不能被拒绝了。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前，学者就已开始发表他们从这些档案中获得的研究成果。⁴⁰

平反工作的第三阶段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最高苏维埃委员会，此后一直由总统平反工作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主要检察官负责。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2005）创办的民主基金会出版了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平反进程的资料集。后斯大林时代新的领导层面临着数十万件或多或少伪造的调查档案和对捏造罪行的严厉判决，这些文件也为我们了解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视角。⁴¹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РЯД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图 70 “红军——国际无产阶级武装支队——万岁！” V. 埃尔金（1897—1991）创作于 1935 年的海报，当时红军仍依靠飞艇运输

第六章 车里雅宾斯克的生产备战（1939—1940）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领导人就认为欧洲不可避免地会爆发一场新的大战。苏军报纸《红星报》上的文章与世界其他地区有识见的机构一样，预见到日本和美国之间即将爆发战争。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最严重的担忧是哪些国家联盟最有可能侵略苏联。恩斯特·亨利（Ernst Henry）就这一问题写了两本书：《希特勒征服欧洲？》《希特勒征服俄国？》。在前一本书中，亨利警告要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¹另一本书则以梦魇般的预言，描绘了法西斯对苏联发动联合战争的可能场景。“恩斯特·亨利”是塞门·罗斯托夫斯基逃离纳粹来到伦敦后选择的笔名，他曾在伦敦多家报纸担任通讯员。在德国期间，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德国社会哪些团体支持希特勒的材料。虽然亨利在书中预测法西斯军队会联合入侵苏联，但他对这种冲突结果的进一步推理只是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工人革命的胜利将是新战争的最终结果。

“恩斯特·亨利”这个笔名实际上蕴含着一个精彩的人生故事。他于1904年出生在维捷布斯克²，是已有九个女儿的富商阿尔卡季·肯托夫的儿子，取名列昂尼德。列昂尼德在家中接受了扎实的教育，后来又在—所古典中学接受了教育。1917年革命后，列昂尼德获得了苏俄护照并

• 白俄罗斯城市。——编者



图 71 恩斯特·亨利 1936 年出版的《反俄运动？》一书中的地图显示了法西斯对苏联可能发动的联合进攻

前往德国。在那里，他积极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担任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信使。之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化名为塞门·尼古拉耶维奇·罗斯托夫斯基。他继续开展地下政治活动，例如参加了 1922 年土耳其共产党的成立大会^①。1923 年秋，他在德国共产主义政变失败后被捕，后被流放到萨克森州。1927 年后，他住在柏林，并开始收集有关魏玛德国政治生活的文献，以撰写《资本集中》和《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动态》两本书。不过，这两本书一直没有出版，因为希特勒掌权后，罗斯托夫斯基不得不离开德国。他设法到了伦敦，留在了英国。他的大部分个人档案已经丢失，但他决定重建部分手稿，并写出了后来成为畅销书的《希特勒征服欧洲？》，这是对纳粹德国侵略西欧计划的最早预

① 似不确实。一般认为土耳其共产党成立于 1920 年。——编者

警之一。

1934—1937年，苏联作为国联的新成员，努力建立有效的反侵略机制。如某个国家攻击一个国家，会遭到所有国联成员国的制裁。然而，由于苏联的内部情况（红军的大清洗）和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国际变化（法国无力支持共和国），莫斯科未能成功巩固与法国的联盟。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出笼，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1939年，苏联、法国和英国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为阻止德国进一步扩张而进行了各种尝试，由于开始得太晚了，成功的机会渺茫。² 这些大国在1939年夏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苏联之所以不信任他国，是因为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伦敦的领导阶层并不反对德国向东侵略，而德国的侵略最终是针对苏联的。³

如果仅仅根据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对公众、工业和军队的指令来谈论苏联社会的军事化，那将是有误导性的。⁴ 瑞典情报官员，后来的瑞典军事情报局局长弗雷·雷德贝格非常了解苏联的情况。根据对红军文献和其他资料的阅读，他在描述社会变革时，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大规模的民事和军事准备感到既恐惧又钦佩。他的《军事化社会：关于苏联权力的几句话》一书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官方资料。他也描述了民间社会如何采取各种措施备战，但在这方面他缺乏对真实情况的理解。⁵ 有必要对比一下1939—1940年在车里雅宾斯克这样的城市中，国防准备工作的实际情况。

空军和化学防御的志愿防卫组织即奥索维亚欣（Osoviakhim）^{*}，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通过吸收工厂工人和其他雇员加入，该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群众组织。1927年夏天，由于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战争威胁似乎加剧，因此开展了特别密集的演习和运动。到1928年10月1日，车里雅宾斯克地区共有123个学习小组，其中1万多名成员学习军

* 作者此处应指 Society for the Assistance of Defense, Aircraft and Chemical Construction 这一组织，似可译为“国防、航空和化工建设援助协会”，是“二战”前苏联最大的群众性志愿团体。——编者



图 72 自愿接受狙击训练

事技术。

20 世纪 30 年代，年轻人迷恋新技术——尤其是滑翔机飞行和跳伞，还能在新的体育俱乐部接受训练。阿沙的钢铁厂为军事运动建造了一个竞技场，其他工厂附近还有射击场，人们可以在这里努力拿到足够的分数，以获得广受欢迎的“伏罗希洛夫徽章”（伏罗希洛夫是一位传奇神枪手和国防人民委员，徽章以他的名字命名）。

鉴于实际取得的具体成果，苏联希望给外界留下的形象是非常微妙的，即一个为艰苦条件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国家，还有一群几乎随时可以拿起武器的青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地区，4777 个企业中的奥索维亚欣组织共有 150075 名成员。然而，跳伞训练并未成功开展。市内有 3 座跳伞塔，但其中两座未投入使用，第三座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军事设施内，

不对外开放。市里的 1200 家企业中只有 422 家有奥索维亚欣俱乐部，39 万人口中只有 23300 名会员。⁶

1940 年，志愿防卫组织变得更加活跃。6 月 18 日，党的军事部门人员和奥索维亚欣成员戴着防毒面具进行了一次长达 5 公里的行军，同时参加者要防空袭、伪装自己，并对受污染地区进行消毒。⁷ 在斯维茨基城区，该组织也开展了一次演习。指挥官们在演习前参加了为期 5 天的课程。在市中心有“紫色田野”之称的广场进行了 10 次训练，参加者多达 300 人，分为班、排、连。750 人参加了使用机枪、火炮和坦克进行的演习。参与者分为骑兵、装甲兵、空军、步兵、信号部队和医务人员。在从广场出发的 10 公里行军途中，这些部队受到了来自地面或空中的不同手段的攻击。这些攻击是有规律的。到达谢尔什尼亚村后，他们进行了伪装和部队集结训练。对车里雅宾斯克的志愿防卫组织所做的分析表明，年轻人和其他人确实进行了一些军事训练，但不能说某种形式的“军事化”已经渗透了苏联社会。备战工作显然也涵盖了医疗保健部门。一旦发生战争，许多公共建筑和学校将被改造成战地医院。这些计划在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就立即实施了，并在随后几年中涉及车里雅宾斯克越来越多的建筑。1941 年 2 月 19 日，市执行委员会决定将第 30 号和 36 号学校改建或全部重建为医院。⁸ 为了使这些战地医院正常运转，学校管理部门必须在第 12、27、30 和 36 号学校储备至少 40 吨煤和 7.5 立方米木柴，相当于一个月的用量。1941 年春，另外 8 所学校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以照顾战争情况下从前线撤出的伤病士兵。1941 年 3 月，市里下令采购所有必要的家庭用具，工厂俱乐部将为战地医院提供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⁹

在这一阶段，车里雅宾斯克州有十几家工厂被指定为国防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国防工业的核心由弹药、武器、航空和造船 4 个人民委员部领导。同时，机械制造业的大部分已被视为与国防工业综合体

* 指“二战”欧洲战场的战事。——编者

有关。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科柳申科农业机械厂和研磨工具厂被视为国防工业的一部分，该州其他城市的很多类似工厂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在和平时期接收过大量国防订单的工厂。¹⁰在这些工厂中，尽管军用生产只在单独的车间和设计局中进行，但民用和军用生产的结合是非常公开的。

1937年10月，拖拉机厂成立了专门的设计局。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拖拉机厂的主要管理部门）指示，为了确保设计和实验项目以及所谓的军队特殊产品的现代化，所有汽车厂和拖拉机厂都应成立专门的设计局。研究工作由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汽车拖拉机研究院（NATI）负责协调，该研究院拥有自己的设计局，负责机械制造工业的军事研究项目。¹¹

1937年10月30日，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厂长涅斯捷罗夫斯基就如何组织设计局发布了指令。技术部主任安特谢夫被任命为设计局的主要负责人。实验厂厂长什韦利泽为设计局准备工作场地。拖拉机厂的总工程师科罗特科夫还接到指示，要把为设计局供货的订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什韦利泽和总督察赫列布尼科夫被告知，要对特种产品提出比拖拉机和牵引车等民用产品更高的质量要求。

涅斯捷罗夫斯基为设计局的工作制订了长期计划。第一项任务是研制功率更大的发动机，以满足红军装甲坦克兵管理局的要求。在1938年进行的实验中，涅斯捷罗夫斯基强调了新型起动机、制造带涡轮增压机的新型柴油发动机以及对各种设备进行一系列耐久性试验的设想。¹²

苏联企业的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往往会对被解职者的失误或失职提出十分直率的批评。涅斯捷罗夫斯基被捕后，新厂长所罗门诺维奇向工厂的总工程师尼卡诺罗夫递交了一份关于工厂“破坏”情况的报告。虽然对待这种报告应该持保留态度，但他的陈述还是有一些确凿的证据：“工厂领导认为工厂没有必要备战……用短缺原材料的替代品进行实验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实验厂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没有进行实验，而是开发了工厂的普通产品……工厂的备战储备没有按计划建立。”¹³

1939年3月16日，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设计局组织了一次会议。一份内容丰富的报告被送到了拖拉机工业总局秘密部门的负责人手中。参会的有设计局负责人阿纳涅夫，工程师班尼科夫、普里霍季金、索斯尼茨基、德罗兹多夫和科兹洛夫。会议记录显示了该厂负责人对企业备战情况的评价。设计局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工程师都是新招聘的，对哪些问题应优先考虑总是很犹豫。在其他情况下，亟须从其他工厂获得新的炮弹图纸。厂长甚至被批评太不重视动员物资问题。“我必须亲自查看整个工厂……材料被扔得到处都是，而动员物资反而被用于当前的生产”，德罗兹多夫总结道。1939年的准备工作是为了按照军队的要求开始生产152毫米炮弹和S-4牵引车。动员准备不足的情况显而易见，因为哈尔科夫183厂运来的用于生产BT坦克和“共产国际”牵引车的重要设备甚至还未开封和检查。¹⁴

1939年8月10日，由于欧洲局势不明朗，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开始进入战时状态。这意味着工厂可以要求员工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每日生产计划。工厂最重要的客户是红军的汽车装甲坦克部（ABTU）。1940年7月，S-2火炮运输车开始批量生产。新型S-65履带式拖拉机在1940年入侵芬兰的最后阶段成功投入战场。重兵把守的曼纳海姆防线得以突破，部分原因是152毫米榴弹炮可以在非常恶劣的地形中向前推进。1940年春，拖拉机厂收到了几百辆这种火炮运输车的订单。

1940年5月25日，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NKSM）致所罗门诺维奇厂长的一封信中提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代表被召集参加6月1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工厂动员备战工作的会议。¹⁵6月19日，人民委员部军事部门发出了关于组建动员小组的指令，指令中还有关于动员小组任务和职能的详细指示。¹⁶1940年7月，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还设定了时间表，就战争情况下如何大幅提升企业产量提出了建议；同时强调，必须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动员计划中所有产品的设计图、规格等技术文件都已到位。¹⁷

在1941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被作为一个警示性的例子，来说明管理层是如何未能提高生产率和质量的。厂长被要求回答为什么每月计划的平均完成率只有80%—85%。在同一次会议上，当地党代表因没有执行1939年十八大的决定而受到批评。他们本应努力执行“布尔什维克纪律”，严格遵守中央的决定，而不是在惩罚有罪之人时犹豫不决。在拖拉机厂，新产品没有达到预期标准。1941年3月20日，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就“改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仪表车间”发布了一项决议。然而，由于1941年6月18日至20日，即德国入侵前几天，车里雅宾斯克州委会议仍在讨论有关问题，因此该决议尚未得到执行。这个例子和类似的例子表明，工厂管理层并未将决议视为法律，党组织在企业日常工作中可以采取务实的态度。

尽管苏共十八大将提交拖拉机厂车间的每日报告列为优先事项，但这一做法尚未得到落实。拖拉机厂的大规模生产要求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进行精确控制。生产总是中断，月底还要进行“突击”才能完成生产计划。1941年5月，因停产损失了5000个小时，而月底要加班8000个小时来补。对机器和设备的检查显示，机器磨损程度很高，不得不报废过多的零件。大家坦诚地讨论了工资形式以及计件工资与工厂成本之间的关系。人们也探讨了改善工厂秩序和清洁度的必要性，而且注意到，自从这些不正常现象受到最高层的批评后，一些工厂确实清理并运走了“数百吨几十年来积聚的金属废料和垃圾”。¹⁸

1940年6月10日，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关于减少废弃产品数量的法令，但该法令并未在拖拉机厂产生任何明显影响，工厂管理层也未对任何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处罚。许多零件都不符合标准，发动机组、传动轴、过滤器和其他许多部件直接成了废品。¹⁹

* 此次代表会议，是专为解决工业生产领域的相关问题而召开的。会议调整了工业部门的领导层，对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接下来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编者

1941年2月15日至20日召开的代表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快国防工业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会议通过的许多决议以及会议批准的1941年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使工业和运输系统适应战时状况的措施。

总的来说，苏联从西班牙内战、1939年夏对日边境作战和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对乌拉尔国防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必须设计出比20世纪30年代的重得多的坦克。约瑟夫·雅科夫列维奇·科廷是在苏联重型坦克研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他于1908年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个工人家庭。1932年，他从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学院毕业，随后在列宁格勒的多家研究所工作，直到1937年被任命为基洛夫工厂特种设计局局长。他负责监督生产可抵御炮弹打击的重型装甲坦克。先后推出了多种型号，分别命名为SMK（以1934年12月1日遇刺身亡的列宁格勒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名字命名）和KV（以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KV坦克曾在苏联入侵芬兰时使用，能够抵御芬兰国防军的大部分炮弹。因此，苏联领导人选择批量生产KV坦克。²⁰

据说当科廷设计的SMK坦克原型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展示时，斯大林走到模型前，拿掉了三个炮塔中的一个。他宣称坦克不应该像新的百货商店一样，有多个塔尖。他问道：“这个炮塔有多重？”科廷回答说：“两吨半。”“那就再加这么多坚固的装甲吧！”这是否只是苏联史学界的众多传闻之一，可能难以考证。不管怎样，20世纪30年代这种包含多炮塔和可容纳多个乘员的重型坦克结构此后被放弃了。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也要开始生产新型重型坦克，因为1940年上半年，基洛夫工厂的产能明显不足。给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第一份订单是在1940年试生产五辆这种坦克。1940年11月10日，所罗门诺维奇厂长向新任中—重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马雷舍夫报告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无法开始批量生产KV重型坦克。所罗门诺维奇在信中告诉马雷舍夫，从基洛夫工厂收到的所有图纸和设计图都存在错误，甚至在

生产过程中存在多余的环节。因此，他们要自己绘制图纸，并与基洛夫工厂协调修改。据所罗门诺维奇称，这些图纸“技术方面并不完整”。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这些图纸只会导致更多的废品出现。如果原来的部件制作得更精确，那么有些制图和生产环节就是不必要的。

有164个零件不能按照图纸生产，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质量问题。在部件的组装方式上，已经发现了1000多个问题。到11月1日，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已经修改了大约350张图纸，但仍然坚持与基洛夫工厂进行商榷。与此同时，基洛夫工厂根据红军在1940年夏天对坦克进行测试时提出的批评意见，并参照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发现的缺陷，对图纸进行了检查。

1940年上半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生产了第10万台拖拉机。第一季度，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拖拉机产量超出计划191台。然而到了4月份，生产率却降到了计划指标以下。许多车间缺少零件，金属材料短缺。传送带经常停工，这引起了工人们越来越多的不满。自年初以来，有360名工人离开了车间，其中238人因擅自离开工作场所而被解雇。

党组织批评工厂的共产党员开了太多的会，有时一个晚上要开好几个。由于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凌晨，工头和主管花在会议上的时间比花在工厂管理上的时间还多。另一方面，由于最高苏维埃1940年12月通过了新劳动法，工厂有的会议又安排得太少。²¹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陷入了恶性循环，新企业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导致了劳动力的高流动率，这反过来又造成了质量、生产率和利润的下降。工会对这一糟糕局面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一系列本应尽早弥补的技术缺陷。²²

1939年，劳动力流动性大仍然是工厂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车里雅宾斯克最大的六家工厂中，1939年有23204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其中15265人因擅离职守而被解雇。1939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新招了14131名工人，但有15136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工厂。1940年冬季第一个月的情况也是如此，有1154人被雇用，1316人离开工厂或被解雇。²³

1940年6月26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重新实行每周七天工作制，将工作日时间延长至八小时，并对擅自缺勤者实施一系列处罚。任何主动离开工厂的人都可能被判处2—4个月的监禁。任何人旷工一天都可能被判处6个月的劳动改造，即强迫劳动，并扣减工资。国家制定了更严厉的工厂法，这是因为意识到全面战争迫在眉睫，不能容忍劳动者的违纪行为。这些法律不能说有多“苛刻”，只要是拥有自动化设备、有质量要求和生产目标的现代企业，都不会允许大部分员工迟到半小时或更长时间。这是这些法律首次得到严格执行，大量工人受到处罚。许多工厂试图通过奖金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来加强工厂纪律。然而，法律实施半年后，缺勤和员工流失问题依然存在。战时形势要求国家制定特别的法律来规范劳工状况。²⁴

1940年7月10日，国家通过了一项关于“交付不符合质量要求或缺少部件的产品以及在工业生产中忽视强制性标准须承担责任”的法律。该法规定，厂长以及部门和车间主管对部门和车间的产品缺陷负有刑事责任。违法者将被处以5—8年的监禁。1940年12月28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也旨在加强纪律；贸易、铁路和工厂学校的学生如果辍学，将被判处长达一年的“劳改所监禁”。

苏联在1941年的备战情况

莫斯科是否事先知道纳粹德国的人侵计划——“巴巴罗萨计划”，是最近讨论的一个话题。苏联如果知道，则能够先发制人，阻止德国的进攻计划。约瑟夫·戈培尔在1941年6月22日后散布了一种谬论，他援引希特勒在人侵前夕的讲话，称1940年夏天法国被占领后，苏联在与波兰的共同边界沿线集结了大量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宣称，德国别无选择，只能攻击苏联。然而，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情况截然不同。²⁵1939—1940年苏芬战争后，苏联红军的许多问题暴露无遗，必须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的部分成果在1940年秋季就显现出来了。在技

术领域，苏联正在对飞机和坦克进行重大改革。1940—1941年，新式武器的研发速度加快，与德国最优型号相媲美的现代化武器的生产速度也加快了。然而，组建机械化部队所需的装备与苏联工业在1941年能提供的装备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车里雅宾斯克的档案揭示了更多细节，说明战前政府是如何推动相关组织工作，为让工业企业在1941年下半年过渡到战时生产做好准备的。

传统的苏联官方史书称，苏联领导人在1941年德国入侵后才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新的战时需求计划。然而，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的几个月里，苏联已在积极制定有关弹药、武器和战争初期预计所需的其他许多物品的战时生产规划。1941年6月，斯大林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Sovnarkom，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人民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工厂重新起草动员计划。然而，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当时有意进攻。许多事实表明，斯大林期待柏林发出某种形式的新的最后通牒，他并不相信德国军队沿苏联边境集结实际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斯大林在1941年6月初签署的致各人民委员部关于加强动员准备的决议，要求所有工厂都应做好准备，在7月1日之前切换到战时的产量和品类。这些决议表明，苏联领导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运用了他们关于工业动员的知识。²⁶

1941年6月10日，负责机械制造工业大部分工作的人民委员马雷舍夫发出一项命令，上面标有“非常紧急，绝密”和“严禁复制”字样，内容涉及“关于工厂转入弹药生产的准备措施”。该命令被发送到三个总局和十几个大型机械制造厂，如高尔基汽车厂和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该命令明确规定了20多项应立即采取的措施、必须准备的物品以及应建立的原材料、仪器和零部件储备，以便在动员时能够生产弹药。

人民委员会军事科负责从国防人民委员部接收有关所需弹药类型的最新信息，从弹药人民委员部接收这些弹药的最新图纸和规格。国家计

划委员会应在收到命令的三天内，详列 1941 年下半年机械制造行业的企业所需的铁和其他金属产品、化学品、锻件和铸件，以完成这一动员计划。这些机构还将研究如何在各工厂之间分配劳动力资源，以及是否需要从其他部门和各自的人民委员部招募工人。²⁷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开始生产坦克

苏联史学有意识地隐瞒了苏联向战争经济过渡的真实备战情况。史料称，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军队沿边境发动突然袭击后，苏联立即成立了新的国防委员会（GKO）。随后，国防人民委员部受命根据出人意料的战时形势改变了 1941 年第三季度的计划。由于冷战仍要求对国家计划原则进行一定程度的保密，史学界对苏联经济备战情况进行这样神话式的表述在当时可能是有充分动机的。²⁸

大型工厂在“巴巴罗萨行动”前后的历史也被同样的神话所笼罩。关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备战情况，或远在 1941 年 6 月之前拖拉机厂就已经为坦克生产做好了准备，相关的材料少之又少。通过查阅档案，我们可以分析出这家工厂最初的动员计划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做出来的，就像该地区的许多其他企业和机构一样。

1939—1940 年苏芬战争结束后，苏联决定不仅要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生产重型坦克，而且也要在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生产重型坦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一批工程师、技术人员和设计师制造出了第一批 KV-1 坦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他们缺乏图纸和设计图，也没有生产不同零部件的经验。

如果大战在 1936 年打响，纳粹德国和苏联的陆军武装力量几乎完全相同。在此后的几年间，德国将军们继续完善他们的“闪电战”思想，并在“二战”初期迅速取得了胜利。苏联方面发展的理论则恰恰相反，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苏联将军们根据西班牙内战中的经验，对坦克在战斗中的作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对未来坦克的构造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西班牙的具体情况，只是从众多坦克参与的惨烈战斗、巨大损失和相对不那么成功的状况中归纳出这样的结论。因此，苏联根据这一理论将独立的机械化部队打散，并将坦克分散到步兵师中。²⁹

此后，苏联专家认识到，坦克需要有能抵御手榴弹攻击的装甲。在那之前，坦克的装甲板厚度不超过 20—30 毫米，只能承受机枪火力。当时人们认为，当装甲车辆与步兵一起前进时，敌人的炮兵阵地已被摧毁。1938—1939 年，红军的汽车装甲坦克部命令各企业按照新的规格开发可进行测试的原型车。有几个项目被纳入试验：1939 年初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第二特别设计局设计的 SMK 重型坦克；由 174 厂设计局设计的 T-100 重型坦克。前者由尼古拉·采茨和 A. S. 叶尔莫拉耶夫设计，后者由 I. V. 加瓦拉诺夫设计。这两种型号的坦克都参与了 1939 年至 1940 年冬天苏芬战争的曼纳海姆防线战役。T-100 重型坦克为后来设计自行火炮打下了基础——SU-100 型自行火炮配备了一门 133 毫米的 B-13 舰炮，SU-100Z 配备了 152 毫米火炮，但这些自行火炮从未投入批量生产。

战后对 SMK 坦克的评价是积极的：芬兰炮弹都无法穿透它的装甲，只留下许多小缺口。SMK 坦克碾过了一枚地雷，其他坦克好不容易在猛烈的炮击下才将其救出。芬兰人没有找到可以移动 55 吨重坦克的运输车。在对首战进行评估后，其设计得到了修改。根据上文提到的一个传闻，是斯大林本人建议拆除装有 45 毫米火炮和 300 发炮弹的小型炮塔，只保留 76.2 毫米火炮（原型车装有 150 发炮弹）。他说：“坦克为什么看起来像莫斯科的奢华商店呢？”他拆除了在克里姆林宫展示给他的模型上较小的炮塔，但是，要求装甲板做得更厚。1940 年，杜霍夫在 SKB-2 研制出一款新型坦克，并将其命名为 KV-1。³⁰

它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炮塔：一种是用 75 毫米厚的装甲板焊接而成，另一种是 95 毫米厚的铸造炮塔。原来的 L-11 型火炮被换成了 76.2 毫米 F-32 火炮，1941 年又换装了一门 76.2 毫米的 ZIS-5 火炮，备弹 114 枚。为提升装甲防护增厚了钢板，炮塔壁达到 105 毫米。坦克能容纳四名乘员。最初的设计没有规定坦克的最大速度和弹药携带量。在 KV-1 的基

础上，又设计了KV-2、KV-3、KV-8、KV-9等一系列坦克。虽然没有全部批量生产，但它们都作为原型保留了下来。KV-2型坦克于1940年2月设计，炮塔采用了不同的配置，装备一门152毫米M-10火炮和36枚炮弹。1940—1941年共生产了330辆KV-2坦克。战争期间，列宁格勒和车里雅宾斯克的工厂共生产了4800多辆各种型号的KV坦克。

1940年3月，车里雅宾斯克代表团前往列宁格勒，研究基洛夫工厂的生产方法；随后，图纸和仪器被送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列宁格勒的专家也来到拖拉机厂，那里的50名设计师和24名技术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生产出他们此前完全没有打算生产的产品。KV-1所需的零件只生产了三分之一。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本应重建五个车间，然后1940年开始生产坦克。但由于人力严重不足，建筑活动尚未开始；需要5000名建筑工人，实际只雇用了1178人。从车里雅宾斯克附近招募来的工人寥寥无几，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也没有按计划派遣来2000名工人。其他行业的人民委员部也未能按时向拖拉机厂运送原材料、半成品和设备。1940年8月，拖拉机厂特别部门的总工程师说，当年显然无法按照最初的订单开始生产坦克。³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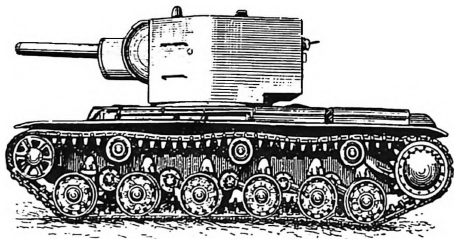


图 73 KV-2 坦克

1940年9月28日，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向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发出指示，要求制订1940年新的动员计划。在战争情况下，该厂要生产以下产品：

KV 坦克	400 辆
坦克备件	100 份
S-2 拖拉机	3500 台
S-65 拖拉机	13000 台
用于 S-2 和 S-65 的发动机	3000 台
S-2 的备件	1000 万卢布
S-65 的备件	1 亿卢布
152 毫米榴弹炮炮弹	200000 枚
52 毫米炮弹和冲压容器	2300000 枚

人民委员部命令工厂检查动员计划中的所有内容，并明确需要与哪些工厂合作，可以从其他工厂订购哪些零件。随后，拖拉机厂的总工程师完成了工厂的动员要求。这是一份详细的说明，包含 140 多页，涉及战争时必须提供的所有产品。³² 该厂军事科副科长在 1940 年 11 月 28 日的一封信中要求在 12 月 15 日之前对这份动员清单进行一些修改。³³

在评估苏联的工业领域备战情况时，重要的是区分一般层面上讨论的计划和措施，以及工厂实际执行的计划和措施。³⁴

1941 年 6 月，斯大林直接主持政府工作，莫洛托夫只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在这一个月里，通过了一系列修订法令来加强工业领域的备战工作。关于弹药生产的第 1502-614ss 号法令不仅针对弹药人民委员部，也针对其他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所有相关企业。所有制订了火炮、地雷、弹药、枪支、榴弹炮、手枪生产动员计划的工厂都受到了该法令的影响。这些工厂必须检查自己的计划，并送交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弹药人民委员部批准，以便在 7 月 1 日前制定出 1941 年下半年的新动员计划。人民委员部可以将装备从一个企业调到另一个企业。该法令包含了更详细的指示，规定了应该检查和巡视的内容以及必须报告的内容。例如，所需的金属切割机数量估计为 35000 台，还需要 2000 台冲击机和 300 台熔炼机。该法令甚至计算了转运弹药所需的木箱的立方米数，并规定需要 16000 吨钉子。同样，规划人员也计算出了所需化学品和金属的数量。最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协调，这只是新动员计划的一部分。国家计划委员会

要在 10 天内完成 1941 年下半年的计划，20 天内完成 1942 年的计划。

这些 1941 年初夏的文件说明苏联当时经济领域的备战水平很高；有一套完善的规划流程，以确保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炮弹短缺情况永远不会重演。1941 年 6 月，党的领导人加快了动员计划的修订，这表明他们意识到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可能一触即发。在官方层面，为了苏联公众的利益，政府仍然传播这样一种观点——与德国即将开战是虚假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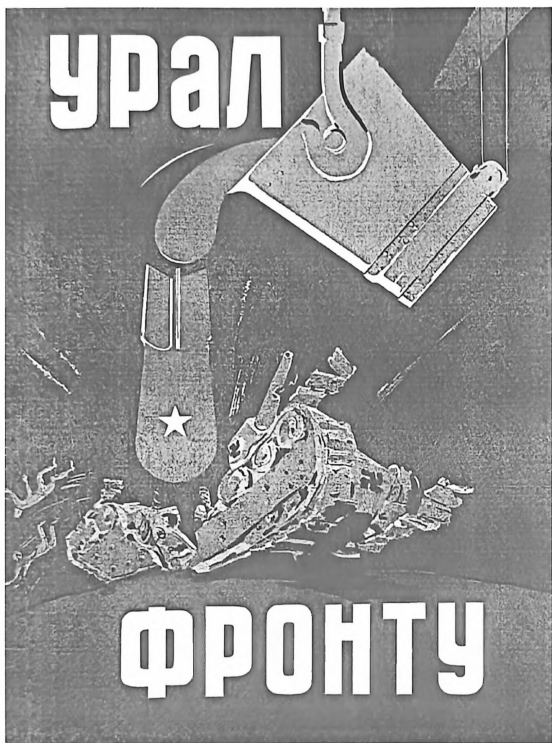


图 74 卡拉舍佐夫 1942 年创作的这幅海报上写着：“乌拉尔人献身前线”

第七章 乌拉尔地区重型坦克的生产条件

德国之所以能在 1940 年迅速战胜法国，与出其不意地用坦克穿越阿登森林有直接关系。这些装甲部队被视为德国“闪电战”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样，在计划对苏联的战争时，德国领导人计算出，独立的机械化集团军群可以在仅一个夏季的战役中就给予苏联人决定性的打击。

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是许多军事史研究的主题。最近，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人们对苏联如何备战有了新的解读，因此又丰富了军事史的内容。¹希特勒的将军们认为，1941 夏天可以像击溃波兰和法国那样轻而易举对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计算了东部的武器需求，但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比 1940 年遇到的英法坦克更强大的苏联坦克。

尽管苏联的备战工作存在一些缺陷，但在许多方面，莫斯科更清晰地认识到德国国防军将是多么可怕的敌人。苏联领导人非常了解德国装甲部队的演变，了解德国哪些坦克已经投入战斗。在军备竞赛的层面，苏联拥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在作战层面并不总能从中获益。1941 年 6 月，他们在白俄罗斯西部有装备 T-34 中型坦克的强大装甲师，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燃料和武器储备，6 月 22 日之后无法用于防御。苏军拥有大量的 BT 坦克，如果能正确编组并做好战斗准备，它们的技术规格将与德国三号 and 四号坦克相当。

然而，在撤退时，红军不得不留下许多新的 T-34 和 KV 坦克，或用

炸药将其炸毁，因为它们缺乏燃料——大部分燃料库和弹药库所在位置都是为了应对乌克兰方向的入侵。直到德国入侵前几天，斯大林才同意红军提高战备水平。²

纳粹德国的全球观体现在他们的宣传中。关于“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出版了一本所谓的“红皮书”，名为《为什么要对斯大林开战？》（*Warum Krieg mit Stalin?*），其中收录了希特勒 1941 年 6 月 22 日对全国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解释了为什么德国认为有必要在 1939 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然后，他描述了斯大林如何继续鼓励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员对德国进行破坏，据传甚至已经开始计划对德国发动袭击。



图 75 1941 年纳粹德国的宣传品。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为什么要对斯大林开战？》

纳粹在1933年的宣传中曾使用过同样的故事，说的是希特勒夺取政权后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共产主义政变。1941年6月后，纳粹又使用了1939年9月前流行的反苏陈词滥调。在“红皮书”中，苏联、共产党及其国家和军队被描述为完全由犹太人控制。³ 纳粹的一个谣言是，1932年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自杀后，斯大林把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的女儿、17岁的罗莎·卡冈诺维奇当作自己的私人秘书和情妇。据说，这种安排使卡冈诺维奇成为苏联的实权人物和“苏联天堂”犹太统治集团的中心，因为他对斯大林具有影响力。对于战争初期关注德国宣传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残酷的歼灭战既针对共产党员，也针对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犹太人。⁴

苏联人民很快就看清了这场侵略战争的性质——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来自西部地区的大量报道都讲述了对平民的镇压。那些有幸及时随东线疏散列车逃离的人，讲述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系统性迫害是根据所谓的“政委令”提前准备的，即不把共产党军官或犹太军官当作战俘。1941年德国宣传部门出版的“红皮书”也证明了这一点，该书是德国必须预先防范苏联即将发动的进攻的所谓理由之一。1941年德国大规模处决犹太人和其他人，而不仅仅是苏联政权的代表，这表明大屠杀从一开始就是德国入侵计划的一部分。

纳粹对苏联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一直存在争议。为了理解纳粹的这一观点和其他世界观，需要记住，“犹太-布尔什维主义”一直是他们不变的主题——共产主义主要表现为一场犹太运动，由1917年在彼得格勒掌权的俄国犹太人主导，他们与共产国际一起渴望征服全球。“一战”后到“二战”前，当然也有一些反共者并没有反犹思想。当时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都反对独裁统治，然而在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德国针对苏联的反犹宣传阻碍了对后者真实情况的清晰分析。⁵

希特勒和德国军事领导层计算过，一次“闪电战”就能消灭苏联的大部分军事和经济潜力。然而，他们将兵力分散，分三路推进。第一路

向乌克兰进发，随后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进发，目的是获取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源。第二路向拥有众多工业和行政机构的莫斯科进发，他们认为莫斯科的中央集权程度很高，一旦攻占这一目标，国家的其他地区就会崩溃。第三路的目标是列宁格勒和俄罗斯欧洲部分北部地区。他们的想法是，当红军在这些地区被击败后，苏联就会投降。这样，德国就又有足够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对抗英国了。德国国防军领导人认为，只有到那时，他们才需要重型坦克来打击英国军队。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几个月，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似乎证实了德国将军们的计算。然而，德国低估了已经在乌拉尔、伏尔加河以东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建立起来的苏联工业的规模。当这些工厂及其基础设施与撤出的设备结合在一起时，苏联在半年内就为持久战奠定了新的工业基础。

现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在探讨这段历史时非常确信：实际上，1941年夏天苏联处于一场灾难的边缘。如果工业设备和人员的快速撤离在某个关键阶段失败了，那么苏联肯定会被迫投降，或者放弃比1941—1942年时放弃的多得多的领土。⁶

红军在1941年和1942年的惨重损失之后，成功地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在与德国人的大规模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在对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失败的各种解释中，“俄罗斯的冬天”经常被提及，似乎只有天气才会影响侵略者的战斗力。“二战”后，一群被美军俘虏的德国将军和参谋研究了在与苏联的战争中，每一个季节是如何对其军队产生负面影响的——暗指红军受到的影响小。他们试图表明，德国人之所以未能赢得战争，是因为苏联的气候条件、不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道路网络。⁷

在西方，红军的胜利曾被戏称为“俄罗斯的蒸汽压路机”，意指苏联凭借士兵、武器和军备方面的优势取得的成功。与这一论点相关的观点是，苏联依靠美国和英国的租借援助取得了胜利。

与“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谚语相反，1941—1945年苏德战争中失败者所写的历史书——德国将军的著作和回忆录——比苏联元帅和将军的著作（在西方）更为流传，也被认为更可信。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苏联史学界对此都难辞其咎，因为它审查了许多被认为敏感或不合时宜的问题。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的历史被用来迎合党的领导，这不利于对事件进行客观、复杂的重构。⁸

我们只能假设性地猜测，如果德国不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动进攻，而是只沿着其中一个方向有条不紊地推进，去实现不太有野心但却更加稳健的目标，结果会是怎样。另一方面，如果苏德战争更多地按苏联防御计划所预测的那样进行，那么就很容易看出他们工业方面的备战有多充分。苏联国防工业能力的很大一部分位于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在一本经典著作中写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苏联的很大一部分工业设备都在铁路上运输。⁹

国防委员会最初的决定之一就是增加坦克生产。在战争初期，所有先前对战时需求的估计显然都不足以满足前线的需要。负责坦克生产的是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马雷舍夫。1941年7月，当读到有多达4000辆坦克参加装甲战斗的报告后，他感到十分惊讶。于是，他向斯大林建议，应重新装备一些大型机械制造厂，用于生产坦克或坦克零件。工厂被迫撤离那些受到德军快速进攻威胁的地区，苏联国防工业被暂时扰乱了。但最终苏联坦克工业在东迁后重新集中到新的大型单位，如位于下塔吉尔的乌拉尔汽车厂和位于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德军进攻几个月后，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最重要的人员被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后来他们开发出了由科廷设计的新型坦克。

根据在几周内在紧急制定的计划，设备从数百家工厂撤离，这间接证明了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人们对战时经济变化已经进行了许多建设性的思考。经济方面的备战工作包括讨论“副本工厂”或“影子企业”的方案，它们可以接替遭受轰炸或破坏的国内其他地区的工厂继续生产。计划部门知道将要撤离的工厂与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现有工厂和设施之间存在哪些联系。然而，由于苏德战争的进程与苏联各种工业动员计划中的进程大相径庭，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企业必须进行彻底的重建和

改造，以接收撤离的设备。

苏联政府成功进行了一次基本上没有计划的疏散。这可以解释为战前经济备战计划训练了人们纪律性和创造性地寻求解决问题的能力。700多家对军备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企业被疏散到乌拉尔。这为扩大坦克、火炮、步枪和弹药的生产奠定了新的基础。战时所需的机器产量和原材料数量都经过了详细的重新计算。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经验丰富的领导塞门·金兹堡负责重建旧工厂来放置撤出的设备，他指挥着数百个建筑营和大量古拉格囚犯。就像战前古拉格的囚犯一样，这些囚犯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对战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¹⁰

新的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于1941年9月12日成立，其中包括几家在20世纪30年代生产坦克的工厂。哈尔科夫有生产T-34坦克的183厂和生产坦克用V-2柴油发动机的75厂；列宁格勒有生产KV重型坦克的基洛夫工厂和生产T-26轻型坦克的174厂；莫斯科有生产T-40轻型水陆两栖坦克的37厂；马里乌波尔有生产T-34坦克底盘的伊利奇工厂；波多利斯克有生产T-40坦克底盘的奥尔忠尼启则工厂。

由于其中几家工厂已经向东撤退，以前没有生产过坦克的企业接管了它们的设备。最有名的是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它接收了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设备。下塔吉尔汽车厂从哈尔科夫183厂接收机器和设备，开始生产T-34坦克。乌拉尔涡轮机制造厂接替撤离的基洛夫工厂继续生产发动机。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接收了多个军工单位的机械设备，其中也包括列宁格勒郊外的伊佐尔斯克工厂的。1941年10月，包括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战争期间更名为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在内的重型坦克生产联合企业成立。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生产装甲和坦克炮，乌拉尔涡轮机制造厂生产V-2柴油发动机，还有很多工厂生产其他产品，后来又有一些工厂并入该集团。¹¹

苏联坦克生产的主要负责人是马雷舍夫，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下塔吉尔工厂重型和中型坦克生产的主要领导。他于1902年出生于乌斯季-瑟索拉斯克（现彼尔姆州的瑟克特夫



图 76 坦克生产车间内部

卡尔^{*})的一个教师家庭。在铁路技术学院学习后,马雷舍夫从1924年起担任蒸汽机车的技工和机械员。他曾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现在的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学习,从1934年起在科洛姆纳的古比雪夫工厂担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厂长。马雷舍夫是苏联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专家的典型代表,他的职业生涯发展迅速。他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幸存下来,后晋升为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1940—1944年,马雷舍夫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1年9月至1942年8月、1943年6月至1945年10月担任坦克工业人民委员。¹²

贝利亚是另一位在早期苏联历史著作中遭忽视的人物。鉴于贝利亚的前任莫洛托夫未能完成坦克工业的任务,从1942年底起,国防委员会

• 瑟克特夫卡尔似应位于俄罗斯科米自治共和国,后者与彼尔姆州邻近。——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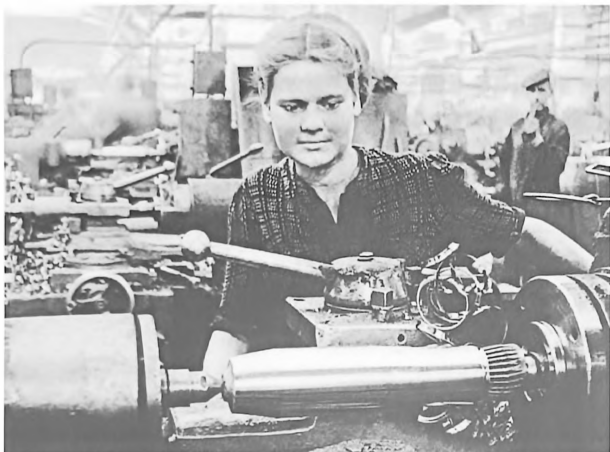


图 77 1940—1941 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和其他工厂根据工业动员计划开始生产炮弹

让贝利亚全权负责坦克工业。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版的回忆录，贝利亚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他在没有采取“镇压措施”的情况下，使问题重重的工厂业绩显著。¹³

巨大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重建了起来，该厂为即将在下塔吉尔或车里雅宾斯克工厂组装的坦克生产底盘和炮塔。这三个城市及其大型机械制造厂构成了苏联坦克联合企业的核心。反过来，它们又依赖于一个由数百家供应方组成的组织严密的网络。

在下塔吉尔，乌拉尔车辆制造厂进行了重建，装备了哈尔科夫机车厂的机器，开始生产中型 T-34 坦克。在建筑工业人民委员塞门·金兹堡的领导下，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计划年产量为 9000 辆 T-34 坦克。¹⁴

• 指 183 厂，战时始终是 T-34 坦克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编者

“坦克格勒”的建立

威廉·亨利·张伯伦的《俄罗斯之谜》(*The Russian Enigma*)是20世纪40年代西方理解苏联在战争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的重要书籍之一。张伯伦(1897—1969)曾在莫斯科当过十多年的记者,后来在一本名为《俄国的钢铁时代》(1935)的经典著作中回忆了他对“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工业化和消灭富农——的印象。¹⁵标题中的文字既体现了斯大林时期严酷的社会秩序,也体现了苏联大规模建造钢铁厂,为现代战争工业奠定了基础。张伯伦认为,斯大林工业化的本质是极高的军事经济潜力。他在《俄罗斯之谜》一书中写道,极高的军事经济潜力是红军取得胜利背后的秘密。如上所述,张伯伦写道,一个古老的俄罗斯笑话说,如果一个小学生答不上来俄罗斯哪里蕴藏某种金属这类问题时,他回答乌拉尔就能蒙对。乌拉尔的山脉煤炭储量很少,但几乎所有其他矿石的储量都很丰富,如铁、铜、金、铂、镍、铋、铅、锌、钴、钒和钾。张伯伦还描述了一系列现代化工厂——从北部别列兹尼基的化工厂到南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厂——是如何在乌拉尔地区建起的。他提到,媒体有时会隐晦地把车里雅宾斯克称为“坦克格勒(坦克城)”。张伯伦认为,200多家新工厂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军事硬件生产方。¹⁶

1939年12月苏芬战争的经验促使苏联设计师对KV坦克进行了改装,并于1940年开始批量生产。1941年,这款装甲坦克能抵御德军火炮的猛烈射击,德军方面无法与之对抗。另一方面,这款坦克在发动机和传动装置方面的缺陷很快就暴露出来——坦克经常会停下来,然后很容易成为非正面攻击火力的目标。

1941年6月,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只有一个生产KV坦克的车间。1940年初以来,在这款坦克的生产过程中,特别部门及其设计人员的实验一直在高度保密中进行。战争爆发前,该厂只生产了25辆KV坦克。工厂的主要产品仍然是S-65、S-65G和S-2拖拉机。直到1941年11月,该厂才停止拖拉机的生产。7月、8月和9月,厂里分别生产了25、27

和 24 辆 KV 坦克，10 月，坦克产量增至 88 辆，11 月增至 110 辆，12 月增至 213 辆。1941 年，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共生产了 512 辆 KV 坦克。

6 月 25 日凌晨 2 点，厂里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根据 1941 年下半年和 1942 年的新动员计划开始生产弹药。这个命令是以编码电报的形式发送的，其中还提到了 1941 年 6 月 10 日通过的一项计划，也是以代号命名的。过了一段时间，厂里还收到了另一份相似的命令，要求根据其动员计划生产坦克和火炮牵引车。

表 3

1941 年第四季度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生产计划

		第四季度	10 月
KV 坦克	辆	490	125
S-2 拖拉机	台	600	250
S-65 拖拉机	台	1600	250
V-2 柴油发动机	台	1300	200
拖拉机发动机	台	500	200
KV 坦克备件	卢布	15000000	6000000
拖拉机备件	卢布	13000000	4600000
76 毫米炮弹	枚	39000	13000
152 毫米炮弹	枚	75000	25000
M-13 火箭弹的配件 Zab-T-G-50	套	39000	13000
用于 76 毫米炮弹的轧制钢材	套	60000	20000
别列兹涅夫机枪的链条	套	600000	200000
金属切割机	台	30	10
钢	吨	16000	5500

因此，改建后的拖拉机厂不仅要生产重型坦克，还要为军队提供炮弹。¹⁷很难对战争期间苏联生产的不同类型的和口径的炮弹总量进行汇总。为了解为什么苏联在1941—1945年不像沙皇俄国和“一战”中的其他国家那样缺少弹药，有必要对其生产及其后分配给不同的方面军、军和师使用的成千上万发炮弹的数据进行分解和分析，然后计算出苏德战争各阶段使用的炮弹数量。苏联弹药工业专家伊万·弗尼杜布（Ivan Vernidub）对大多数武器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清楚地说明了从盟国租借的原材料和武器运抵之前生产的大量炮弹。1941—1945年，仅南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就为红军生产了大量炮弹，装满了13万节火车车皮。这个单位也是弗尼杜布认为最适合用来描述炮弹数量的单位。整个苏联的生产情况如下：

1941年：21000节火车车皮的火炮，1990节火车车皮的榴弹炮弹药；

1942年：44801节火车车皮的火炮，17469节火车车皮的榴弹炮弹药；

1943年：62200节火车车皮的火炮，32895节火车车皮的榴弹炮弹药；

1944—1945年：143293节火车车皮的火炮，50712节火车车皮的榴弹炮弹药。¹⁸

苏联的钢铁产量是纳粹德国的1/4或1/3，煤炭产量是1/3或更少一些，但它生产的弹药和其他武器却几乎是纳粹德国的两倍。德国及其卫星国的钢铁年产量通常为3200万吨，而苏联的年产量仅为800—1100万吨。

1941年夏天，杜霍夫从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调到车里雅宾斯克，7月25日，他被任命为拖拉机厂三部的坦克总设计师。预计KV坦克将开始大规模生产。根据苏芬战争中总结的经验，苏联已设计出了名为KV-3的改进型坦克。然而，战争爆发后，工厂根据手头KV-1型坦克的旧图



图 78 一辆 ISU-152 作战坦克正在通过装配车间

纸就匆忙开始了生产。杜霍夫希望利用车里雅宾斯克已有的传送带生产方式，这就需要对基洛夫工厂的图纸进行一系列的修改，因为基洛夫工厂的坦克是单独组装的，小的结构缺陷可以在组装过程中纠正。

即使在战争爆发后，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坦克生产仍持续了几个月，直到 10 月上面决定撤离主要厂区和合格的工人。

1941 年 10 月，伊萨克·扎尔茨曼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一家新工厂的厂长，这家工厂就是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重组后的工厂。工厂将接收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设备和人员。他还被任命为副坦克工业人民委员。1941 年夏末，扎尔茨曼和他的同事们受委任，要让列宁格勒的工厂做好准备，以抵御预期中的德军进攻，同时还要准备好通过铁路运往东部的所有物资。工厂是德军精确轰炸和炮击的目标，但生产在较低水平上继续进行，坦克从工厂直接开往城市周围的战斗阵地。这时距整



图 79 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扎尔茨曼（1905—1988）曾在工程和坦克部队中拥有少将军衔。1941年，他因成功组织了乌拉尔地区的坦克生产而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此后又获得了许多其他奖章。他在战争年代的声望远远超出了车里雅宾斯克，人们给他起的绰号是“坦克王”（Korol tankov）

座城市被包围仅有几周的时间。¹⁹

1941年下半年，拖拉机厂进行了重建。重建后的工厂包括一个占地12000平方米的新装配车间、一个占地15000平方米的机械车间（用于加工零件和装配工作）、一个占地15600平方米的机械区和一个占地9000平方米的专门用于装配和测试坦克发动机的长方形厂区。新厂房的设备先后来自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开始批量生产的时间非常短。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来自列宁格勒的5800台机器和其他机械设备被安置在了连屋顶都还没有的车间里。

10月，基洛夫工厂的设计师们从列宁格勒抵达后，SKB-2设在了厂长楼，占据了整个三楼和四楼。设计图是在五楼绘制的。起初，房间的角落里只有几张办公桌，很少有人在这里工作，但随着各种年龄段、穿着各式服装的男女人员的到来，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这是一大批来自列宁格

勒 SKB-2 的专家，他们在科廷的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天起，工厂开始被称为“车里雅宾斯基洛夫工厂”，并很快被视为当地最重要的军工单位之一。在科廷的监督下，SKB-2 继续开发新型坦克。在战争年代，他们设计了 13 种不同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总设计师科廷、杜霍夫与发动机专家伊万·特拉舒廷合作，推出了 KV-1S、KV-85、IS-1、IS-2 和 IS-3 坦克，以及自行火炮 SU-122 和 ISU-152。科廷召集了 SKB-2 的设计师杜多夫 (E. P. Dudov)、伊林 (K. N. Ilin)、克拉斯尼科夫 (B. A. Krasnikov)、克利斯拉夫斯基 (M. I. Kreslavskii) 和莫斯科文 (G. N. Moskvin)，还有其他毕业于著名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的年轻工程师共同工作。

伊万·特拉舒廷于 1901 年出生于乌克兰。他曾就读于哈尔科夫技术学院，后在哈尔科夫机车厂担任工程师。1931 年，他被苏联政府派往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回到哈尔科夫，参与研制了第一台用于坦克的新型柴油发动机，命名为 V-2。因这一成就，特拉舒廷被授予列宁勋章。1941 年秋，哈尔科夫发动机厂撤离，特拉舒廷来到车里雅宾斯克，被任命为柴油机部部长。KV、IS 和 T-34 坦克的柴油发动机都是由特拉舒廷的团队设计的。特拉舒廷留在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工作了 40 多年，进一步完善了坦克和拖拉机的柴油机技术。

战争爆发时，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预计需要 24000 名工人、3000 名工程技术人员和 1200 名办事员。²⁰ 然而，撤离后，工作人员的组成如下：

从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撤离人员	7000
其中有工人	5891
工程技术人员	1185
来自哈尔科夫 75 厂	3004
其中有工人	1773
工程技术人员	1033
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撤离人员	2050
从莫斯科撤离人员	1000
动员工人	10000
已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工作的工人	15000

1942年初，在近40000名就业人员中，43%年龄在25岁以下，32%为女性。工厂还安排以前没有在工厂工作过的年轻人参加职业培训课程，使他们能够迅速晋升到要求更高的岗位并且当上组长和监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管理层仍像战前一样，鼓励工厂开展竞赛，并为最优秀的部门颁奖。然而，党内报告指出，即使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工人们也在努力为军队争取最大产量。每个人都明白前线对新坦克的巨大需求。1941年和1942年红军进行艰难的撤退战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消息。1942年，在车里雅宾斯克和南乌拉尔的其他城市组建了特种坦克师。这些师合并组成了乌拉尔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夏季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经受了炮火的洗礼。由城市士兵组成的特种坦克师使军队与大后方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苏联重型KV-1坦克一开始令德军非常震惊，因为它更厚的装甲可以抵挡德军三号坦克和四号坦克的多次直接打击。1941年，德国的反坦克武器包括37毫米PaK 35/36反坦克炮，可在500米范围内击穿50毫米的装甲。然而，它们在对付KV坦克和T-34坦克时显得太弱了。苏联的KV坦克有时被击中数十次，但前部仍然只有轻微的凹痕。德军很快就得到了PaK 38反坦克炮和炮弹，它的威力更大，可以从500米外穿透KV坦克。德军一发现了坦克的薄弱点，就会从后面或侧面直接开火，红军因此损失了许多KV坦克。

为了批量生产KV-1重型坦克，车里雅宾斯克进行了一系列重建工程，并增建了新的厂房。第一批坦克于9月下线，从9月24日起，设计人员对装配车间进行全天候管理，分两班12小时工作。第一批坦克是完全按照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图纸生产的，因此在适配、故障矫正和测量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在重型坦克生产之初，车里雅宾斯克自动传送带生产的优势并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前线发来的关于坦克薄弱环节的报告推动了持续的变革。发动机容易过热，需要更换，而制动器有时会失灵。设计错误的光学仪器使得弹片有可能进入机舱并杀死乘员，而坦克本身却没有损坏。此时，人民委员马雷舍夫经常到访车里雅宾斯克，了

解新工厂坦克生产的进展情况。

在乌拉尔的新基洛夫工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与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零敲碎打、各自为政的组装方式发生了冲突。科廷在新工厂的传送带旁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没有接受鲍里斯·阿尔汉格爾斯基提出的使 KV 坦克符合流水装配线原则的建议，而是选择使用与在列宁格勒时相同的方法，这意味着坦克生产的整个方向必须再次改变。阿尔汉格爾斯基和拖拉机厂的几名设计师被调到其他车间，由列宁格勒的人员取而代之。然而，当基洛夫工厂奉命大量生产 T-34 时，传送带方式的经验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1944 年，新型重型 IS 坦克按照传送带方式进行组装。

1941 年 10 月 17 日，大批 KV 坦克被运往莫斯科郊外的军队，当时德军已逼近首都。这些坦克除了发动机外都已完工。飞机曾两次飞往生产这些发动机的工厂，但都坠毁了。扎尔茨曼厂长决定将坦克装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在首都附近的车站等待发动机的到来。扎尔茨曼和装配车间的一批工人乘坐同一列火车，监督坦克的最终交付。这些坦克还将参加 1941 年 12 月朱可夫指挥的苏军第一次反攻。

领导层为坦克师引入了新的例程序，以避免 1941 年那种由于坦克驾驶员和射手不习惯新车辆，不清楚如何驾驶坦克或指挥火炮而出现的问题。未来的车组人员抵达车里雅宾斯克后，在工厂跟进组装工作的最后阶段，然后参加在工厂靶场进行的坦克测试。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坦克的性能特点及其可承受的压力。KV 坦克的总设计师杜霍夫和科廷还到前线各地视察，对 KV 坦克进行评估。他们在那里与官兵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战斗经验汇报。有一次，一名中尉从坦克里跳出来，说“那个白痴”设计的后视镜有明显缺陷。当时拥有上将军衔的科廷恰好站在附近，但据报道，他很欣赏这种坦率的交流。1941 年秋季，KV 坦克主要参与了防御战。厚重的装甲使它们能够迫使更大的德军坦克群停下来。在这种接近目标的战斗中，不良的后视镜影响不大。来自前线和前线修理厂的所有反馈信息都及时传达给了车里雅宾斯克的设计人员。

在其他情况下，新坦克或原型车被开到佩尔沃湖的试验场，在那里进行现役条件下的测试。苏联军事工业还通过与德国坦克对射，或用德国火炮、德国弹药与苏联新战车对射来测试他们的火炮。人民委员马雷舍夫不断提醒苏联设计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想象敌人的发展思路，并据此预测德军的下一种武器，同时采取更好的反制措施。

1942年，苏军定制了一种快速自行火炮，因为用马匹或拖拉机牵引的火炮无法跟上坦克的前进步伐。经过改装的SAU-KV-7很快就被制造出来，并在莫斯科战役的最后阶段使用。此后，科廷设计了KV-9坦克，并为其配备了一门122毫米榴弹炮。²¹

1942年2月，杜霍夫被任命为坦克工业发明与合理化新技术专家委员会主席。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评估，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出结论，重型坦克必须彻底改进。对于50吨级的KV-1坦克来说，许多桥梁和道路都无法通行，而它们的发动机又太弱，无法翻山越岭。最早的改良型之一是1942—1943年生产的KV-1S（S在俄语中意味着“快速”），该车轻了5吨，装备了新型发动机和更好的变速箱，最高时速达43公里。其正面装甲厚75毫米（炮塔装甲厚82毫米）。事实证明，这种坦克在1942年至1943年冬天的红军反攻中非常有用，当时人们对重型坦克在编队中的合适位置有了更好的理解。

1942年3月，上级决定坦克特别实验工厂（当时称为100厂）应使用原实验厂的零件。新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设计新一代重型坦克的样品。100厂的总设计师是叶尔莫拉耶夫，隶属于从1943年3月开始担任厂长的科廷。在这家工厂里，科廷召集了曾与他一起在列宁格勒工作过的同一批技术人员。在战争年代，他们设计了十多种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原型和模型。当务之急是设计与第一批KV坦克具有相同火力和装甲防护能力的轻型坦克。

1942年，KV坦克至少在理论上仍能抵御德军的反坦克炮，因为德国国防军配备的新型PaK75毫米反坦克炮非常稀缺。然而，苏联坦克的损失仍然很大，因为德国士兵已经掌握了与苏联重型坦克作战的新战术。



图 80 坦克制造厂内部

他们从更好的位置射击，并且发现了坦克的弱点。KV 坦克的设计缺陷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车长同时也是装填手，他的周边视野很差；坦克与部队其他成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很差，这导致与炮兵和步兵之间的合作很有限，因此坦克不是总能被引向最佳目标。由于战斗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坦克必须长途运输，因此坦克的损耗也显而易见。对 1942 年夏秋的战斗经验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KV 坦克具有坚固的装甲，对攻克设防较少的地区来说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德军的反坦克炮成功地消灭了大量 KV 坦克。事实证明，中型 T-34 坦克更适合这一时期进行的战斗。

在同一时期，坦克弹药的月产量迅速增加：76 毫米炮弹从 11 万枚增加到 30 万枚，122 毫米炮弹从 5 万枚增加到 15 万枚。1942 年，苏联共生产了 24700 辆坦克，其中只有几百辆新型号。重型 KV 坦克约占总数的 10%，中型 T-34 坦克约占一半。1942 年夏末秋初，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约有 70% 的产能被分配用于生产 T-34 坦克，只有 30% 的产能被指定用于生产重型坦克系列。

表 4

1942 年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的坦克生产情况

单位：辆		
月份	KV 坦克	T-34 坦克
一月	216	—
二月	264	—
三月	250	—
四月	282	—
五月	351	—
六月	150	—
八月	125	30
九月	180	220
十月	175	300
十一月	135	230
十二月	125	275
总计	2253	1055



图 81 T-34 坦克 (1941 年型, 28.5 吨, V-2-34 柴油发动机, 500 马力, 最大时速 55 公里, 装甲 40—45 毫米, 炮塔装甲 52 毫米, 一门 85 毫米火炮和 77 枚炮弹) 被誉为“二战”中最好的坦克。即便如此, 许多直言不讳的坦克兵“批评家”还是指出了它的缺陷和薄弱环节, 而这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在苏德战争期间不断得到改进

1942年坦克部队损失惨重，部分原因是德军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红军不得不被动作战，不完整的师没有时间进行侦察、集结或确定战斗任务。他们无法完成任何出其不意的行动，与红军其他部队的配合也很差。这往往导致坦克分散进攻，而坦克指挥官和驾驶员又不熟悉地形和前方战况。苏军因此在雷区或在德军进行侧翼攻击时损失惨重。

1942年10月，KV坦克从混编部队中抽调出来，组建了独立的重型坦克团，所有车辆都具有相同的速度、机动性和耐久性。国防人民委员部经过详细分析，在1942年10月8日第306号命令和10月16日第325号命令中制定了重型坦克作战的新原则。

1942年夏季，德军的攻势仍在继续，其目标似乎是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生产的T-34坦克已是红军官兵最喜爱的坦克之一。然而，斯大林格勒的持续生产受到了威胁，而位于下塔吉尔的乌拉尔车辆制造厂的新生产基地（在哈尔科夫机车厂撤离后，该厂将成为T-34坦克的主要生产厂家）尚未达到满负荷生产。因此，国防委员会命令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开始生产T-34坦克，同时继续生产重型坦克。

工厂的党员们接到了具体任务，明确了执行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T-34坦克的命令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冶金车间需要改造，而且需要与下塔吉尔乌拉尔车辆制造厂进行更好的协调，大多数T-34坦克都是在那里生产的，这样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就可以获得启动新生产线所需的所有图纸和协助。党组织的决议强调了最高苏维埃1940年6月26日发布的（关于劳动纪律）和1941年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国防工业撤离）两项法令的重要性。决议指出，“工厂必须有铁的纪律”，尽管党委非常清楚，工厂实际上存在许多与不端行为、作弊和旷工有关的问题，但在恶劣的战时条件下也不得不容忍这些问题。²²

党组织的决议要求更好地利用工厂的内部资源，而不是要求购买新设备和材料。党组织的一个特别小组将负责迅速启动T-34坦克的生产。“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向我们的祖国、我们敬爱的领袖和苏联人民的统帅斯大林同志保证，基洛夫工厂的工人将无条件地按时开始T-34坦克的生

产”，这是这份决议庄严的最后一句话。²³ 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斯大林偶尔给个别领导的威胁性电报被印成传单广泛分发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工厂的专家和工人。这些额外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

1942年8月15日，工厂党委再次通过决议，对自决定生产T-34坦克以来的20天内没有完成足够的工作表示担忧。到8月12日，厂长日程上的准备措施只完成了一半——延迟了五六天。该决议还指出，8月份的KV-1、KV-1S和坦克发动机月度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一些车间主任因反对同时生产中型和重型坦克而受到批评。党委决定，T-34坦克的生产应尽可能采用装配线原则。车间主任收到了交付第一批新坦克的最后期限。党委强调，党员有义务履行生产决议，否则就会被开除党籍，而开除党籍往往是采取更严厉镇压措施的第一步。²⁴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厂的车间确实已翻新完毕，可以生产中型坦克，从车里雅宾斯克出发的列车队伍开始发运T-34坦克。1942年，他们生产了1055辆T-34坦克、1902辆KV-1坦克和651辆KV-1S坦克，在365个工作日内共生产了3608辆坦克。在战争初期，国防工业的员工几乎没有休息日，包括星期天和暑假。

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人被迫日产10辆重型坦克，月复一月，这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与社会主义者15年前的设想相去甚远。如果这场战争以另一种形式发生或根本没有发生，苏联可能会出现怎样的一种社会？对此我们只能猜测。托洛茨基主义者将苏联描述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但当其生存受到威胁时，它反击官僚主义的能力又令人震惊。法国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Jacques Sapir）将其描述为“动员经济”（une économie mobilisée），从而更好地解释了这一制度的本质。然而，萨皮尔过分强调了这一制度军事化的一面，这一点从他著作的德语标题*Die Permanente Kriegswirtschaft*（长期战争经济）中可以明显看出。²⁵ 虽然这只是一种概括，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科书在讲述苏联指令性经济时，认为只有要最大限度地生产战争物资时，苏联优先发展重型机械制造业、行业增长不平衡的体制才是合理的。然而，在关于所谓的指令性经济或计划体制的标准教科书中，没有一处提到苏联为使整个经济体系

图 82 “不要说闲话！提高警惕。这年头，连墙壁都有耳朵。从流言蜚语到叛国只有一小步。”尼娜·瓦托利娜创作的这幅海报是战争年代苏联流传最广的海报之一



迅速适应全面战争的需要而在和平时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既然历史的结果已经摆在眼前——苏联体制最终走向解体——我们或许更应该思考，如果红军没有击退纳粹的进攻，欧洲范围内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可以留给小说来呈现，如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1992年创作的反事实小说《祖国》（*Fatherland*）。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纳粹德国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败。²⁶但红军直到1943年夏天的战役之后，才掌握战略主动权。1943年春、夏，德军装备了75毫米反坦克炮和88毫米火炮，其穿甲弹即使入射角为0度，也能在1000—1300米的距离上击穿KV-1S坦克。因此，实际上重型KV坦克与中型T-34坦克一样无法抵御德军武器的攻击。1943年4月，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停止了KV-1S的生产，相关设备转而用于生产一种自行火炮——SU-152。

1942—1943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苏联人得到情报，德国人生产了新型重型坦克，即经过改进的T-VI型坦克。重型自行火炮SU-152是在KV-1S的底盘上制造的，并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投入使用，以应对德国的这些新挑战。1943年，德国国防军的豹式坦克（T-V）装备了一门75毫米KwK火炮，炮管口径为70毫米，虎式坦克（T-VIh）装备了88毫米KwK火炮。弹药包括穿甲弹和穿透能力更强的破甲弹（1000米距离内可穿透155毫米的装甲）。与此同时，德军部队的纵深比战争头几年更大。他们的第一道防线由两到三条战壕组成。在这些战壕的前方和纵深内，他们还设置了各种工兵障碍。德军每个师的防御纵深可达4—12公里。距离第一道防线10—15公里处是第二道防线。自然，突破这样的防线需要苏军运用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苏军必须突破整个防御纵深，完成8—12公里宽的突破。²⁷在1943年7月至8月的库尔斯克突出部作战中，250万红军参战，击溃了超过100万的德军。随后，600万红军士兵在绵延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250万德军发起进攻，最终抵达第聂伯河。库尔斯克会战的主要事件之一是7月12日苏德装甲部队之间的交战。为了突破德国在奥廖尔和哈尔科夫方向的防御，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动用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力和武器。



图83 1943年夏库尔斯克会战期间，步兵等待坦克旅的支援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中，密度约为每3公里战线一个师，突破口每公里30—80门火炮。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密度为每1.6公里战线一个师，突破地区每公里170—230门火炮。为了压制敌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两到三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将炮火对准敌人防御工事中仍在活跃的点。然而，炮兵只能削弱敌人第一道防线的防御能力。对敌人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的侦察情报带来了更坏的消息。在突破第一道防线后，红军遇到了更为集中的抵抗。至于在进攻前进行多长时间的炮击，则必须考虑敌军是否有机会将其预备队转移到可以发动进攻的地段。一种解决办法是使用司令部炮兵预备队中最重的火炮加强炮击。在这种持续的炮击之后，苏联步兵就可以前进了，这时他们需要能立即摧毁新目标的坦克来支援。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红军只有KV坦克和T-34坦克，这些坦克对德国国防军来说不再难以摧毁。因此，苏军在库尔斯克损失了多达6000辆坦克。只有在前线的少数地区（主要是在南部地区），红军才设法将战术上的成功转化为行动上的成功。但德军在北部地区建立了准备充分的防



图84 库尔斯克会战。指挥官列昂诺夫视察沃涅日斯基战场的情况

线，红军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换句话说，当时的情况与德国国防军一个月前开始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时遇到的情况相似。

库尔斯克会战的经验表明，苏联军队必须拥有一种新的突破性坦克。因此，苏军加紧研制 KV-13 坦克。与此同时，KV-1S 坦克上安装了一门 85 毫米火炮。

这种新型坦克被称为 IS-1（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或 237 工程，仅在 1943 年间少量生产。该坦克装甲厚 120 毫米，重 44 吨，装备 V-2-10 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 520 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 40 公里。它的 85 毫米 D5-T85 火炮有 59 发榴弹，射程 160 公里。

苏联人在会战后认真且坦率地探讨了战果，结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民委员马雷舍夫估计损失了约 6000 辆苏联坦克，是德军损失的 1500 辆坦克的 4 倍，此外还牺牲了 7 万名士兵。马雷舍夫认为，这必须被视为一个警告，他要求设计人员改进枪支和装甲。设计师列·谢·特罗扬诺夫想出了对付虎式坦克的有效对策。

1943 年夏，苏军坦克突破了德军坚固的防线，在这场伟大的奥廖尔战役之后，红军收集了大量有关德军炮弹如何击中或损坏苏军坦克的数据：对口径、距离和入射角度进行了系统归类和分析。这为今后的技术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在此之前，苏联设计师更多地是依靠直觉在装甲防护、火炮和机动性之间进行折中。苏联坦克设计师认为 50 吨是最大重量。如果超过这个重量，通行就会出现問題，桥梁无法通行，速度也会太慢。现在，他们可以根据敌人的火力模式调整坦克装甲。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战争后期的苏联坦克有了截然不同的轮廓和构造原理。战争期间，装甲零件的铸造技术有了实质性的改进，装甲的焊接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943 年秋，科廷和杜霍夫以及他们的许多助手提出了 IS-1 坦克的设计思路。当所有的模型和图纸都准备就绪后，他们与州委书记取得了联系。州委书记接受了他们的新思路，尽管生产 IS-1 坦克并不包括在任何计划中，而且这需要改变车间和减少至少一个月的产量。该小组获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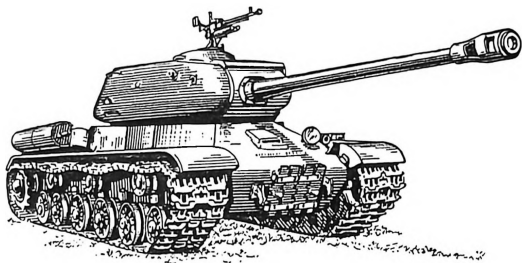


图 85 IS-2 坦克

尽可能保密的情况下在工厂制造三辆试验坦克。

这些坦克准备就绪后，在夜间被运往射击场和试验场。测试驾驶员在凌晨时分抵达，对坦克进行了各种试验，直到它们满足预期要求为止。9月，马雷舍夫来到车里雅宾斯克视察新坦克。他参加了夜间试验，并且就坐在坦克驾驶员身边。马雷舍夫决定向国防委员会申请批准来批量生产该坦克。马雷舍夫与扎尔茨曼、科廷和谢尔盖·马霍宁一起飞回了莫斯科。1943年9月4日，国防委员会批准了IS-1坦克的批量生产。当斯大林听取了科廷关于新型坦克的优点和质量的报告后，他惊叫道：“有了这些坦克，我们就能赢得战争！”10月，IS-1坦克开始在车里雅宾斯克批量生产²⁸，首先生产的是IS-1（也称IS-85）坦克，从12月开始生产IS-2（1943年型）坦克。IS-2坦克配备了新型122毫米D-25火炮，不仅能摧毁开阔地上的目标，还能摧毁工兵障碍或压制战壕中的火力点。IS-2坦克重量不到50吨，但其炮塔装甲仍然比其前身厚得多（前部装甲厚120毫米，炮塔装甲厚100毫米，侧面装甲厚90毫米）。当时德国国防军的反坦克武器无法从500米外以0度角穿透IS-2坦克（德军坦克上有75毫米的PaK 40s或KwK 40/L43s反坦克炮）。在实战中，这意味着IS-2坦克可以在300—400米的距离内向敌方炮兵阵地开火。

能生产出新的、防护性能更好的坦克也是铸造装甲技术发展的结果。炮塔前部和炮塔下部是用铸件制成的，而两侧和底部则是用轧制的装甲板制成的。铸造装甲是最经济的方法，但它由于比轧制钢材更容易留下微小杂质，因此通常不如轧制部件坚固。找到一种尽可能减少杂质的装甲钢铸造方法是战争年代的一大技术进步。

1943年，车里雅宾斯基洛夫工厂仍生产了约3600辆T-34坦克，此外还生产了469辆KV-1S坦克和668辆SU-122自行火炮，以及102辆IS-1S和IS-2重型坦克。在战争的最后一年，IS-2坦克不断被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改动之一是1944年6月开始采用的开放式前部。这些改动是为了尽可能提高装甲防护能力。由于倾斜度为60度，其120毫米的装甲厚度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德国75毫米PaK 40和88毫米KwK 36反坦克炮的校准炮弹和低校准炮弹都无法穿透IS-2的装甲。

1944年，车里雅宾斯基洛夫工厂奉命参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重建工作，并为石油人民委员部和军队生产S-65拖拉机的备件。²⁹当年，车里雅宾斯克共生产了520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210辆IS-2，2510辆ISU-122、ISU-122S和ISU-152）。

1944年，下塔吉尔继续生产了数以万计的T-34坦克。尽管德军在这一阶段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重型坦克——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但从本质上讲，德国设计师未能将强度、火炮和机动性结合起来。科廷说：“许多人把重型坦克想象成履带上的巨人，带有装甲的大象。但我们的新型重型坦克外形尺寸非常小，比它前身小得多。但装甲更厚，火炮更强……重型坦克必须要善于隐蔽。”

1944年10月3日，扎尔茨曼发布了第1541号命令，他在命令中指出，1944年第三季度已完成了计划目标，重型坦克的产量也增加到了预期的最高水平。他写道：“现在我们具备了在今年剩余时间实现计划目标的所有条件。在追求完成计划的同时，还必须给工人更多的休息日，组织企业管理方面的文化活动。”“热车间”的工人每月休息三天，工厂其他部门的工人每月休息两天。工厂管理层的工作时间如下：上午9点开

始工作，下午5—7点是晚饭休息时间，午夜或凌晨1点之前下班。车间里，工人上午7点30分开始工作，午餐时间为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晚餐时间为下午5点至7点，工作日结束时间为晚上11点或午夜。³⁰

米哈伊尔·巴尔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为苏联坦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极具前瞻性的基础。巴尔日1909年出生于叶卡捷琳娜斯拉夫，曾就读于哈尔科夫机械制造学院，后被派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工作，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53年，负责设计坦克和自行火炮。他的职业生涯从设计师起步，后晋升为设计局局长、副总设计师，并从1947年起担任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战后列宁格勒部分人员撤出后厂名恢复为“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总设计师。1949年，巴尔日开始在车里雅宾斯克机械技术学院任教，并从1953年起全身心地投入坦克技术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中。

战争年代，巴尔日在科廷和杜霍夫的指导下工作，于1945年负责研制完成了IS-3坦克。巴尔日在疗养院住了10天，其间萌生了关于IS-3坦克的想法。后来他回到了车里雅宾斯克，两周后的一天，凌晨1点左右，他把一份完整的方案稿放在了扎尔茨曼厂长的桌子上。扎尔茨曼看着设计图图纸，闭上眼睛想了很久。巴尔日以为扎尔茨曼睡着了，但一个半小时后，扎尔茨曼抬起头说：“我们要生产这个坦克！”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工厂已经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推出一款全新的型号并非毫无风险。³¹

IS-3坦克的外形比同时代的坦克低矮得多，这为一系列的改进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改进型为苏联军队提供了基本装甲防护。战后，巴尔日参与了T-10坦克和两栖坦克的研制工作。巴尔日设计了一种重点加强装甲，具有最大的防弹效果。他后来通过了技术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在机械技术学院（后来的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工作期间，他担任过13名博士生的导师，带领他们研究坦克和拖拉机的生产。



图 86 作为车里雅宾斯克纪念碑的 IS-3 坦克

决战柏林

在 1944—1945 年德国的最后一战中，红军组建了特种重型坦克编队，每公里战线配备 30—40 辆坦克。德军在德国境内的防线纵深可达 120—150 公里，并没有永久性防御工事。因此，大规模坦克部队集中在主要进攻方向；这些部队由 7 个近卫坦克旅^{*}组成，每个旅有 65 辆坦克。

柏林由一支庞大的德军部队沿奥得河和尼斯河防守，纵深达 40—50 公里。所有战场和永久性防御工事都有部队驻守，其作战密度堪比 1941—1942 年德国国防军的进攻行动。由于德军在市郊还有防御工事，防御的战术纵深实际上为 90—100 公里，沿线有许多反坦克炮。然而，

* 在苏联军队中，“近卫”是授予精英部队的荣誉性称号。——编者



图 87 驶入柏林的苏联坦克部队

第 7 和第 11 近卫坦克旅在 IS-2 坦克的直接支持下，成功闯入柏林，70% 的坦克完好无损。换句话说，IS-2 完成了作为突破坦克的主要任务，在突破敌人战术防御区时直接支援了步兵。

德国总共生产了 1354 辆虎式坦克，其中 489 辆是虎王型。与相应的苏联重型坦克相比，这些坦克的生产更为复杂。

1945 年上半年，苏联共生产了 2005 辆坦克：980 辆 IS-2、405 辆 ISU-152、390 辆 ISU-122、200 辆 ISU-122S 和 30 辆 IS-3。历经考验的 IS-2 坦克、新型 IS-3 坦克和上述自行火炮参加了“二战”的最后几场战役，特别是参与了第 49 近卫坦克团的战斗，并在桑多梅日地区苏军与德军虎王坦克的战斗中取得突破。

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及其助手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工厂的生产报告。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可以打电话给工厂某位领导询问情况、下达命令或发出威胁。大多数此类电话都是在深夜拨打的，这可能是关于斯大林性格谣言的一部分。确实有过很多次，克里姆林宫深夜打出电话，由于时区不同，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甚至要晚几个小时。



图 88 1944 年夏，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第 63 坦克旅战士宣读车里雅宾斯克工人们的问候

亚历山大·贝克 (Aleksandr Bek) 的《新任命》(Novoe naznachenie) 中就以一种非常有趣的虚构形式讲述了这种领导风格。这部小说是根据与人民委员伊万·捷沃关系密切的厂领导提供的信息撰写的。³²

斯大林或总参谋部的指令往往是以加密电报的形式发出的，工厂的报告也是以规定的形式和密码发出的。尽管如此，车里雅宾斯克州委还是印制了一本皮面装订、有银色配件装饰的小册子，名为“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其中用图表和照片清楚地介绍了南乌拉尔地区国防工业的所有成就。第一页上写道：“基洛夫工人向斯大林同志庄严宣誓，要学会如何生产新型、坚固的坦克。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前线接收了基洛夫工人生产的坦克。”

1941—1945 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生产了 977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约 8000 辆是 IS-2 重型坦克和 SU-152、ISU-122 和 ISU-152 重型自行火炮。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共生产了 65100 辆坦克，其中

1959 辆是虎式、虎王式、费迪南德式*和猎虎式重型坦克，此外还有 6400 辆黑豹式坦克和猎豹式坦克。³³ 苏联生产了 151.59 万挺各种口径的机枪、1213.99 万支步枪和卡宾枪以及 617.39 万支冲锋枪。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与德国相当，甚至超过了德国。

自 1996 年以来，俄罗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 1941—1945 年东部战线苏德战争的史学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有更多的档案资料被公开，而且还出现了其他资料来源。总体而言，可以说历史学家们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苏联官方史学中讳莫如深或很少讨论的问题上。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且有大量研究对历史进行了修订和重新解释。³⁴

“二战”的经济史，即后方的斗争史，并不是史学家们着重修订的对象。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以前被忽视的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农村甚至一些城市近乎饥荒的严峻形势，还有德军占领下和红军解放后人们的真实态度和心态。这些新的史学作品更详细地展示了男女老少在工业、交通和医疗保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往的史学作品中主要是些宣传口号，而非这些事实。³⁵

* 也称象式，是德军一款自行反坦克炮。——编者



图 89 “一切为了胜利！苏联女性奉献前线。”阿列克谢·科科雷金 1942 年创作的海报

第八章 南乌拉尔地区：战争后方的 1418 个漫长日夜

1941 年 6 月 22 日似乎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许多人在街上散步、去游乐园或去找朋友，享受着一天的假期。在车里雅宾斯克，人们中午才收到德国进攻的消息。工厂里的汽笛开始鸣响，广场和公共场所的广播喇叭播放着塔斯社的官方消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还播放着莫洛托夫关于纳粹德国如何“阴险地进攻苏联并破坏互不侵犯条约”的讲话。

档案资料里很难体现出普通民众的态度。战争开始的头三天，超过 10000 人聚集在拖拉机厂。该州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一些退伍军人回忆起当时近乎恐慌的情况——许多人曾坚信 1941 年不会发生战争，毕竟 6 月 14 日塔斯社刚刚发文强调，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其他人则更有信心，相信红军将在几个月内赢得战争。战争爆发前的几周里，党组织领导人和大型工厂的负责人一直在紧张地修改工业动员计划，以备战争之需。对他们来说，莫斯科不断发来的提醒他们备战的消息中透露出的紧迫感，现在变成了现实。

希特勒和德国军事领导层指望通过“闪电战”一举歼灭苏联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心脏。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将兵力分布在三条不同的进攻路线上：第一条是向乌克兰进攻，而后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进攻，以获取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源；第二条是向莫斯科及其众多工厂、中央行政机构进攻；第三条是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欧洲部分



图 90 1941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在米阿斯市举行的群众大会。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时，车里雅宾斯克州其他许多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

北部地区进攻。如今我们只能假设，如果德军有计划地集中力量实现三个目标中的一个，将会发生什么。

希特勒的计划是，在击溃红军主力后，通过德军的推进迫使苏联接受德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这样，德国就会拥有必要的石油资源、矿产和其他对其军事工业至关重要的资源。如此一来，德国就有能力继续对英国发动战争。然而，德国低估了苏联在伏尔加河以东和西伯利亚的工业潜力。苏联领导人则非常清楚乌拉尔地区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的作用。这些工业储备和乌拉尔五年间展现的潜能有多么重要，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乌拉尔地区新的基础设施已经建成，很容易就能和苏联西部地区撤出的工业设备相结合。¹

一旦这些基础设施与撤出的装备相结合，苏联就具备了打持久战的工业基础。德国军事领导人对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及其对苏联国防的重要性只有肤浅的认识。这些基本误判的特点是，希特勒甚至认为德国国防军在特种部队的帮助下，可以进一步向乌拉尔推进，或者利用远程“乌拉尔轰炸机”消灭该地区的苏联国防工业。²

根据最初的“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地面部队将在三四个月内突进1500公里，1941年9月或10月抵达伏尔加河，之后空军部队将占领“俄国人最后的工业堡垒”。Ju-88、He-111、Do-17和Do-215轰炸机理论上可以从伏尔加河沿岸的某个地点飞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其他城市，但它们没有战斗机护航，只有在所有苏联战斗机都被击落的情况下才有成功的可能。³

即便最乐观的理论假设，也不会认为德国飞机有足够的轰炸能力来摧毁乌拉尔地区出现的众多国防工业工厂：从南部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到北部的下塔吉尔，从西部的莫洛托夫（彼尔姆）到西伯利亚边境的库尔干。但苏联安全部队在战争年代仍不得不清除大量的间谍和破坏分子，他们有的早已潜伏在苏联，有的被空运来执行各种破坏任务。

1942年，德军飞机大规模轰炸的威胁依然存在。所有平民都接受了防空和自卫训练，在此之前其意义不大。1942年5月，车里雅宾斯克市执行委员会紧急召集全市各区负责人检查防空洞，但官方并没有发布任何关于防空袭或在空袭时撤出房屋、机构和工厂的指示。工厂有军事防卫人员，会负责处理这些问题。⁴

尽管苏联在生命和武器方面损失巨大，但1941年秋季苏联的坚固防御和1941、1942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在莫斯科的成功反攻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之成为一场消耗战。在这种冲突中，国家的工业资源最终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苏联拥有更强大的资源基础，加上其盟国美国和英国的援助，工业基础远超德国，而且苏联能更好地将资源运用于军事目的。1943年，德国总参谋部仍在考虑通过派遣“特攻队”执行自杀性任务去摧毁苏联钢铁厂。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失败后，德国方面打消了这种念头。

工厂撤离和转产

随着1941—1942年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车里雅宾斯克市和周边地区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宁格勒、哈尔科夫、莫斯科和国家西部其他城市的工厂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程师被疏散。重要的人民委员部或其下属部门被迁往车里雅宾斯克，而行政机关则从莫斯科迁往乌拉尔或西伯利亚。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电站人民委员部、弹药人民委员部和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都迁往了车里雅宾斯克。15个撤离的研究所或大学院系，还有几十所职业学校也迁往车里雅宾斯克州。⁵ 133所寄宿学校和92所孤儿院的总共15626名儿童被转移到车里雅宾斯克州。该市需要照顾大批难民，而工厂的绝对优先事项则是满足前线的需要。

政府通过了1941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以及下一年的军事经济计划，特别是给伏尔加河以东、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制定了计划。工厂停止了所有民用产品的生产，转而生产弹药、卡车和坦克。奥尔忠尼启则机械制造厂（78厂或Stankomash）迅速对车间进行了调整，开始生产KV坦克的炮弹和底盘。奥尔忠尼启则和科柳申科工厂为BM-13火箭炮生产穿甲弹，苏联人将这种炮称为“喀秋莎”，而纳粹士兵则称其为“斯大林风琴”。

1941年秋，疏散委员会下达了将哪些工厂和工人送往车里雅宾斯克的指令。约200家工厂（总计700家工厂）被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州。1942年春，42.77万难民从苏联其他地区来到该地。严格的中央集权避免



图91 1942年4月从列宁格勒边境地区疏散平民，此处为科博纳村的车站

了稀缺资源的分散，但在某些方面却出现了许多误判。在乌拉尔地区的城市中，过多的企业被安置在现有企业的周围，或要求建造许多新建筑。乌拉尔地区的能源资源完全不能满足如此多企业的需求，这就造成了新的问题。如果当时将撤离的设备运往其他地方，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⁶

当然，没有人能够详细了解有多少设备、是何时运抵车里雅宾斯克等细节的。一些资料可以大致体现当地工厂是如何接收数以百计的机器、产品零件和其他未经分拣的货物的。⁷

有时，整个工厂的设备会从一个疏散地转运到另一个疏散地。根据1941年10月15日的命令，“口径”仪器厂要被疏散到中亚的塔什干。拆卸工作于10月19日开始，12月4日完成。这批设备包括880台金属切削机床、18台锻压机床和78台热处理机床，还有许多小型部件和组件。设备被装在185节火车车厢里，另外还有40节车厢坐着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11月6日，第一列车抵达塔什干，新工厂开始安装机器。这时，又接到了新的命令，要求将企业迁往车里雅宾斯克。12月3日，火车抵达车里雅宾斯克，到1942年1月12日，690台金属切削机床、10台锻压机床和23台热处理机床已经运抵，共计723台。然而，其中只有370台运抵指定的新工厂，其余的还留在火车站附近。车里雅宾斯克的“口径”仪器厂所使用的场地是该市战前刚开始建造的新剧院，但列宁格勒党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的档案已经撤到了这里。因此，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没有解决将档案送往何处的问题。就这样拖延了一个多月，直到1月中旬，工厂的设备才安装到规划的新剧场，后者面积达9800平方米，但仅能满足工厂需求的60%。于是，又修建了一座占地3000平方米的附属建筑。在莫斯科“口径”仪器厂的2700名员工中，只有650名工人、17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50名办事员被疏散到了车里雅宾斯克。这意味着新工厂必须招聘1650名合格工人（铣工、旋转车床操作员、自动车床操作员、磨工等）。许多疏散人员及其家属（1510人中的530人）住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尽管如此，国家计划委员会车里

雅宾斯克代表处的最终报告还是显示了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看似混乱的世界里，利用来自不同企业的各种设备，于1942年1月在全新的条件下开始生产的。

就这样，太多被疏散的工人及其家属住在这个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面临巨大生活和供给问题的城市中。1942—1944年战争期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塔吉尔、车里雅宾斯克和乌拉尔其他城市的数十万居民的食品状况、物资供给和居住条件几乎是灾难性的。为接收从乌克兰或其他靠近前线地区来的人，这里建起了疏散点。许多疏散人员被临时安置在学校的教室和走廊里。此后，他们与其他家庭一起住在公寓里，这些公寓逐渐容纳了越来越多的人。从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工人和专家被要求与其他家庭合住公寓，甚至合住房间，而其他则不得不住在浴室、走廊或地下室，这些地方成了临时宿舍。俄语中的уплотнение（“挤在一起”）就是用来描述这种居住安排的。在战争期间，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些工人经常不得不反复“挤在一起”，以适应更小的居住空间。⁸

许多难民与亲属失去了联系。政府收到了一些信件和问询，得知一些母亲在疏散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学校和行政大楼内设立的许多医院尽力给难民和伤兵最好的照顾。在这些年里，市政府和当地的内务系统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有关失散或失踪亲属的问询。有些人在火车站时失散了，有些人则在德国空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例如，一个名叫查斯金的士兵正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请内务系统帮忙寻找母亲；据说他的母亲已经从列宁格勒撤离到车里雅宾斯克。士兵们的妻子想要寻找她们从拉脱维亚撤出的3—9岁的孩子。另一个例子是纳鲁特斯卡娅和格拉佐娃，她们在列车停靠斯摩棱斯克时找不到撤离列车了，于是询问列车去了哪个城市。这些只是1941年10月车里雅宾斯克疏散站信息处问询信息中的几个例子。⁹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政府更清楚地了解了1941年从西部地区疏散的人口情况，当这些地区从纳粹占领者手中解放后，政府为他们大规模

返回家乡做着准备。¹⁰到1942年4月，车里雅宾斯克州有42.77万疏散人口，大多分散在各个城市。到1945年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返回了家乡。¹¹

初期是最混乱的。当时，车里雅宾斯克的食物采购甚至不能满足军事工业人员的需要——他们需要额外的口粮。这些人11—12小时轮班工作，通常在他们离开工厂时，商店里的商品已经售罄。城市里的有轨电车人满为患，而且往往破旧不堪。这造成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延误，工人不得不步行——通常长达7公里——才能到达工厂。¹²1942年，基洛夫工厂（前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周边区域要求增设单独的公交线路，以满足工厂工人的交通需求。后来公交线路也建立了起来，最显而易见的需求不时能得到有效处理。¹³有时，一些最明显的需求还能被高效处理。1942年春，医生、警察和地方苏维埃代表按上级要求清理街道和花园，并将垃圾放到米阿斯河的冰面上。¹⁴

由于拥有众多国防企业，车里雅宾斯克市被重新划为具有特殊安全地位的城市，称为“一类城市”，这意味着对谁可以在该市居住进行了限制。还有一个目的是几乎完全控制任何到访这座城市的人，即使只是临时到访。¹⁵例如，服刑期满的罪犯不得在此居住。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工厂对工人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些限制被忽视了，而且负责招募的人员去其他城市和农村招募时也不会检查这方面的材料。¹⁶

由于坦克工业对整个国家非常重要，而且许多国家机关、组织和文化团体都撤离到了那里，因此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车里雅宾斯克也渴望获得更高的地位。1943年8月21日，车里雅宾斯克被授予“共和国级城市”的地位，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心之一。这意味着该市将获得更多的国家预算补贴，用于进一步重建旧建筑或建造新建筑，或从根本上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水处理站、公共桑拿房和浴室。一份有关这些问题的报告显示，交通系统已经破旧不堪：87辆有轨电车中，只有26—30辆能使用，18辆无轨电车中，有11辆需要大修。¹⁷基洛夫工厂的厂长扎尔茨曼试着改善交通系统，至少为企业员工做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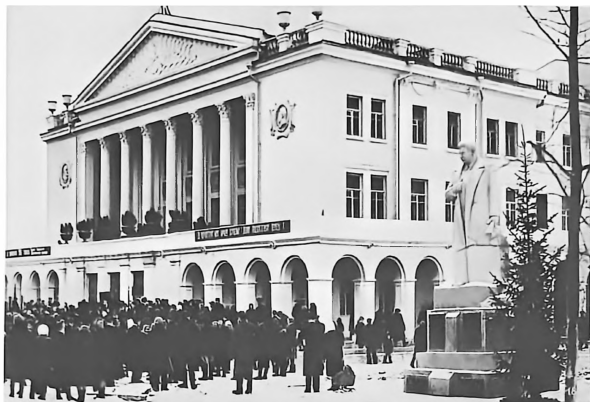


图 92 乌斯季-卡塔夫市铁路工人文化宫开幕式，1952 年



图 93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1908—1989，前排左三）是新型党员干部的代表，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断进步并证明了自己。他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也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州委书记之一，战后被任命为外贸部长，后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

* 似不准确。帕托利切夫任苏联外贸部长至 1985 年。——编者

他给从厂区通往市中心的斯巴达克斯大街(今天的列宁大街)铺上了沥青,并确保有轨电车的载客量和时刻表有所调整,以满足工厂的需求。¹⁸

车里雅宾斯克地位的正式改变让该市更有机会获得预算资金来改善文化生活。党组织工作人员向莫斯科提出申请,请剧院和作家协会派更多的艺术家和诗人到车里雅宾斯克演出。¹⁹剧院的演出剧目包括西方经典剧目,如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奥赛罗》《驯悍记》,莫里哀的《伪君子》,以及席勒、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和洛佩·德·维加的戏剧。俄罗斯经典戏剧——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托尔斯泰和莱蒙托夫的戏剧,还有包戈廷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卢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水手》和斯维特洛夫的《二十年之后》等苏联新剧也经常上演。市里还开了一家木偶剧院和一家歌剧院。²⁰该剧院以茨维林命名,E. B. 克拉斯尼安斯基担任艺术总监。他从莫斯科搬来后,成功创作了《杜罗夫的希望》《错误的喜剧》《进攻》《奥列科·邓迪奇》《三姐妹》等剧目。1944年3月,该市最重要的人物、州委书记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要求克拉斯尼安斯基在该市再待一年左右,不要马上返回莫斯科。他反对由知名度相对不高的戏剧家索科洛夫代替克拉斯尼安斯基前来。州委给中央宣传部门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早先的一项决议,决议强调要提高车里雅宾斯克这样规模的工业城市的文化水平,使其至少达到苏联首都的水平。然而,收效甚微。决议还要求向车里雅宾斯克的剧团派遣更多的演员,向青年剧院提供更多的资源,建造更多的电影放映厅,以及派遣著名作家和演员到车里雅宾斯克来撰写战争年代该地区 and 居民相关题材的书籍和剧本。²¹

“坦克格勒”的工作条件

到1941年底,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的劳动力总数达到40852人,其中工人27895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6922人,职员2120人,其他类别3915人。总人数中有14121名妇女,包括9315名工人,1071名工程

技术人员。此外，还有约 2000 名红军士兵和 1000 名来自市郊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²² 车里雅宾斯克的第三劳改营（ITK No. 3）是为被判处三年（有时甚至五年）徒刑的轻罪犯而设的，它将 1600 名囚犯交由基洛夫工厂安排，其中有 1000 多人直接在工厂工作。劳改营的负责人很快就抱怨工厂没有尽到对古拉格囚犯的义务——营房里没有供暖，宿舍里也没有暖气，没有床单被褥。许多囚犯病倒了。营房和工厂之间的交通很少像预期的那样正常。在随后的几年里，类似的抱怨也频繁发生。其他报告显示，古拉格囚犯偷窃工厂工人的物品，有时甚至以暴力相威胁。只有对古拉格囚犯工作的车间进行更严格的管理，情况才会有所改善。²³

最高苏维埃 1941 年 12 月 26 日的法令宣布，军工企业和相关供应方的工人、工程师和其他人员要像军队中的应征入伍者一样被动员起来。任何主动辞职的人都将被像逃兵一样受到指控，并根据战时法律受到惩罚。从 1942 年下半年起，这项法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煤炭、汽油和化工行业，从 1943 年 4 月起，又包括了铁路和内陆水运系统。然而，这些压制措施最终并不能完全改善劳动纪律，也不能将工人束缚在工厂里。战争期间工厂中擅自缺勤和“逃兵”现象十分普遍。许多人被缺席判决，并被警察搜捕，等待他们的将是判决。每隔一段时间，州政府就会强调工人不离开工厂是多么重要。1944 年 6 月 29 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标题很有说服力——《消除 1941 年 12 月 26 日法令执行失败的后果》。同样，车里雅宾斯克州苏维埃试图说服各工厂不要雇用主动从其他工厂离职的人员，但没有成功。这些法令不得不再重复，这说明其在实际执行中是多么不到位。工人太缺乏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居住条件不好，所以新雇主会保护他们招募的工人不被指控为“逃兵”。1944 年 12 月 30 日，一项新法令宣布赦免任何自愿返回工厂的人员。²⁴

截至 1943 年 1 月 1 日，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共有 49000 名员工。其中 7500 人来自列宁格勒，3000 人来自哈尔科夫的 75 厂，2050 人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1000 人来自莫斯科的企业。另有 10441 人受到“征召”后被送往工厂，没有被送去部队。1942 年，劳动力的流动

性很大。11个月里新招募了29080人，同时有21807人离开了工厂。据报道，至少有1572人主动离职，违反战时法律。这些“逃兵”根据具体情况被处以不同的刑罚。其他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房间或公寓来吸引工人。²⁵在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资料中，国家通过严苛的劳动法和1940年关于旷工的法律将劳动完全军事化了。对此，我们首先应考虑到军备生产需要持续推进；其次，这些法律的实施相当务实；第三，缺勤的原因实际上有很多，如表5所示。

表 5

1942年1月至7月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的缺勤情况

	人数	缺勤的工作日	参与社会和政治工作	节假日	产假	病假	准假
1月	415	47065	549	316	3777	35186	6922
2月	761	48278	942	283	3411	36676	6034
3月	820	59886	911	521	3632	46493	7328
4月	1361	74924	1348	462	3052	54116	10209
5月	3200	98761	2148	584	3277	71056	11895
6月	2871	109303	2058	764	2309	84363	11077
7月	4129	107453	2198	1692	2311	83366	8957
总计	13557	545670	10144	4622	21769	411256	62422

尽管战时法令原则上取消了普通假期和额外假期，但工厂管理层仍继续大规模批准休假。表5中的“准假”指的是经批准后的休假。另一方面，未经批准的无故缺勤有所增加，从冬季的415—820人增加到夏季的约2800—约4000人。部分原因是，许多工人逃到了乡下，帮助集体农庄的亲戚们干活。在接下来的冬季（1942年冬），基洛夫工厂报告的每月900—1000例缺勤中有400—600人是未经批准缺勤的。2797个确定已

离开工作岗位的人被判刑，他们往往被缺席判决。在这些人中，1689人被当作“逃兵”审判，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受到减少食物配给的惩罚。²⁶基洛夫工厂的情况和车里雅宾斯克的其他工厂一样，教科书中普遍描述的上班迟到20分钟就会被关进古拉格劳改营数年的情况显然不是事实。通常的处罚是在自己的工厂强制劳动几个月并减薪，而不是在偏远的古拉格劳改营服刑。

据悉，“逃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a)工人被招进工厂，但体力或资历不够；(b)住房条件差，不卫生；(c)对年轻工人不加照顾；(d)秘密警察工作负担过重，无法对所有判决结果加以监管；(e)工人被诱骗到附近的其他工厂；(f)允许工人放短假回家，但他们根本不返岗。²⁷

战争爆发后，工厂内部的纪律、监视和控制得到加强，任何不当行为为都可能被视为犯罪行为。工厂负责人也处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如果报告中出现“无法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的字样，内务人民委员部就会将其视为危害国家罪，并对生产中的这一环节进行严格检查。由此，管理者在秘密警察揭露他们之前就批评工厂里出现的任何小过失。1942年4月至7月间，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不履行生产义务为由逮捕了弹药企业的八名负责人，其中包括N.谢罗夫，他是车里雅宾斯克78厂的经理之一。²⁸

当男人们去当兵时，他们在企业的岗位就被妇女和更年轻的男女青年顶替。车里雅宾斯克的平民被动员了好几波。1942年2月13日，通过了《战时动员城市居民参加生产和建设活动》的法令，许多家庭主妇、退休人员被工厂雇用。直到1943年8月，针对这些群体的劳动法才有所松动，例如，有8岁以下子女的劳动妇女每周可休息一天。²⁹

伊丽莎维塔·科切尔金娜回忆说：

1941年，我16岁，又矮又瘦。当我和其他青少年来到第541号弹药厂（战时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工厂只有代号没有名称）时，监工看着我们惊呼道：“他们为什么给我们送来一个托儿所？”工厂里

中年人很少，大多数是年轻人和老年人。我在一台生产机枪子弹的机器旁工作。如果我够不着机器，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箱子上。过了一段时间，当我能获得双倍计件工资时，监工就改变了态度。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或更长。就这样持续了四年。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以前是这样的：半夜回到家，早上8点钟又得赶到工厂。我们非常累。为了不睡着，我们常常在机器旁唱歌。但最糟糕的还是饥饿。我们梦想着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战争快结束时，我的双腿开始站不稳。1945年5月，我住进了医院。

当然，加班也很多，而且没有加班工资。541厂在一份申请中称，由于人手不足，许多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1个小时，没有休息日。1942年12月，215名工人甚至在一天内完成了两个普通工作日的工作。工厂有2200名工人超额完成了每天的标准工作，其中1450人属于“斯达汉诺夫式工人”。因此阿列辛厂长提出申请，希望至少给这些工人增加食品和其他物品的配给。³⁰各个工厂都非常缺人手。到1941年底，估计有25865名疏散人员可投入生产劳动，其中9200人毕业于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该地区各城市有1284名师范学院女生和5763名九年级和十年级学生。³¹

1941年秋，科柳申科工厂开始为BM-11火箭炮生产炮弹，这些炮弹被装载到1.5吨重的卡车上。它们很快就被红军士兵称为“喀秋莎”。这些炮弹是与多个机械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的78厂、兹拉托乌斯特的259厂、克什特姆的机械厂和车里雅宾斯克金属结构厂——合作生产的。³²

科柳申科工厂还接到了许多其他国防订单。从俄罗斯南部工厂撤离的机器也被运抵这里。为了开始生产，在士兵应征入伍后，9月份招募了1330名工人，10月份招募了3109名工人。从南方撤离到这里的1830名工人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如此，仍缺少21个工种的1200多名合格工人。这些空缺的岗位由在工厂接受速成培训的年轻人填补。

维拉·谢伊娜就是这些工人中的一员，她负责为火箭弹外壳制作尾翼。她说：“在焊接时，发光的金属会飞到你的腿和脚上。烧伤后非常疼。有一次，我待在家里，因为大面积烧伤请病假。后来监工来我家把我接了回去。我一条腿缠着绷带，坐在椅子上焊接火箭壳体。”后来，所有工人都穿上了防护服，但由于缺乏基本的防护设备，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故。³³

战争期间，劳动力可以被征用，并在南乌拉尔地区的工厂之间重新分配。即便如此，企业也会拒绝将部分人员调走。兹拉托乌斯特第54号机械制造厂厂长梅列克辛列出了一份本厂所需劳动力的清单，其中分为16个工种，共计1387人。州委下达了抽调600名工人补充缺口的命令，但只有264名工人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和几个小城市来到兹拉托乌斯特工厂。³⁴

1941年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后，1922年、1923年和1924年出生的2000人于1942年2月被征召入伍。这给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带来了额外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得不动用90名本来免于征兵的工人离开工厂，就像附近的78厂不得不派出80名工人参军一样。³⁵

1942年10月，车里雅宾斯克的工厂又为10000人组织了职业培训班，这些培训班大多是为该市青年大规模教育开设的短期课程，但也面向来自该州其他城市和乡村的被征召的青年。³⁶

1942年10月14日，该州49家工厂的厂领导和负责人齐聚一堂，召开了一次盛大的会议，讨论战争爆发后年轻人的教育和招募入厂流程等相关问题。弗兰克的汇报讲述了许多车间的糟糕条件。工人的房屋没有得到维修，工作服也没人提供。许多人睡在大型工厂的车间里，因为他们没有冬装，或者回宿舍的路途太长。车里雅宾斯克707厂的巴拉诺夫举了一个例子：他遇到了一名16岁的女孩，女孩在一台复杂的进口机器前工作。当他走近时，她甚至没有抬头，而是继续像之前一样认真工作。后来女孩说，她光着脚已经七个月了，脚上长满了冻疮引起的疖子。她是从列宁格勒撤下来的，遵守所有的生产规范。巴拉诺夫发现了其他类似的情况，并通知了管理层。原来，库存有200双鞋靴，但没有人想到



图 94 1943 年小学生制作铸铁模型的实践活动

要分发给工人。在基洛夫工厂的营房里，检查发现，工作了三四年的年轻女工没有靴子。她们不得不赤脚走到工厂领取新鞋，有时甚至会因为丢了鞋而被收取费用。在营房里，有时床单和床垫都没有。³⁷ 1942 年 12 月 3 日，基洛夫工厂的一名经理戈列格里亚德发布命令，要求制作 100 双毡靴和 100 双草靴，并要求每月集中修补多达 3000 双鞋，其中 400 双“用较好的皮革修理”，供斯达汉诺夫式工人穿。³⁸

工人往往很干脆地离开自己的工作场所，尽管他们知道这被视为与“逃兵”一样严重的罪行。由于持续缺乏劳动力，其他工厂的主管会无视他们的新员工没有出示劳动手册或原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这一事实。1942 年 11 月，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卫部队的军事检察官菲拉托夫向乌拉尔军区检察官布卢姆费尔特和军事检察官梅尔库洛夫报告说，截至 10

月1日，未审理的案件数量为963起，10月份又增加了2832起“逃兵”案件。10月份总共有3795起案件需要审理，迄今为止只审理了其中的1119起。其中，210起案件在当事人出庭的情况下审理，909起案件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审理。截至11月1日，检察官菲拉托夫还有2517起案件未处理。他明确表示，这些“逃兵”大多是由于住房和生活条件恶劣造成的。收到军事检察官的这些“信号”后，州委于10月视察了军事工业工厂，了解工人的生活、衣着和饮食情况。这些突击检查暴露了许多丑闻。宿舍和餐厅的情况就是一大批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青年工人离开车里雅宾斯克的原因。³⁹

厂长扎尔茨曼1943年8月27日的命令指出，突击检查暴露出，16岁以下的青少年经常被迫加班和上夜班，却得不到合理的工资。很多时候，青年工人被安排从事他们无法胜任的工作，而不是被送去参加职业培训或加入计件工资更高的班组。扎尔茨曼下令禁止青年加班或上夜班。此后，所有出生于1928—1929年的青年每天工作六小时，晚上10点后不得工作；还应给他们保障一日三餐。所有关于无偿加班的投诉应当立刻处理并支付加班费。只有12或13岁的儿童（生于1930—1931年）应从一些车间调离，主任们应在他们上完一些行业课程后给他们安排其他工作。兹韦列夫副厂长负责监督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并检查孩子们是否得到了更好的住房、鞋子和衣服。工厂还将对所有青年工人进行全面健康体检。⁴⁰

另一项命令暗示了工作条件和领导们正努力实现的目标。1944年3月21日，厂长扎尔茨曼签署了一项命令，“要培养工厂车间主任着装方面的行为习惯”。管理人员应穿由扎尔茨曼确定样式的工作服。从3月25日起，车间主任及其副手、车间主任助理、部门主管、班长、机械师和车间能源技术员都必须穿工作服。任何人都不得穿户外服装进入车间。扎尔茨曼希望每个人都能衣着整齐、洗漱完毕、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再上班。⁴¹

在战争年代，尽管困难重重，但车里雅宾斯克还是新建了许多工厂。根据计划，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269厂将于1941年底建成。然而，当地建筑部门最初得到的资源太少，而除了工业建筑外，还要建造新的住宅。

1万多名工人和工程师还没有自己的住房，因此对新房间和公寓的需求很大。权宜之计是为7000名工人建造营房。⁴²

战争期间，国防人民委员部成立了军事工程建设营，招募因健康、年龄或其他原因不适合在正规军队作战的人员。建设营中还包括曾被判刑的罪犯和因政治或其他原因被苏维埃政权认为不可靠的人。因此，它包括来自古拉格特殊定居点或工人村的曾遭驱逐的农民和青年，还有许多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新苏联公民。另有一些是与交战方民族相同的苏联公民：他们是德意志人、芬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等。1941年秋，这些建设营被分成工作纵队，并被分配到其他人民委员部。1942年初，20个这样的工作纵队共有12万多人。⁴³

早期，车里雅宾斯克市没有为建设营所有人员的食宿做好准备，营房里也没有足够的床位。建筑工人的食物不足，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适当的冬装和工作服。在第一个冬天，许多被征召到这些建设营的人都没有冬装，只能待在营房里。以第793爱沙尼亚建设营为例，1000名工人



图95 KV坦克的装配车间

中有 700 人不得不待在室内。⁴⁴ 1943 年，中亚共和国的年轻人也被征召到车里雅宾斯克的建设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懂指挥官使用的俄语，也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所以被认为不适合在红军中服役。这些建筑工人在车里雅宾斯克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无法适应恶劣的气候，经常生病。因此，大部分中亚工人在 1944 年被遣散。⁴⁵

悲惨的条件促使工人们逃离建设营，他们被汇报为“逃兵”。在主要由爱沙尼亚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建设营里，经常有关于酗酒、打群架和怠工的报告。⁴⁶ “打倒斯大林，希特勒万岁！”在车里雅宾斯克 254 厂的第 65 建设营中，有人散发传单，号召加入希特勒的军队。不知道到底是谁制作了这些手写传单。在同一个建设营里，偷窃其他人的财物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1943 年 10 月 23 日车里雅宾斯克卫戍区三级军事律师奥斯塔宾给共产党州委员会的萨普利金递交了一份报告，内有最臭名昭著的案件的调查结果。切巴尔库尔村第 765 建筑工人纵队有 14 人逃离，兹拉托乌斯特第 776 纵队有 55 人逃离，兹拉托乌斯特第 793 纵队有 37 人逃离，卡姆斯克第 820 纵队有 15 人逃离，卡姆斯克第 779 纵队有 28 人逃离。截至 10 月 23 日，共报告了 301 名“逃兵”，但只找到、逮捕和判刑了 133 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别部门正在搜寻其余的“逃兵”。这些工人纵队的“逃兵”大多是爱沙尼亚人和所谓的“西方人”，即来自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建设营中的许多人被归类为“社会异类”，即具有商人阶层的背景，或是自雇职业的代表，据称还有来自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前法西斯党员。这份报告认为对这些建筑工人缺乏政治宣传，导致他们缺乏基本的军事纪律，但也谈到物质匮乏导致工人冻伤，因卫生条件不佳导致白喉和其他疾病传播。⁴⁷

不过，这些建设营的确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迅速建成了许多新工厂。例如，1942—1943 年，第 22 特别建设与安装部队 (OSMCh-22) 在车里雅宾斯克建造了轧管厂。其他营从俄罗斯南部的马里乌波尔钢铁厂运来了一台布鲁明轧机的设备，并从伊热夫斯克工厂搬来了其他机器。这

项工程由米哈伊尔·希尔德克罗特领导。为了加快在车里雅宾斯克的施工进度，还从中断施工的苏维埃宫项目那里运来了建筑材料和脚手架。1931年，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被毁——它于19世纪末为纪念战胜拿破仑而建——鲍里斯·约凡设计的300米高的摩天大楼（顶端有一座75米高的列宁雕像）已获批建设，因此苏维埃宫的地基工程于1937年开工。然而，土壤中的黏土需要大量的铁筋，工程比预期的要复杂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维埃宫的施工被迫中断，铁筋被转移到更紧急的任务上。此后，整个项目被视为无用功。20世纪30年代的宏伟城市规划遭到了太多的反对，而苏维埃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⁴⁸

德裔苏联人新建了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

从1941年战争初期就可以看出，国防工业所需的金属远远超过既有钢铁厂的产量。其中一些钢铁厂不得不撤离，而在德国空军轰炸范围之外的地区，又无法计算有多少钢铁厂的产能可以重新启动。

巴卡尔的铁矿石含碳量低、杂质少，被认为是优质钢的重要原材料，因此开始在此建设钢铁厂。然而，由于缺乏投资资金和劳动力，除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外的第二家钢铁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中断了建设。1939年初，苏共十八大原则上决定，要建成巴卡尔优质钢铁厂，因为飞机、坦克、汽车和拖拉机工业急需其产品。讨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厂的选址要远离任何有可能成为前线的地方。车里雅宾斯克州委敦促尽快开工建设该工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厂主要生产普通钢材，只有在1941年秋天从马里乌波尔调来一台布鲁明轧机后才能生产轧制钢。战争头几个月苏联钢铁厂的损失促使政府尽快建造巴卡尔工厂。厂址位于车里雅宾斯克东北10公里处的佩尔希诺村附近。根据最初的计划，工厂要到1945年才能建成。建筑工程于1942年2月开工，当时的

• 确切来说，该教堂的建造工作始于1837年，1883年正式竣工。——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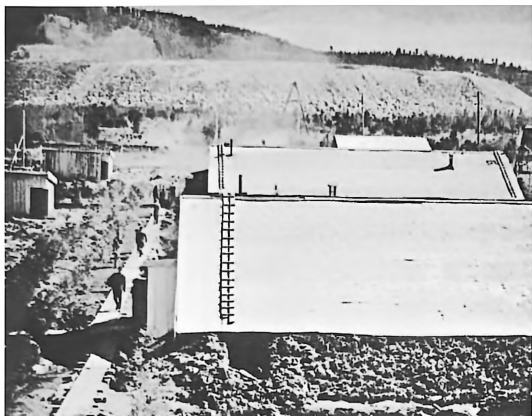


图 96 被征召劳动的德裔苏联人“劳动军”就住在车里雅宾斯克北部类似劳改营这样的营房里

建筑单位名为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Cheliabmetallurgstroï），工厂名称也改为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其中包括焦化厂、高炉、轧钢厂和其他车间。早在 1943 年 9 月 19 日，1 号电炉开始生产第一炉钢水。⁴⁹

这是依靠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资源完成的。1941 年 1 月 25 日，巴卡尔建设局成立，亚历山大·科马罗夫斯基担任首任领导人。大部分建筑设备都是从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另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的建筑工地运来的，巴卡尔建设局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是来自前伏尔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的德裔苏联人，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已被征召。根据 1941 年 8 月的一项法令，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没有被征召入伍，而是被“动员起来工作”或建造工厂。苏联领导人并不信任他们的德裔公民，因为他们中

• 全称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41 年 8 月，斯大林出于战时政治考虑，发布法令废除了该自治共和国。——编者

的大多数人都是 18 世纪末来到沙皇俄国的德国人的后裔。1941 年 8 月，苏联决定将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自治区的居民驱逐到苏联其他地区。德裔苏联人被送往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特别区域。

这些“劳动军”被安置在与普通古拉格劳改营非常相似的集中营中。第一批德裔“劳动军”于 1942 年 1 月至 2 月抵达车里雅宾斯克。⁵⁰ 这些人来自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区，主要由于不懂俄语和没有接受过战前培训而被送进“劳动军”。因此，新的战时法律对德意志、罗马尼亚、芬兰和匈牙利族裔的苏联公民具有歧视性。即使他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但仅仅因为政府怀疑其中一些人容易成为纳粹德国宣传的猎物，他们的命运就被改变了。美国也对日裔公民采取了类似的安全措施。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车里雅宾斯克集中营内的线人提供的材料和集中营内信件审查的结果都表明，直到 1943 年，“劳动军”中的氛围通常都是亲德的。⁵¹ 他们这种心态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除非这些德裔是 1941 年秋季或基辅战役和莫斯科战役期间撤退的苏军的一部分。同样，在苏德战争之前和第一阶段，一些集体农庄的农民也表达了失败主义或亲德情绪，或希望德国取得胜利。⁵²

1942—1943 年，依靠德裔苏联人的强迫劳动，一个钢铁厂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建成，这些德裔苏联人与红军的建设营以及少数自由工人、监工和专家并肩工作。这些“劳动军”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古拉格系统的一部分。⁵³ 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是一个集中营，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工作场所被武装警卫和警犬包围。工人们在一队士兵的监督下从营地被带到建筑工地。工作指标定得极高，任何人如企图抗议，都会被严厉镇压。这些极端的条件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944 年 2 月，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统计出有 34605 名“劳动军”，他们几乎与附近的城市隔绝，住在营房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定，无论付出多大的生命代价，新钢铁厂都应尽快完工。1942 年第四季度，五座电炉竣工；1943 年第二季度，另有两座高炉安装完毕。

从形式上看，德裔苏联人并非囚犯，而是被动员到后方工作的。大

体上，大多数“劳动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态度，至少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可以确定这一点。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更加积极，许多不同工种的技术专家都提出了工作过程量化的建议。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或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担任领导职务。20世纪40年代末，该工业实体由内务部转交建设部主管。1945年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报告中可见，1944年被征召的德裔苏联人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许多德裔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合格工人获得了各种奖励（毛皮夹克、西服、靴子等）。⁵⁴

科马罗夫斯基之后，雅科夫·拉波波特（1898—1962）成了车里雅宾斯克建筑项目的负责人。他出生于犹太职员家庭，在沃罗涅日接受了四年大学教育。1918年8月，他为契卡进行预审调查，并晋升为沃罗涅日秘密警察地方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拉波波特在沃罗涅日秘密警察中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一些岗位是负责监控地方企业的。从1922年起，他开始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济局，并负责编写关于苏联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情况的报告。从1926年6月1日起，拉波波特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犯集中营委员会副主任，并从1930年7月起担任该委员会生产部门负责人。1934年7月，他担任快速发展的劳改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副局长，并在负责波罗的海—白海运河建设项目期间处理了相关问题。事实证明，他有能力负责古拉格的大型水利工程——雷宾斯克和乌格里奇的水库和水坝。因此，他被任命为古拉格新单位——水利工程建设总局——和建筑工地附近集中营的二把手。苏德战争开始后，拉波波特担任古拉格军事防御建筑施工局负责人。随后，他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塔吉尔新钢铁厂建设项目，并被任命为下塔吉尔建设局与劳改营（Tagillag）的负责人，该系统是为完成这项任务而组织的强迫劳动营。1946年4月29日起，拉波波特担任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的负责人。⁵⁵

拉波波特描述说：“囚犯队伍”主要由“劳动军”和被判处长期古拉格监禁的罪犯组成。此外，许多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战俘，加上被拘禁的德国人，都被关押在东普鲁士。1944年，身体健康的

囚犯比例有所增加，而生病和体弱的囚犯人数则随着集中营总体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减少。但拉波波特指出，第 68 号集中营的死亡率和患病率仍然极高。集中营的领导因没有采购足够的食物来让囚犯适应繁重的劳动而受到批评。拉波波特认为，来自东普鲁士的新囚犯大多是纳粹党或盖世太保的成员。他说，“他们是来工作的，而不是让我们对他们进行改造教育的”。这与普通德国战俘形成了鲜明对比，普通战俘参加了许多宣传课程，目的是让他们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第 68 号集中营的领导接到指示，要改善囚犯的日常生活条件，从中任命新的工头，并将他们分成连和营。⁵⁶

被征召劳动的德裔苏联人还在科佩伊斯克的煤矿，车里雅宾斯克煤炭联合体、科尔基诺矿区、科尔基诺矿山建设托拉斯和其他生产基地工作。战后，被征召劳动的德裔苏联人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被置于与流亡农民同等的地位，被归入“特殊定居者”的类别。1949 年 1 月，车里雅宾斯克州有 384400 名德裔苏联人及家属，他们是在战争期间被迁到这里的。这些“特殊定居者”没有国内身份证件，没有当地领导的允许不能随意离开特殊定居点，必须定期向领导报告。直到 1956 年，他们才获得了与其他苏联公民相同的公民权利，特殊地位也被取消。⁵⁷

车里雅宾斯克的战俘

从 1941 年起，无数红军俘虏的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战俘被送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特别收容营。根据他们的技能、职业、工作能力和健康状况，他们被分配到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GUPVI）* 下属的各种劳改营。我们不应将该机构与劳改营管理总局（Gulag，古拉格）混为一谈。战俘的关押条件应遵循国际公约，苏联也签署了该国际公约。

* 事实上该机构名称几经变更，读者可参考《苏联战俘事务管理机构沿革（1939—1956）》（《东北亚论坛》2012 年第 2 期）。——编者

德国、匈牙利和其他敌国战俘早在 1944 年秋季就开始在车里雅宾斯克坦克工厂和其他工厂工作。⁵⁸

乡 村

大部分被征召人员来自农村。1941 年，车里雅宾斯克州有超过 2700 个集体农庄、161 个机械拖拉机站和 92 个国营农场。战争结束时，只有 876 个集体农庄、74 个机械拖拉机站和 41 个国营农场仍在运营。留在农村工作的主要是妇女、老人和非常年轻的人。集体农庄中的大多数男子都应征参加了红军。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具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1939 年，健全男性有 206000 人，女性有 231700 人。到 1941 年底，相应的数字分别为 91200 人和 199500 人。到 1942 年，男性劳动力为 25400 人，女性劳动力为 75100 人。这两个数字在 1943 年分别降至 18200 人和 71100 人，1944 年分别为 18600 人和 66600 人。1945 年，该州有 27200 名身体健康的男性和 66800 名身体健康的女性。⁵⁹ 1941 年全州有 161 个机械拖拉机站。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六个月，共有 24500 名拖拉机手、5500 名收割机手和 24000 名拖拉机队长被征召入伍。这些工种的工人换成了受过短期培训的妇女。共有 12400 名农机手是接受过教育的人。1944 年，10868 名拖拉机手中有 7220 名女性，2378 名收割机手中有 1702 名女性。

1941 年战争爆发时，1930—1931 年强制集体化期间车里雅宾斯克地区被流放的富农家庭（共计 46900 人）居住在 29 个“劳动村”，这些“劳动村”由 8 个负责人领导。自 1938 年起，这些前富农的子女可以申请身份证件并获得公民权利（尽管这是一个官僚程序，但代表了政治权利）。起初，这个群体中没有人被征召入伍，但 1941 年苏军的惨重损失迫使高层改变了想法。从 1942 年起，前富农及其子女也被动员加入苏联军队。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克多·泽姆斯科夫撰写了一篇关于“特殊定居者”的综合研究报告，据他估计，实际应征入伍的人大约占达到服兵役年龄的

人数的一半。来自前富农“劳动村”的其他男女则必须从事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部指定的工作。这些“特别分遣队”在战争期间被用于劳动力需求量大的部门——建造工厂、新铁路线或林业。关于林业，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决定如何组织这种形式的“集中营经济”。例如，1942年8月，州委下令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卡拉巴赫和其他地方的55个“劳动村”的家庭转移到州建筑公司。战争期间，这些前富农在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附近，与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违背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尽可能将“社会异己分子”与其他人隔离的原则。这样一来，“特别分遣队”的概念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一些含义。1942—1943年，被驱逐的前富农被允许参加红军，这使他们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平反。⁶⁰

1939—1940年，其他“特殊定居者”从波兰和前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流亡到车里雅宾斯克。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的部分理由是1920年波俄战争后签订了不公平和约，导致当时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从苏维埃共和国分离出去了。与此同时，新领土上的苏维埃政权在战时有意识地推行了一项政策，对大量波兰人进行大清洗，并将他们驱逐到苏联内地，以此清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国家的残余。总共有近40万波兰公民被流放，其中13.4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和监狱，24.3万人被迫建造所谓的特殊定居点并在那里生活。大约4万波兰人被送往乌拉尔地区，主要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莫洛托夫（今彼尔姆）附近的地方。约200个波兰家庭最后被安置在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煤矿城镇科佩伊斯克。德国入侵苏联后，苏联立刻加强了这些特殊定居点的安全制度。1941年8月12日的一项法令赦免了所有被定为“战俘”或因“其他原因”获罪的波兰公民，将他们的身份改为难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该军队于1942年离开苏联，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在1945年后返回波兰。

食品与健康状况

在德国入侵并占领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后的头几年里，粮食状况急剧

恶化。⁶¹ 即使在乌拉尔北部，也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尤其是在农村。⁶² 从战争一开始，职工供应部（ORS）又重新建立起来——1932—1936年职工供应部曾是工厂内部封闭的分配系统，为工厂、行政或管理部门内的人服务，但后来随着消费品的增多而关闭了。重新成立的职工供应部负责将中央库存的货物分发给员工，还设了自己的食堂、商店、库存和种植园。他们还负责工人子女的食堂。车里雅宾斯克的每个企业都有义务为附近城区的儿童提供几百份食物。1943年1月22日，国防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加强打击侵吞食品和工业产品的行径”的法令。不得不发布这样的法令这一事实表明，食品被广泛、系统地滥用，而且社会对食品的实际分配缺乏控制。

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天，儿童因肺炎、霍乱和肠道疾病而患病和死亡的比例急剧上升。⁶³ 车里雅宾斯克政府注意到，儿童营养不良，能在市区公共食堂就餐的儿童太少。因此，78厂不得不为其员工子弟和周边地区的总共1500名孩子安排餐食。最年幼的儿童在家中就餐，而5—12岁的儿童可以选择在家中就餐或早上在工厂食堂就餐。⁶⁴

战争爆发后开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食品也通过工厂的内部商店出售。1942年4月至12月采用了额外配给制。⁶⁵ 1942年6月10日，市委根据古贝格里茨教授的建议，敦促所有工厂食堂增加食物中的维生素含量，例如添加洋葱和调制松针植物饮品，每餐分发。⁶⁶ 每个工人每天能获得400毫升这种饮品。⁶⁷

食品短缺导致战争年代车里雅宾斯克的犯罪特点发生了变化。偷窃食品和配给卡的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古拉格囚犯普遍存在问题，他们可以在工厂里四处走动，向工人提供物品，只为对工人进行诈骗，还用刀威胁工人，并偷走工人的配给卡。⁶⁸ 政府还得跟大量孤儿中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做斗争。晚上9点后，政府对低龄儿童实行宵禁，禁止儿童买卖商品或从事擦鞋等工作。⁶⁹ 在战争年代，学龄儿童在夏季被有组织地派往集体农庄劳动。数以万计的儿童帮助农民清除田里的杂草和收割庄稼。

为了缓解食品短缺状况，政府鼓励并支持城市居民耕种私人农田。

工人们可以在城外拥有自己的土地，而集体农庄成员则可以拥有大片私人土地。⁷⁰这很快就变得非常流行；起初完全出于生存需要，但后来成了人们喜爱的休闲方式。在战争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几乎所有的产业工人都得到了自己的土地。企业还抽出部分劳动力种植蔬菜和马铃薯，以满足工厂食堂的需要。此外，一些工人还负责看管私人地块，以防偷窃。⁷¹

车里雅宾斯克市外的一些地区被分配给员工。1942年4月15日，市政府为工人划定了3754公顷个人土地，还向工人提供了蔬菜和马铃薯种子，优先提供给国防工业人员、从其他城市疏散的人员和残疾人。⁷²工厂厂长负责将这些分配给工人。工厂夏季还负责安排车辆，将员工运至郊外这些分配的地块。由于战争期间食盐严重短缺，每名员工都能领到2公斤食盐，以便在冬季腌制白菜、黄瓜和西红柿。⁷³

在战争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州的土地配额大幅增长，如表6所示：

表6

工人土地配额的变化情况

	1940	1942	1943	1944
种植者数量（人）	200000	276200	476000	514000
面积（千公顷）	20.1	22.5	30.0	41.7

1945年，有4.3万公顷土地种植了马铃薯和蔬菜，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收成约占全州的三分之一。据估计，居民从这些土地上收获了约25万吨马铃薯和蔬菜。⁷⁴

档案文件很少反映日常生活的某些内容。战后留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工作的机械师伊科夫·戈尔茨坦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个插曲，突出说明了有些事情在历史学中常常被遗忘。基洛夫工厂与该地区的一些集体农庄都有直接的产品交换机制。有一天，工厂派了五个小伙子去一个集体农庄用一些工业产品交换食物。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五个小

伙子杳无音信，工厂的同事们开始担心起来。然而，几天后，几个人终于回来了，他们带着大袋子满载而归，袋子里有马铃薯、甜菜和奶制品。经过一番怯生生的介绍后，小伙子们更加坦诚地讲述了集体农庄孤独的妇女们是如何从一开始用食物和饮料款待他们，到后来连续几天用其他方式向他们表示感谢的。⁷⁵

要详细介绍苏联后方的人口状况，需要另辟一章。如前所述，由于营养不足，人群免疫力下降，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也因战争而下降。表7显示了城市和农村登记的活产数。⁷⁶

表 7

车里雅宾斯克州的出生率（死胎除外）

		单位：千人				
年份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城市	45.9	44.7	30.0	13.6	13.2	19.6
乡村	72.3	63.5	33.4	8.9	7.3	9.7
总计	118.2	108.2	63.4	22.5	20.5	29.3



图 97 红十字会护士（1940年6月23日照片）

战争期间，男女人口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就能在农村工作的人而言，男性远远少于女性：男性有 62955 人（16—55 岁），女性有 138468 人（16—49 岁）。如果算上 12 岁以上的儿童，该地区村庄的劳动力接近 27 万人。耕地面积急剧缩小。

1944 年春天，许多人食用了冬季留在田里的粮食制成的面粉，这在布罗多卡尔马克、纳加伊巴克、切斯门斯克、瓦尔嫩斯克等地引发了化脓性扁桃腺炎的流行。州政府派出了数十名医生和护士来治疗病人，还在这些地方分发了新面粉。⁷⁷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组织经常报告乌拉尔地区大部分居民的饥饿和疲惫及其症状，如营养不良，尤其是在 1943 年底。州委书记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要求采取一系列对策，但这只能解决最严重的采购问题。即使是在国防工业中，也有大约 2%—3% 的工人患病并面临营养不良的危险。1944 年 4 月 12 日，在工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可以被定性为患有营养不良症或处于营养不良症前期。在一些工厂，多达四分之一的工人营养不良，以致健康受到威胁。疾病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基本的卫生要求。食堂的食物热量很低，蛋白质含量也很低。添加松针制成维生素饮料的建议被忽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检查员的报告指出，许多工厂的通风系统失灵，这意味着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气体和污垢。工厂管理层被敦促遵守有关休息时间的法令：国防工业每月至少休息两天，其他工厂休息四天。宿舍应得到修缮和清洁，食堂应提供更好的食物。⁷⁸ 车里雅宾斯克制药厂接上级指令要准备 150 万剂维生素 C。1945 年 5 月，工厂食堂的伙食状况有所改善，平均每天的能量为 3000 卡路里，而 1943 年每天的能量不到 2000 卡路里。⁷⁹

官方报告显示，1942 年上半年基洛夫工厂（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因病缺勤数量“巨大”，以下是 4 万多名雇员的统计数字：⁸⁰

	病例数	损失的工时
流感	6752	46785
胸痛、扁桃腺炎	510	3745

续表

	病例数	损失的工时
疖病	1245	15314
风湿病	314	4510
肺结核	369	7871
疟疾	53	484
肠道感染	810	7059
眼疾	350	2115
感染	60	1536
其他	6144	72298
总计	16607	161717

1942年秋，一名军医警告说，由于新一批士兵从感染率较高的重灾区赶来，斑疹热正在蔓延。⁸¹ 1943年初夏，痢疾和斑疹热的病例迅速增加。对房屋和其他疫源地的消毒准备不足。一个由13名医生和12名助手组成的团队按要求分成5个小组，检查工人营房和其他地方并进行彻底消毒，以此来遏制传染病传播。⁸² 乌拉尔军区司令的一项特别命令禁止红军士兵在车里雅宾斯克乘坐有轨电车，要求更加仔细地打扫军营，所有军装每周都要消毒一次，只有开水能作为饮用水。⁸³

1941年11月12日政府颁布了一项规定，要求军工企业的医疗保健中心应遵循卫生人民委员部的要求，以此对军工企业的医疗中心进行了统一监管。然而，上级对这类医疗保健中心只有非常笼统的要求。拖拉机厂附近的医院（后来是基洛夫工厂附近的医院）不仅向职工开放，也向周围城区的所有居民开放。医院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工人的患病人数，避免工伤事故，同时医生也应从健康的角度对工作场所进行检查。战争初期，肺结核、疟疾和肠道疾病的患病人数居高不下；战争期间，每1000名工人的患病人数在60—110名之间。1944年，那些被迫加班和夜间工作的年轻工人被送往医院，并额外获得了营养食品。他们得到了合

适的衣服和鞋子，工厂还发布了关于年轻人工作时间的指令。⁸⁴ 1943年夏天，3000多名儿童有机会住进斯莫利诺湖的“先锋营”和乌拉尔南部的儿童疗养院，在那里，他们可以在花园、种植园劳动，在森林里采集健康的草药和浆果，从而全面增强体质。⁸⁵

1944年4月20日，车里雅宾斯克电极厂厂长A. F. 莫科霍夫给有色金属人民委员部铝业总局的I. I. 贝特采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工厂的整体健康状况，还介绍了工厂如何根据工人的工作能力给他们分配工作。他的调查对象包括1012名工人，也包括来自古拉格劳改营的工人。其中124人是患有营养不良症的人或出现营养不良苗头，因此只能从事最轻松的劳动。39名工人的年龄超过55岁，只能从事特定的工作，31名工人的年龄不足16岁，17名工人被征用为其他工厂的司机或修理工。这意味着实际劳动力只有801人。来自古拉格劳改营的80人很难管教，31名罪犯旷工。莫科霍夫厂长要求人民委员洛马科出面干预，要向电极厂输送至少200名工人，因为这是完成生产计划的先决条件。⁸⁶

1943年冬，151师有许多伤兵在部队医院死亡，许多人不得不无棺下葬。祖本科中校要求市苏维埃加快棺材的生产，绝不能无棺下葬。⁸⁷ 但1943年7月14日的报告称，在车里雅宾斯克、兹拉托乌斯特和特罗伊茨克的一些医院中死亡的许多士兵被埋在乱葬坑中，而没有遵守这一规定。⁸⁸

乌拉尔的政治信息领域

战争期间，车里雅宾斯克的日常生活自然少不了政治活动。共产党负责宣传以及向人民提供信息。党的积极分子走遍了该州的数百家工厂和集体农庄，从战争一爆发就开始就时事发表简短演讲，并根据指导方针就与战争有关的各种主题进行了准备充分的演讲。这些主题包括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法西斯集团的崩溃趋势和盟国的实力。⁸⁹ 党员讲师包括古布尼茨基、亚克门科夫、福明和瓦尼切克，以及来自内务人民

委员部高级党校的菲拉托夫。1944年3月至6月间，约20名其他党员共讲了388次课，其中为党员授课108次，为工厂授课114次，为集体农庄授课33次，为机械拖拉机站授课33次，为铁路职工开设了47场讲座，为知识分子团体开设了10场讲座。后来，他们又增加了一些讲座，主题是苏联被占领地区的解放以及被毁城市和村庄的重建，因为车里雅宾斯克州的工厂开始向这些地方提供大量援助。⁹⁰

共产党统计了有多少人参加这些演讲，这些统计数据也很值得关注。例如，根据州委的一份报告，农村的8196场演讲和讲座共有524238名听众。另一方面，从“苏联的外交政策”系列讲座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看待国际关系史的。讲座的主题是：（1）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条件；（2）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东；（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和华盛顿会议；（4）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苏联外交政策；（5）新世界大战的两个策源地（德国和日本）；（6）1933—1934年的苏联外交政策。⁹¹

当时，党的宣传员必须向上级汇报讲座期间人们提出的问题，后来也是如此。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坦克格勒”的人对全球局势的了解有多深。1944年6月的一份报告包括以下问题——中立国瑞典、瑞士和土耳其采取了什么立场？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如何？戴高乐的军队在哪里？如何解释巴多格里奥^{*}的辞职？意大利目前有什么政府？日本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了吗？美国为何与芬兰断交？德国有很多火箭动力飞机吗？如何对付火箭动力飞机（V-1）？德国人有无线电制导坦克吗？德军在我方前线使用过火箭吗？德国的粮食资源还能支持多久？罗斯福连任总统的可能性有多大？德国人会发动化学战吗？盟军在法国北部的登陆可以称为第二战场吗？今天还有多少德军师在作战？其中有多少个师是针对苏军部署的？恩斯特·台尔曼（1933年被捕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哪里？在对德决战期间，日本是否有攻击我们的风险？德国出现

· 1943年接替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首相，后同盟军达成停火协议，1944年6月辞职。——编者

了哪些新的军事技术？

从听众提出的问题来看，他们似乎对 1944 年 7 月的国际事态发展同样感兴趣。他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发生在哪里，是如何发生的？暗杀未遂的原因是什么，之后德国的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德国战败后会有怎样的政权？能否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表现如何？如何解释中国（当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失败及其软弱无力的举措？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吗？为什么盟军在法国北部推进如此缓慢？在诺曼底作战的德军有多少个师？法国解放后，盟军是否会对法国提出领土和殖民地主张？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是否存在矛盾？战争大约何时结束？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人们对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变化以及欧洲大陆和亚洲的主要战役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对苏联媒体——中央报刊和乌拉尔地区报刊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可以重新建构出战时的信息领域。目前只能勾勒出人们知识和世界观的轮廓。可能是战时形势要求更直率和坦诚，也可能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根本无法掩盖 1941 年的灾难或 1942 年的损失，尽管军队对机密有审查机制，但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人可能在红军中有自己的信息来源。

群众体育活动

尽管战争期间工厂的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生活艰苦，但他们仍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1942 年 8 月 8 日，基洛夫工厂为员工组织了一次军事体育“斯巴达克运动会”。多年来，一直在颁发著名的 GTO 勋章。GTO 是“为工作和国防做好准备”的俄语缩写，颁发给跑步、投掷、射击和军事障碍赛表现优秀的人。每个车间都可以组一支队伍，人数不限，但只有成绩最好的十个队才能参加比赛。“斯巴达克运动会”包括以下田径项目：100 米和 1000 米（女子 500 米）、投掷手榴弹、跳高和跳远以及军事障碍赛。个人田径项目有 400 米和 5000 米（女子 100 米和 1000 米）、铁饼、铅球、三级跳远和立定跳远。工厂还组织了排球比赛，来自几个

车间的代表队参加了比赛。⁹²

1943年7月25日至29日组织了乌拉尔“斯巴达克运动会”，参赛者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莫洛托夫（后为彼尔姆）和车里雅宾斯克三个地区。车里雅宾斯克有53名参赛者，他们是在7月3日、4日的选拔赛和7月的训练营中选出的，分别是田径、体操、拳击、篮球、足球和自行车这些项目的运动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队总分获胜；车里雅宾斯克队在拳击、自行车和体操比赛中获胜，并在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队的足球比赛中获胜。⁹³

战争对高等教育的附带影响

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季，车里雅宾斯克各学院的学生被动员到各企业协助卸载撤来的机器和设备，这意味着他们错过了当年的部分教学计划。此后，考虑到战时的特殊要求，各学院都尽量开设完整的课程。1943年成立了机械技术学院，下设两个系：坦克技术系和机械技术系。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军工企业培养工程师。总体而言，车里雅宾斯克的教育与基洛夫工厂及其数百名来自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莫斯科的高素质专业人员密切相关。后来，该学院成为著名的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大学，并开设了火箭技术等高科技课程。⁹⁴

1945年南乌拉尔胜利日

1945年5月5日的早间新闻报道，柏林的纳粹德国集团军群已被红军击溃。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所有工厂、学校和机构。到处都组织了群众集会。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白班和夜班各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比往常召开得更早。同一天，仅在拖拉机厂所在城区就召开了82次会议，302名演讲人向近5万名听众发表了讲话。⁹⁵

车里雅宾斯克的胜利庆祝活动于5月9日开始，人们围着城市的扩音器彻夜不眠。凌晨4时15分，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被直

布为公众假期。人们很快开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头。从清晨到傍晚，各地的工厂都举行了庆祝胜利的集会。⁹⁶ 在车里雅宾斯克，来自全市各区的 25 万人在下午聚集在一起，参加四年来的第一次游行。5 月 13 日，战后第一个周末，盛大的胜利庆典以群众游行拉开帷幕。城市的广场和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管弦乐队在全城演奏舞曲。人们在户外剧院跳舞或看电影，直到第二天深夜。历经 1418 天，后方的“战争”结束了。

НОВАЯ ПЯТИЛЕТКА-ПЯТИЛЕТКА ВЕЛИКОМ СТРОИКИ



图98 妮娜·瓦托丽娜1948年的海报展示了“二战”后的重建情况以及纳粹占领苏联大片地区造成的破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一个拥有宏伟建筑工地的五年计划。让我们在1946—1950年间修建、重建5900家企业！”

第九章 冷战时期车里雅宾斯克的新型军工综合体

冷战初期，车里雅宾斯克是一座典型的苏联工业城市，有几所新的理工高校。机械和冶金专家的培养与当地军工厂紧密相关。该市主要是大型冶金和机械制造工厂，这些工厂大部分或全部属于军工综合体。1943年成立了一所名为机械技术学院的院校（后更名为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该学院下设两个系：一个是坦克技术系，另一个是机械技术系。1945年，坦克设计师尼古拉·杜霍夫因贡献突出获得了新的奖项，晋升为工兵少将。自1943年后，杜霍夫一直在该学院任教，该学院也为培养坦克工业的人才打下了基础。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的最优秀学生毕业后都分配到军工企业担任工程师。¹

“坦克格勒”位于车里雅宾斯克东部，是一个以拖拉机厂为中心的庞大综合体，附近的机械厂是它的供应方。在长长的列宁大街（早先叫斯巴达克斯大街）的尽头，竖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苏联原子弹之父之一、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20世纪40年代，库尔恰托夫和核物理学家们曾在附近封闭的“原子城”奥焦尔斯克（早先称为“车里雅宾斯克-40”）和马雅克钚工厂工作。通过“坦克格勒”和“原子城”这两座城市，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战后发展的万花筒图景。在南乌拉尔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有几个有利因素。

战后，工作节奏恢复正常，重建需求巨大。公众并不确切知道有多



图 99 位于车里雅宾斯克的理工学院（20 世纪 50 年代的照片）

少人死于战争，但战争造成的人口创伤随处可见。战后几年，妇女在集体农庄中的比例大幅上升。无数男人带着永久的伤痕从战场归来，只能找些轻松的工作做。然而，人们坚信，人民会完成新的重建任务。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经济备战计划似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全面认可。如果没有为全面战争所做的周密准备，1941—1942 年苏联几乎不可能实现工业的民用转军用。由于缺乏训练和斯大林大清洗中干部的流失，战场上的一些胜利可能是以过高的代价换来的。然而，苏联在 1941 年经受住了未曾预料的影响和灾难的考验，这一事实使计划制定者和政治领导层相信，现在有些方面必须优先考虑，就像战前一样。

军民结合的拖拉机厂最初打算生产履带式拖拉机，而非轮式拖拉机。苏联工业普遍的备战特点和计划性使苏联经受住了对德战争的考验。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对日本城市使用了原子弹，这给军民计划

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个特殊的例子可以说明经济备战理论如何在“二战”后的苏联实践中得以应用。苏联在冷战期间进行了军备重整，但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军备重整。根据1949年的动员计划，车里雅宾斯克制药厂的生产设施应该具备生产烟雾和气体保护装置的能力。根据一项检查结果，工厂已经计算出了战争情况下所需的原材料数量，并完成了所有图纸和技术文件。然而，这些原材料的必要储存却不足，许多已交付的机器存放在单独的车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损坏的风险。仓库总面积为1250平方米，至少还需要1150平方米。这次检查显示，之所以没有预先做好动员准备，是因为医疗行业企业中没有一个人负责军用物资的生产。此后，苏联粮食与物资储备部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负责人列出了一系列紧急措施。²

在理论核物理领域，苏联科学家与世界顶尖科学家水平不相上下。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并没有为研制原子弹做出实际努力；研制原子弹的成本似乎过高，甚至无法确定是否有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引爆原子弹——从而影响正在进行的战争。然而，当斯大林从苏联情报部门得到有关英美核项目的信息时，他为加快原子弹研究开了绿灯。当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证明了这种武器的威力后，苏联决定集中力量推进原子弹研究。一个研究中心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阿尔扎马斯-16（一座叫萨罗夫的城市）。另一个中心离车里雅宾斯克不远，该中心被命名为“车里雅宾斯克-40”，在那里还建造了一个钚反应堆。核计划相关的其他基地都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偏远地区，处于高度机密状态。这些城市与外界隔绝，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人都受到特别的限制。³

战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重新改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工厂面临很多转型方面的问题。工厂的多少产能继续用来生产坦克？拖拉机生产应占工厂产能的多少？与其他工厂之间应如何分工？⁴

战后转型要求工厂重新开始生产农业拖拉机，同时也继续生产坦克。⁵工厂计划每天生产50台S-80拖拉机和5辆IS-3重型坦克，也生产V-11发动机、这些车辆的备件以及1941年之前一直生产的S-60和S-65拖拉机。这意味着每年要生产15600台拖拉机和1560辆重型坦克。⁶

拖拉机厂厂长扎尔茨曼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重建期间拖拉机厂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他在信中写道：“考虑到我肩负重任，须完成对国家如此重要的1948年重型坦克计划，我不得不直接向您求助，请求您就部长会议今年4月5日第1116-399s号决议做出指示，即必须尽快为基洛夫工厂提供支持。”

工厂的1948年计划包括生产16500台S-80拖拉机，几乎是1947年产量的两倍。该年第三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为64台，第四季度为76台。这远远超出了工厂预计的每天50台拖拉机的生产能力。拖拉机厂订购的164台新设备，只交付了49台。此外，扎尔茨曼还要求再提供228台特殊设备和110台通用设备。部长会议下属建筑局只完成了年度计划的五分之一。由于没有像样的住房，无法雇用更多的人员，合格工人也十分缺乏。扎尔茨曼强调说：“企业竭力利用所有内部资源。为了在继续生产的同时扩大产能，我们对车间进行了全面改造，搬来了400多台机器。生产部门调来了700多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引进新技术，努力提高生产率。几乎所有工人都在加班。仪表车间、维修车间和其他车间都被用来生产拖拉机的零部件。”

在1948年10月18日关于“改进工厂生产措施”的指令中，扎尔茨曼要求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应被监工和其他生产负责人事无巨细地管控”。行政化程度应该降低，会议次数应该减少，每个生产部门都应该有更多的能干员工负责每个车间。厂长指令的数量应减少，应更加重视检查指令的执行情况。扎尔茨曼还指出，应在今年第四季度为300名车间领班和700名工人组织培训课程。他还对工厂的住房条件和食堂提出了要求。⁷

战争结束后，经过第一次改装，车里雅宾斯克工厂生产出了S-80履

带式拖拉机，该车辆还可用作火炮牵引车。此外，工厂还在生产 V-11 和 V-12 坦克柴油发动机以及所有产品的配件。与此同时，还研制了一种新型 S-64 履带式拖拉机，既可民用，也可军用。IS-4 坦克的研制工作仍在继续，该坦克曾被苏联军队送去测试；首次试车结果表明坦克设计是失败的。⁸ 1948 年，工厂重新开始生产 IS-4 坦克。负责交通运输的部长伊万·诺森科批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坦克存在若干缺陷。1949 年 2 月，扎尔茨曼接到命令，停止生产并改进所有存在缺陷的部件。扎尔茨曼与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总设计师科廷一起，根据陆军装甲部队的技术和战术规范，开发了一种新的重型牵引车。⁹ 因此，仅有少量 IS-4 坦克被生产并得到苏联军队认可。这种坦克的图纸被列入备战储备，所有精力都集中在 50 吨级的 IS-5 重型坦克上。¹⁰

战后，约瑟夫·科廷回到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指导生产 IS-4 坦克（1947 年起）、PT-76 水陆两栖坦克和一些其他军用运输车辆。科廷在工程兵部队中获得了上校军衔，并因其在战争中的功绩获得了许多勋章和奖章。他在一些针对特定群体的演讲和高度机密的文章中总结了在战场上与德国坦克对抗的经验，并为苏联坦克工业的未来发展设定了广阔的路线。¹¹

IS-8 重型坦克被重新命名为 T-10，它进一步发扬了 IS-3 坦克的优



图 100 机械拖拉机站是农业机械园的正式所有者



图 101 S-80 履带式拖拉机是应用广泛的新一代拖拉机

点。尽管 IS-3 装甲防护能力强、速度快、火炮威力大，但由于指挥官视野有限，它的性能无法完全发挥出来。T-10 坦克的底盘结构与前代坦克相同，但前部装甲厚 120 毫米，两侧装甲厚 80 毫米，炮塔装甲厚 220 毫米，总重量只有 50 吨，而且直到 1995 年仍在使用。¹²

当务之急是改善车里雅宾斯克大型工厂的废物净化。长期以来，拖拉机厂、钢铁厂、奥尔忠尼启则机械制造厂、硫酸厂和镍厂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都直接倾倒入米阿斯河。化学品和酚类物质的排放不仅有卫生隐患，还使米阿斯河无法作为乌拉尔南部的淡水储备。¹³

在战争年代，人们不太关注坦克从工厂到试验场和发射场的运输问题。1945 年 7 月，市执行委员会就哪些道路可用于重型交通发出指示，防止路面被破坏和铁路道口被毁。¹⁴

劳动力情况

人们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为返回的复员军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截至1946年2月，已有8005名复员人员返回车里雅宾斯克，其中包括3908名士兵、3504名士官和588名指挥官。政府收到了大量问询，涉及3863个有一名或数名复员人员的家庭，3333个有成员在战争中死亡的家庭，2469个有近亲伤残的家庭和1686个仍有一名成员在苏军服役的家庭。大多数问题涉及住房或公寓的变动，以及新衣服（6020件）或鞋子（3745双）的申请。这些家庭获得了燃料（木炭或木柴）、住房、现金补助或食品以及基本的公用设施。

列宁格勒人希望尽快回家。他们甚至威胁说，除非告知何时开始返程，否则就要罢工。拖拉机厂党委的一份秘密报告提到，工人中流传着关于新法律的谣言，该法律将赋予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工厂的权利。也有其他传言，理由是管理层提出要改善住房条件，增加生活补助，这被解读为：工人们将被“绑定”在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厂。虽然某些地方缺少宿舍，但在战争条件下没有人抱怨。许多人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回来，几乎不关心这些地方有多需要维修。然而，战争结束后，因为宿舍条件差、缺少娱乐设施和存在其他问题的投诉数量却增加了。¹⁵

许多有家庭和孩子的工人不得不住在公用房间里，可能只有一个角落是他们自己的。工人的妻子往往想去工厂找工作，但又不敢把自己的东西留在宿舍里。¹⁶有很多被疏散的工人及其家人作为租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当士兵返回时，他们才知道必须离开自己的公寓。有些工人甚至住在谷仓里。1945年夏天，为了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在车里雅宾斯克4.5万名员工中占3万人）解释为什么还需要他们留在车里雅宾斯克，召开了多次会议。¹⁷工厂承诺，那些同意留在车里雅宾斯克工厂的工人将拥有自己的公寓。然而，许多领班在提出这一激励措施时犹豫不决，因为他们知道管理层不可能履行这些承诺。

到1945年夏天，乌拉尔地区的10个战俘营中共关押有约25万名战俘。1944年12月16日和29日，国防委员会规定，将德国平民作为苏联企业的劳动力来关押是合法的。隶属于关键领域人民委员部的企业将接收约14万名被关押的德国人。根据1945年2月3日国防委员会的一项法

令，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以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逮捕和关押所有 17—50 岁身体健康的德国男子，并将他们送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俘营和劳改营。¹⁸ 由于战后苏联人手不足，因此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拖拉机厂更多地使用战俘和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苏联内务部^{*}在拖拉机厂内组织了一个劳改营。然而，由于 2000 名囚犯的住宿已经极为拥挤，内务部无法满足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提出的再将 1000 名囚犯转移到车里雅宾斯克的要求，直到工厂管理层为他们建造出更多的营房。¹⁹

1948 年春，扎尔茨曼要求将被遣返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俘换成其他战俘或古拉格囚犯。定期从职业学校招募青年只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一小部分。内务部拒绝向车里雅宾斯克输送更多战俘，但古拉格囚犯的人数被批准增加到 3900 人，条件是工厂必须保证为他们提供足够大的生活区。该部还准备用更健康的战俘来交换无法工作的精疲力竭的战俘。在 1948 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扎尔茨曼写信给贝利亚，请求将更多的囚犯送往工厂；得到的答复是，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的古拉格劳改营共有 5500 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容纳 3425 名囚犯，其中只有 2740 人经常在工厂工作。其他的囚犯则因身体虚弱或饥饿而无法工作。每个囚犯的平均居住面积为 1.6 平方米，低于规定的 2 平方米，因此内务部要求扎尔茨曼修建更多的营房，以容纳要求新增的 2125 名囚犯。车里雅宾斯克内务系统也缺乏必要的资源，无法为三班倒的战俘提供足够的警卫。²⁰

1949 年，5593 名受雇于运输机械制造部^{**}的德国战俘将被释放（第一季度释放 1237 人，第二季度释放 1516 人，第三季度释放 1380 人，第四季度释放 1460 人）。除了临时用作德军战俘住所的校舍外，所有营地建筑物和特殊医院都将交给内务部，内务部将把适合工作的古拉格囚犯安置到以前使用过德国战俘的企业中。从 1949 年开始，劳动后备部系统地培训年轻人从事这些职业并进入相关企业。²¹

* 1946 年 3 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称内务部。——编者

** 前身即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编者

截至 1949 年 4 月 10 日在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的特别战俘

1. 第 3 号劳改营的强迫劳动囚犯被用于从事以下类型的工作：

冶金车间	1460
在铁路车间仓库装卸货物	505
工厂维修工作	65
工厂重建单位的建筑和锯木工作	49
古拉格囚犯总数	2079

2. 来自第 2 号营地的战俘：

拖拉机生产车间	796
复制和制作木制模型	121
发动机结构	36
维修车间	109
装配和建筑	23
维修和保养	216
装卸	54
战俘总数	1355

资料来源：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R-792, op. 16, d. 90, l. 32-33。在 10 月 24 日的一份报告中，副厂长萨夫罗诺夫提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雇用了 2045 名战俘。其在各车间的分布情况与上述情况基本相同。

住房条件

战时工厂的撤离意味着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城市总体规划已不再适用。1946 年 1 月 16 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车里雅宾斯克市住宅和公共建筑、文化和福利活动”的法令，其中包括城市建筑指导方针。建筑委员会将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建制订新的长期计划，并为未来几年提出更详细的短期计划。城市将铺设相当于 11000 平方米的路面或沥青路



图 102 拖拉机厂的青年工人娱乐室

面，铺设 9000 条沥青小路，安装电灯，并在街道两旁种植 60000 棵树，还将在米阿斯河和城市马戏团旁新建两个公园。总体而言，政府接上级命令，开展大规模的战后清理工作，并对车里雅宾斯克周围的沼泽地进行排水和开垦。²²

与 20 世纪 30 年代相比，战后的居住空间更加紧缺，甚至大型军工企业的员工也是如此。这些工厂的数据表明，国防领域以外的情况可能更糟。然而，由于建筑资源都投到了车里雅宾斯克州的新原子弹制造厂，战后住房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 8 以数据说明了军工企业的居住条件。²³

扎尔茨曼厂长经常要求莫斯科提供更多的预算资金，以缓解这种状况。自 1940 年以来，拖拉机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了 2 倍多，车间面积增加了 1.6 倍，员工人数增加了 1.9 倍，但总居住面积只增加了 1.32 倍。1948 年 11 月，有 33193 人的居住条件不达标，占工厂总人数的 44%；5054

表 8

车里雅宾斯克市职工的住房条件

工厂	单位：人					
	家庭居住条件不佳的员工	地窝子	营房	地下室和走廊	其他居住条件不佳的人	居住条件适宜的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	25300	9000	9900	5700	700	45700
200 厂	3962	—	2500	51	1402	2954
255 厂	1635	—	1635	—	—	—
乌拉尔斯大林汽车厂	2658	—	2658	—	—	5429
78 厂	8351	—	8333	18	—	10149
114 厂	3401	—	2531	26	841	831
259 厂	1214	—	1173	36	—	4299
66 厂	5171	—	2171	—	3000	7199

人仍住在 1930 年建造、多年前就应拆除的营房里，3130 人住在地下室，1 万多人住在各种附属建筑里，1677 人住在俱乐部和洗衣店的小房间，近 9000 人住在自己挖的地窝子里。在 1949 年的建筑计划中，部长会议仅为总面积为 11000 平方米的新住宅提供了预算资金。扎尔茨曼要求在 1949 年及以后几年至少建造 2.5 万至 3 万平方米的住房，这样才能解决最严峻的住房问题。他的主要理由是，“工厂的生产能力与居住条件严重不相称”，导致无法招聘到合格的长期工人。²⁴

战后不久，13000 多名工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住在两层木板床的宿舍或破旧的房屋、营房里。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1.5—2 平方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情况略有改善。他们搬进了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宿舍，人均居住面积至少为 4.5—5 平方米，一个房间不超过 6 人。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只有 6000 名较年轻的工人仍住在较差的宿舍里。

为了避免工厂工人花两三个小时寻找面包和其他商品，扎尔茨曼向运输机械制造部部长伊万·诺森科和副部长莫辛提出请求，希望允许在工厂食堂销售面包和食品，即工厂能从市贸易局接管这项工作。²⁵

战后的情况令人绝望，一方面是因为 1939 年前建造的房屋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的人口导致住房需求急剧增加。20%—80% 的军工企业从业人员都需要新的住房，而那些优先级低于国防工业的企业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在战后的头 10 年，各工厂都获得了预算补贴，用于建造新房。然而，由于建筑材料匮乏或仍须抓紧生产，许多计划都未能实现。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大量资源被用于建设“原子城”及其特定的基础设施和高度安全的管理体制。

“坦克之王”职业生涯的终结

1949 年 7 月 11 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解除扎尔茨曼的职务，他的职业生涯就此戛然而止。官方的理由是他对员工的态度粗暴、无礼，不配为一名党员，还说他未能在战后三年里领导好工厂。²⁶ 这暗指地方党委在

1946年提出的批评，即扎尔茨曼延续了战时常见的严厉作风。1946年，扎尔茨曼因其生硬、专横的作风，以及使用脏话和威胁的工作方式受到地方党委的批评。然而，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理由，缺乏实际说服力。事实上，扎尔茨曼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尤其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坦率直言的领导风格。他从不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而且在1943年条件允许时，他就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预留了资金。²⁷

扎尔茨曼被撤职的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他拒绝揭发他在列宁格勒的前同事，这些人是战后第一次大清洗的目标。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在“列宁格勒事件”中被捕，据称是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有不当行为，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与列宁格勒的“独立团体”斗争的结果。由于拒绝揭发被捕的党员，扎尔茨曼被指控回护“人民公敌”。他被解除了拖拉机厂厂长的职务，但没有被开除党籍。他没有正式降级，依然保留了将军军衔，还保留了三枚列宁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劳动英雄勋章。据说斯大林曾问扎尔茨曼是如何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当斯大林得知扎尔茨曼最初是车间监工时，他惊叫道：“那就把他送到某个能当监工的地方去！”扎尔茨曼被派往穆罗姆市（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一家小企业。那里的经理们很快就意识到，被降职的扎尔茨曼是个累赘，是个藏不住的人物。扎尔茨曼被工人们称为“坦克格勒”战时成功背后的传奇人物，工人们会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在游行和集会时，他总是佩戴着自己所有的勋章和奖章。自然，酒馆里的人对扎尔茨曼的关注超过了对小城地方领导层的关注。

他没有接到任何与他的能力相符的任务，很快就被调到了奥廖尔的一家机械制造企业。1955年，对他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销，他得以返回列宁格勒，并被任命为基洛夫工厂下属的一家新实验厂的厂长。扎尔茨曼再也没有回到车里雅宾斯克。在1955年、1960年、1965年和其后的胜利日周年庆典上，苏共和拖拉机厂都没有邀请他，也没有纪念他的功绩，尽管很少有人能像扎尔茨曼一样，称自己为战胜纳粹德国做出了重大贡献。1984年，共产党党刊《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篇扎尔茨曼的文章，题

为《铭记坦克格勒的教训》。²⁸ 扎尔茨曼一直精力充沛，致力于新型坦克的开发，直到1988年7月17日去世。²⁹ 最终，工厂在厂门口附近为他竖立了一块纪念碑。

战后车里雅宾斯克的青年抗议活动

苏联人民的心态在“二战”期间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战争期间士兵在前线的经历与战前他们的平民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现在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与20世纪30年代按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社会建设的那一代人相比，退伍士兵表现出了他们的性格、自信和责任感。这些新的行事风格经常车里雅宾斯克市内和周边地区的会议上体现出来。他们向讲师们提出的有关战后发展和西欧状况的问题体现了一种相对开放和批判性的态度。³⁰ 正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报刊和会议上会讨论物质需求、技术失误和社会问题。车里雅宾斯克战后还开展了几次运动来扩大城市文化娱乐。工厂组建了足球和冰球等热门运动的运动队。

在此期间，扎尔茨曼发起成立了拖拉机厂冰球队，并在附近修建了一座冬季体育场。20世纪40年代末，拖拉机厂建造了全市最大的体育馆。夏季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是足球、排球和田径，冬季则是滑雪。夏天，工厂会组织大批工人及其家属到附近的湖泊和山区短途旅行。每周六，文化娱乐公园都会为年轻人举办主题晚会，包括讲座、业余戏剧表演、运动员表演以及古典和舞蹈管弦乐队的音乐会。³¹

扎尔茨曼担任拖拉机厂厂长期间，还在斯莫利诺湖畔建造了避暑别墅和寄宿公寓。战后，“基洛维兹”电影院建成，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剧院也建了新的礼堂。扎尔茨曼还支持在拖拉机制造区（今天称为捷列什科娃公园，以第一位女宇航员的名字命名）建造艺术家工作室和音乐工作室以及儿童公园。³²

如果对比西方对苏联制度的描述，其实参与工厂党组织的意识形态活

动的人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在拖拉机厂的工人和青年中，参与党史学习小组、党内积极分子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聚会的比例不高。另一方面，共产党是工厂文化宫所有活动的组织者。共产党对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之外的任何独立组织的建立都有最终决定权。车里雅宾斯克师范学院的学生办了一份报纸《学生》，内容只有诗歌和散文，但很快就被查封了。³³ 因此，四名学生——佩列列斯基、索罗金、列维茨基和布鲁克决定办一份地下通讯，他们称之为《雪酒》。虽然他们使用了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美学，但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认为该刊物只是“反苏政治宣传”。《雪酒》只出了两期，其中有几页空白，读者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评论。档案馆保存的几份《雪酒》中有对出版该杂志的“浪漫主义者”的负面评论。

根据臭名昭著的“第 58 条”，该刊物的编辑因“散布反苏宣传”而受到谴责，并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和劳改营刑期。³⁴

学习小组的学生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观点。他们将



图 103 位于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的文化宫在 20 世纪 50 年代拥有 800 多个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俱乐部

官方宣传中的描述与他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况进行对比，尤其是在 1946 年的严重饥饿时期，就连城市里也有家庭在挨饿。车里雅宾斯克的警察发现了一群青少年——七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制作了写有“打倒政府！”的传单，并将其贴在房屋的墙壁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青年团体成员被重判 10—25 年的古拉格监禁。三名莫斯科学生甚至被判处死刑。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政府尽量不公开这些事件，只能从预审和法庭记录中进行分析。

在车里雅宾斯克，警察发现了一个由 I. S. 迪纳堡、G. F. 肯奇克和 G. I. 邦达列夫领导的学生团体，他们自称为“理想主义共产主义青年”。他们被指控组织反苏集会，对抗现有秩序。然而，法庭判决中的术语是否反映了这些集会的实际讨论情况以及他们实际辩论的内容，这一点令人怀疑。内务系统长期以来就有捏造记录的传统，因此判决书中的内容是不可靠的。这一描述仅以内务部选择复制的记录和摘要为依据。邦达列夫等人在审讯中说，“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缺乏思想。党奉行的是不正确的路线，因为工人阶级基本上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可见，学生中的失望往往是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术语表达的。根据秘密警察的调查，该组织的信条为“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已被市侩的精神所污染。党和国家机构中的领导集团构成了苏联新的统治阶级，无情地剥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要夺回政权，就必须实现革命性的飞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正在提出一种理论，并寻找实施这种理论的方法。我们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这三个学生和他们在车里雅宾斯克能源技术学院的亲属邦达列娃、吉尔维迪斯因参与该讨论小组的活动而被判刑。当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青年团体成员被捕，显然是出于“预防目的”，从而阻止其他人进行独立思考 and 开展不受官方控制的活动。

历史学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强调，很难描述苏联境内这些自发形成的青年团体。一方面，秘密警察高层只记录了几个判例和审议情况，另一方面，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和谣言。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为，这并非



图 104 体操

因为青年组织有政治野心；这些组织被赋予政治意义，只是因为当局不会容忍任何独立的活动。³⁵ 学生们使用的术语表明，他们主要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问题，讨论了所宣称的目标与城市实际情况之间的明显矛盾。³⁶

车里雅宾斯克州封闭的“原子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拉尔作为国防工业中心的重要性和潜力已显而易见。从战争中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苏联将其重工业基地设在乌拉尔地区，远离敌方陆空军的攻击方向，具有地缘战略优势。在常规武器方面，乌拉尔地区工业的地位毋庸置疑。这种情况随着火箭技术和新型原子武器的发展才有所改变。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在最坏的核战争情况下，整座城市都可能被一举毁灭。苏联甚至通过在地下建造新工

厂来应对这种威胁，尽管成本极高。与战争期间在车里雅宾斯克建造钢铁厂时的情况一样，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也参与了奥焦尔斯克钚工厂的部分建设工作。其他建筑工程则由苏军正规建设营完成。³⁷

因此，在战争期间，车里雅宾斯克市和附近的乌拉尔封闭城市就具备了建立高科技军事工业单位的先决条件。苏联核计划的重要部分位于附近的奥焦尔斯克、斯涅任斯克*和特列赫戈尔诺耶市，而火箭生产则位于米阿斯市。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的教育和研究也与军事工业有关。³⁸

即使与其他苏联企业相比，距离车里雅宾斯克几十公里的封闭城市也处于极度保密中。核计划的两个中心相距甚远——阿尔扎马斯-16和车里雅宾斯克-40，而它们的研究和实验进程是相互协调的。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建在车里雅宾斯克-40，用于生产武器级钚。整个苏联核计划由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1903—1960）领导，他长期居住在车里雅宾斯克-40，并最终负责设计了苏联第一批原子弹。尽管苏联原子科学家对如何制造这种武器有自己的想法，但最高层——斯大林——决定，第一颗原子弹必须是美国原子弹的复制品。因此，库尔恰托夫有特权查阅苏联有关美国核计划的所有情报资料。这些材料极其重要，但如果没有能与之匹配的、最先进的物理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苏联人就无法解读情报文件。通过解读情报资料，苏联人在几年内就能试验自己的原子弹，而不会面临处于战略劣势的风险。

1949年8月，一列专列在其他军用列车的前后护送下驶离车里雅宾斯克-40。它一路绿灯，开往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被引爆。苏联当局没有宣布爆炸成功，只是在美国监测站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境内放射性辐射增强后，才宣布这一消息。苏联承认自己进行了原子弹试验。苏联成功研制出这种高科技武器的时间远远早于美国政府专家的预期，这一发展打乱了美国在冷战第一阶段的战略规划。然而，美国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意识到他们先对苏联

* 即车里雅宾斯克-70。——编者



图 105 20 世纪 50 年代乌韦利斯基文化宫的舞蹈



图 106 1950 年 7 月米阿斯的矿工在斯德哥尔摩反对核武器请愿书上签名



图 107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苏联“原子弹之父”之一，车里雅宾斯克-40 核反应堆的总设计师

经济的哪些假设导致了这些错误的预测。

尼古拉·杜霍夫不仅是坦克设计师，1948 年他还被任命为阿尔扎马斯-16 的 KB-11 设计局总设计师。他在核计划中的确切角色尚未解密。他后来被任命为一家最负盛名的飞机自动化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和副所长，这也体现了他的成功。1964 年 5 月 5 日，他在莫斯科死于严重的辐射伤。³⁹

就该地区是如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冷战期间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军工综合体的，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米阿斯建起了火箭工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以潜艇为基础的导弹设计局。事实上，直到最近才在档案中发现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是核武器工业的分包企业。⁴⁰

后来，车里雅宾斯克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该市的技术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不断扩大，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全国最负盛名的科研机构，并与军工企业建立了联系。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种多维交织的方式来想象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看到“坦克格勒”从一个高度集中的、充满活力的、复杂的工业基地到典型的苏联工业城市的演变过程。20世纪40年代，“坦克格勒”周边的营房和棚户区为城市居民和从战区疏散的工人提供了每天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20世纪50年代，这里建起了五层楼房，60年代建了更舒适的多层楼房，最严峻的住房匮乏问题得到了解决。

今天，到车里雅宾斯克的游客仍然可以看到苏联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美好景象，比如三个50米长的游泳池，一小时的游泳票很快便一售而空。冬天，人们可以在休闲和文化公园以较低的价格租用滑雪板。除了与西方相媲美的电影院外，还有传统的戏剧院、歌剧院和儿童剧院上演传统剧目。市中心的革命广场因不再举行游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挖开，建造了面向大众的地下商场。附近还为新贵们开设了出售欧洲著名品牌的高级精品店，这些新贵通常会预约单独购物。基洛夫大街曾经是一条压抑、嘈杂和肮脏的街道，如今已被改造成一条步行街，其20世纪上半叶的建筑已被列为历史遗迹。即使是近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有许多开放和渴望解决例子。米阿斯河附近的一座超现代化建筑中有一座新的历史博物馆，馆内有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全面展现了这一地区各方面的历史。



图 108 “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吗？”

第十章 今日车里雅宾斯克的历史记忆与研究

1918年6月，车里雅宾斯克的局部冲突点燃了俄国内战的战火。一年后，红军与西伯利亚白军之间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从20世纪30年代起，车里雅宾斯克生产的拖拉机在苏联各地集体农庄的劳动机械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城市被称为“坦克格勒”。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作战军队与后方的密切联系。以上只是车里雅宾斯克作为苏联工业城市在20世纪发挥核心作用的几个历史节点。然而，从车里雅宾斯克人的角度来看，历史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而且更加多面化。在强制工业化时期，来自苏联各地的人来到车里雅宾斯克居住。有些人只住了几年，有些家庭则几代人都居住在这里。

在1941—1945年的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从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城市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与此同时，很多工厂也从苏联欧洲部分靠近前线的地区转移到这里。战争结束后，许多被疏散的人选择留在车里雅宾斯克和周边地区。然而，被派去建造钢铁厂的德裔苏联人却别无选择，只能留在车里雅宾斯克，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的公民权利才得以恢复。他们作为“特殊定居者”住在冶金城市，那里的房屋和企业都是他们自己建造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苏联人都必须接受他们从高校毕业后被分配的工作。

族群动态的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车里雅宾斯克与其他苏联城市有



图 109 基洛夫大街上 I. 格洛夫尼茨基创作的坦克兵雕像——“献给志愿坦克兵”

相似之处，都是背景迥异的人的“大熔炉”；因此，研究和分析这段社会和经济历史一直是该市和该州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广场和公园里有 multiple 纪念碑，以缅怀 1941—1945 年卫国战争的战士们。无名战士墓位于邮政总局和科姆纳街之间的广场上。“坦克兵”雕像位于几米外的同一广场上，上有碑文，致敬那些 1942—1945 年在装甲师中作战的车里雅宾斯克人民。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志愿军隶属于第 62 乌拉尔装甲军，该军在 1943 年夏季激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首次经历了炮火洗礼，随后解放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1944 年，该军参加了解放利沃夫的战役，并于 1945 年 4 月下旬抵达战斗阵地，为攻占波茨坦，进而对柏林发起最后的进攻而战。在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另一区域的共青团广场上，一辆战争期间生产的最后一批 IS-3 坦克被放置在一个基座上，基座上刻有纪念后方英雄的碑文。

当然，在俄罗斯的集体记忆中，1941—1945 年间抵御纳粹德国、意

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战争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现代历史中，没有多少话题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近些年引起如此激烈的讨论。不仅整个俄罗斯是这样，车里雅宾斯克也是如此。近年来，新的资料展现了车里雅宾斯克州是如何受到苏德战争的间接影响的。档案管理员收集了该州 15 万以上阵亡士兵的资料，并将其列入殉难者名录。这个数字应与 20 世纪 30 年代末该州略少于 300 万的人口进行对比。

不仅斯大林主义在苏联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痕迹，而且战争时期的苦难留下了更为深刻的痕迹。这一点在西方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不言而喻，“二战”历史，无论是与德国国防军的战斗还是后方的斗争，在学校课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与德国在西线的战役相比，对苏联部分地区的占领是德国更大规模的灭绝战争计划的一部分，它不仅针对所有苏联犹太人，甚至还针对其他平民。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包括消灭所有苏联犹太人，也包括大规模枪杀共产党员，以及有计划地通过饥饿和其他手段消灭数百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¹

在经济改革和自由化之前，苏联一直是一个“封闭社会”。在车里雅宾斯克——“坦克格勒”以及后来的“原子城”——这种封闭性被视为应对冷战时期军事和战略挑战的基础。不过，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苏联的历史和经济文献确实展现了苏联工业某些方面的面貌，但仍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因此西方就苏联的军工综合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²

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段历史也同样模糊不清，尤其是因为人们对官方史学失去了信任。国家的当代史多次被改写，显然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领导层。新当选的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可能希望通过当代史上的“空白点”进行认真讨论来加强既有体制。然而，“公开性”政策期间大量关于苏联人民悲惨遭遇的出版物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和许多教师根本不愿意讨论以前的禁忌事件，更不用说就相关主题进行写作和教学了。《车里雅宾斯克工人报》和《车里雅宾斯克晚报》的记者们首先尝试澄清这段历史。这些报纸刊登了大量文章，介绍在斯大林大清洗活动中沦为受害者，近期得到平反的党员、

专家和工人的命运，还刊登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去富农化运动中遭遇苦难的普通人的名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举行的历史学家会议和教师研讨会上，人们认真探讨，努力使历史不再遗漏和歪曲，也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确立了新的原则。不仅苏联的国家档案馆和政党档案馆向研究人员开放了馆藏，而且现在印刷的资料也使普通读者能够查阅过去甚至对苏联社会精英都不公开的文件，使读者能了解到俄罗斯当代历史的很多方面。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车里雅宾斯克的学者们研究了内战期间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农村的强制集体化、去富农化以及在该地区为失地的农民建立特殊定居点等问题，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共产党的强制性宣传论调。伊戈尔·纳尔斯基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乌拉尔地区的农民是如何在政权几经更迭的情况下应对和度过内战的艰难困苦的。⁴亚历山大·巴扎罗夫的作品也提到了这点。⁵塔季扬娜·斯拉夫科分析了乌拉尔地区征用和驱逐富农的各个阶段。⁶维克多·基里洛夫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乌拉尔中部和北部地区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镇压浪潮，此后他又撰写了多部相关专著，并启动了一项联合数据库计划，整合了俄罗斯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⁷费尔德曼从广泛的比较视角分析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业化与俄国早期的联系、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与之前倾向于宣扬成功故事的历史研究作品相比，他对实际进展的评估和对强制工业化人力成本的分析都是依据新解密的档案资料。⁸2004 年，该市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主要目标是“以现代性和现代化范式解释俄罗斯历史”。⁹

车里雅宾斯克与俄罗斯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在苏联解体后的头几年，公众对历史问题的兴趣特别高。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经历了一个危机时期，他们不能再按照旧的范式进行教学或研究，但还没有找到对俄罗斯现代史进行其他解释的新的、坚实的基础。他们努力建立新的、可靠的信息来源来评价这段历史，主要是通过寻找可靠的文献或可信的证人。人们普遍对新的叙事持怀疑态度，也质疑那些过分强调书面文件或口头记录的历史资料，因为这样的资料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给出自己的

解释和结论。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也编纂了一套类似的历史文献资料，这至少能为重新研究现代历史提供坚实的基础。¹⁰他们还出版了一本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资料集，为我们了解档案馆本身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¹¹

车里雅宾斯克州的历史学最初聚焦研究的是被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称为“历史空白点”的尚未触及的课题。其中首次研究的课题是 20 世纪 30 年代强迫劳动在工业化和工厂建设中的作用。被驱逐的富农生活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半地洞或营房中。这些事实对老一代车里雅宾斯克人来说可能印象深刻，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些资料才载入史册。关于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德裔苏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冶金区的居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德国人，然而，没有人写过他们的故事：他们是如何被驱逐出境的，“二战”期间他们又是如何在战时纪律的约束下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国防工业中工作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记者和宣传人员就这些主题和很多其他主题撰写



图 110 车里雅宾斯克历史博物馆于 2006 年落成

了大量文章。该市报纸刊登了一系列 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压迫受害者的名单。有时也会包含一个人的生平故事。这些调研逐渐在历史学家中引发了新的讨论。¹² 然而，在苏联历史的其他主题上，人们对增长率和发展的长期模式已形成了共识。苏联不可否认的成功历史似乎是依靠 20 世纪 20 年代后的精英和大众教育的结合。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人普遍认为，苏联航天计划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其无所不包的学校系统。苏联的福利制度也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和社会自由模式有相似之处。¹³

关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历史，苏联时期仅以通俗编年史的形式描述过。虽然书中有大量细节，但由于没有任何脚注参考，无法确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的。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书的主要作者列昂纳德·科马洛夫出版了一本关于拖拉机厂的新书《俄罗斯没有坦克》（*Russia Had no Tanks*）。事实证明，此前那本书遗漏或因审查删除了该工厂历史上的许多阴暗面。在新书中，他不仅深入研究了 1937—1938 年大清洗的影响，而且更真实地描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和战争年代的生产条件。¹⁴ 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沃肖洛夫和维塔利·托尔斯蒂科夫都曾在斯涅任斯克封闭的“原子城”生活过，他们撰写了数本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核计划的内容翔实的著作。他们还根据档案文件描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原子城”发生的严重事故。¹⁵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发表了对苏联历史的新解释，这些解释采用了极权主义的经典理论。他们的作品表明，自 20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主义范式被放弃以来，俄罗斯历史学家采用了与西方同行相同的分析框架和通用理论。一些人采用了汉娜·阿伦特和布热津斯基经典的极权主义理论，另一些人则将 20 世纪 30 年代视为“斯大林式的现代化”，认为他有着与 19 世纪末以来世界其他地区领导人相似的野心。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的亚历山大·巴库宁是后一理论最高产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这一理论可以取代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范式。¹⁶ 在这一趋势中，也可能推进了对斯大林主义国家和纳粹主义国家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不过，这更多是为了突出异同，而非出于政治目的（在西欧往往如此）。¹⁷ 历史

学家们还采用了更多的经验主义方法，研究“日常历史”。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如今重新参与了科学讨论。E. E. 伊万诺夫和M. A. 库吉诺夫撰写了一篇调研文章，关于俄罗斯移民作家，如“民族布尔什维克”乌斯特里亚洛夫和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的极端保守团体，如何评价苏联的强制工业化。这也是俄罗斯历史学家对海外侨民研究重新产生兴趣的一个例证。¹⁸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著作都可以归类为“正视”“俄罗斯的悲惨过去”。然而，许多学者已经将他们的兴趣从过去的禁忌事件扩大到对斯大林主义镇压的研究，再到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广泛分析。¹⁹叶卡捷琳堡乌拉尔国立大学鲍里斯·利奇曼的教科书使学生能够对俄罗斯历史的任何方面进行自己的“多概念解读”。学生们可以读到一些有关工业化和集体化、斯大林的个性和镇压责任问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特征的研究成果。²⁰这类教科书引导未来的历史教师与学生探讨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和世界观如何影响历史叙事。学生们接受的训练是通过东正教、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技术官僚”棱镜来思辨性地看待对俄罗斯悠久历史的各种分析。²¹在利奇曼看来，绝不能推广唯一一种“客观历史理论”。虽然单独的事实必须有确凿的依据（文件或其他），但对事实的解读总是带有主观因素。其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几种理论或概念，并培养他们拥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这样他们就能为所选理论进行论证，同时也能发现其他理论的优点和缺点。P. E. 阿列克谢耶夫和V. D. 卡梅宁的一篇文章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将苏联工业化视为“多概念分析的对象”。²²

新史学显然也改变了车里雅宾斯克以及俄罗斯其他地方的学校关于俄罗斯20世纪历史的教学。²³我在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进行访问研究期间，有幸与他们一起探讨了基础学校教师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对于9—11年级的历史老师来说，工作是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主要学习苏联历史。²⁴值得一提的是，车里雅宾斯克和俄罗斯其他地区一样，许多年轻人都参加了全国范围的最佳历史征文比赛。人权组织“纪念”每年都

会邀请高年级的学生参加这样的竞赛，每年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但总的题目是“历史中的人物——20世纪的俄罗斯”。²⁵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些获奖作文见证了新一代的态度和努力。来自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区第59号学校的伊利亚·波列扎伊金根据档案资料撰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战争年代强迫劳动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中的作用。²⁶叶卡捷琳娜·布尔科娃和娜塔莉亚·阿克萨诺娃研究了该市战俘营中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战俘的命运，以及这些外国人是如何被分配到工厂的各个工作岗位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根据档案馆最近解密的材料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她们首次成功地估算出了有多少战俘在战争年代被用于工业生产及其死亡率，还分析了他们在被遣返之前的命运。这一研究项目得到了她们的老师玛丽娜·萨尔米娜的支持，她亲自对埋葬在市内一个破败、杂草丛生的墓地里的战俘进行了研究。²⁷丹尼斯·斯捷潘诺夫对另一个以前可能是完全禁忌的话题——斯大林时期人们向秘密警察公开或匿名告发的情况——很感兴趣。他的文章基于大量市民写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党组织的信件，并研究了当局如何处理这些来自匿名或公开请愿者的指控。²⁸

历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取决于他或她所处的时代，这一论断似乎过于平淡无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代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能忽略前辈积累的知识。或者说，人们是在研究那些重新发现的事实或以前未曾研究过的情况，从而对原有知识进行适当的补充。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历史学的变革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或是对原有知识进行补充，或是以全新视角解读已有信息。

通俗史在俄罗斯当代史学的边缘蓬勃发展。在任何关于苏联历史的新叙事都遭受不信任的时期过后，对新叙事的需求显然与日俱增。这种通俗史的主流一方面是新爱国主义、反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是新斯大林主义。前者的特点是美化沙皇后期政权的成就，并且设想如果俄国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景，或者以类似的方式妖魔化革命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据称他们依赖德国的财政支持并在1917年11月发动政

变。这股潮流的一个重要焦点是弑君事件——1918年沙皇家族被杀——这或多或少是一个“种族灭绝”时代的开端。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亲共产主义的表述则是以歌颂的方式描绘苏联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代。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用1956年二十大之前惯用的政治术语来描述斯大林，即斯大林是列宁最英明的继任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策划者以及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的设计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一些人的观点更为极端，他们在叙述中加入了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苏维埃政权在20世纪20年代实际上是由犹太人控制的，据称这导致了国家的无神论宣传、全俄东正教教堂的毁灭和乡村的灾难。因此，斯大林被描绘成在大恐怖中结束这种所谓犹太人统治的人。千禧年后有一系列专门为斯大林披上新光环的传记，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所写的就是其中最早的一部。其第一卷甚至转载了一份捏造的“文件”，意在表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多数被镇压者实际上是敌方特工和犹太裔。当时，我曾和现已故的维克多·达尼洛夫教授一起揭露这一不实情况。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专家们毫无疑问地证实，卡尔波夫在文章中加入了一份新近编造的“传真”。维克多·达尼洛夫教授在《祖国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嘲笑卡尔波夫传记中的许多荒谬数据，特别是编造的据称是贝利亚的“文件”。在后来的版本中，卡尔波夫重写了书中的这一段，并删去了编造的“传真”。²⁹从那时起，更多微妙的亲斯大林主义作品主宰了图书市场，许多人试图通过辩论来反对自由派和保守派夸大的斯大林时代的恐怖，转而将斯大林塑造成一位伟大的国家建设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

在叶卡捷琳堡以西几英里处，通往彼尔姆的高速公路旁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纪念碑由一根高高的圆柱组成，圆柱底部镶嵌着四个世界宗教标志——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周围是花岗岩铺成的环形小径，上面镶有金属板。在这些金属板上，镌刻着斯大林时期整个乌拉尔地区18000多名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叶卡捷琳堡的地方档案馆有个专门的研究课题，研究人员致力于尽可能全面地研究这场大清洗的情况。

20多年来，人权组织“纪念”一直致力于揭露苏联时期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的罪行。他们拥有一个档案库，其中包括自传、信件、文件和文物（信件、日记、图画、检察院的官方文件等）。通过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合作，他们出版了有关古拉格劳改营、内务人民委员部和20世纪50年代平反工作的文件，还出版了斯大林清洗活动受害者名录。他们印制了苏共和秘密警察的档案文件，还保存了一些有关苏联时期俄罗斯北部地区的肃反活动的其他物件。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其他城市也对俄罗斯现代史上这一悲惨篇章进行了类似研究。同样，几年前就开始了车里雅宾斯克州政治压迫的所有无辜受害者进行全面鉴定。³⁰早在1954年，地区安全机关就开始重新调查20世纪30年代末的政治案件，并为许多无辜者平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被迫认为无罪。几年后，针对很多“反革命组织”的虚假指控也得到了平反。³¹但真正大规模的平反要等到几十年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命令和指示成立的委员会才对数以千计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的判决进行了审查。车里雅宾斯克市的这一司法程序仍在继续，目前以市议会2003年4月18日的一项法令作为指导原则。³²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指出，这些委员会目前已证实，在车里雅宾斯克市及其周边地区，有11592人在斯大林时期因政治罪在司法听证后被处决，另有7066人被非司法机关处决，甚至被告也未接受听证。车里雅宾斯克州（不包括该市）1991—2001年间共有188347人被平反。其中，27983人因“阶级和政治原因”被定罪，30102人因种族原因被镇压。60000多起有关归还财产的申诉得到了答复，更多的是针对被征用的房屋和被没收的个人财物给予了赔偿。³³

这些都是车里雅宾斯克集体历史记忆中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使我得以开展该研究项目，而且使每次访问都更加令人振奋。不过，对我这个经济史学家来说，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俄罗斯特别是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的开放。与西方媒体的普遍观点相反，这仍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虽然解密的速度在 21 世纪初有所放缓，但这主要是由于档案解密的行政程序烦琐。无论是在中央一级的档案馆，例如莫斯科的国家档案馆，还是车里雅宾斯克的档案馆，都在努力解密更多苏联时期经常受到限制的档案。³⁴ 在本书中，我使用了 21 世纪初解密的 1945 年之前的档案。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不仅为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服务，他们还是城市集体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档案馆还负责用视频或音频来记录苏联时期由政府或政党组织的非公开活动。因此，一名或几名档案管理员会定期拍摄或录制正式访问和各类会议。市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还负责记载名人或“普通人”的个人档案，有些人在车里雅宾斯克工作了一辈子，也有些人在这只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他们走访了车里雅宾斯克州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也是为了收集、记录和记载那些可能很快就会被拆除或损坏的工业和文化遗址的资料。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经常组织历史事件展览，用原始文件和物件来说明过去的时代。工厂老干部和学校班级定期受邀到档案馆参加有关此类事件的讲座。档案馆还与市电视台联合制作纪录片节目。在新千年到来之际，1999 年全年在一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了一系列长达 5—10 分钟的节目。每个节目都涉及 20 世纪某一事件、人物或该市和该州生活的变化。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车里雅宾斯克市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付出了非凡的努力，编写了两部百科全书，其中一卷是关于车里雅宾斯克市的，五卷是关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显然，这些集体著作中的大量资料来自各州的档案馆，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努力尽可能多地收录在苏联时期被压制的信息，以便每个公民，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对“坦克格勒”这个多面的、矛盾的、引人入胜的、迷人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否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注 释

第一章 车里雅宾斯克：20 世纪俄罗斯的一面镜子

1. “他们对战争有什么看法？”“他们没有准备好，尤其是车里雅宾斯克的工厂。军队准备好了，但农业国还没有。”出自 Boris Souvarine, *Souvenirs sur Isaac Babel, Panaït Istrati, Pierre Pascal*, Paris: Gérard Lebovici, 1985, p. 17.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的犹太人聚居区，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长大，曾在基辅大学学习。之后，他移居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发表了批评沙皇主义、反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文章。巴别尔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俄国内战期间，他加入了布琼尼的红色骑兵军。1923 年，他开始发表以那段时期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后来这些作品结集成《红色骑兵军》。

巴别尔是最受瞩目的苏联作家之一，有出国旅行的特权。他曾多次探望自 1925 年起就居住在巴黎的妻子尤金妮亚。1935 年，巴别尔在巴黎国际作家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作者指的应是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编者]

1930 年，巴别尔生活在乌克兰的一个村庄，当时正值去富农化政策推行，同时农民也被从各自的村庄驱逐到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策相比，当时的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他深感震惊。此后，巴别尔住在一个集体农庄，以便为一本关于农民新生活的新书收集资料。20 世纪 30 年代末，巴别尔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并于 1939 年 5 月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警察指控他犯有托洛茨基主义和“反苏活动”罪。1940 年 3 月 17 日，他被处决。

他的传记见 Reinhard Krumm, *Isaak Babel. Schreiben unter Stalin. Eine Biographie*.

-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05); 同上, *Isaak Babel. Biografija* (Moscow: Rosspen 2008)。可与这本内容涉及对巴别尔的告发、审讯和供词的书——Vitalii Shentalinskii, *Raby svobody: V literaturnykh arkhivakh KGB* (Moscow: Parus 1995, pp. 26–81)——进行比较。当时, 他的妻子被错误告知巴别尔已被关进古拉格劳改营, 并于1941年3月17日死亡。巴别尔于1954年获得平反。对他的审讯和处决的实际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在“公开性”政策下公之于众。
- 2 鲍里斯·苏瓦林 (Boris Souvarine, Lifschitz, 1894—1985) 属于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左翼社会主义者, 后来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 1924年, 他因纪律原因被开除出党。由于他对苏联体制“实验”的独立态度, 苏瓦林很快被认为是法国最了解苏联的专家之一。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以帕奈特·伊斯特拉蒂 (Panaït Istrati) 的名义出版的小说《另一种火焰》(*Vers l'autre flamme*) 的第三卷。该书后来以《1930年的俄罗斯》为名重新编辑, 这本书也是苏瓦林的第一部作品, 提到了库斯廷侯爵1839年对沙皇俄国的经典描述。苏瓦林通过阅读报刊热切关注苏维埃俄国发生的一切。尽管他被禁止返回苏联, 但与许多前共产党员一样, 他在分析苏联事态发展的能力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他已经为一本名为 *Staline: Aperçu historique du bolchevisme* (Paris: Plon 1935) 的斯大林传记收集了材料。当时, 法国很少有人欣赏这本传记, 因为“人民阵线”时代的主流风尚是亲苏。然而, 他的传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20世纪70年代, 法国和意大利重新编辑了苏瓦林的斯大林传, 并由作者撰写了后记。关于苏瓦林“二战”前后在亲苏的法国开展有关苏联的批判性研究和辩论并努力确立自己的地位, 见 Jean-Louis Panné, *Boris Souvarine: Le premier désenchanté du communism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3, pp. 174–261, 308–366。
- 3 V. Bozhe, 'P. Stolypinu videlas blestiaschaia budushchnost Urala i Sibiri', *Cheliabinsk*, 1999, no. 2. 关于向西伯利亚的移民, 见 Donald W. Treadgold, *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Government and Peasant in Resettlement from Emancipation to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90–98, 146–149。
- 4 关于车里雅宾斯克的早期历史, 见 Ivan Degtiarëv, *Cheliabinskaia starina. Sbornik statei i materialov po istorii Cheliabinska rannego perioda (30-e gody XVIII - seredina XIX veka)*. *Tsentr Istoriko-kultornogo naslediia g. Cheliabinska* Cheliabinsk 1996; A. L. Pastukhov, *Ot Cheliaba do Cheliabinska: Puteshestvie v proshloe*, Cheliabinsk: Vzgliad 2000。
- 5 Anatole Kopp, *L'Architecture de la période stalinienne* (由 Charles Bettelheim 撰写前

- 言),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78, p. 154. 作为法国先锋建筑师, 科普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多次前往苏联考察。然而, 尽管他与法国共产党有联系, 但除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一些旅游城市, 他无法访问任何其他地方。为了了解苏联其他地方的建筑, 他只能在图书馆阅读书籍和期刊。
- 6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对苏维埃俄国最有受众的描述之一是美国工程师约翰·斯科特 (John Scott) 所著的 *Behind the Urals: An American Worker in Russia's City of Steel* (1943)。斯科特以极大的同情心生动地描述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同年, 他的书被翻译成瑞典文, 德文版也在瑞士出版。斯科特于 1931—1937 年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担任工程师。之后, 他作为英国和美国报纸的通讯员驻扎在莫斯科, 直到 1941 年。“二战”最后几年, 斯科特作为《时代》的记者和新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 (OSS) 的卧底特工驻扎在斯德哥尔摩。在此期间, 斯科特在华盛顿为美国经济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份大规模的调查报告, 内容涉及战前五年计划期间建造的, 位于伏尔加河以东、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的苏联重工业。这份研究情报的详细程度表明, 斯科特可能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在为美国从事情报工作。另见 Lennart Samuelson, 'Making Sense of Stalinist Industrialisation: An Insider's Approach', in *Markets and Embeddedness: Essays in Honour of Ulf Olsson*, Göteborg: Ekonomisk-historiska institutionen vid Handelshögskolan, Göteborgs Universitet 2004, pp. 209–218。
 - 7 William H. Chamberlin, *The Russian Enigma.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3, p. 179.
 - 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75, op. 1, d. 686, l. 152–160, 车里雅宾斯克的会议纪要, 1930 年 5 月 25 日至 31 日, 专区党组织会议。

第二章 从国内战争到五年计划

- 1 关于 1917 年前车里雅宾斯克市和乌拉尔南部的政党制度, 参见 Igor Narskii 的博士论文 *Politicheskie ob "edineniia na Urale do 1917 g.*, Cheliabinsk 1995; 同上, 'Politicheskie Parteien in der russischen Provinz (Ural, 1901–1916)',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1997, No. 45。
- 2 Elena Pavlovna Turova, 'God 1914. Voina. Cheliabinsk i cheliabintsy', *Neizvestnyi Cheliabinsk*, vol. 1, 1996, pp. 65–83。

- 3 *Ural: Vek dvadtsatyi. Liudi, sobytiia, zhizn*, ed. A. D. Kirillov, Ekaterinburg: Ural Politicheskii 2000, p. 34–38.
- 4 伊万·卡希林从1920年7月起加入秘密警察机构,并在1930—1931年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镇压活动中参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农民的镇压。他在大恐怖期间被捕,1937年被处决。
- 5 尼古拉·卡希林是20世纪20年代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大恐怖期间,他卷入了一起针对军队捏造事实的案件。
- 6 有关俄国内战的概述,见Evan Mawdsley, *The Russian Civil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2000); 关于红军和白军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战斗,见pp. 75–111, 132–147。
- 7 在布罗多卡尔马克小镇和车里雅宾斯克有以弗拉基米尔·莫吉利尼科夫命名的街道,以此纪念他。
- 8 1920年,白色兵营广场更名为“牺牲的革命者广场”(Ploshchad' pavshikh revoliutsionerov)。
- 9 同注释6。
- 10 Gulsina D. Selianinova, 'Intelligentsiia i terror: Opyt grazhdanskoi voiny na Urale, 1918–1919 gg.', *Ural i Sibir' v stalinskoi politike*, Novosibirsk: Sibirskii Khronograf 2002, pp. 5–30. 1991年之前,苏联历史学家对白军镇压工人和其他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的描述要多得多。西方国家对红色恐怖的描述同样也是片面的,参见George Leggett,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显然,要明确“即决处决”和其他通常纳入“大清洗”概念的镇压措施的程度,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从苏联解体后的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对双方进行平衡的描述,更好地解释1918—1921年间在直接军事行动之外广泛存在的暴力对抗行为。比较Aleksii Litvin, *Krasnyi i belyi terror v Rossii, 1918–1922 gg.*, Moscow: Iauza/Eksmo 2004, 特别是第3章“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做法”(第139页起)和第4章“全面恐怖。对标志的践踏。独裁者清算反对派”(第225页起)。Litvin描述了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建立集中营和劳改营的(第99页及以下各页),以及规范集中营组织的1919年法律。在最后一章, Litvin展示了集中营是如何招募新干部的。截至1920年底,这些集中营共关押了17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工人。列宁支持严厉镇压,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内部批评也被置之不理。

今天,重要的是要避免将1914—1921年间俄国的人口损失政治化,要仔细分析和区分各种起作用的因素。俄罗斯历史学家对最新的人口计算进行了分

析：Yurii A. Poliakov and Valentina B. Zhiromskaia, *Naselenie Rossii v XX veke. Istoricheskie otjerkii*, vol. 1, 1900-1939, Moscow: Rosspen 2000, pp. 83-133。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有必要首先将内战双方的损失与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区分开来。然后，有必要估算主要由白军实施的反犹屠杀的受害者人数。此后，我们必须估算全国各地的人口数量和死亡率以及生活条件是如何变化的。

虽然人口登记在内战期间几乎瘫痪，而且直到 1926 年才进行了一次较为可靠的人口普查，但对人口发展背后的不同组成部分还是有相当准确的估计。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恐怖活动受害者的确切人数（正如苏联历史上其他形式的镇压一样）。然而，这一论点不应被用来诋毁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近年来所取得的科学进步。把邓尼金将军所在的委员会于 1919 年在俄国南部做出的“红色恐怖夺走 170 万人生命”的估计视为正确的这一做法同样已不再合适。这些数字反映了战时如何通过宣传来影响公众舆论。

最后，有必要估算一下 1918—1919 年间在俄国和欧洲蔓延的流行病（斑疹伤寒和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丹麦历史学家 Bent Jensen 在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统计数据”中，将 1917—1922 年间的人口损失总数归纳在一起。请比较 Bent Jensen 书中的人口损失表：Bent Jensen, *Gulag og glensel: Ruslands tragedie og Vestens hukommelsestab i det 20. århundrede* (Copenhagen: Gyldendal 2002), p. 24。

- 11 在后苏联关于内战白军的丰富文献中，值得研究的是年轻的 Evgenii Volkov（生于 1964 年）的客观而不矫揉造作的著作 *Pod znamenem belogo admirala: Ofiterskii korpus vooruzhënykh formirovanii A. V. Kolchaka v period grazh-danskoi voiny* (Irkutsk: Sarma 2005)。
- 12 在车里雅宾斯克市中心有一条以索菲娅·克里瓦娅命名的街道，它与伟大的列宁大道平行，列宁大道的起点是城市西部加加林公园。
- 13 参见 G. F. Krivosheev 上校对 1918—1921 年内战与干涉军作战期间损失的计算。他简要探讨了由于缺乏可靠报告而造成的资料来源问题，*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7, pp. 7-39。
- 14 P. R. Nazzyrov, 'Cheliabinsk v 1918-1919 (Iz istorii goroda v gody grazhdanskoi voiny)',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vol. 1, Cheliabinsk 1996, pp. 90-103; K. Zadirkii, 'Tukhachevskii v Cheliabinske', *Vechernii Cheliabinsk*, 1989 年 9 月 13 日。另见文章 'Cheliabinskaia operatsiia', 'Ufimskaia operatsiia', 'Zlatoustovskaia operatsiia', *Grazhdanskaia voina i voennaia interventsii v SSSR. Entsiklopedia*,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a 1983。

- 15 图哈切夫斯基因涉嫌叛国罪和为纳粹德国从事间谍活动而在一次闭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然后，他在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判的“供词”中成为主要罪犯之一。阴谋论与他所谓的政变计划的主题相结合。对于斯大林主义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些神话在 Michael Sayers and Albert Eugene Kahn, *The Great Conspiracy: The Secret War against Soviet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6) 等书中成了“真理”。20世纪50年代，图哈切夫斯基被正式平反，1937年公审中的造假行为在党内高层正式为人所知。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著作于20世纪60年代重新出版，他在20世纪30年代红军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认可。Valentin Ivanov的 *Marshal M. N. Tukhachevskii* (Moscow: Voenizdat 1990) 是苏联时代的标准传记，特别是他对图哈切夫斯基与东方方面军第五集团军在乌拉尔山脉的战役和1919年车里雅宾斯克战役的描述，pp. 97–121。

苏联解体后，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实验”中的作用被重新解读。人们在军事档案中发现了一些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如何镇压坦波夫地区1921年农民起义的新信息。例如，G. V. Smirnov在‘Pravda o krovavom marsjale’一文中称他为“血染的元帅”；*Krovavyi marshal: Mikhail Tukhachevskii, 1893-1937* (St. Petersburg: Korona 1997)。有关图哈切夫斯基在制定新军事理论中的作用的介绍，见 Sophie de Lastours, *Toukhachevski: Le Bâtitteur de l'Armée Rouge* (Paris: Albin Michel 1996)。Iuliia Kantor, *Voina i mir marshala Tukhachevskogo* (Moscow: Vremia 2005) 是对图哈切夫斯基文献的最新补充，其中摘录了1937年5月至6月对图哈切夫斯基审讯的有趣片段。

- 16 L. V. Borisova, *Voennyi kommunizm: nasilie kak element khoziaistvennogo mekhanizma* (Moscow: Institute of Russian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MONF 2001).
- 17 V. Bozhe, ‘Trudovye armii v Sovetskoi Rossii (1920–1921): Diskussiiia o meste trudovykh chastei v khoziaistvennoi zhizni strany’, *Istoricheskie chteniia*, vol. 4, pp. 104–109.
- 18 格奥尔基·皮达可夫(1890—1937)在1917年革命后的三个不同阶段领导了经济复苏和重建。他最初担任乌拉尔劳动军的负责人，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负责翻修乌克兰被毁的煤矿，最后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副重工业人民委员，专门负责国防工业。他的管理风格和方法是在前两个阶段形成的。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加入了反对斯大林的左翼反对派。尽管皮达可夫一直是国防工业利益的热心推动者，但他在1936年底被捕，罪名是捏造和虚假的，称其有政治预谋且经济上领导失败。1937年2月，他在第二次莫斯科

- 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见 Andrea Graziosi, 'G. L. Piatakov (1890–1937): A Mirror of Soviet History', 'At the Roots of Soviet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Practices: Piatakov's Donbass in 1921', in *A New, Peculiar State: Explorations in Soviet History, 1917–1937* (Westport & London: Praeger 2000), pp. 1–64, 119–178。
- 19 关于托洛茨基对内战期间苏维埃俄国局势的看法, 见《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劳工组织问题”一章。对托洛茨基在 1919—1920 年建议使用“劳动军”的解释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关调查, 请参阅 Francesco Benvenuti, 'Dal comunismo di guerra alla NEP: Il dibattito dei sindacati', *Pensiero e azione politica di Lev Trockij*, vol. 1 (Milan: Leo S. Olschki 1982), pp. 261–288。清楚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劳工政策在当时的局限性的历史背景的: Lars T. Lih, 'Our Position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Tragic': Bolshevik 'Euphoria in 1920', in Mike Haynes & Jim Wolfreys (eds), *History and Revolution: Refuting Revisionism* (London: Verso 2007), pp.118–137。
- 20 参见 *Leninskii sbornik*, vol. XI, pp. 345–403, 以了解布哈林的 *Ekonomika perekhodnogo perioda* 中列宁画线或评论的段落。另请参照 Nikolai Bukharin,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Kenneth J. Tarbuck (London: Routledge 1979)。
- 21 A. P. Abramovskii & P. N. Pankin, 'Golubaia armia'. Sozdanie, bor'ba, razgrom', *Istoricheskie chteniia*, 4, pp. 68–70; A. V. Bakunin, 'Grazhdanskaia voina i krasnyi terror v Rossii', *ibid.*, pp. 22–25; A. I. Skorikov, 'Iz istorii povstancheskogo i dezertirskogo dvizheniia na territorii Cheliabinskoi gubernii v kontse 1919–nachale 1921 gg.', *ibid.*, pp.59–62。另见 Veprev &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pp. 194–200。
- 22 Skripkov, *Cheliabinsk. XX Vek*, p. 64。
- 23 P. F. Nazyrov, 'Cheliabinsk v 1918–1919 (Iz istorii goroda v gody grazhdanskoi voiny)',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vol. 3, 1996, pp. 90–103。对比 1921 年契卡集中营战俘人数统计, *Voennioistoricheskii archiv*, 2004: 6。
- 24 V. L. Telitsyn, *Skvoz' ternii 'voennogo kommunizma': Krest ianskoe khozhaistvo Urala v 1917–1921 gg.*, Moscow: RAN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1998; A.V. Ivanov, A. T. Tertysnyi, *Ural'skoe krest'ianstvo i vlast' v period grazhdanskoi voiny (1917–1921 gg.): Opyt osmysleniia problemy v otechestvennoi istoriografii*, Ekaterinburg: Urals State Economic University 2002。
- 25 Vladimir Bozhe & I. G. Nepein, *Zhatva smerti: Golod v Cheliabinskoi gubernii v 1921–1922 gg.*, Cheliabinsk 1994. Irina Iangirova, 'K vesne 1922 goda v Cheliabinskoi gubernii

- umerli ot goloda okolo 10 tysiach chelovek...’, *Vechernii Cheliabinsk*, 23/12 1992.
- 26 Iu. Khmelëvskaia, ‘Rol’ amerikanskoi missii v bor’be s golodom na Urale (po materialam Ural’sko-Ufimskogo okruga ARA, 1921–1923),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149–153.
- 27 Alan Ball, *And Now My Soul is Hardened: Abandoned Children in Soviet Russia, 1918–19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54–156, 183. 关于儿童保育和教育, 参见 Lisa A. Kirschenbaum, *Small Comrades: Revolutionizing Childhood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安东·马卡连柯(1888—1939)是一名教师, 他为开始犯罪生活的孤儿组织了一个“国际学校”。教育与实际劳动相结合, 严厉的纪律往往由孩子们自己负责。 *The Road to Life, an Epic of Education* [1935] (Moscow: Progress 1977)。关于契卡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孤儿设立的管辖区的描述, 见 Aleksandr M. Plechanov, *VChK-OGPU, 1921–1928* (Moscow: X–History 2003), pp. 430–437。
- 28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The Russian Enigma*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3)。
- 29 G. K. Pavlenko, ‘Istoriograficheskie problemy industrialnoi modernizatsii na Urale’,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pp. 68–71。
- 30 A. A. Antufev, *Ural’skaia promyshlennost’ nakanune 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Ekaterinburg: The Urals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 31 爱德华·卡尔(1892—1982)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兴趣。1937年, 他访问了莫斯科, 近距离观察了当时的“恐怖社会”。不过, 他也比许多观察家更清楚地看到了严酷的工业化运动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见 Jonatha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1982* (London: Verso 1999), pp.74–79。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强制集体化的替代方案问题。关于最近对斯大林工业化的重新解读, 见 Robert Allen,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史学界, “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代价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例如, P. E. Alekseev & V. D. Kamynin,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kak obekt mnogokontseptualnogo rassmotreniia’,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168–171。
- 32 Nadezhda Petrovna Shmakova, ‘Mashinostroitel’naia promyshlennost’ Iuzhnogo Urala v 30-e gody XX veka’, *Promyshlennost’ Urala v XIX-XX vekakh*, Moscow: AIRO–XX 2002, pp. 208–226。
- 33 20世纪20年代, 在所谓的工农检察院(Рабкрин)中成立了一个由民众控制的机

- 构来打击官僚化。它后来与共产党自己的监察委员会合并；见 Arfon Rees, *State Control in Soviet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1920-1934* (London: Macmillan 1987)。
- 34 Hubert R. Knickerbocker, *The Red Trade Menace: Progress of the Soviet Five-Year Plan*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31), pp.61ff.
- 35 D. V. Gavrilov, 'Ural'skii ty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Geopoliticheskii aspekt', *Ura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Ekaterinburg 1995, p. 58.
- 36 Tatiana Kirstein, *Sowjetische Industrialisierung-geplanter oder spontaner Prozeß? Eine Strukturanalyse des wirtschafts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prozesses beim Aufbau des Ural-Kuzneck-Kombinats 1918-1930* (Baden-Baden: Nomos 1979)。这篇论文分析了为开采马格尼特山铁矿而建设矿山、运输系统和城市的决策过程。
- 37 Valerij Kucher, *Magnitka-eto navsegda. Dela i sud'by stalinskich direktorov* (Moscow: Novosti 2003)。
- 38 Albert A. Antufev, *Ural'skaia promyshlennost' nakanune 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Ekaterinburg: The Ural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 39 T. V. Palagina, 'Iz istorii Cheliabinskogo elektrolitnogo zinkogo zavoda',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vol. 1, Cheliabinsk 1996, pp.112-120。
- 4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5, d. 1, l. 10 ch. *Materialy dokladchikam na otchëtnykh sobraniakh o rabote gorsoveta za 1933*。
- 4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870, op. 9, d. 8, l. 1, 15。
- 4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804, op. 1, d. 29, l. 24-27, 工农检察院 1932 年 3 月的报告。
- 43 P. V. Kostiuina, 'Istoriia OAO "Ufaleinikel" – pervenets nikelevoi promyshlennosti SSSR',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pp. 189-192。
- 4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637, op. 1, d. 186, l.1-1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804, op. 11, d. 514。
- 45 G. V. Forstman & M. D. Mashin, *Ural'skie stankostroiteli. Istoriko-biograf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8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220.5.1: 1-2, 6-11. *Materialy dokladchikam na otchëtnykh sobraniakh o rabote gorsoveta*. 1. 'Itogi pervoi piatiletki'. 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成果是在受到严厉批评和带有偏见的情况下呈现的。原定目标几乎没有实现, 1932 年秋天还发生了严重饥荒。对计划结果的篡改尤其偏向于工业生产宏观数据。一些目标没有实现是不争的事实, 这被归咎于对日战争的威胁, 并声称战争产生了新的优先

事项。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然而，1930年宣布的最不现实的目标干脆被取消了，计划的完成情况被拿来与1928—1929年制定的更为适度的原始目标进行比较。

- 4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P-288, op. 2, d. 605, II. Cheliabinska za vremia ot III do IV gorodskoi partkonferentsii；又见 Natalia P. Shmakova, 'Mashinostroitel'naia promyshlennost' 'Iuzhnogo Urala v 30-e gody XX veka', *Promyshlennost' Urala v XIX-XX vekakh*, Moscow: ARIO-XX 2002, pp. 208-226。
- 4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75, op. 1, d. 566, l. 219-220，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交地区党委的报告，1928年4月27日。
- 4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R-134, op. 1, d. 210, l. 34-36，1928年5月关于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决议。
- 49 A. A. Napylov & N. V. Kostin, 'Kollektivizatsiia kak neobkhodimaia predposylka industrializatsii SSSR',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28-29; M. A. Ivanova, 'Kollektivizatsiia-samaia massovaia repressiia vlasti protiv naroda', *Totalitarizm v Rossii (SSSR) 1917-1991. Oppozitsiia i repressii*, Perm 1998, pp. 49-51. Postanovlenie biuro OK VKP (b) o poriadke provedeniia rabot po likvidatsii kulachestva kak klassa, 1930年2月11日。关于集体化、1930—1932年对富农及其家人的驱逐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警察在这些行动中的作用，见 Nikolai A. Ivnikski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nachalo 30-x godov)*, Moscow: Magistr 1996，以及同上，*Repressivnaia politika sovetskoii vlasti v derevne (1928-1933 gg.)*, Moscow: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2000。
- 50 关于苏联刑法中定义的政治罪（第58条），见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s of the 1930s* (London: Macmillan 1968) 附录。
- 5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804, op.8, d. 143, l. 21。
- 52 A. A. Rakov, 'Opyt analiza kulatskogo khozhaistva 1930 goda: Ekonomiko-pravovoi i politicheskoi aspekty',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Materialy nauchnoi konferentsii*, Cheliabinsk 2003, pp. 164-167; Irina Iangirova, 'Zhertvy 'Velikogo pereloma'', *Golos*, 10-17 January, 16-23 February 1992。
- 53 GASO, f. 245, op. 3, d. 341, l. 30-35。
- 54 V. V. Betenev, 'Pravookhranitel'nye organy Iuzhnogo Urala v period provedeniia kollektivizatsii', *Iuzhnyi Ural v istorii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137-139; Salmina, 'Prokuratura Juzhnogo Urala v 30-e gody', *ibid.*, pp. 179-182。

- 5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180, op. 1, d. 367, l. 194。
- 5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180, op. 1, d. 398, l. 32。
- 57 Ivanova, 'Kollektivizatsiia-samaia massovaia repressiia vlasti protiv naroda', p. 51。
- 5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88, op. 2, d. 5, l. 8。
- 5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88, op.1, d.150, l. 198-202。
- 60 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宣传中经常提到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旨在“消灭”农民,并使用德语词 *ausrotten* 或 *Ausrottung* (消灭)。根据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在苏维埃俄国的生活改编的畅销小说经常使用这些术语来激发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和反俄罗斯的舆论。Karl Albrecht, *Der verratene Sozialismus. Zehn Jahre als Staatsbeamter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Niebelungen 1938 (1943年之前有多个后续版本)。
- 61 Irina Iangirova, 'Raskulachivanie', rotaprint 90-02-21; 同上, 'Velikii pere-lom luzhnouralskii variant', *Golos*, 4-11/9 1992。所有乌拉尔地区的数据均基于 I. E. Plotnikov, 'Kak likvidirovali kulachestvo na Urale',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1993, No. 4, p. 159。俄罗斯大学学生使用的标准教科书和纪录片 (*khrestomatiia*) 中包含了共产党政治局关于去富农化的重要决议、关于“反革命农民”被处决或送往劳改营人数的决议。例如,参见 A. F. Kisel'ev & E. M. Shchagin (eds), *Khrestomatiia po otechestvennoi istorii (1914-1945 gg.)*, Moscow: Vldos 1996, 关于集体化的第 435—440 页。
- 62 James J. Schneider, *The Structure of Strategic Revolution: Total War and the Roots of the Soviet Warfare State* (Novato, CA: Presidio 1994), pp.237-241, 257-263。
- 63 Viktor N. Zemskov, *Spetsposelentsy v SSSR, 1930-1960*, Moscow: Nauka 2003。
- 64 GASO, f. 245, op. 3, d. 376, l. 4-5 ob。
- 6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9, d. 24, l. 81。
- 6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9, d. 24, l. 83-85。
- 6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1075, op. 1, d. 23, l. 89-90。
- 68 GASO, f. 245, op. 3, d. 376, l. 42。
- 6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804, op. 5, d. 10, l. 72-87, 关于 1937 年科佩伊斯科夫的煤炭开采和 1938 年提高煤炭产量的准备工作;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2, d. 602, l. 53-62。
- 7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1075, op.1, d. 33, l. 89-145。
- 71 *Cheliabinskaia oblast 1917-1945*, 脚注 183。

第三章 工业城市：社会主义愿景和苏联现实

- 1 见 Anton Karlgren, *Stalin: Bolsjevismens väg från leninism till stalinism*, Stockholm: P. A. Norstedt & Söners 1942. 卡尔格伦 (1882—1973) 曾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语言教授, 后任斯德哥尔摩《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 编辑。
- 2 在法国, 马克思主义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 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有强大地位。知识分子热衷于接受苏联官方的自我形象和围绕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神话。Louis Aragon 的 *L'Histoire de l'U. R. S. 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2) 一书中介绍的苏维埃俄国历史就是一种典型的颂扬。随着赫鲁晓夫等人对苏联进行了更多的“修正”, 法国前党员试图对苏联历史提出新的态度。Jean Elleinstein 撰写了一本官方认可的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教科书 *Histoire de l'R. S. S. (Tome 2). Le socialisme dans un pays* (Paris: Seuil 1975)。几年后, Elleinstein 试图对斯大林主义做出自己的解释, 即 *L'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ien*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75)。然而, 他的这一尝试遭到了法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Elleinstein 后来撰写了马克思和斯大林的传记, 但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 3 在西方和俄罗斯的众多著作中, 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如何设想 1921 年革命前景的有 Moshe Lewin 的 *Lenin's Last Struggle* (1967, 新版作者撰写了新前言,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 4 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以乌托邦愿景为引领的人包括两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流亡海外的苏联历史学家: Michel Heller and Aleksandr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据称, 列宁在 1917 年受到了这种乌托邦愿景的“束缚”(第 41—58 页), 最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出现的政权被两位作者描述为“社会主义极权国家”(第 263 页)。
- 5 这是根据 N. P. Korolëv, 'K. V. Ryndin i protsess industrializatsii v Cheliabinskoi oblasti',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109—113; 同上, 'K voprosu o deiatelnosti K. V. Ryndin kak parti-inogo rukovoditelia sovetskogo gosudarstva', in *Iuzhnyj Ural v sudbd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174—178。
- 6 E. Arfon Rees, *State Control in Soviet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1920-1934*, London: Macmillan 1987。
- 7 比较 R. W. Davies, Oleg V. Khlevniuk & E. A. Rees, *The Stalin-Kaganovich Correspondence, 1931-1936*,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72—273。该英文版收录了俄文版 *Stalin-Kaganovich. Perepiska, 1931-1936* (Moscow: Rosspen 2002) 867 封信中

的 182 封。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之间的往来信件写于其中一人在黑海边度假一个月时。他们的通信揭示了许多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以及两位领导人如何就镇压措施和法律进行争论。他们的信件增加了人们对苏联最高层决策过程的了解。另见 Stephen G. Wheatcroft, 'From Team-Stalin to Degenerate Tyranny', in E. Arfon Rees (ed.) *The Nature of Stalin's Dictatorship: The Politburo, 1924-195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79-107。

- 8 R. W. Davies, Oleg V. Khlevniuk, E. A. Rees, *The Stalin-Kaganovich Correspondence*, pp. 285-287.
- 9 *Pismo ob organizatsii i provedenii anti-rozhdestvenskoi kampanii v 1931 godu*,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221. I. 107: 11-12, *Materialy o rabote biuro soiuzna bezbozhnikov*, 1931.
- 10 关于两次大战之间苏联的无神论和反宗教运动，以及从另一个角度看的启蒙运动——这些运动针对的是所有宗教：俄罗斯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犹太教和佛教——见 William B. Husband, 'Godless Atheists': *Atheism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6-100；和 Daniel Peris, *Storming the Heavens: The Soviet League of the Militant Godl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对宗教的嘲弄、无神论宣传的社会化以及教堂的关闭，见 Paul Gabel, *And God Created Lenin: Marxism vs. Religion in Russia, 1917-1929*,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6。
- 11 关于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 30 年代车里雅宾斯克宗教生活的详细分析，见 Vladimir P. Bozhe, 'Ocherk tserkovno-religioznoi zhizni Cheliabinska nachala XX v.',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Kraevedcheskii sbornik*, vol. 1, Cheliabinsk 1996；同上，'Materialy k istorii tserkovno-religioznoi zhizni Cheliabinska (1917-1937 gg.)',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Kraevedcheskii sbornik*, vol. 2, Cheliabinsk 1998, pp.107-199。
- 12 参见 Veprev &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Tri veka na Iuzhnom Urale*,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2002, pp. 278-279。
- 1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74, op. 3, d. 55, l. 79。
- 1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2, d. 602, l. 53-62。
- 15 位于市中心的邮政总局是一座文化遗产建筑。20 世纪 90 年代对其进行了重建，以恢复建筑师设计的原貌，同时对其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基洛夫大街（1935 年前称为工农街）现在是一条步行街。在苏联时期，它曾是一条崎岖不平、破烂不堪、交通繁忙的街道。20 世纪建造的所有商店、咖啡馆和办公室在外观上都经过了精心修复。步行街上有许多雕塑，展现了车里雅宾斯克历

- 史上的贸易情况。另见 T. Maevskaia, 'Glavpochtamt', *Biulleten arkhitektury*, 2000, no. 2; Iu. Filinskich, 'Poslednii 'vzvizg' konstruktivizma', *Vechernii Cheliabinsk*, 26 February 2001。
- 16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城市规划的主流观点, 见 Anatole Kopp, *Ville et révolution: Architecture et urbanisme soviétiques des années vingt*, Paris: Anthropos 1967; 同上, *Changer la vie, changer la ville: De la vie nouvelle aux problèmes urbains. U. R. S. S. 1917-1932*, Paris: UEG 1975。关于整个苏联建筑史, 请参见 Selim Khan-Magomedov, *Pioneers of Soviet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New Solution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3)。虽然 Khan-Magomedov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写作时不得不回避某些主题, 但这本书是对苏联建筑史最全面的考察。V. A. Vinogradov 编的《莫斯科》中的 'Mysterious Pages of History of the 30s' 描述了莫斯科中心改造的大规模计划, 见 *Moscow. 850th Anniversary*, Moscow 1997, vol. 2, pp. 94-96。对斯大林主义建筑的其他解释, 见 Harald Bodenschatz & Christiane Post (eds), *Städtebau im Schatten Stalins: Die internationale Such nach der sozialistischen Stadt in der Sowjetunion 1929-1935*, Berlin: Braun 2004。
- 17 V. P. Terekhov, 'Inzhenerno-tekhnicheskaiia intelligentsiia Urala naka-nune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Ural v strategii Vtoroi Mirovoi voiny*, Ekaterinburg 2000, pp. 160-166。
- 18 见 Evgeniia Gershkovich & Evgenii Komeev, *Vysokii stalinskii stil'*, Moscow: Trilistnik 2005; Alessandra Latour, *Birth of a Metropolis: Moscow 1930-1955. Recollections and Images*, Moscow: Iskusstvo-XX vek 2005。在极权主义范式下对这一时代艺术的解读, 见 Igor Golomstock, *Arte totalitaria nell' URSS di Stalin, nella Germania di Hitler, nell'Italia di Mussolini*, Milan: Leonardo 1990 (俄文译本: *Totalitarnoe iskusstvo*, Moscow: Gallart 1994)。
- 19 Nikolai Miliutin, *Sotsgorod. Problema stroitel'stva sotsialisticheskikh gorodov. Osnovnye voprosy ratsional'noi planirovki i stroitel'stva naseleñnykh mest SSSR*,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30。
- 20 见 Jean-Louis Cohen, *Le Corbusier and the Mystique of the USSR. Theories and Projects for Moscow, 1928-193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瑙姆·加博是应邀参加苏维埃宫设计竞赛的十多位外国建筑师之一, 参见 Naum Gabo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Palace of Soviets, Moscow 1931-1933*, Berlin & Moscow: Berlinske Galerie 1993, pp. 197-201。

- 21 V. I. Isaev, 'Sotsial'nye problemy formirovaniia Uralo-Kuznetskogo kom-pleksa', in *Ural i Sibir' v stalinskoj politike*, Novosibirsk: Sibirskii khronograf 2002, pp. 126–137.
- 22 *Sotsial'no-ekonomicheskie ustanovki i skhema raspredeleniia territorii g.Cheliabinska*, vol. 1, Leningrad 1935. 'Printsipial'nye ustanovki rasseleniia i ego normativy', 'Proektnoe razmeshchenie promyshlennosti', 'Proektnaia skhema raspredeleniia territorii Cheliabinska', vol 2: *Cheliabinsk kak nauchnyi i uchebnyi tsentr*.
- 23 E. V. Konysheva, 'A. K. Burov i Cheliabinskaia arkhitektura rubezha 20-kh-30-kh gg.', *Biulleten' arkhitektury*, 2000, No. 5; Marina Salmina, *Istoriia Iuzhnogo Urala. XX-nachalo XXI veka*, Cheliabinsk: Vzgliaid 2004, pp. 93–94.
- 2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180, op. 1, d. 359, l. 50。
- 25 关于战时苏联工业中的妇女, 请比较 Wendy Z. Goldman, *Women at the Gates: Gender and Industry in Stalin's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elanie Ilic (ed.), *Women in the Stalin Er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 2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804, op.1, d. 141, l. 25; op.8, d. 143, l. 31; op. 9, d. 4, l. 48; Dokladnaia zapiska o sostoianii zhilshchno-kommunal'nogo khozhiaistva v oblasti i g. Cheliabinske za 1940 god.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3, d. 704, ll. 4–8, 12–14, 17–25 & 74–94。
- 2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297, op. 2, d. 480, l. 35–39。
- 2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20, op. 1, d. 329, l. 109。
- 29 E. A. Malyshev, 'Sotsialno-kul' turnye tendentsii istoricheskogo razvitiia toponimiki zhilykh raionov ChTZ v 1930-60-ch gg.',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64–66.
- 3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804, op. 1, d. 141, 25; op. 8, d. 143, l. 31; op. 9, d. 4, l. 48。
- 3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1, d. 364, l. 186–191, 车里雅宾斯克内务系统第二处处长布鲁诺中校关于工人村条件的特别报告, 1937年3月28日。
- 3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1, d. 335, l. 1–5, 1937年2月拖拉机厂厂区苏维埃选举代表集会上男女工人、工程师和职员提案。
- 33 E. Podtiashekin, 'Baraki', *Golos*, 25 October-1 November 1991.
- 3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3, d. 499, ll. 1–8, 78–92, 112, 123, O sostoianii mest-nogo khozhiaistva Cheliabinskoi oblasti。
- 35 John Scott, *Behind the Urals: An American Worker in Russia's City of Steel*, [1942], enlarged edition prepared by Stephen Kotki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19.

- 3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20, op. 5, d. 70, l. 45, 向市苏维埃提交的关于车里雅宾斯克师范学院教育情况的报告, 1940年1月21日。
- 37 A. P. Cherednichenko (ed.), *Cheliabinskii Gosudarstvennyi Pedagogicheskii Universitet*, Cheliabinsk: Izdatel'stvo ChGPU 1999, pp. 14–64.
- 3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1, d. 14, l. 105–106; f. R-220, op. 11, d. 15, l. 6–6ob, 车里雅宾斯克市委关于拖拉机厂扫盲运动的摘录, 1936年6月3日。
- 3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15, l. 56–57, Rezoljutsiia Chelabinskogo gorkoma, 'O sostoianii likvidatsii negramotnosti na ChTZ, 3 June, 1936.
- 4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20, op. 1, d. 605, l. 66.
- 41 *Cheliabinskii rabochii*, 1932年1月28日。
- 4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95, op. 1, d. 26, l. 48–50. Cheliabinskii oblastnoi otdel zdravookhraneniia.
- 4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379, op. 2, d. 760, l. 30.
- 4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95, op. 1, d. 26, l. 54–55.
- 4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95, op. 1, d. 2, l. 13.
- 4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95, op. 1, d. 13, l. 176–182ob.
- 4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95, op. 1, d. 26, l. 88–91.
- 4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95, op. 1, d. 26, l. 92–94.
- 4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88, op. 1, d. 25, l. 57–61。在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 为供水线路投资了1420万卢布。1937年, 它们的总长度为126公里,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20, op. 4, d. 498, l. 16, op. 8., d. 143, l. 29。
- 50 V. M. Semënov, V. N. Novosiolov & L. V. Shubarina, *Sport na Iuzhnom Urale: Istoriia razvitiia fizicheskoi kul'tury i sporta v Cheliabinske 1919-1929 gody*, Cheliabinsk: Ural'skaia akademiia fizicheskoi kultury 2000.
- 5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5, l. 72–73, 1936年7月23日决议。
- 5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5, l. 110.
- 5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5, l. 137–139.

第四章 拖拉机厂的民用生产和军用潜力

- 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28, l. 11。

- 2 R.W. Davies, Oleg V. Khlevniuk & E.A. Rees (eds.), *Stalin-Kaganovich Correspondence, 1931-1936*,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4, 82.
- 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124, op. 1, d. 28, l. 11。
- 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124, op. 1, d. 28, l. 57。
- 5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是强制工业化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见 Oleg Vital'ievitch Khlevniuk. *In Stalin's Shadow: The Career of 'Sergo' Ordzhonikidze*, Armonk, NY & London: Sharpe 1995。
- 6 关于此类报告,请参见 'Obzor raboty po stroitel'stvu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zavoda. Sostavlenn po materialam EKO Cheliabinskogo Opersektora PP OGPU po Uralu po sostoianiiu na 26 aprelja 1931 g.',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5, op. 1, d. 685, l. 104-109。
- 7 Davies et al., *Stalin-Kaganovich Correspondence*, p. 221.
- 8 A. G. Kireev & E. G. Choviv, *ChTZ-moia biografija*.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83.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阶级从大约 300 万扩大到 600 万的情况,见 Jean-Paul Depretto, *Les Ouvriers en U. R. S. S. 1928-1941*,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7, 特别是他描述的库兹涅茨茨克地区的条件,与车里雅宾斯克的条件相似, pp. 187-251。
- 9 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萨顿 (Antony Sutton) 在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0 to 1945*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中的分析,往往高估了西方的部分,而低估了苏联内部的新技术发展。尽管如此,该书还是对西方公司在战时为苏联工业化做出贡献的几乎所有领域进行了详尽的调查。萨顿面临的问题是,西方私营公司的档案无法查阅,或者保存的苏联事务文件极少。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封闭的苏联档案被开放,这为西方技术转让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关于美国技术和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见 Sutton, *Western Technology*, pp. 188-191; Leonid S Komarov, 'ChTZ-Katerpillar', *SShA: Ekonomika, politika, ideologija*, 1977, no. 1, pp. 59-70; Elena A. Kalinkina, '... Kazhdyi nash den' oplachvaetsia zolotom...' (O komandirovках spetsialistov ChTS i ChTZ za granitsu v 1930-e gg.),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204-208。
- 10 托洛茨基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于 1930 年在柏林出版,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近年来出版了许多新版本。
- 1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379, op. 12, d. 6, l. 54-61。
- 12 *Materialy k kontrolnym tsifram khoziaistva Cheliabinskogo raiona na 1932 g.*,

Cheliabinsk 1932.

- 1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98, op. 1, d. 3234, l. 91–92 (*Cheliabinskaia oblast*, p. 140)。
- 14 Z. Krasilshchik, *V borbe za Cheliabinskii traktorny, Sverdlovsk-Moscow*: n. p. 1931, 详细描述了拖拉机厂是如何打算生产民用拖拉机和火炮牵引车的。
- 1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379.2.11, 23ob–125。
- 16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业化进程中, 许多西方文献都高估了强制囚犯劳动的实际作用。关于古拉格囚犯和乌拉尔特殊定居点的作用的更多数据, 请参阅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230–235; James Harris, *The Great Urals: Reg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5–122。关于在下塔吉尔和乌拉尔北部建造金属厂和其他工厂时必不可少的营地和特殊定居点的详情, 见 Viktor Kirillov, *Kniga pamjati. Posvjaschaetsia Tagilchanam-zhertvam repressii 1917-1980-kh godov*, Ekaterinburg: Nauka 1994; 同上, *Istoriia repressii v Nizhnetagil'skom regione Urala, 1920-1950 gody*, vols. 1–2, Nizhnii Tagil: n. p. 1996; 同上, *Zherty repressii: Nizhnii Tagil 1920-1980-e gody*, Ekaterinburg: n. p. 1999。
- 1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804, op. 8, d. 49, l. 120–125. Stenogramma slëta stakhanovtsev i udarnikov vsekh predpriatii Cheliabinskoi oblasti. 1937 年这次斯达汉诺夫会议的报告全文共 148 页。
- 18 关于在苏联境外招募合格工人和专家, 见 Elena Osokina, *Za fasadom 'stalinskogo izobilia'.* *Raspredelenie i rynek v snabzhenii naseleniia v gody industrializatsii, 1927-1941*, Moscow: Rosspen 1999, pp. 105–110。另见 Vincent E. Baker, 'American Workers in 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From Dream to Disillusionment', master's thesi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WV, 1998。
- 19 Richard Cartwright Austin, *Building Utopia: Erecting Russia's First Modern City, 1930*, Kent & Lond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0 Sergej Shurawl'jov, *'Ich bitte um Arbeit in der Sowjetunion': Das Schicksal deutsche Facharbeiter im Moskau der 30er Jahre* (Berlin: Ch. Links 2003) 描述了在莫斯科一家电灯厂工作的德国工人的命运。关于外籍工人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 Sergei Zhuravlëv, 'Inostrantsy v sovetskom obshchestve 1920–1930–kh godov', *Trudy Instituta Rossiiskoi istorii RAN, 1999-2000*, Vypusk 3, Moscow 2002, pp. 186–209, 随后, 俄罗斯历史学家从比较的角度讨论了档案研究的新领域。

- 21 Andrea Graziosi, 'Visitors from Other Times: Foreign Workers in the Prewar Five-Year Plans', *A New, Peculiar State: Explorations in Soviet History, 1917-1937*, Westport, CT, & London: Praeger 2000, pp. 223-266. 在脚注 26 (第 227 页) 中, Graziosi 提到了一长串的工人回忆录, 这些回忆录在今天几乎被遗忘了, 但由于他们对斯大林俄国的印象大相径庭, 因此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
- 2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3, l.14-20, Ukazaniia, spiski, perepiska ob inos-trannykh spetsialistakh, 193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379, op. 3, d. 555, l. 29-3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88, op. 1, d. 113, l. 19-22。
- 2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60, l. 4, 4ob, 5 (1934-35) dokladnye zapiski o rabote s inostrannymi spetsialistami。
- 24 *Izvestiia* 28 May-7 June 1931; A. Aleksandrov, 'Boris Pasternak v Cheliabinske', *Vechernyi Cheliabinsk*, 1990 年 3 月 2 日。
- 25 RGVA f. 31811, op. 1, d. 242, l.20, A report of an inspection trip to the Tractor Experimental Plant at ChTS building site, Pavlovskii, 27 November 1930,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yi arkhiv*。
- 26 克里斯蒂坦克的改进型号有 BT-5 和 BT-7, 后者有多个型号, 如 BT-7A、BT-IS、BT-SV-2 (从未投入批量生产), 最后是 BT-7M, 配备 500 马力的 V-2 柴油发动机, 重 14.7 吨, 地面压力为每平方米 0.68 千克。它是一种轮式和履带式相结合的坦克, 轮式最高时速为 86 公里, 履带式最高时速为 65 公里, 配有一门 45 毫米火炮和三挺 DT7 62 毫米冲锋枪。1939 年共生产了 700 多辆 BT-7M 坦克。
- 27 见 A. V. Karpenko, *Obozrenie otechestvennoi bronetankovoi tekhniki (1905-1995gg.)*, St. Petersburg: Nevskii Bastion 1996。
- 28 Mary R. Habeck, *Storm of Steel: The Development of Armo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9-1939*,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另见 Sergei Gorlov, *Sovershenno sekretno. Al'ians Moskva-Berlin 1920-1933 gg. (Voenno-politicheskie otnosheniia SSSR-Germaniia)*, Moscow: Olma-Press 2001。
- 29 比较 Vladimir K. Triandafillov, *The Nature of the Operations of Modern Armies*, [1929], edited with a foreword by Jacob W. Kipp, London: Frank Cass 1994。
- 30 俄国军事理论家如何总结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的经验的详细分析, 请参阅前美国驻莫斯科武官理查德·W. 哈里森 (Richard W. Harrison) 的调查报告 *The Russian Way of War. Operational Art, 1904-1940*, Lawrence,
- 290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 (1900—1950 年代)

-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 31 关于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坦克技术军备竞赛，见 Daniil P. Ibraimov, *Protivoborstvo: Istorii sozdaniia voennoi tekhniki v SSSR i Germanii*, Moscow: DOSAAF 1989。
- 32 关于苏联军方如何为现代战争构想装甲理论的介绍，可参见 Jacob Kipp, 'Mass, Mo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Soviet Operational Art, 1918-1936',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n and Soviet Military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Military History Symposium, USAF Academy 1986; Richard Simpkin, *Deep Battle: The Brainchild of Marshal Tukhachevskii*, with a foreword by John Erickson,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1987。
- 33 关于代号为“Z行动”的苏联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支持，见 Youli Sun,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 London: Macmillan 1993, pp. 109-130。关于苏联和红军在西班牙 1936—1938 年内战中对其合法政府的支持（内部代号为“X行动”），见 *Komintern i, grazhdanskaia voina v Ispanii. Dokumenty*, eds. S. P. Pozharskii & A. I. Saplin, Moscow: Nauka 2001; Gerald Howson, *Arms for Spai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John Murray 1998; Iurii Rybalkin, *Operatsiia 'X': Sovetskaia voennaia pomoshch' respublikanskoi Ispanii (1936-1939)*, Moscow: AIRO-XX 2000。
- 34 D. V. Gavrilov, 'Rol' malykh voyn razvitiia voennoi promyshlennosti Urala pered Pervoi i Vtoroi mirovymi voynami', in *Ural v strategii Vtoroi Mirovoi voiny*, Ekaterinburg 2002, pp. 81-84。
- 35 见 Paul A. C. Koistinen, *Planning War, Pursuing Pe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Warfare, 1920-1939*,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 36 见 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 St. Martins 1999。
- 37 Ivan Vernidub, *Boepripsy Pobedy. Ocherki*, Moscow: TsNIINTIKPK 1998, p. 36。
- 3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19, l. 10-10ob。
- 3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19, l. 9 otborotnyj spisok nr 3。
- 40 *Proektnoe zadanie po assimiatsii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zavoda mashinnoi T-29* 作为 1933 年的目标，拖拉机厂的所有车间（热工、焊接、车身、测试和装配）都应做好生产 T-29 坦克的战时准备。
- 4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390, op.1, d. 25, l. 103-104, 奥尔忠尼启则的命令，

1933年10月26日。

- 4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0, l. 6, 拖拉机厂厂长布鲁斯金的信。
- 4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0, l. 5, 7, 8-9, 14。
- 4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0, ll. 24-25。
- 4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10, ll. 30, 31 and 43。
- 46 A. N. Shcherba, 'Stanovlenie i razvitie tankovoi promyshlennosti Leningrada d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Peterburgskaia Istoricheskaia shkola. Almanakh. 1: O Viktoro Anatoleviche Ezhove i ego tvorchestve*, St. Petersburg 2001, pp. 232-250。

第五章 恐怖风暴中的停滞 (1936—1939)

- 1 Victoria Bonnell, *Iconography of Power: Soviet Political Poster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168. Bonnell 分析了斯大林时代海报中的插图语言 (第 161—279 页), 指出权力精英如何通过将斯大林塑造成正义英明的领袖, 妖魔化其政权的反对者, 以及在战后将其描绘成先知先觉、高瞻远瞩的天才, 来改变关于列宁的神话。
- 2 Zeth Höglund, *Häxnatt över Europa: Tal till kristna och hedningar*, Stockholm: Axel Holmströms 1939, pp. 102-103。
- 3 Frederick Beck & W. Godin,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51。两位作者详细讨论了哪些类别的苏联公民以及外国人遭到了恐怖清洗。他们还总结了苏联内部流行的十几种或多或少可信的解释, 说明为什么会发生大清洗。
- 4 Roy Medvedev, *K sudu istorii. Genезis i posledstviia stalinizm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同上,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1, enlarged ed. 1990。
- 5 Robert Thurston,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1934-194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 关于苏联社会、共产党和秘密警察日常活动的全面而详细的编年史调查, 见 Wladislaw Hedeler, *Chronik der Moskauer Schauprozesse 1936, 1937 und 1938: Planung, Inszenierung und Wirk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 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390, op. 2, d. 4, l. 2。
- 8 关于 1937 年的大恐怖和最新的基础研究成果, 请参见 Marc Jansen & Nikita Petrov,

-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3-1940*,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同上, *Ezhov-stalinskii pitomets*, Moscow: Rosspen 2008; Aleksei Polianskiiskii, *Ezhov: Istoriia 'zheleznogo' narkoma*, Moscow: Veche 2003; Vladimir N. Khaustov & Lennart Samuelson, *Stalin, NKVD i repressii, 1936-1938*, Moscow: Rosspen 2008.
- 9 V. N. Khaustov et al., *Lubianka: Stalin i Upravlenie Gosbezopasnosti NKVD, 1936-1938*, Moscow: Demokratsiia 2003.
- 10 James Harris, *The Great Urals: Reg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Ithaca, NY,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6-190.
- 11 我们不知道与斯大林的这些会晤是如何当场记录或以其他方式记录下来的。迄今为止, 我们只能推测可能的议程。不过, 通过对这些会议进行定量分析, 我们已经获得了新的见解, 即谁是最常见的来访者, 以及这些会议的类别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见 Stephen G. Wheatcroft, 'From Team-Stalin to Degenerate Tyranny', in Edgar Arfon Rees (ed.), *The Nature of Stalin's Dictatorship: The Politburo, 1924-195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79-107.
- 12 N. Gevorkian, 'Vstrechnye plany po unichtozheniiu naroda', *Moskovskie novosti*, 21 June, 1992, No. 29, pp. 18-19.
- 13 1956年3月, 伦丁正式从所有这些捏造的指控中恢复名誉。
- 14 见 Galina Kibitkina, 'Vzgliad v istoriiu: Vysokoe doverie-bol'shaia otvetstvennost', *Tankograd*, No. 12. 1999.
- 15 自1992年以来, 出版了大量有关大清洗的地区研究报告和文献集。例如, 见 R. A. Khantalin (ed.), *Repressii v Archangelske: 1937-1938*. Archangelsk: Pomor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1999。在分析斯大林时代的地区工作中, 包含沃尔库塔煤矿的科米共和国尤其值得一提。20世纪40年代, 这些煤矿主要由古拉格囚犯开采, 在科米的其他地区有许多古拉格劳改营和特殊村庄。科米的历史学家和档案管理员有八卷巨著, 名为《忏悔》(*Pokaianie*), 其中收录了数千名斯大林时代镇压受害者的传记。关于苏联全国各地遭受镇压的受害者名单的调查, 见 *Knigi pamjat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j v SSSR: Annotirovannyi ukazatel*, St. Petersburg: Rossiiskaia natsionalnaia biblioteka 2003, edited by Anatolii Razumov from the association 'Vozvrashchennyje imena'; 特别是关于来自车里雅宾斯克州的殉难文献(第181页)。
- 1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1, d. 364, l. 244-248, Spets-svodka ob anti-sovetskikh

- projavleniakh v sviazi s protsessom k [ontra]. r [evoljutsionnogo] trotskist-skogo parallelnogo tsentra, Nachalnik UNKVD Cheliabinskoi oblasti, star-shii maior Blat, 27 January 1937.
- 17 G. I. Ierusalimchik, 'Period industrializatsii i evreiskaia intelligentsia v 30-egody', in *Raznye gody-obshchaia sudba*, Cheliabinsk 1999.
 - 18 V. E. Sakhov, 'Molokh stalinskikh repressii', *Prizyv*, Cheliabinsk, 1994年4月15日; N. Shukalin, 'Nevinoven, no podsuden...', *Cheliabinskii rabochii*, 1994年7月29日。
 - 19 'Rol' sudov v repressivnoi politike gosudarstva (na primere lineinogo suda zheleznoi dorogi imeni Kaganovicha)', *Arhivny Urala*, 1995, no. 2, pp. 154–164.
 - 20 A. L. Khudoborodov, 'Kak eto bylo: O tragicheskoi sud'be direktora Cheliabinskogo gosudarstvennogo pedagogicheskogo instituta I.K. Zelenskogo v 1930-e gody',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168–170.
 - 21 Gustaf Mund, *GPU. Das Angriff an der Abendland*, Leipzig: Niebelungen 1942.
 - 2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2, d. 228, l. 1–148, *Soveshchanie direktorov predpriatii u sekretaria Obkoma VKP (b) t. Ryndina*, 1937年9月1日。
 - 23 GARF, f. 8418, op. 12, d. 91, l. 8–18, 报告及附录, 军事观察员提供的11张照片, 军方代表 (voenpredy) 的信和备件草图。N. Antselovich. 1937年2月8日; GARF, f. 8418, op. 12, d. 91, l. 19–23, N. Antinov, 并抄送 Kliment Voroshilov、Lazar Kaganovich、Valerii Mezhlauk 和 Moisei Rukhimovich。
 - 24 关于扎尔茨曼的简短传记仍然是唯一一部专门介绍这位迷人人物的重要著作; 请参见 Vladimir Sergiichuk, *Tankovyi korol Rossii*, Kiev: Nichlava 2005。
 - 25 车里雅宾斯克遭受的镇压浪潮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被公之于众, 当地报纸刊登了政治镇压受害者的名单和简历。例如, 1990年3月23日, 4月3、11、15、18、25日, 5月29日, 6月6、28日, 7月10、19、24日, 8月7、14、28日; 1991年7月7、8、9、14、23、30日, 8月4、25日, 9月1、5、29日, 11月4、12、24日和12月24日; 1992年1月3、15日, 2月19、25日, 3月3、11、31日, 4月8日, 5月6、13、19日, 6月16日, 7月7、8、9、14、23、30日, 9月1、5、29日, 11月12、24日, 12月24日。在“Reabilitirovannye”标题下, *Vechernii Cheliabinsk* 于1992年11月24日和26日以及12月3、8、10、24和29日刊登了106人的名单。每期都刊登了数百个人名和其中一些人的简历。甚至在1993年和更久以后, 车里雅宾斯克的报纸还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和苏联时期政治迫害受害者名单。

- 26 这些“大规模行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基本上不为历史学家所知。此后，党内高层和安全部门的相关文件陆续出版。Vladimir Khaustov et al., *Lubianka: Stalin i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1936-1938*, Moscow: Demokratia 2003。俄罗斯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如何最好地解释异常残酷的大规模处决的背景；有关这一争论的介绍，请参阅 Barry McLoughlin and Kevin McDermott (eds.), *Stalin's Terror: High Politics and Mass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Arch Getty, 'Excesses are not to be permitted...: Mass Terror Operations in the late 1930s and the Stalinist Government', *Russian Review*, 61 (January 2002); Nicolas Werth, 'Repenser la grande terreur: L'U. R. S. S. des années trente', *Le Débat*, November-December 2002。另见 Khaustov & Samuelson, *Stalin, NKVD i repressii, 1936-1938*, Moscow: Rosspen 2008, 有关历史学介绍的章节。
- 27 比较 Oleg Khlevniuk,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From Collectiviz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0-185。
- 28 见1930年强制集体化期间，雅戈达对当地工会干部的评论，他不仅逮捕了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还逮捕了牧师、商人和前白军分子。“我们不是要在农村清除牧师、商人和‘其他人’。‘其他’？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抓的是谁。我们稍后会有时间解决商人和牧师。必须正确打击目标，即富农和富农反革命分子”，*Les Campagnes soviétiques vues par O. G. P. U.-NVKD, 1930-1934, Sovetskaia derevnia glazami OGPU-NKVD, 1930-1934*, ed. Viktor P. Danilov et al., vol. 3: 1, Moscow: Rosspen 2003, p. 107。
- 29 关于古拉格劳改营系统的相关经济意义，见 Paul Greg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the Gulag', in Paul R. Gregory & Valery Lazarev (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The Soviet Gulag*,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1-21。
- 30 见 Barrington Moore Jr., *Terror and Progr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31 V. N. Khaustov et al., *Lubianka: Stalin i Glavnoe Upravlenie Gosbezopasnosti NKVD 1937-1938*, Moscow: Demokratia 2004, passim。
- 32 对大恐怖为何以清洗秘密警察而告终这一经典说法的现代解释，见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350-354。当 Kotkin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进行大规模研究时，该地区的档案尚未对研究人

员，尤其是外国学者开放。

- 33 社会革命党是1917年12月制宪会议选举时的第一大党，在乌拉尔农村地区拥有坚实的基础。1917年，社会革命党分裂，成为左翼组织，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1918年夏，左翼社会革命党企图发动政变，他们的组织被禁止开展活动。在1918年的俄国内战中，社会革命党站在了白军一边，试图重新组建制宪会议，为俄国的民主发展奠定基础。1922年，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接受政治审判，罪名是煽动内战和从事恐怖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恐怖期间被指控“社会革命党反革命激进主义”的人是20年前社会革命党的成员，并且早已停止了任何政治活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的重大清算发生在1922年，见 Mark Jansen, *The Trial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Moscow 1922*, Niemegen: Martinus Nijhoff 1982 (Russian translation: *Sudbez suda: 1922 god. Pokazatel'nyi protsess sotsialistov-revolutsionerov*, Moscow: Vozvrashchenie 1993)。
- 3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288, op. 3, d. 165, l. 236–240。Memorandum po delu Lapshina, Lugovtseva, Voronchikhina i drugikh, 1940年6月19日。Igor Nepein, *Palachi i zhertvy*, Cheliabinsk n.p. 1997, pp. 189–193，摘录了这一针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判决的长篇节选。Nepein 在书中摘录了在大清洗期间被捕的车里雅宾斯克当地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的长篇审讯记录。他们精神崩溃，被迫承认想象中的罪行。Nepein 可以接触到车里雅宾斯克安全局的档案，可以非常详细地讲述清洗机制。被捕的四名作者中有两人被处决，另外两人在劳改营中幸存下来，并在20世纪50年代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他们在1937年遭受酷刑的经历。Nepein 的书中还收录了1940年和1946年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员的谈话记录，这些审讯员被指控使用非法手段强迫被捕者“认罪”，例如伪造已签署的“供词”，并编造了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整套反革命系统。

关于车里雅宾斯克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如何承认在1937—1938年间曲解莫斯科的命令，并对虚构的波兰阴谋和其他阴谋采取行动的更多细节，请参阅详细讲述乌拉尔地区国家安全机关三个世纪历史的一本书：Oleg Veprev & Viacheslav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Triveka na Iuzhnom Urale*,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2002, pp. 287–318。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的逼供无辜者的方法，可参阅 Aleksandr V. Churakov 的文章和文件，Aleksandr V. Churakov,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 nos 6 and 7, 2004。

- 35 Nepein, *Palachi i zhertvy*, pp. 193–194.
- 36 Nikita V. Petrov & K. V. Skorkin, *Spravochnik: 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

- Moscow: Zvenia 1999, pp. 436–437.
- 37 比较 Gábor T. Rittersporn, ‘The Omnipresent Conspiracy: On Soviet Imager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1930s’, in Arch Getty & Roberta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9–115。
- 38 *Reabilitatsiia-kak eto bylo*, vol. 1, pp. 75–77. 另见 1956 年 1 月 9 日第 15 号文件, 内容涉及针对共产党员的大规模清洗活动。
- 39 *Reabilitatsiia*, vol. 1, pp. 317–348, 波斯佩洛夫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该报告为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提供了事实依据。
- 40 关于俄罗斯历史学的这一动荡时期, 参见 Robert W. Davies, *Soviet History in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同上, *Soviet History in the Yeltsin Era*, London: Macmillan 1997。
- 41 *Reabilitatsiia-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 KPSS i drugie materialy*. vol. 1: March 1953–February 1956, eds. A. N. Artizov et al., Moscow: MFD 2000; vol. 2: February 1956–Early 1980s, Moscow: MFD 2003; vol. 3: Mid-1980s–1991, Moscow: MFD 2004.

第六章 车里雅宾斯克的生产备战 (1939—1940)

- 1 比较 Ernst Henry, *Hitler over Europe?*, London 1935; 同上, *Feldzug gegen Moskau?*, Strasbourg 1936. 这两本书都翻译成了俄文, 分别为 *Gitler nad Evropoj?* 和 *Gitler protiv SSSR: Grjadushchaia schvatka mezhdu fasjistskimi i sotsialistitjeskimi armijami*, 并大量发行。罗斯托夫斯基经常向《新政治家》和《国家》投稿。“二战”期间, 他曾在伦敦逗留, 回到苏联后, 他对斯大林执政最后几年的反犹运动中的镇压感到震惊。1965 年, 伊利亚·爱伦堡用磁带录下了恩斯特·亨利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过, 这些录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公开性”政策时期才得以出版。另见 Iakov Drabkin 和 Lev Bezymenskii 的文章, 载于恩斯特·亨利的两本书的再版中 (Moscow: Russkii raritet 2004, pp. 469–485)。
- 2 Michael Jabara Carley, 1939. *The Alliance that never was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Chicago: Ivan R. Dee 1999.
- 3 见 Alvin Finkel & Clement Leibovitz, *The Chamberlain-Hitler Collu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 4 Maurice Edelman, *How Russia prepared: U. P. S. R. beyond the Urals*, London: Penguin 1942.
- 5 Frey Rydeberg, Carl Kempff & Georg Gärden, *Det militariserade samhället: några fakta om Sovjetunionen och dess maktmedel*, Stockholm: Hasse W. Tullberg 1934.
- 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1, d. 451, l. 83-89, 103-108, 147-149。
- 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23, l. 81-82。
- 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1, l. 4。
- 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1, l. 24。
- 1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288, op. 3, d. 676, l. 26-31, 35, 关于车里雅宾斯克州机械制造业的报告, *Dokladnaia o rabote mashinostroitel- noi promyshlennosti Cheliabinskoi oblasti*。拥有 11 家大型企业的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对国防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 1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23, l. 81, 82。Jfr R-792.1.39: 83-83ob。
- 1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23, l. 84-88。
- 1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1, d. 29, l. 10。
- 1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39, l. 9-15。
- 1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2.23:31-32。
- 1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2.23: 33-39, Plan organizatsii kursov po povysheniiu kvalifikatsii rabotnikov moborganov NKSredMash。
- 1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23, l. 138-139。
- 1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288, op. 4, d. 14, l. 220-206, 马林内科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40 年 6 月 18—20 日。
- 1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1, d. 512, l. 41, Partinformatsiia Traktorozavodskogo raikoma VKP (b) v obkom, gorkom VKP (b), September 1940。
- 20 Igor Shmel'ev, *Istoriia tanka, 1916-1996*, Moscow: Tekhnika-molodezhi, 1996. 关于设计师和发明家科廷的生平, 见 *Konstruktor boevykh mashin (O Zh. Ia. Kotine)*, Leningrad: Lenizdat 1988。
- 2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1, d. 512, l. 69-72, Politicheskaiia informatsiia sekretariam gorkoma VKP (b) , t. Fokinu, 1940 年 6 月。
- 2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299, l. 110-114。
- 2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92, op. 1, d. 451, l. 89。
- 2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 124, op. 1, d. 178, l. 108, Spravka o kolichestve osuzhdennykh narushitelei trud [ovoi] distsypliny po ChTZ za period s 1 iuilia po 20 noi-abria

- 194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178, l. 89-93, Dokladnaia zapiska. Upravlenie kadrov TsK VKP (b), tov. Tsunikovu ot Burakovskogo, sekretaria partiinogo komiteta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zavoda im.Stalina。
- 25 见 Evan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 vol. XXV, pp. 818-865, 另见 Bianka Pietrow-Ennker (ed.) *Präventivkrieg? 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0。
- 26 RGAE, f. 7516, op. 1, d. 750, l. 1-10, *Postanovlenie SNK 1502-1503*。
- 2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88, l. 7-12, Prikaz po Narodnomu komissariatu srednego mashinostroeniia 'O meropriiatiakh po podgotovki k perekhodu promyshlennosti na mobilizatsionnyi plan po boeipisam', 10 June 1941。
- 28 早期关于拖拉机厂非常详尽的史料中, 几乎没有关于坦克生产的动员计划或生产调整准备的信息; 比较 L. S. Komarov & Je. G. Khoviv & N. I. Zarzhevskii, *Letopis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1929-1945 gg.)*, Moscow: Profizdat 1972。
- 29 见 Mary R. Habeck, *Storm of Steel: The Development of Armo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9-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0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列宁格勒的坦克生产, 见 A. N. Shcherba, 'Stanovlenie i razvitie tankovoi promyshlennosti Leningrada d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Peterburgskaia Istoricheskkaia shkola. Almanakh. I: O Viktoire Anatoleviche Ezhove i ego tvorchestve*, St. Petersburg 2001, pp. 232-250。
- 3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792, op. 1, d. 64, l. 79-85。
- 3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792, op. 1, d. 73, l. 108-109。
- 3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792, op. 1, d. 73, l. 240。
- 34 M. A. Feldman, 'K voprosu o stepeni gotovnosti promyshlennosti Urala k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Ural v voennoi istorii Rossii*, Ekaterinburg 2004, pp. 159-161。

第七章 乌拉尔地区重型坦克的生产条件

- 1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的无与伦比的历史, 请参阅 Alexander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 (London: Barrie & Rockliff 1964 and later)。Werth 的父母是俄罗斯人, 1917 年后移居英国。他写过几本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政治危机和 1940 年德国战胜法国的书。1941 年, 纳粹德国进攻苏联, Werth 乘坐护航蒸汽船横渡北

海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在战时莫斯科的第一篇报刊文章以 *Moscow '41* (London: H. Hamilton 1942) 为题发表。他比大多数通讯员更能感受到苏联士兵和普通苏联人之间的气氛。这构成了他后来著作的主要内容,但受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资料来源,这本书的篇幅有限。

他的儿子是法国历史学家 Nicolas Werth, 他与 Stephan Courtois 等人一起编纂了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法文版 1997 年)。在其他有关苏德战争的学术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 David M.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 K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8); Mikhail Meltiukhov, *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 Sovetskii Soiuz i bor'ba za Evropu, 1939-1941* (Moscow: Veche 2000)。Meltiukhov 并没有断然否认 1941 年苏联领导层可能计划对动员起来的德国军队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这种解释最初可追溯到希特勒本人关于在 1941 年发动入侵的说辞,但已被大多数俄罗斯和西方学者所摒弃。参见 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关于克里姆林宫(主要是斯大林本人)为何对德国的进攻感到惊讶,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驻柏林情报官大卫·墨菲(David E. Murphy)撰写了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一书。
- 3 *Warum Krieg mit Stalin? Das Rotbuch der Anti-Komintern*, Berlin: Niebelungen-Verlag 1941, pp. 57-73.
- 4 这里不适合对 1942 年 2 月柏林万湖会议就“犹太人问题”做出致命决定的原因进行研究调查。有一种假设认为,1941—1942 年秋冬季的“巴巴罗萨行动”失败后,德国军队未能征服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于是有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决定。德国的主要将领明白,对苏联的战争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获胜,而将是另一场持久的消耗战。

与这一假设相反的证据是,大规模处决犹太人以及共产党员和军队政委发生在 1941 年夏季,当时德军正向乌克兰和俄罗斯纵深推进。见 Pavel Polian, 'First Victims of Holocaust: Soviet-Jewish Prisoners of War in German Captivity',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New Series, vol. 6, No. 4, 2005, pp. 763-788。

- 5 这一有争议的主题在学术文献中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Johannes Rogalla von Bieberstein 的 '*Jüdischer Bolschewismus*'. *Mythos und Realität* (Schnellroda: Antaios 2003) 讨论了纳粹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概念。关于苏联在纳粹德国各社会团体、政党、教会和机构中的代表和形象的总体回顾,见 Hans-Erich Volkmann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Böhlau 1994。

- 6 D.V. Gavrilov, 'Ural'skii ty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Geopoliticheskii aspekt', in *Ural v Velikoi Otejtstvennoj voine, 1941-1945 gg.* Ekaterinburg 1995, pp. 55-62.
- 7 见 *Effects of Climate on Combat in European Russia*, Historical Study CMH Pub104-6,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 C., 无出版年份。
- 8 关于希特勒作为军阀和德国将军的作用的文献, 见 John Strawson, *Hitler as Military Commander*,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chapter: 'Barbarossa-The irretreivable Blunder'。关于德国对苏战争计划的长期视角, 请参见 Carl Dirks & Karl-Heinz Janßen, *Der Krieg der Generäle. Hitler als Werkzeug der Wehrmacht*, Berlin: Ullstein 1999。
- 9 Nikolai A. Voznesenskii, *Voennaia ekonomika SSSR v period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7], Moscow: Ekonomicheskaja gazeta 2003, pp. 101-113, 特别是第 110 页。
- 10 关于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和期间的活动, 见 Semën Zakharovich Ginzburg 的回忆录: *O proshlom-dlia budushchego*, Moscow: Politizdat 1983。在那些年里,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金兹堡只能提及建筑业中存在的强制集中营劳动。
- 11 见 Arsenii Iu. Ermolov, 'Perestroika tankovoi promyshlennosti SSSR 1941-42',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No. 3, 2004, pp. 28-34。
- 12 关于这位苏联军工综合体中的重要人物, 只有一本可靠的传记, 见 Viktor Andreevich Chalmaev, *Malyshev*,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78。这本书是 *Zhizn' zamechatel'nykh liudei* 系列丛书的一部分, 在披露有关苏联国防工业的精确数据方面比以往更加谨慎。后来, 马雷舍夫参与苏联核计划, 负责监督乌拉尔铀工厂的建设。他因过度暴露于放射性物质而英年早逝。另见 Vladimir Nikolaevich Novosëlov, 'V. A. Malyshev i N. P. Dukhov-vydaishchiesia organizatory oboronnoi promyshlennosti',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K 70-letiiu puska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zavoda)*, Cheliabinsk 2003, pp. 147-150。
- 13 例如, Aleksei Toptygin, *Laurentij Berija. Neizvestnyj marsjal gosbezopasnosti*, Moscow: Jauza/ Eksmo 2005, pp. 160f。贝利亚在 1944—1949 年苏联核计划中的作用解密后, 人们对这位内务人民委员 (部长) 的印象发生了些许变化。1953 年贝利亚被捕并被处决后, 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散布谣言, 不仅将 1937 年的大清洗归咎于贝利亚, 还讲述关于他疯狂的行为、变态的性趣, 甚至谋杀少女的传说, 这些少女可能都是他的副官在莫斯科街头抓来的。
- 14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乌拉尔车辆制造厂以及为生产 T-34 坦克而重建工厂的情况,

- 见 Sergei V. Ustiantsev, Alla V. Pislegina & Al'fiia Kh. Fakhretdenova, *Uralvagonzavod, Elita Rossiiskoi Industrii / Ural Car-Making Works: An Elite of the Russian Industry*, Ekaterinburg: Start 2001。
- 15 张伯伦对1917年事件的描述《俄国革命》(1934)至今仍值得对俄国历史感兴趣的人一读。战时来自苏联的所有报道都是有争议的,在实践中很难进行评估。西方记者必须在电报站向苏联审查员提交他们的报道。只有通过其他文章中的背景材料,英美报纸才能让读者对苏联的变化有更扎实的了解。关于三位著名通讯员在战时如何描述苏联的有趣比较,见 Allen McTavish Johnson, 'Moscow Dispatches, 1921-1934: The Writings of Walter Duranty,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and Louis Fischer in Soviet Russia', 博士论文, 杜兰大学, 2000年。在冷战期间,张伯伦是一名“鹰派”人物,他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战争最后几年对苏联的“让步”。
- 16 William H. Chamberlin, *The Russian Enigma*.
- 1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84, l. 33, 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关于根据1941年6月10日、11日和14日的计划立即转入弹药生产的命令。
- 18 Ivan Vernidub, *Boepripsy Pobedy. Ocherki*, Moscow: TsNIINTIKPK 1998, p. 27.
- 19 E. B. Druzhinina, 'Korol' tankov': Fakty iz biografii I. M. Zal'tsmana',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179-186.
- 2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95, ll. 184-185, 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诺森科致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工厂厂长扎尔茨曼, 1941年10月13日。
- 2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6, d. 292, l. 56-80。
- 22 1942年7月25日基洛夫工厂党委根据厂长马霍宁的报告做出的决议。
- 2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281, l. 92-94。
- 2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282, l. 102-104。
- 25 见 Jacques Sapir, *L'Économie mobilisée: Essai sur les économies de type sovié-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9; 同上, *Logik der sowjetischen Ökonomie oder die permanente Kriegswirtschaft*, Berlin: Lit 1992。
- 26 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沿岸,160个苏军师共派出110多万士兵和3500辆坦克,歼灭了5个轴心国集团军,其中两个是拥有50多个师的德国集团军。他们俘虏或杀死了60多万人。相比之下,在几乎同时进行的阿拉曼战役中,10个英国师和480辆坦克歼灭了9个德国和意大利师,
- 302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1900—1950年代)

- 损失约 6 万人，见 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pp. xv-xvii. Glantz (pp. 3-62) 还重点介绍了 1942 年红军一系列不太成功的行动。苏联官方史书对此只字未提，或以非常别扭的形式提及。
- 27 库尔斯克会战在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分析，而俄罗斯档案的开放揭示了关于双方力量关系和损失的一些新事实。David Glantz, *Colossus Reborn*, pp. 48-59; 另见 Robin Cross, *Citadel. The Battle of Kursk*,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93.
- 28 Eduard Sobolev, *Konstruktorskoe biuro: Sudby liudei i mashin*, Cheliabinsk, 'Vsem!', 1997, p. 86.
- 2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792, op. 14, d. 135, l. 14-15, 31-34。
- 3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792.5.40: 40-41。管理部门要确保人员往返工厂的交通，尤其是深夜轮班的人员。
- 31 Galina Kibitkina, 'Rozhdenie i stanovlenie Tankograda', *Tankograd*, No. 10, 1999, p. 2.
- 32 Aleksandr Bek, *Novoe naznachenie*, Frankfurt am Main: Posev 1972.
- 33 P. V. Ustiantsev, A. V. Pislegina & A. Ch. Fakhretdenova, *Uralvagonzavod, Elita Rossiiskoi industrii / Ural Car-Making Works: The Elite of the Russian Industry*, Ekaterinburg: Start 2001.
- 34 出版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资料集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的主持下,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1941-1945* 丛书出版了大量档案资料。有关最高军事领导层、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游击队运动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的专题资料集是对档案本身的可靠介绍。自 2007 年起，俄罗斯国防部的一项总命令启动了一项新的解密程序，对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中 1945 年之前的所有资料进行解密。
- 35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1941-1945* (Moscow: Nauka 1999) 第四卷的标题为“人民与战争”，就是这种新史学的一个例子。*Voina i obshchestvo* (Moscow: Nauka 2004) 一书也反映了过去 10—15 年的研究成果，其中约 30 篇文章涵盖了战史和后方历史，甚至还包括合作、逃兵、与东正教的关系以及战俘回国待遇等主题。

第八章 南乌拉尔地区：战争后方的 1418 个漫长日夜

- 1 K. I. Zubkov, 'Ural v geopoliticheskikh stratagemakh Vtoroi Mirovoi voiny', in *Ura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Ekaterinburg: RAN UO, Institut istorii,

- 1995; Iu.V. Velichko, 'Strategicheskoe znachenie Urala v period Vtoroi Mirovoi voiny', *Ural v strategii Vtoroi Mirovoi voiny*, Ekaterinburg 2000, pp. 72–76.
- 2 D. V. Gavrilov, 'Ural'skii ty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Geopoliticheskii aspekt', in *Ura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Ekaterinburg 1995, pp. 55–62.
- 3 见 Oleg Veprev & Viacheslav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Tri veka na Iuzhnom Urale*,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2002, pp. 319–352; Vladimir P. Motrevich, 'Novye materialy o deiatel'nosti germanskoi razvedki na Urale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OENnyi KOMmentator*, no. 1, Ekaterinburg 2002, pp. 63–76。
- 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6, d. 7, l. 382–383。
- 5 P. G. Agaryshev & N. P. Paletskikh, 'Cheliabinskaiia oblast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in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208–211.
- 6 一般而言,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铁路系统,以及在苏德战争初期向前线运送部队和同时向东疏散工业和人口的问题,见 Georgii A. Kumanev, 'Podvig zheleznodorozhnikov', *Eshelony idut na vostok: Iz istorii perebazirovaniia proizvoditel'nykh sil SSSR v 1941–1942 gg.*, Moscow: Nauka 1966, pp. 116–140。
- 7 发给人民委员的报告描述了当大量撤离的装备一批又一批运抵时的混乱场面。货物有时会在车站滞留数日,而不是尽快装车;例如,见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的报告, f. 288, op. 9, d. 288, l. 116。
- 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20, op. 13, d. 1, l. 85–86, 317; P-792, op. 7, d. 13, l. 2–4。
- 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142, op. 3, d. 2, l. 31–39, 60–62; f. P-288, op. 4, d. 146, ll. 36–43。
- 10 *Direktivnye ukazaniia vysshikh organov gosudarstvennoi vlasti po voprosam evakuatsii i reevakuatsii naseleniia*, March 1940–October 1945(超过 100 页),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142, op. 3, d. 2, 25–30, 31–39, 60–62。
- 11 V. D. Pavlenko, 'Rol' Cheliabinskogo oblispolkoma v priëme i razmeshchenii evakuirovannogo naseleniia (iiun 1941–1942 gg.)', in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212–215; M.N. Potëmkin, 'Evakuirovannye v Cheliabinskoi oblasti: Vklad v delo Pobedy', *ibidem*, pp. 216–220。
- 1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224, 7–12, 68, 126–132。
- 1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177, op. 2, d. 29, l. 20–21。
- 1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6, d. 7, l. 71–72。

- 15 对战争年代国安部门（NKVD-GUGB）的作用和工作情况的分析，见 Aleksandr I. Volkhin, 'Bor'ba orga-nov NKVD-GUGB Urala i Sibiri s antisovetskoi agitatsiei i propagando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OENnyi KOMmentator*, Ekaterinburg, 2001, no.1, pp. 19-46; 同上, 'Poisk povstanchesких organizatsii organami NKVD-GUGB, borba s terroristicheskimi aktami i banditizmom na Urale i v Sibir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ibidem*, pp.47-62。
- 1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146, op. 1, d. 10, l. 43。
- 1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11, l. 8-9。
- 18 E. B. Druzhinina, 'Korol tankov': Fakty iz biografii I.M. Zaltsmana',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K 70-letiiu puska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zavoda)*, Cheliabinsk 2003, p. 180.
- 1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8, d. 145, l. 78-81。
- 2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402, op. 1, d. 1, l. 225-229; 关于应演出哪些戏剧的报告备忘录。令人遗憾的是, 乌拉尔作家没有创作出本地题材的剧本 (l. 82-83)。关于战争年代车里雅宾斯克文化生活的总体情况, 见 Aleksandr V. Speranskii, *V gornile ispytanii: Kul'tura Urala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Ekaterinburg: UrO RAN 1996, ch. V, pp. 175-218, 关于神职人员在动员民众方面的作用。
- 2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8, d. 145, l. 78-81。
- 2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3, d. 87, l. 2。
- 23 给苏联副总检察长莫基切夫的关于企业罪犯问题的报告, 1942年12月,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3, d. 108, l. 21-22。
- 24 见《真理报》, 1944年12月27日。
- 25 参见工厂劳动力调查,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1, d. 221, l. 176。
- 26 *Svodka o sostoianii trudovoi distsipliny po Kirovskomu zavodu*, Deputy Director Tilip.
- 2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97, op. 2, d. 858, l. 29, 8。
- 28 RGASPI, f. 644, op. 14, d. 14, l. 144; data according to A. A. German & A. N. Kurochkin, *Nemtsy SSSR v 'trudovoj armii'*, p. 122.
- 2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74, d.2, op.5, l. 50。
- 30 1943年1月4日给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00, op. 13, d. 10, l. 17。
- 3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6, d. 18, l. 32, 36-37。
- 32 关于按照计划在12月前10天(10天)交付35门喀秋莎火箭炮的报告, 车里雅

- 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123, l.124; Letter from Director Poliantsev to obkom Secretary Kashina 31 October, 194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123, ll. 70-71。
- 33 见 G. K. Pavlenko, 'Kadry trudovykh rezervov Cheliabinskoi oblasti, 1940-1945 gg.', in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240-244。
- 3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125, l. 106。
- 3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3, d. 5, l. 85-87。
- 3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74, op. 3, d. 1429, l. 53-53ob。
- 3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6, d. 213, l. 18-18ob, 33-33ob, 40-40ob. 1942 年 10 月 14 日会议速记。
- 3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5, d. 33, l. 21a。
- 3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317, op. 21, d. 17, l. 130-132。
- 4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5, d. 58, l. 116-117。
- 4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5, d. 77, l. 92。
- 4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307, l. 73-74ob。
- 4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6, d. 358, l. 1; G. A. Goncharov, 'Chislenost' i razmeshchenie' trudarmeitsev' na Urale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Promyshlennost' Urala v XIX-XX vekakh*, Moscow: AIRO-XX 2002, p. 247。
- 4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322, l. 1-1ob, 5-7。
- 4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92, op. 5, d. 228, l. 9。
- 46 G. A. Goncharov, 'Osobyie stroitel'nye montazhnye chasty (OSMCh) na Urale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Ural v voennoi istorii Rossii: Traditsii i sovremennost'*, Ekaterinburg 2003, pp. 27-30。
- 4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322, l. 28。给车里雅宾斯克州内务系统部队军事检察官的关于逃兵的报告,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3, d. 108, l. 1-1p。
- 48 Leonid L. Mininberg, *Sovetskie evrei v nauke i promyshlennosti SSSR v period vtoroi mirovoi voiny (1941-45gg.)*, Moscow: ITs-Granit 1995, p. 372。还有人说, 在阴天根本看不到列宁雕像, 而在晴天, 这座建筑甚至会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投下阴影。20 世纪 90 年代, “新俄罗斯人” 和市政当局设法按照 19 世纪的原始图纸迅速重建了大教堂。[“新俄罗斯人” (new Russians) 可大致理解为当时的“新贵”。——编者]

- 49 *Cheliabinskaia oblast, 1917-1945*, 第 262 号文件及脚注 235—236 中的评注。
- 50 关于涉及作为苏联公民的德裔苏联人的决定, 见著名专家 Nikolai F. Bugai 编辑和评论的文献集, ‘Mobilizovat’ nemtsev v rabochie kolonny... I. Stalin’, Moscow: Gotika 1998; 以及 A. A. German & A. N. Kurochkin, *Nemtsy SSSR v ‘trudovoi armii’ (1941-1945)*, Moscow: Gotika 1998。
- 51 那些假装工作、工作速度过慢, 甚至破坏建筑工地的人被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 并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例如, 请参阅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2 年 3 月 24 日的命令,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1619, op. 1, d. 7, l. 20-22, in *Cheliabinskaia oblast, 1917-1945*,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izdatel’stvo 1999, pp. 203-204。
- 52 T. V. Koshman, ‘Trudarmeitsy Kazakhstana na voennykh ob’ektakh Urala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in *Ural v voennoi istorii Rossii: traditsii i sovremennost*, Ekaterinburg 2004, pp. 71-75。
- 53 *Skvoz gody: Cheliabinskii metallurgicheskii kombinat. Istor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ChMK 1994。
- 5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619, op. 1, d. 33, l. 46-47。
- 55 Nikita V. Petrov & K. V. Skorkin, *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 Spravochnik*, Moscow: Zvenia 1999, pp. 356-357。
- 5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878, op. 1, d. 302, l. 15-18。
- 5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619, op. 2, d. 26, l. 1-2, 5。
- 58 Marina Salmina 和她在拖拉机厂区 (Traktorozavodskii) 第 59 号学校的学生们对车里雅宾斯克不为人知的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Ekaterina Burkova 和 Natal’ia Aksionova 撰写了一篇关于乌拉尔地区德国战俘的学期论文 (‘Voennoplennye Germanskoi armii na Urale 1942-1955 g.g.’)。他们的论文依据的是市内一处理葬战俘的荒废墓地的大量文献资料, 以及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的 100 多份档案文件。他们的论文描述了战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以及他们在战后重建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 59 Gennadii Kornilov, *Uralskoe selo i voina (Problemy demograficheskogo razvitiia)*, Ekaterinburg: Uralagopress 1993, pp. 38-39. Kornilov 是分析战争年代乌拉尔地区濒临饥荒状况的先驱, 苏联史学界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Kornilov 的研究基于来自农村的大量报告, 这些报告称数百个丈夫被征召入伍的家庭正在挨饿, 许多孩子因营养不良而肚皮肿胀。
- 60 Nadezhda P. Paletskich, ‘Spetsposeleniia na Urale v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 voiny',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154–157.
- 61 关于战争期间苏联的总体粮食状况，见 William Moskoﬀ, *The Bread of Affliction: The Food Supply in the USSR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2 V. P. Motrevich, 'Golod na srednem Urale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Ural v voennoj istorii Rossii*, Ekaterinburg 2003, pp. 85–88.
- 6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220, op. 6, d. 8, l. 373–375。
- 6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220, op. 6, d. 3, l. 70–72。
- 6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R-1146, op. 1, d. 21. 25。
- 6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R-200, op. 6, d. 91. 22。
- 6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P-288, op. 8, d. 32, l. 14。
- 68 I. A. Usjlik, 'Bor' ba s ugovnoj prestupnost' iu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in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225–227。
- 6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220, op. 6, d. 8, l. 378–379。
- 7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R-274, op. 3, d. 1616, l. 157。
- 7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P-297, op. 2, d. 904, l. 75–81。
- 7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R-220, op. 6, d. 7, l. 35。
- 73 *Zhenskoe litso Pobedy. 100 dokumentov o zhenshchinakh Cheliabinskoi oblast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Cheliabinsk 2002, p. 214, note 49, 基于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P-385, op. 6, d. 10, l. 134, 191; P-915, op. 1, d. 62, l. 23。
- 7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804, op. 7, d. 93, l. 15–27。
- 75 Iakov Goldstein, *Otkrovenno govoria. Vospominaniia, razmysleniia*, Cheliabinsk: Rifei 1994, p. 166. Goldstein 讲述了很多他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不过，他也经常重述同胞们的爱情生活和风流韵事，在他看来，有些人未婚夫和伴侣的更换比换衬衫还频繁，而且不遵守通常的道德规范。Goldstein 断言，扎尔茨曼与女起重机械操作员和女秘书有过多次恋情，这种说法应该慎重对待（同上，pp. 162–166）。
- 76 Kornilov, *Ural'skoe selo i voina*, Ekaterinburg 1993, p. 45.
- 7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1595, op.1, d.63, l. 8, rapport om hälsöläget i Cheliabinsk under krigsåren, 15 November 1944。
- 7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288, op. 8, d. 32, l. 13–14。
- 7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288, op. 9, d. 37, l. 40。
- 8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f. R-792, op. 7, d. 13, l. 131。

- 8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7, l. 36-37。
- 8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8, l. 59。
- 8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1555, op. 1, d. 51, l. 18-18ob。
- 84 N. N. L. Usol'tseva, 'Mediko-sanitarnoe obsluzhivanie trudniashchichsia ChTZ v gody Velikoi Otetejstvennoi voiny (1941-1945 gg.)',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162-165.
- 8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792, op. 7, d. 20, l. 61。
- 8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840, op. 2, d. 57, l. 64-64ob。
- 8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10, l. 13。
- 8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74, op.20, d. 5, l. 43。
- 89 例如, 见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4, d. 275, l. 8-12; 比较 1941 年 7 月 12 日关于战争爆发后如何在城区组织政治学习的报告,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288, op. 4, d. 238, l. 11-12ob, 58。
- 9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8, d. 145, l. 19-161, 1944 年授课清单和说明。
- 9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8, d. 145, 19-21ob, 63-67, 78-81, 1944 年下半年演讲活动调查。
- 9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7, d. 13, l. 160。
- 9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804, op. 7, d. 111, l. 107; *Cheliabinskii rabochii*, 6 August 1943, No. 161, p. 2。
- 94 M. V. Gavrilinia, 'Iuzhno-Ural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Vekhi istorii', *Ural v istorii Rossii*, pp. 308-310.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原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更名为南乌拉尔国立大学, 并增加了经济和法学系。
- 9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9, d. 285, l. 3-8. Petrov, Informatsiia otdela propa-gandy i agitatsii Cheliabinskogo gorkoma VKP (b), 5 May 1945.
- 9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288, op. 9, d. 225, l. 14-16. Informatsiia o provedenii Dnia Pobedy v gorode Zlatouste.

第九章 冷战时期车里雅宾斯克的新型军工综合体

- 1 M. V. Gavrilinia, 'Iuzhno-Ural'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Vekhi istorii', *Iuzhnyi Ural v istorii Rossii*, pp. 308-310.
- 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39, l. 126-129。

- 3 “封闭城市”后面的数字与距离或位置无关。选择这些数字只是为了传播有关军工综合体中最秘密的对象的虚假信息。
- 4 战后坦克生产概况见 Liubov' V. Shubarina, 'Borba SKB ChTZ za liderstvo v sozdanii i proizvodstve tiazhëlykh tankov (1945–1960 gg.)',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285–288.
- 5 E. L. Glotova, 'Osnovnye napravleniia konversii predpriatii mashinos-troeniia Cheliabinskoi oblasti (1945–1949)',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pp. 289–292.
- 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R-792. 19. 44: 1–15, 根据 1945 年 5 月 26 日马雷舍夫人民委员的命令进行重建的基础和经济计算。其中还简要介绍了工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建设情况。关于 1947 年 4 月工厂破旧部件的清单, 见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5, d. 106, l. 17–22。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活动, 见 *Otchët o rabote Kirovskogo zavoda v g. Cheliabinske za 1947 god.*, f. R-792, op. 19–s, d. 87, l. 1–10, 52–66。 *Godovoi otchët po osnovnoi deiatelnosti na 1948 g.*,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9, d. 101, l. 3–10, 65–73。
- 7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124, op. 821, l. 116–121。
- 8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9, d. 111, l. 84–86。 扎尔茨曼关于 IS-4 重型坦克的说明,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5, d. 54, l. 1–6。 关于“701”坦克, 见他 1946 年 3 月 19 日的说明,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5, d. 9, l. 1–3。
- 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6, d. 181, l. 14–24。 Prikaz ministra Transportnogo mashinostroeniia Soiuza SSR, Nosenko, 1949 年 2 月 19 日。 军队的要求是: 最重 50 吨, 乘员 4 人, 一门 122 毫米 D-25 火炮, 两挺 12.7 毫米 DShK 机枪, 与 IS-3 相同的装甲, 至少相同的最大速度, 每平方米 0.77–0.8 千克的地面压力, 425–450 升的柴油油箱, 650 马力的发动机 (每吨 13 马力), 续航能力 2000 公里, 发动机连续工作 200 小时。
- 10 A. R. Zaets, 'Proizvodstvo bronetankovoi tekhniki na Urale v poselvoennyi period', in *Ural v voennoi istorii Rossii: Traditsii i sovremennost'*, Ekaterinburg 2003, pp. 35–40。
- 1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7, d. 29, l. 79–91, 科廷 1946 年 9 月 8 日的演讲内容体现了对战争期间军备发展的实际特征与和平时期的演变的细致调查。
- 12 *Bez tain i sekretov* 中的文章介绍了列宁格勒与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设计师合作生产的最重要的坦克。 另见 Liubov V. Shubarina, 'Bor'ba SKB ChTZ za liderstvo v sozdanii i proizvodstve tiazhëlykh tankov (1945–1960 gg.)', in *Iuzhnyi Ural vsud'be*

- Rossii, pp. 285–288; 同上, ‘Sozdanie tanka T–10 na Cheliabinskome traktornom zavode (1948–1951)’,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pp. 226–229.
- 13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220, op. 13, d. 40, l. 10–14 March 1950。市苏维埃和市委的决定。
 - 1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20, l. 53–54。
 - 1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6, d. 31, l. 92–97。
 - 16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92, op. 6, d. 31, l. 92–97。
 - 17 Elena Zubkova, *Poslevoennoe sovetskoe obshchestvo: Politika i povsednevnost’, 1945–1953*, Moscow: Rosspen 1999, p. 43.
 - 18 *Voprosy istorii*, 1994 年第 2 期, 第 60 页;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1997 年第 5 期, 第 168 页。关于“二战”最后阶段被驱逐到车里雅宾斯克和科佩伊斯科的德国妇女, 见 Freya Klier, *Verschleppt ans Ende der Welt: Schicksale deutscher Frauen in sowjetischen Arbeitslagern*, Berlin: Ullstein 1999, p. 204。有人说, 这些被捕的德国妇女弥补了俄罗斯男性劳动力的缺口, 这些俄罗斯男性如果没有被这些妇女的丈夫杀害的话, 本可以替代成为劳动力。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战争贡献。
 - 19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 d. 96, l. 111–113, 扎尔茨曼厂长和运输机械制造部部长诺森科的信, 1948 年 9 月。
 - 2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9, d. 96, l. 95。
 - 21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6, d. 12, l. 16–20, 关于替代外国战俘的劳改营囚犯。
 - 2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220, op. 13, d. 20, l. 61–61ob。
 - 23 N. P. Khomutova, ‘Zhilshchnyi vopros na predpriiatiakh voenno-promyshlennogo kompleksa Iuzhnogo Urala (1945–1955 gg.)’, *Iuzhnyi Ural v istorii Rossii*, pp. 303–307。
 - 24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9, d. 111, l. 94–95。
 - 25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R–792, op. 15, d. 250, l. 7。
 - 26 RGASPI, f. 17, op. 3, d. 1077, l. 32;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f. P–124, op. 1, d. 904, l. 88–91。
 - 27 关于扎尔茨曼事件, 见 Gennadii V. Kostyrchenko,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Vlast’ i antisemitizm*,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01, pp. 616–618。另见政治局 1950 年 1 月 26 日对车里雅宾斯克市、车里雅宾斯克州和市委书记别洛博罗多夫的批判, *TsK VKP (b) i regional’nye partiinnye komitety, 1945–1953*, V. V. Denisov et al. (ed.), Moscow: Rosspen 2004, pp. 240–244。

- 28 Isaak Zaltsman & G. Edelgauz, 'Vspominaia uroki Tankograda', *Kommunist*, 1984, no. 16, pp. 76–87.
- 29 Galina Kibitkina, 'Korol' tankov',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手稿。关于地方一级对扎尔茨曼的指控, 见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 P-124/1/904/88–91, Postanovlenie sobraniia partiinogo aktiva Kirovskogo zavoda, 1949年7月19—20日。
- 30 另见资料卷 *Sovetskaia zhizn, 1945-1953* 中的文件。Seria Dokumenty sovetskoï istorii. Ed. E. Iu. Zubkova, L. P. Kosheliova, G. A. Kuznetsova, A. I. Miniuk & L. A. Rogovaia, Moscow: Rosspen 2003, pp. 292–293。
- 31 M. N. Fedchenko, 'Molodëzh ChTZ. Iz opyta sotsializatsii v usloviakh proizvodstvennoï mikrosredy (1946–1950)',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p. 221.
- 32 E. B. Druzhinina, 'Korol' tankov': Fakty iz biografii I. M. Zaltsmana',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p. 180.
- 33 Elena Zubkova, *Poslevoennoe sovetskoe obshchestvo: Politika i povsednevnost, 1945-1953*, Moscow: Rosspen 1999, pp. 146–148.
- 34 另见 A. I. Prishpea, 'O nachal' nom periode dissidentstva v SSSR (na primerakh Urala)', *Totalitarizm v Rossii (SSSR) 1917-1991. Oppozitsiia i repressii*. Materialy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 Perm 1998, pp. 56–64。
- 35 P. R. Rozhdstvenskii, 'Materialy k istorii samodeiatelnykh molodëzhnykh obedinenii v SSSR posle 1945 goda', *Pamiat. Istoricheskii sbornik*, Moscow 1981/ Paris 1983, p. 226.
- 36 E. Iu. Shutkova, 'Molodëzhnaia oppozitsiia stalinizmu v poslevoennoe vremia', *Totalitarizm v Rossii (SSSR) 1917-1991. Oppozitsiia i repressii*, Materialy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 Perm 1998, pp. 71–73.
- 37 Vladimir Novosëlov & Vitalii Tolstikov, *Tainy 'Sorokovki'*, Ekaterinburg: Ural'skii Rabochii 1995.
- 38 Sergei Vladimirovich Tulinskii, *Iuzhno-Ural'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1943-2003. Istor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IuUrGU 2003.
- 39 Tatiana P. Pushkarëva, 'Dukhov, Leonid Nikolaevich, 'Inzhener-konstruktor. 100 let so dnia rozhdeniia', *Kalendar' znamenatel'nykh i pamiatnykh dat*, Cheliabinsk 2004, pp. 159–162. 关于南乌拉尔国立大学 (IuUrGU) 从伟大的卫国战争最后几年成立的理工学院开始的历史, 见 Sergei Tulinskii, *Iuzhno-Ural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1943-2003. Istor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IuUrGU 2003。
- 40 Aleksandr Finodeev, 'Uchastie Kirovskogo zavoda Narkomata (Ministerstva)
- 312 坦克格勒——苏联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 (1900—1950年代)

transportnogo mashinostroeniia v sozdanii iadernogo oruzhiia',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pp. 223–225; 同上, 'Nachal'nyj etap razvitiia raketnoi promyshlennosti na Iuzhnom Urale',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Materialy nauchnoi konferentsii*, pp. 279–284。另见 V. P. Terekhov, 'Stanovlenie i razvitie Ural'skogo raketostroitel'nogo kompleksa', *Ural v voen-noi istorii Rossii: Traditsii i sovremennost*, Ekaterinburg 2004, pp. 138–148。

第十章 今日车里雅宾斯克的历史记忆与研究

- 1 参见 Igor Narskii (ed.), *Vek pamiatii, pamiat' veka: Opyt obrashcheniia s proshlym v XX stoletii*, Cheliabinsk: Kamennyi poias 2004。
- 2 美国著名的苏联国防工业和军事战略专家雷蒙德·加索夫 (Raymond Garthoff) 描述了美国情报部门是如何几乎偶然地 (由于苏联方面的失误) 发现乌拉尔地区“原子城”的位置的。在一份地区报纸上的一张模糊照片上, 人们看到了乌拉尔地区的高压电网, 而早在 U-2 间谍飞机飞越苏联上空的几年之前, 人们就已经准确地知道了苏联“原子城”的位置。见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A Memoir of Containment and Coexist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p.94。
- 3 有两本关于新资料来源的指南可作为解密文件和最近出版的文件的极佳入门; 比较 I. A. Kodrakov, *Otkrytyi arkhiv-2. Spravochnik sbornikov dokumentov, vysjedshikh v svet v otechestvennykh izdatel'stvakh v 1917-2000*, Moscow: Rosspen 2005。
- 4 Igor Narskii, *Zhizn' v katastrofe: Budni naseleniia Urala v 1917-1922 gg.*, Moscow: Rosspen 2001。另见 A. V. Ivanov & A. T. Tertyshnyi, *Ural'skoe krest'ianstvo i vlast' v period grazhdanskoi voiny (1917-1921gg.): Opyt osmysleniia problemy v otechestvennoi istoriografii*, Ekaterinburg: Ural'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ekonomiki, 2002, 其对有关 1918—1921 年内战 (乌拉尔地区) 的苏联史学和俄罗斯近代史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 5 Aleksandr Bazarov, *Kulak i Agro-Gulag*, vol. 1,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1; 同上, *Durelom ili gospoda kolkhozniki*, vol. 1–2, Kurgan: Zaural'e 1997。
- 6 Tatiana Slavko, *Kulatskaia ssylka na Urale, 1930-1936*, Moscow: Mosgorarkhiv 1995。
- 7 Viktor Kirillov, *Istoriia repressii v Nizhnetagil'skom regione Urala, 1920-1950 gody*, vol.

- 1-2, Nizhnii Tagil 1996; 同上, *Istoriia repressii i pravozashchinoe dvizhenie v Rossii*, Ekaterinburg: UMTs UPI 1999; 同上, *Kniga pamiati. Posviashchaetsia Tagilchanam-zhertvam repressii 1917-1980-ch godov*, Ekaterinburg: UIF Nauka 1994; *Zhertvy repressii; Zhertvy repressii: Nizhnii Tagil 1920-1980-e gody*, Ekaterinburg: n. p. 1999。另见他的 *Sostoianie raboty nad knigami pamjati zhertv polititjeskich repressij v Rossii, Kazachstane i Ukraine*, Nizhnii Tagil: n. p. 2002。
- 8 M. A. Feldman, 'Industrializatsiia v Rossii i v SSSR v 20-30-e gg. XX veka (metodologicheskie aspekty)',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71-74.
- 9 Igor Narskii (ed.), *Ural v kontekste rossiiskoi modernizatsii. Sbornik nauchnykh statei*, Cheliabinsk: Kamennyi poias 2005.
- 10 车里雅宾斯克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 Aleksandr Finodeev、Galina Kibitkina 等人编辑了大量文献集, 如 *Cheliabinskaia oblast, 1917-1945. Neizvestnaia voina, 1941-1945. Zhenskoe litso Pobedy* 和 *Eti detskie voennye gody*。
- 11 Aleksandr Finodeev (ed.), *Arkhiv-khranitel vremeni. Istoriia arkhivnoi sluzhby Cheliabinskoi oblasti v dokumentakh, vospominaniakh, fotografiakh*, Cheliabinsk: ChPO Kniga 2004.
- 12 见 *Cheliabinskii rabochii* 报上的“处决名单”(Rasstrel'nye spiski), 如 1990 年 3 月 23 日, 4 月 3、11、18、25 日, 5 月 15、29 日, 6 月 6、28 日, 7 月 10、19、24 日, 8 月 7、14、28 日; 1991 年 7 月 7、8、9、14、23、30 日, 8 月 4、25 日, 9 月 1、5、29 日, 11 月 4、12、24 日和 12 月 24 日; 1992 年 1 月 3、15 日, 2 月 19、25 日, 3 月 3、11、31 日, 4 月 8 日, 5 月 6、13、19 日, 6 月 16 日, 7 月 7、8、9、14、23、30 日, 9 月 1、5、29 日, 11 月 4、12、24 日, 12 月 24 日。在“Reabilitirovannye”标题下, *Vechernii Cheliabinsk* 于 1992 年 11 月 24、26 日以及 12 月 3、8、10、24 和 29 日刊登了 106 人的名单。每期报纸都刊登了数百个人名和简短的传记资料。甚至在很久以后, 当地报纸仍在刊登类似的文章和苏联时期政治压迫受害者名单。
- 13 见 Stephen Kotkin, 'Modern Tim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Interwar Conjunctio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2, nr 1, 2001, pp. 111-165。
- 14 Leonid Komarov, *Rossiia tankov ne imela*, Cheliabinsk: n. p. 1993.
- 15 Vladimir Novosiolov & Vitalii Tolstikov, *Tainy 'Sorokovki'*, Ekaterinburg: Uralskii Rabochii 1994.

- 16 Aleksandr Vasil'evich Bakunin, *Istoriia sovetskogo totalitarizma*, vol. 1, Ekaterinburg 1996.
- 17 比较 Aleksandr V. Speranskii, 'Totalitarnaia kultura SSSR i Germaniia 30–40-kh gg: Skhodstva i razlichiiia', *Ura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Ekaterinburg 1995, pp. 101–107.
- 18 E. E. Ivanov & M. A. Kudinov,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glazami russkoi emigratsii',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190–193. 关于 Piotr Struve、Pavel Miliukov、Sergei Melgunov 以及其他流亡的俄罗斯历史学家, 见 *Istoriki-emigranty. Voprosy russkoi istorii v rabotakh 20-x-30-x godov*, Moscow: Institute of Russian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2; Iurii N. Emelianov, *S. S. Melgunov: V Rossii i emigratsii*, Moscow: Editorial URSS 1998.
- 19 Igor Narskii (ed.), *Chelovek i voina. Voina kak iavlenie kultury*, Moscow: AIRO–XX 2001.
- 20 Boris Lichman, *Mnogokontseptual'naia istoriia Rossii. Posobie dlia abiturientov*, Ekaterinburg: SV–96 2000; 同上, *Istoriia Rossii: Teoriia izucheniia*, vol 1: *S drevneishikh vremën do kontsa XIX veka* & vol. 2: *Dvadtsatyi vek*, Ekaterinburg: SV–96 2001.
- 21 参见 Lichman, *Istoriia Rossii*, vol. 2, *Dvadtsatyi vek*, pp. 126–167, 涉及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50 年代的伟大变革。
- 22 P. E. Alekseev & V. D. Kamynin,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kak obiekt mnogokontseptual'nogo rassmotreniia',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pp. 168–171.
- 23 请特别比较 Marina Sergeevna Salmina, *Istoriia luzhnogo Urala. XX-nachalo XXI veka*, Cheliabinsk: Vzgliad 2004.
- 24 例如, 见 A. A. Danilov, L. G. Kosulina & A. V. Pyzhkov, *Istoriia Rossii. XX-nachalo XXI vekov. Uchebnik dlia 9 klassa obshcheobrazovatelnykh uch-rezhdenii*, Moscow: Prosveshchenie 2003, p. 27. 'Sotsial'naia sistema v 1930–e gody', pp. 205–209, 以及工作文件中为学生规定的任务: *Rabochaia tetrad po istorii Rossii. XX vek: 1928–1953*.
- 25 比较纪念馆在“历史中的人物”丛书中出版的全俄罗斯学生竞赛学期论文。'Man in History. Russia's 20th century': *Chelovek v istorii. Rossiia-XX vek. Sbornik rabot pobeditelei*. Moscow: Obshchestvo Memorial / Zvenja 2001–2008.
- 26 Ilya Polezhaikin, 'Prinuditel'nyi trud na Cheliabinskomo Traktornom Zavode', 第 59 号普通学校 11 年级学期论文。

- 27 见 Ekaterina Burkova & Natalia Aksēnova 的学期论文 ‘Voennoplennye germanskoi armii na Urale, 1942–1955 gg.’, 第 59 号普通学校 11 年级学期论文; 另见 Marina P. Salmina, *O chēm rasskazalo staroe kladbishche. Po materialam issledovatel'skoi deiatel'nosti uchashchichsia*, Cheliabinsk: Cheliabin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2003。
- 28 Denis A. Stepanov, ‘Donos kak sposob vzaimootnoshenii cheloveka s vlast'iu. (Po materialam dokumentov 1920x–1940–kh gg. v OGACHO)’, 2003 年车里雅宾斯克第 59 号普通学校 11 年级学期论文。年轻的斯捷潘诺夫研究了一个在西方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课题。他热切地听我描述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和其他历史学家是如何分析斯大林治下的告发制度 (donositel'stvo) 的。例如, Sheila Fitzpatrick, ‘Suplicants and Citizens: Public Letter-Writing in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Slavic Review*, Spring 1996, no. 1, pp. 78–105。
- 29 Vladimir Karpov, *Generalissimus*, Moscow: Veche 2003。
- 30 关于全国各地所有镇压受害者名单的调查, 见 *Knigi pamyat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j v SSSR: Annotirovannyi ukazatel*, St. Petersburg: Rossiiskaia natsionalnaia biblioteka 2003, 由 Vozvrashchennyje imena 协会的 Anatolii Razumov 编辑; 特别是关于来自车里雅宾斯克州的殉难文献, p. 181。
- 31 关于克格勃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改造过程, 见 Oleg Veprev & Viacheslav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Tri veka na Iuzhnom Urale*,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2002, pp. 381–384。
- 32 ‘Ob utverzhenii Polozheniia o gorodskoi komissii po vosstanovleniiu prav lits, postradavshikh ot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Vechernii Cheliabinsk*, 2000 年 4 月 27 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地方纪念团体建立了关于政治压迫受害者的数据。这些数据大多已制成光盘, 由“纪念”协会出版。
- 33 ‘V oblasti-11592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Vechernii Cheliabinsk*, 1994 年 10 月 11 日; 另见 Veprev &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p. 383; G. Gavrilova, ‘Stranichka istorii: Den' politzakliuchennykh’, *Vechernii Cheliabinsk*, 1999 年 11 月 4 日。
- 34 比较对首席档案员兼车里雅宾斯克州档案委员会副主席加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基比特金娜的采访, ‘Voennye tainy KPSS raskryty’, *Vechernii Cheliabinsk*, 2001 年 5 月 31 日, 以及解密文件清单: *Rassekrechennye dokumenty (55-letiiu Pobedy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posviashchaetsia)*, Komitet po delam arkhivov and OGACHO, vols. 1–2, 2000。

参考文献

(据原书影印)

报纸

In my research, the bibliographical handbooks *Literatura o Cheliabinskoi oblasti: Tekushchii bibliograficheskii ukazatel'*, no. 1 (127)/ 1991– no. 1 (144)/2000, Cheliabinsk: Cheliabinskaia universal'nai nauchnaia biblioteka, 1993–2003, have been most useful for locating articles in the regional and city press and periodicals. The newspapers *Cheliabinskii rabochii* (the Cheliabinsk worker) and *Vechernii Cheliabinsk* (Evening Cheliabinsk) have provided background material on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 However, I did not use articles in the press as sources on the realities in the changing Soviet society.

原始资料

Cheliabinsk Region in Photos, 1920–1940 /Cheliabinskaia oblast' v fotosnimkakh, 1920–1940, ed. V. I. Bogdanovskii, text by K. A. Shishov, Cheliabinsk: Kamennyi poias 2001.

Cheliabinsk Region in Photos, 1940–1960 / Cheliabinskaia oblast' v fotosnimkakh, 1940–1960, eds. V. I. Bogdanovskii, K. N. Bochkarëv et al., Cheliabinsk: Kamennyi poias 2002.

Cheliabinskaia oblast', 1917–1945.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eds. P. G. Agaryshev, N. A. Prykina, E. P. Jurova, I. S. Iangirova,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izdatelstvo 1998.

Davies, R.W., Oleg V. Khlevniuk & E.A. Rees, eds. *The Stalin– Kaganovich Correspondence, 1931–1936*,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ti detskie voennye gody, 1941–1945.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eds. Aleksandr P. Finodeev, Elena P. Turova, Elena A. Kalinkina, N. A. Prykina & Irina S. Iangirova Cheliabinsk: Komitet po delam arkhivov 2000.

Komintern i grazhdanskaia voina v Ispanii. Dokumenty, eds. S. P. Pozharskii & A.I. Saplin, Moscow: Nauka 2001.

Neizvestnaia voina, 1941–1945. Sbornik dokumentov, eds. Aleksandr P. Finodeev, Igor I. Vishev, Nadezhda P. Paletskich & Jelena P. Turova, Cheliabinsk: Komitet po delam arkhivov 2000.

Obshchestvo i vlast'. Rossiiskaia provintsia. Cheliabinskaia oblast'. Dokumenty i materialy. Tom pervyj. 1917–1945, Cheliabinsk 2005.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 KPSS i drugie materialy, mart 1953 – fevral' 1956, eds. Andrei Artizov, Iu. Sigaev, I. Shevchuck, V. Khlopov, vol. 1, Moscow: Demokratsiia 2000.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 KPSS i drugie materialy, fevral' 1956 – nachalo 80-kh godov, eds. A. Artizov, Iu. Sigaev, V. Khlopov, I. Shevchuck, vol. 2, Moscow: Demokratsiia 2003.

-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olitbiuro TSK KPSS, stenogrammy zasedanii komissii Politbiuro i drugie materialy, sredina 80-kh* – 1991, eds. A. Artizov, A. Kosakouskii, V. Naumov, I. Shevchuk, vol. 3, Moscow: Demokratia 2004.
- Repressii v Arkhangel'ske: 1937–1938 gg.* ed. R. A. Khantalin, Arkhangel'sk: Pomor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1999.
- Sovetskaia derevnia glazami OGPU–NKVD, 1930–1934 / Les Campagnes soviétiques vues par l'O.G.P.U.–NKVD, 1930–1934*, eds. V. P. Danilov, A. Berelowitch, N. Werth & L. Samuelson, vol. 3, 1–2, Moscow: Rosspen 2003–2005.
- Sovetskaia povsednevnost' i massovoe soznanie, 1939–1945*, eds. A. Ia. Livshin & I. B. Orlov, Moscow: Rosspen 2003.
- Sovetskaia zhizn', 1945–1953*, eds. Elena Zubkova, Liudmila Kosheleva, Galina A. Kuznetsova, Andrei Miniuk & Larisa Rogovaia, Moscow: Rosspen 2003.
- Spain Betraye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eds. Ronald Radosh, Mary R. Habeck & Gregory Sevostianov, New Haven, CT,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e Stalin–Kaganovich Correspondence, 1931–1936*, eds. Robert W. Davies, Oleg V. Khlevniuk & E. Arfon Re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Zhenskoe litso Pobedy: 100 dokumentov o zhenshchinakh Cheliabinskoi oblast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1–1945*, eds. Aleksandr P. Finodeev, Nadezhda P. Paletskikh & Jelena P. Turova, Cheliabinsk: Komitet po delam arkhivov 2001.

百科全书

- Cheliabinsk. Entsiklopediia*, Cheliabinsk: Kamennyi Poias 2003.
- Grazhdanskaia voina i voennaia interventsii v SSSR. Entsiklopediia*.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83.
-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voina, 1941–1945. Entsiklopediia*, ed. M. M. Kozlov. Moscow: Sovj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85.

会议论文集等

- Chelovek v istorii. Rossiia – XX vek. Sbornik rabot pobeditelei*. Moscow: Obshchestvo 'Memorial' / Zvenia, 2001 – 2008.
-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K 70-letiiu puska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zavod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4 – 15 May 2003, Cheliabinsk 2003.
- Istoricheskie chteniia*, vol. 3, Conference on 'Source crit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problems in Cheliabinsk's history', Cheliabinsk 1997.
- Istoricheskie chteniia*, vol. 4, Conference on 'The Breakdown of Tsarism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Urals', Cheliabinsk 1998.
-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K 70-letiiu Cheliabinskoi oblasti) Materialy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 Cheliabinsk 2003. Here Cited here as *Iuzhnyi Ural*.
- Totalitarizm v Rossii (SSSR), 1917–1991. Oppozitsiia i repressii*, Conference in Perm in 1995 and 1996, Perm 1998. Cited as *Totalitarizm v Rossii*.
- Ural i Sibir' v stalinskoj politike*, Novosibirsk: Sibirskii Khronograf 2002. Cited as *Ural i Sibir*.
- Ural v strategii Vtoroi mirovoi voiny*,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27–28 April 2000, Ekaterinburg: The Urals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Cited as *Ural v strategii*.

Ura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Papers to a conference on 20–21 April 1995, Ekaterinburg: The Urals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5. Cited as *Ural v VOV*.

Ural v voennoi istorii Rossii: Traditsii i sovremennost, Conference on 28–29 February 2003, Ekaterinburg: The Urals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3. Cited as *Ural v voennoi istorii*.

其他文献

Abramovskii, A.P. & P.N. Pankin, 'Golubala armia': Sozdanie, bor'ba, razgrom', *Istoricheskie chteniia*.

Albrecht, Karl, *Der verratene Sozialismus. Zehn Jahre as Staatsbeamter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 Niebelungen 1938 and later editions until 1943.

Alekseev, P.E. & V.D. Kamynin, 'Industrializatsiia SSSR kak obekt mnogokontseptual'nogo rassmotreniia',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Alexopoulos, Golfo, *Stalin's Outcasts: Aliens, Citizens, and the Soviet State, 1926–1936*, Ithaca, NY,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en, Robert,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tufev, Albert Alekseevich, *Ural'skaia promyshlennost' nakanune 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Ekaterinburg: The Urals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Aragon, Louis, *L'Histoire de l'U.R.S.S.*, vols 1–3,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2.

Austin, Richard Cartwright, *Building Utopia: Erecting Russia's First Modern City, 1930*, Kent & Lond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abel', Isaak, *Red Cavalry*, transl. Peter Constantine,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3.

Baker, Vincent E., 'American Workers in 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From Dream to Disillusionment', Master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WV, 1998.

Bakunin, Aleksandr Vasil'evich, *Istoriia sovetskogo totalitarizma*, vol. 1, Ekaterinburg,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Ural'skoe otdelenie, institut istorii i arkhologii 1996.

Ball, Alan M., *And Now My Soul is Hardened. Abandoned Children in Soviet Russia, 1918–193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Basseches, Nikolaus, *Der unbekannte Arme*, Zürich: Europa Verlag 1942.

Bazaro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Durelom ili gospoda kolkhozni*, vols 1–2, Kurgan: Zaurale 1997.

Bazaro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Kulak i Agro-Gulag*, vol. 1,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1.

Beck, Frederick (pseud. for Fritz Houterman) & W. Godin (pseud. for Konstantin Shtepa),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51.

Bek, Aleksandr, *Novoe naznachenie*, Frankfurt am Main: Posev 1972.

Belozertsev, Anatolii Konstantinovich, *Silnee ogniia*,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86.

Benvenuti, Francesco, 'Dal comunismo di guerra alla NEP: Il dibattito dei sindacati', *Pensiero e azione politica di Lev Trockij*, vol. 1, Milan: Leo S. Olschki 1982.

- Bettelheim, Charles, *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 1930–1941*, vols. 1–2, Paris: Maspero/Seuil 1978.
- Bez tain i sekretov. Ocherk 60-letnei istorii tankovogo konstruktorskogo biuro na Kirovskom zavode v Sankt-Peterburge, 2nd revised & enlarged ed., St Petersburg: Prana 1997.
- Bodenschatz, Harald & Christiane Post (eds.), *Städtebau im Schatten Stalins: Die internationale Such nach der sozialistischen Stadt in der Sowjetunion 1929–1935*, Berlin: Braun 2004.
- Bonnell, Victoria E., *Iconography of Power: Soviet Political Poster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Boret, Victor, *Le Paradis Infernal (U.R.S.S. 1933)*, Preface by Senator Edouard Herriot, Paris: Quillet 1933.
- Borisova, Larisa Vladimirovna, *Voennyi kommunizm: Nasilie kak element khoziaistvennogo mekhanizma*, Moscow: Institute of Russian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MONF 2001.
- Bozhe, V., 'P. Stolypinu videlas blestiaschaia budushchnost Urala i Sibiri', *Cheliabinsk*, 1999, no. 2.
- Bozhe, Vladimir, 'Trudovye armii v Sovetskoi Rossii (1920–1921): Diskussia o meste trudovykh chastei v khoziaistvennoi zhizni strany', *Istoricheskie chteniia*, vol. 4.
- Bozhe, Vladimir S., 'Ocherk tserkovno-religioznoi zhizni Cheliabinska nachala XX v.',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Kraevedcheskii sbornik*, vol. 1, Cheliabinsk 1996.
- Bozhe, Vladimir S. 'Materialy k istorii tserkovno-religioznoi zhizni Cheliabinska (1917–1937 gg.)',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Kraevedcheskii sbornik*, vol. 2, Cheliabinsk 1998.
- Bozhe, Vladimir S. & I.G. Nepein, *Zhatva smerti: Golod v Cheliabinskoi gubernii v 1921–1922 gg.*, Cheliabinsk 1994.
- Bugai, N.F. 'Mobilizovat nemtsev v rabochie kolonny... I. Stalin', Moscow: Gotika 1998.
- Bukharin, Nikolai,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edi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J. Tarbuck, London: Routledge 1979.
- Burkova, Ekaterina & Natalia Aksionova, 'Voennoplennye Germanskoi armii na Urale 1942–1955 gg.', Article for the conference 'Cheliabinsk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at School No. 59, Cheliabinsk 2001.
- Carley, Michael Jabara, 1939. *The Alliance that never was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Chicago: Ivan R. Dee 1999.
- Chalmaev, Viktor Andrejevich, *Malyshev*, Moscow: Molodaia Gvardiia 1978.
- Chamberlin, William Henry, *Russia's Iron Age*, London: Duckworth 1935.
- Chamberlin, William Henry, *The Russian Enigma.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3.
- Chelovek v istorii. *Rossia – XX vek. Sbornik rabot pobeditelei*. Moscow: Obshchestvo Memorial / Zvenia 2001–2008.
- Cherednichenko, A.P. (ed.), *Cheliabinskii Gosudarstvennyi Pedagogicheskii Universitet*, Cheliabinsk: Izdatel'stvo ChGPU 1999.
- Chernobrovin, V.P., (ed.) *Promyshlennost' Urala v XIX–XX vekach*, Moscow: AIRO-XX 2002.
- Churchill, Winton S., *Step by Step 1936–1939*,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9.

- Cohen, Jean-Louis, *Le Corbusier and the Mystique of the USSR. Theories and Projects for Moscow, 1928–193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s of the 1930s*, London: Penguin 1968.
- Coeuré, Sophie, *La grande lueur à l'Est. Les français et l'Union Soviétique, 1917–1939*, Paris: Seuil 1999.
- Cross, Robin, *Citadel. The Battle of Kursk: The Greatest Tank Battl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93.
- Danilov, A.A., L.G. Kosulina & A.V. Pyzhkov, *Istoriia Rossii. XX – nachalo XXI vekov. Uchebnik dlia 9 klassa obshcheobrazovatelnykh uchrezhdenii*, Moscow: Prosveshchenie 2003.
- Davles, Robert W., *Soviet History in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 Davles, Robert W., *Soviet History in the Yeltsin Era*, London: Macmillan 1997.
- Degtiarëv, Ivan, *Cheliabinskaia starina. Sbornik statei i materialov po istorii Cheliabinska rannego perioda (30-e gody XVIII – seredina XIX veka)*, Cheliabinsk: Tsentri Istoriko-kulturnogo naslediiia g. Cheliabinska 1996.
- Depretto, Jean-Paul, *Les ouvriers en U.R.S.S. 1928–1941*,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7.
- Dirks, Carl & Karl-Heinz Janßen, *Der Krieg der Generäle. Hitler als Werkzeug der Wehrmacht*, Berlin: Ullstein 1999.
- Dreyfus, Michel et al. (eds.), *Le Siècle des communism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l'Atelier 2000.
- Dullin, Sabine, 'Les interprétations du système soviétique', in Michel Dreyfus et al. (eds.) *Le Siècle des communismes*, Paris: Les Editions de l'Atelier 2000, p. 47–81.
- Edelman, Maurice, *How Russia prepared: U.S.S.R. beyond the Urals*, London: Penguin 1942.
- Effects of Climate on Combat in European Russia*, Historical Study CMH Pub 104–6,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C. [no year of publication].
- Eliseev, E.A. *Millionnyi gorod. 'Proryv' v XXI vek: Teoriia i praktika upravleniia sotsialno-ekonomicheskim razvitiem goroda*, Cheliabinsk, n.p. 1999.
- Elleinstein, Jean, *L'Histoire de l'URSS (Tome 2): Le socialisme dans un seul pays*, Paris: Seuil 1975.
- Elleinstein, Jean, *L'Histoire du phénomène stalinien*,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75.
- Emel'ianov, Iu.N., S.P. *Mel'gunov: v Rossii i emigratsii*, Moscow: Editorial URSS 1998.
- Ermolov, Arsenii Iu. 'Perestroika tankovoi promyshlennosti SSSR 1941–42', *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Nr 3, 2004.
- Ermolov, Arsenii Iu., 'Sostoianie proizvodstvennoi bazy narkomata tankovoi promyshlennosti i problema modernizatsii vypuskaemoi narkomatami produktsii v 1942–1944 godach', *Russkii sbornik. Issledovaniia po istorii Rossii XIX–XX vv.*, vol. 1, St Petersburg 2004.
- Filtzer, Donald,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iet production relations, 1928–1941*, London: Pluto Press 1986.
- Filtzer, Donald, *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 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Finkel, Alvin & Leibovitz, Clement, *The Chamberlain–Hitler Collus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 Finodeev, Aleksandr Pavlovich (ed.), *Arkhiv – khranitel vremeni. Istorii arkhivnoi sluzhby Cheliabinskoi oblasti v dokumentakh, vospominaniakh, fotografiakh*, Cheliabinsk: ChPO Kniga 2004.
- Fitzpatrick, Sheila, 'Suplicants and Citizens: Public Letter-Writing In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Slavic Review*, 1996, no. 1.
- Forstman, G.V. & M.D. Mashin. *Ural'skie stankostroiteli. Istoriko-biograf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l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85.
- Frankson, Anders & Niklas Zetterling, *Kursk 1943: A Statist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00.
- Furet, François, *L'Histoire d'une illusion: Essai sur l'idée communiste au XXe siècl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5.
- Furet, François, *Istorii odnoi illiuzii*, Moscow: Ad Marginem 1997.
- Gabel, Paul, *And God Created Lenin: Marxism vs. Religion in Russia, 1917–1929*,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6.
- Garthoff, Raymond L.,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A Memoir of Containment and Coexist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 Gavrilov, D.V., 'Ural'skii ty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Geopoliticheskii aspekt', *Ural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Ekaterinburg 1995.
- German, A.A. & A.N. Kurochkin, *Nemtsy SSSR v 'trudovoi armii' (1941–1945)*, Moscow: Gotika 1998.
- Gershkovich, Evgenia & Evgenii Korneev, *Vysokii stalinskii stil'*, Moscow: Trilistnik 2005.
- Getty, Arch, 'Excesses are not to be permitted...': Mass Terror Operations in the late 1930s and the Stalinist Government', *Russian Review*, 61 (January 2002).
- Gevorkian, N., 'Vstrechnye plany po unichtozheniiu naroda', *Moskovskie novosti*, 21 June, 1992, No. 29.
- Ginzburg, Semën Zakharovich, *O proshlom – dlia budushchego*, Moscow: Politizdat 1983.
- Glantz, David M.,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 Glantz, David M.,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 Glantz, David M. & Jonathan House, *The Battle of Kursk*,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 Glantz, David & Jonathan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 Golomstock, Igor, *Arte totalitaria nell'URSS di Stalin, nella Germania di Hitler, nell'Italia di Mussolini*, Milan: Leonardo 1990 (translation from Russian, *Totalitarnoe iskusstvo*, Moscow: Gallart 1994).
- Golomstock, Igor, *Totalitarnoe iskusstvo*, Moscow: Gallart 1994.
- Gorodetsky, Gabriel,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 CT,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oldman, Wendy Z., *Women at the Gates: Gender and Industry in Stalin's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oldshtein, Iakov, *Otkrovenno govoria... Vospominaniia, razmysleniia*, Cheliabinsk: Rifej 1995.
- Gorlov, Sergei A., *Sovershenno sekretno. Al'ians Moskva–Berlin 1920–1933 gg. (Voenna-politicheskie otnosheniia SSSR–Germaniia)*, Moscow: Olma-Press 2001.
- Grabin, Vasilii G., *Oruzhie Pobedy. Vospominaniia*, Moscow: Politizdat 1989.

- Graziosi, Andrea, *A New, Peculiar State: Explorations in Soviet History, 1917–1937*, Westport, CT, & London: Praeger 2000.
- Gregory, Paul R. & Valery Lazarev (eds.), *The Economics of Forced Labor. The Soviet Gulag*,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3.
- Gubarev, V.S., *Cheliabinsk–70*, Moscow: Izdat 1993.
- Habeck, Mary R., *Storm of Steel: The Development of Armo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9–1939*,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rris, James R., *The Great Urals: Region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Ithaca, NY,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arrison, Richard W. *The Russian Way of War: Operational Art, 1904–1940*,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 Haslam, Jonathan, *The Vices of Integrity. E.H. Carr, (1892–1982)*, London: Verso 1999.
- Hedeler, Wladislaw, *Chronik der Moskauer Schauprozesse 1936, 1937 und 1938: Planung, Inszenierung und Wirk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 Heller, Michel & Aleksandr Nekrich, *Utopia in Powe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
- Henry (Genri), Ernst, *Gitler nad Evropoi? Gitler protiv SSSR*, Moscow: Russkii razitet 2004.
- Höglund, Zeth, *Häxnatt över Europa: Tal till kristna och hedningar*. Stockholm: Axel Holmströms 1939.
- Howson, Gerald. *Arms for Spai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John Murray 1998.
- Hughes, Gwynneth & Simon Welfare, *Red Empire: The Forbidden History of the 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1.
- Husband, William B., *'Godless Atheists': Atheism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angirova, Irina, 'K vesne 1922 goda v Cheliabinskoi gubernii umerli ot goloda okolo 10 tysiach chelovek...', *Vechernii Cheliabinsk*, 23 December 1992.
- Ibraimov, Daniial S. *Protivoborstvo: Istorii sozdaniia voennoi tekhniki v SSSR i Germanii*, Moscow: DOSAAF 1989.
- Ilic, Melanie (ed.), *Women in the Stalin Er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 Istoriki-emigranty. Voprosy russkoi istorii v rabotakh 20-x – 30-kh godov*, Moscow: The Institute for Russian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2.
- Ivanov, A.V. & A.T. Tertyshnyi, *Ural'skoe krest'ianstvo i vlast' v period grazhdanskoi voiny (1917–1921 gg.): Opyt osmysleniia problemy v otechestvennoi istoriografii*, Ekaterinburg: Urals State Economic University 2002.
- Ivanov, Valentin M., *Marshal M.N. Tukhachevskii*, 2nd ed., Moscow: Voenizdat 1990.
- Ivanova, M.A., 'Kollektivizatsiia – samaia massovaia repressiia vlasti protiv noda', *Totalitarizm v Rossii (SSSR) 1917–1991. Opozitsiia i repressii*, Perm 1998.
- Ivniitskii, Nikolai A.,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nachalo 30-x godov)*, Moscow: Magistr 1996.
- Ivniitskii, Nikolai A., *Repressivnaia politika sovetskoi vlasti v derevne (1928–1933 gg.)*, Moscow: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2000.
- Ivniitskii, Nikolai A., *Sud'ba raskulachennykh v SSSR*, Moscow: Sbranie 2004.
- Jacobs, Walter D., *Frunze: The Soviet Clausewitz 1885–1925*. The Hague: M. Nijhoffs 1969.

- Jansen, Marc, *The Trial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Moscow 1922*, Niemegen: Martinus Nijhoff 1982 (Russian translation: *Sud bez suda: 1922 god. Pokazatel'nyi protsess sotsialistov-revolutsionerov*, Moscow: Vozvrashchenie 1993).
- Jansen, Marc & Nikita Petrov,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kolai Ezhov, 1893–1940*,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
- Jansen, Marc & Nikita Petrov, *Ezhov – stalinskii pitomets*, Moscow: Rosspen 2008.
- Jensen, Bent, *Gulag og glemsel. Ruslands tragedie og Vestens hukommelsestest i det 20. århundrede*, Copenhagen: Gyldendal 2002.
- Johnson, Allen McTavish, Ekaterinburg: Nezavisimyi institut istorii materialnoi kultury 2001 'Moscow Dispatches, 1921–1934: The Writings of Walter Duranty,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and Louis Fischer in Soviet Russia', PhD Thesis, Tulane University, 2000.
- Kantor, Iulia, *Voina i mir marshala Tukhachevskogo*, Moscow: Vremia 2005.
- Karlgren, Anton, *Stalin: Bolsjevismens väg från leninism till stalinism*, Stockholm: P.A. Norstedt & Söners 1942.
- Karpenko, A.V., *Obozrenie otechestvennoi bronetankovoi tekhniki (1905–1995 gg.)*, St Petersburg: Nevskii bastion 1996.
- Karpov, Vladimir, *Generalissimus*, vols 1–2, Moscow: Veche 2002.
- Khan-Magomedov, Selim O., *Pioneers of Soviet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New Solution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3.
- Khaustov, Vladimir Nikolaevich, V.P. Naumov & N.S. Plotnikov (eds.), *Lubianka: Stalin i Glavnoe Upravlenie Gosbezopasnosti NKVD 1937–1938*, Moscow: Demokratia 2004.
- Khaustov, Vladimir Nikolaevich & Lennart Samuelson, *Stalin, NKVD i represii, 1936–1938*, Moscow: Rosspen 2008.
- Khlevniuk, Oleg Vital'evich, 'The Reasons for the 'Great Terror': the Foreign-Political Aspect', Silvio Pons & Andrea Romano (eds.)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1945*, Milan: Feltrinelli 2000.
- Khlevniuk (Chlewnjuk), Oleg W., *Das Politbüro: Mechanismen der Macht in der Sowjetunion der dreißiger Jahre*, Hamburg: Hamburger Ed. 1998.
- Khlevniuk, Oleg Vital'evich, *In Stalin's Shadow: The Career of 'Sergo' Ordzhonikidze*, Armonk, NY, New York, London: Armonk 1995.
- Khlevniuk, Oleg Vital'evich, *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From Collectiviz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hmel'evskaia, Iu., 'Rol' amerikanskoi missii v bor'be s golodom na Urale (po materialam Ural'sko-Ufimskogo okruga ARA, 1921–1923),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 Kibitkina, Galina Nikolaevna, 'Vzgliad v istoriiu: Vysokoe doverie – bol'shaia otvetstvennost', *Tankograd*, No 12 1999.
- Kibitkina, Galina Nikolaevna, 'Rozhdenie i stanovlenie Tankograda', *Tankograd*, No 10 1999.
- Kipp, Jacob, 'Mass, Mo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Soviet Operational Art, 1918–1936',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n and Soviet Military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Military History Symposium, USAF Academy 1986.
- Kireev, A.G. & E.G. Choviv, *ChTZ – moia biografiiia*.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83.

- Kirillov, Viktor Mikhailovich, *Kniga pamjati. Posvjasjchaetsia Tagilchanam – zhertvam repressii 1917–1980-kh godov*, Ekaterinburg: Nauka 1994.
- Kirillov, Viktor Mikhailovich, *Istoriia repressii v Nizhnetagil'skom regione Urala, 1920–1950 gody*, vols 1–2, Nizhnii Tagil n.p. 1996.
- Kirillov, Viktor Mikhailovich, *Istoriia repressii v pravozashchitnoe dvizhenie v Rossii*, Ekaterinburg: UMTs Uralskii Politekhnikeskii Institut 1999.
- Kirillov, Viktor Mikhailovich, *Zhertvy repressii: Nizhnii Tagil 1920–1980-e gody*, Ekaterinburg n.p. 1999.
- Kirillov, Viktor Mikhailovich, *Sostoianie raboty nad knigami pamjat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v Rossii, Kazakhstane i Ukraine*, Nizhnii Tagil: Nizhnetagil'skii gosudarstvennyi pedagogicheskii institut 2002.
- Kirschenbaum, Lisa A., *Small Comrades: Revolutionizing Childhood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Kirstein, Tatiana, *Sowjetische Industrialisierung – geplanter oder spontaner Prozeß? Eine Strukturanalyse des wirtschafts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prozesses beim Aufbau des Ural-Kuzneck-Kombinats 1918–1930*, Baden-Baden: Nomos 1979.
- Kiselëv, A.F. and E.M. Shchagin (Eds), *Khrestomatiiia po otechestvennoi istorii (1914–1945 gg.)*, Moscow: Vlado 1996.
- Kitaev, Evgenii Aleksandrovich, *Na stroitel'nykh vysotach*,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91.
- Kjellberg, Sven Herman, *Ryssland i krig*, Stockholm: Lindfors 1944.
- Klier, Freya, *Verschleppt ans Ende der Welt: Schicksale deutscher Frauen in sowjetischen Arbeitslagern*, Berlin: Ullstein 1999.
- Klimin, Ivan Ivanovich, *Rossiiskoe krestianstvo v gody grazhdanskoi voiny (1917–1921)*, St Petersburg: Izdatelstro Politekhnikeskogo Instituta Sankt Peterburga 2004.
- Knickerbocker, Hubert, *The Red Trade Menace: Progress of the Soviet Five-Year Plan*,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31.
- Knigi pamjat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v SSSR: Annotirovannyi ukazatel*, ed. Anatolii Razumov, St Petersburg: Rossiiskaia natsionalnaia biblioteka 2003.
- Kodrakov, I.A., *Otkrytyi arkhiv – 2. Spravochnik sbornikov dokumentov, vysjedshikh v svet v otechestvennykh izdatel'stvakh v 1917–2000*, Moscow: Rosspen 2005.
- Koistinen, Paul A.C., *Planning War, Pursuing Pe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Warfare, 1920–1939*,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 Kokoshin, Andrei, *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1917–1991*,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Komarov, L.S., Ie.G. Khoviv & N.I. Zarzhevskii, *Letopis Cheliabinskogo traktornogo (1929–1945 gg.)*, Moscow: Profizdat 1972.
- Komarov, Leonid S., *Rossiiia tankov ne imelo*, Cheliabinsk n.p. 1994.
- Komarov, Leonid S., 'ChTZ – Katerpillar', *SSHА: Ekonomika, politika, ideologija*, 1997, no. 1.
- Konstruktor boevykh mashin (O Zh. Ia. Kotine)*, Leningrad: Lenizdat 1988.
- Kopp, Anatole, *Ville et révolution: Architecture et urbanisme soviétiques des années vingt*, Paris: Anthropos 1967.
- Kopp, Anatole, *Changer la vie, changer la ville: De la vie nouvelle aux problèmes urbains. U.R.S.S. 1917–1932*, Paris: UEG/10.18 1975.
- Kopp, Anatole, *L'architecture soviétique à l'époque stalinien*, with a forword by Charles Bettelheim,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78.

- Kornilov, Gennadii, *Ural'skoe selo i voina (Problemy demograficheskogo razvitiia)*, Ekaterinburg UralAgro Press 1993.
- Korolëv, N.P., 'K.V. Ryndin i protsess industrializatsii v Cheliabinskoi oblasti', in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 Kostiunina, P.V., 'Istorlia OAO "Ufaleinikel" – pervenets nikelovoi promyshlennosti SSSR',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 Kostyrchenko, Gennadii Vasil'evich,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Vlast' i antisemitizm*,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01.
- Kotkin, Stephe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Kotkin, Stephen, 'Modern Tim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Interwar Conjunction',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2, no. 1, 2001.
- Krasilshchik, Z., *V borbe za Cheliabinskii traktorni, Sverdlovsk–Moscow* n.p. 1931.
- Krivosheev, G.F., *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7.
- Kruglov, Arkadii, *Kak sozdavalas' atomnaia promyshlennost' v SSSR*, Moscow: TsNIIAtominform 1994.
- Krumm, Reinhard, *Isaak Babel. Schreiben unter Stalin. Eine Biographie*.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2005.
- Kucher, Valerij, *Magnitka – eto navsegda. Chast' pervaiia: Dela i sud'by stalinskikh direktorov*, Moscow: Novosti 2003.
- Kuhr-Korolev, Corinna, 'Gezähmte Helden'. *Die Formierung der Sowjetjugend 1917–1932*, Essen: Klartext 2005.
- Kumanev, Georgii A., 'Podvig zheleznodorozhnikov', *Eshelony idut na vostok: Iz istorii perebazirovaniia proizvoditel'nykh sil SSSR v 1941–1942 gg.*, Moscow: Nauka 1966.
- Kuromiya, Hiroaki, *Stal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Workers, 1928–19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Kuznitsa Pobedy: *Podvig tyla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Ocherki i vospominaniia*, Moscow: Politizdat 1974.
- Lastours, Sophie de, *Toukhachevski: Le Bâtitseur de l'Armée Rouge*, Paris: Albin Michel 1996.
- Latour, Alessandra, *Birth of a Metropolis: Moscow 1930 – 1955. Recollections and Images*, Moscow: Iskustvo-XX vek 2005.
- Lebina, Natalia Borisovna, *Povsednevnaia zhizn' sovetskogo goroda: normy i anomalii. 1920–1930 gody*, St Petersburg: Nauka 1999.
- Leggett, George,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The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December 1917 to February 1922)*, Oxford: Clarendon 1981.
- Lenin (Ul'ianov), Vladimir Illich, *Leninskii sbornik*, vol. XI, Eds.: V.V. Adoratskii, V.M. Molotov & M.A. Savel'ev, Moscow–Leningrad 1931.
- Levit, A.I., *Iuzhnyi Ural: Geografiia, ekologiia, prirodopolzovanie*,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izdatel'stvo 2001.
- Lewin, Moshe, *Lenin's Last Struggle* (1967), 2nd ed.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 Lichman, Boris, *Mnogokontseptual'naia istoriia Rossii. Posobie dlia abiturientov*, Ekaterinburg: SV-96 2000.

- Lichman, Boris, *Istoriia Rossli: Teoriia izucheniia*, vol. 1: *S drevneishikh vremën do kontsa XIX veka*, vol. 2: *Dvadsatyi vek*, Ekaterinburg: SV-96 2001.
- Lih, Lars T., 'Our Position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Tragic': Bolshevik 'Euphoria in 1920', in Mike Haynes & Jim Wolfreys (eds.), *History and Revolution: Refuting revisionism*, London: Verso 2007.
- Litvin, Aleksei, *Krasnyi i belyi terror v Rossli, 1918–1922 gg.*, Moscow: Iauza/Eksmo 2004.
- Maevskaia, T., 'Glavpochtamt', *Biulleten arkhitektury*, 2000, no. 2; Iu. Filinskich, 'Poslednii 'vzvizg' konstruktivizma', *Vechernii Cheliabinsk*, 26 February 2001.
- Mawdsley, Evan, 'Crossing the Rubicon: 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 vol. XXV.
- Mawdsley, Evan, *The Russian Civil War*, London: Allen & Unwin 2000.
- McLoughlin, Barry & Kevin McDermott, *Stalin's Terror: High Politics and Mass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Medvedev, Roy A.,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London: Macmillan 1971.
- Medvedev, Roy, *K sudu istorii. Genezis i posledstviia stalinizm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 Meliukhov, Mikhail, *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 Sovetskii Soiuz i bor'ba za Evropu, 1939–1941*, Moscow: Veche 2000.
- Miasnikov, Viktor, *Oruzhie Urala*, Ekaterinburg: Pakrus 2000.
- Millutin, Nikolai, *Sotsgorod. Problema stroitel'stva sotsialisticheskikh gorodov. Osnovnye voprosy ratsional'noi planirovki i stroitel'stva naseleennykh mest SSSR*, Moscow-Leningrad: Gosizdat 1930.
- Mininberg, Leonid L., *Sovetskie evrei v nauke i promyshlennosti SSSR v period vtoroi mirovoi voiny (1941–45gg.)*, Moscow: ITs-Granit 1995.
- Mitrofanova, A.V. (ed.) *Ural – Frontu*, Moscow: Ekonomika 1985.
- Moskoff, William, *The Bread of Affliction: The Food Supply in the USSR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oskovkin, V.V., *Protivoborstvo politicheskikh sil na Urals i v zapadnoi Sibiri v period revoliutsii i grazhdanskoi voiny (1917–1921 gg.)*, Tiumen': Tiumen State University 1999.
- Motrevich, Vladimir P. 'Novye materialy o delatel'nosti germanskoi razvedki na Urals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OENnyi KOMmentator*, Ekaterinburg, no. 1, 2002.
- Mund, Gustaf, *GPU. Das Angriff an der Abendland*, Leipzig: Nebelungen 1942.
- Murphy, David E.,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 CT,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Napylov, A.A. & N.V. Kostin, 'Kollektivizatsiia kak neobkhodimaa predposylka industrializatsii SSSR',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 Narskii, Igor Vladimirovich (ed.), *Chelovek i voina. Voina kak lavlenie kul'tury*, Moscow: AIRO-XX 2001.
- Narskii, Igor Vladimirovich, *Politicheskie ob'edineniia na Urals do 1917 g.*, Cheliabinsk 1995.
- Narskii, Igor Vladimirovich, 'Politische Partelen in der russischen Provinz (Ural, 1901–1916)',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1997, no. 45.
- Narskii, Igor' Vladimirovich (Ed.), *Ural v kontekste rossliiskoi modernizatsii. Sbornik nauchnykh statei*, Cheliabinsk: Kamennyi polas 2005.

- Narskii, Igor Vladimirovich (Ed.), *Vek pamiati, pamiat' veka: Opyt obrashcheniia s proshlym v XX stoletii*, Cheliabinsk: Kamennyi poias 2004.
- Narskii, Igor Vladimirovich, *Zhizn' v katastrofe: Budni naseleniia Urala v 1917–1922 gg.*, Moscow: Rosspen 2001.
- Naselenie Rossii v XX veke*, vol. 1: 1900–1939, Moscow: Rosspen 2000.
- Naum Gabo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Palace of Soviets, Moscow 1931–1933*, exhibition catalogue, Berlin & Moscow: Berlinskhe Gallerie 1993.
- Nazyrov, P.R., 'Cheliabinsk v 1918–1919 (Iz istorii goroda v gody grazhdanskoj voiny)',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vol. 1, Cheliabinsk 1996.
- Nepeln, Igor Georgievich. *Palachi i zhertyy*, Cheliabinsk 1997.
- Neumann, S. & Friedrich Rück, *Kolossen på stålfötter: Den ryska industrimak- tens utveckling och problem*, Stockholm: Kooperativa Förbundets bokförlag 1945.
- Novikov, V.N., *Oruzhie Pobedy, 1941–1945*, Moscow: Mashinostroenie 1985.
- Novosëlov, Vladimir Nikolaevich, *Sozdanie atomnoi promyshlennosti na Urale*, Cheliabinsk: UGAFK 1999.
- Novosëlov, Vladimir Nikolaevich & Vitalii Semënovich Tolstikov, *Tainy 'Sorokovki'*, Ekaterinburg: Uralskii Rabochii 1994.
- Novosiolov, Vladimir Nikolaevich & Vitalii Semënovich Tolstikov, *Istoriia Iuzhno-Ural'skogo upravleniia stroitel'stva*, Cheliabinsk: NIK 1998.
- Novosiolov, Vladimir Nikolaevich & Vitalii Semënovich Tolstikov, *Atomnyi sled na Urale*, Cheliabinsk: Rifei 1997.
- Osokina, Elena Aleksandrovna, *Za fasadom 'stalinskogo izobilia': Raspredelenie i rynek v snabzhenii naseleniia v gody industrializatsii, 1927–1941*. Moscow: Rosspen 1999.
- Palagina, T.V., 'Iz istorii Cheliabinskogo elektrolitnogo zinkogo zavoda', *Cheliabinsk neizvestnyi*, vol. 1, Cheliabinsk 1996.
- Panné, Jean-Louis, *Boris Souvarine. Le premier désenchanté du communism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3.
- Pass, Andrei Arkadevich, *Kooperativnaia promyshlennost' i torgovlia na Urale v 1939–1941 gg.*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ii Universitet 2000.
- Pass, Andrei Arkadevich, *Voina i kooperatsiia. (Promyslovye arteli i potrebitelskie obshchestva na Urale v 1941–1945 gg.)*. Cheliabinsk: Gosudarstvennyi Agro-Inzhenernyi universitet 2000.
- Pastukhov, A.L., *Ot Cheliaba do Cheliabinska: Puteshestvie v proshloe*, Cheliabinsk: Vzgljad, 2000.
- Pavluchenkov, Sergei Alekseevich, *Voennii kommunizm v Rossii: Vlast' i massy*, Moscow: RKT-Istoriia 1997.
- Peris, Daniel, *Storming the Heavens: The Soviet League of the Militant Godl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etrov, Nikita V. & Konstantin V. Skorkin, *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 Spravochnik*, Moscow: Zvenia 1999.
- Pietrow-Ennker, Blanka (ed.), *Präventivkrieg? 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0.
- Plechanov, Aleksandr Mikhailovich, *VChK – OGPU, 1921–1928*, Moscow: X-History 2003.
- Plotnikov, I.E., 'Kak likvidirovali kulachestvo na Urale', *Otechestvennaia Istorii*, 1993, No. 4.
- Podtlaskin, E.. 'Baraki', *Golos*, 25/10 – 1/11 1991.

- Polezhalkin, Ilya, 'Prinuditel'nyi trud na ChTZ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lny (1941–45 g.g.)' term paper for 10th grade, School No. 59, Cheliabinsk 1998.
- Poljakov, Yurii A. and Valentina B. Zhiromskaja, *Naselenie Rossii v XX veke. Istoricheskie otjerkii*, vol. 1, 1900–1939, Moscow: Rosspen 2000.
- Polian, Pavel, 'First Victims of Holocaust: Soviet-Jewish Prisoners of War in German Captivity',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vol. 6, no. 4, 2005.
- Polianskii, Aleksei Ivanovich, *Ezhov: Istoriia 'zheleznogo' narkoma*, Moscow: Veche 2003.
- Pons, Silvio, *Stalin and the Inevitable War, 1936–1941*, London: Frank Cass 2002.
- Postnikov, Mikhail, *Razvitie bronzashchity i zhivuchesti sovetskikh tankov 1941–1945 gg.: (Tiazhëlye tanki KV i JS)*, Moscow: Eksprint 2004.
- Postnikov, Mikhail, *Razvitie bronzashchity i zhivuchesti sovetskikh tankov 1941–1945 gg.: (Srednie tanki T-34)*, Moscow: Eksprint 2004.
- Rakov, A.A., 'Opyt analiza kulatskogo khozhaistva 1930 goda: Ekonomiko-pravovoi i politicheskoi aspekty',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Materialy nauchnoi konferentsii*, Cheliabinsk 2003.
- Rees, E. Arfon, *Stalinism and Soviet Rail Transport, 1928–1941*, London: Macmillan 1995.
- Rees, E. Arfon, *State Control in Soviet Rus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 1920–1934*, London: Macmillan 1987.
- Rittersporn, Gábor T. 'The Omnipresent Conspiracy: On Soviet Imager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1930s', in Arch Getty, Roberta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Rogalla von Bieberstein, Johannes, '*Jüdischer Boshewismus*'. *Mythos und Realität*, Schnellroda: Antaios 2003.
- Rosenberg, William G. & Lewis H. Siegelbaum (Eds.), *Social Dimensions of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ybalkin, Iurii, *Operatsiia 'X': Sovetskaia voennaia pomoshch' respublikanskoii Ispanii (1936–1939)*, Moscow: AIRO-XX 2000.
- Salmina, Marina Sergeevna, *Istoriia Iuzhnogo Urala. XX – nachalo XXI veka*, Cheliabinsk: Vzgljad 2004.
- Salmina, Marina Sergeevna, *O chëm rasskazalo staroe kladbishche. Po materialam issledovatel'skoi deiatel'nosti uchashchikhsia*, Cheliabinsk: Cheliabin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2003.
- Samuelson, Lennart, 'Gulag och 'sharasjki': Sovjetunionens koncentrationsläger och fängelser för specialister', in Anu-Mai Köll (ed.) *Kommunismens ansikten*, Stockholm: Symposion 2005.
- Samuelson, Lennart, *Plans for Stalin's War-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 – 1941*,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 St. Martins 1999.
- Samuelson, Lennart, 'Making Sense of Stalinist Industrialisation: An Insider's Approach', in *Markets and Embeddedness: Essays in Honour of Ulf Olsson*, Göteborg: Ekonomisk-historiska institutionen Göteborg University 2004.
- Sapir, Jacques, *L'Économie mobilisée: Essai sur les économies de type sovié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9.

- Sapir, Jacques, *Logik der sowjetischen Ökonomie oder die permanente Kriegswirtschaft*, Berlin: Lit 1992.
- Sayers, Michael & Albert Kahn, *The Great Conspiracy against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7.
- Schneider, James J. *The Structure of Strategic Revolution: Total War and the Roots of the Soviet Warfare State*, Novato, CA: Presidio 1994.
- Scott, John, *Behind the Urals: An American Worker in Russia's Steel Town, [1942]*, new edition with preface by Stephen Kotki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egbers, Klaus, *Die Sowjetunion im Zweiten Weltkrieg. Die Mobilisierung von 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Großen Vaterländischen Krieg' 1941–43*, Munich: Oldenburg 1987.
- Seiranian, F.G. (ed.) *O Sergo Ordzhonikidze: Vospominaniia, ocherki, stati sovremennikov*. Moscow: Politizdat, 1986.
- Selianinova, Gulsina D. 'Intelligentsia i terror: Opyt grazhdanskoi voiny na Urale, 1918–1919 gg.', *Ural i Sibir v stalinskoi politike*, Novosibirsk: Sibirskii Khronograf 2002.
- Semënov V.M., V.N. Novosolov, L.V. Shubarina, *Sport na Iuzhnom Urale: Istoriiia razvitiia fizicheskoi kul'tury i sporta v Cheliabinske, 1919–1929 gody*, Cheliabinsk: Ural'skaia Akademiia Fizicheskoi Kultury 2000.
- Seniavskaia, Elena Spartakovna, *Psichologiiia voiny v XX veke. Istoricheskii opyt Rossii*, Moscow: Rosspen 1999.
- Sergiichuk, Vladimir, *Tankovyi korol' Rossii*, Kiev: Nichlava 2005.
- Shcherba, A.N. *Voennaia promyshlennost' Leningrada v 20–30-e gody*, St Petersburg: Nestor 1999.
- Shcherba, A.N. 'Stanovlenie i razvitie tankovoi promyshlennosti Leningrada d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Peterburgskaia Istoricheskaiia shkola. Almanakh. 1: O Viktore Anatoleviche Ezhove i ego tvorchsetve*, St Petersburg 2001.
- Shentalinskii, Vitalii, *Raby svobody: V literaturnykh archivakh KGB*, Moscow: Parus 1995.
- Shmakova, N.P. 'Mashinostroitel'naia promyshlennost' Iuzhnogo Urala v 30-e gody XX veka', *Promyshlennost' Urala v XIX–XX vekakh*, Moscow: AIRO-XX 2002.
- Shmelëv, Igor, *Istoriiia tanka, 1916–1996*, Moscow: Tekhnika – molodezhi 1996.
- Shmelëv, Igor, *Tanki BT*, Moscow: Khobbikniga 1993.
- Shubarina, Liubov' V., 'Bor'ba SKB ChTZ za liderstvo v sozdanii i proizvodstve tiazhëlykh tankov (1945–1960 gg.)', *Juzhnyj Ural v sud'be Rossii*, Cheliabinsk 2003.
- Shubarina, Liubov' V., 'Sozdanie tanka T-10 na Cheliabinskom traktornom zavode (1948–1951)',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2003.
- Shurawl'jow, Sergej, *'Ich bitte um Arbeit in der Sowjetunion': Das Schicksal deutsche Facharbeiter im Moskau der 30er Jahre*, Berlin: Ch. Links 2003.
- Shutkova, E. Iu., 'Molodëzhnaia oppozitsiia stalinizmu v poslevoennoe vremia', *Totalitarizm v Rossii (SSSR) 1917–1991. Oppozitsiia i repressii*, Materialy nauchno-prakticheskoi konferentsii, Perm 1998.
- Simpkin, Richard, *Deep Battle: The Brainchild of Marshal Tukhachevskii*, with a foreword by John Erickson,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1987.
- Skorikov, A.I., 'Iz istorii povstancheskogo i dezertirskogo dvizheniia na territorii Cheliabinskoi gubernii v kontse 1919–nachale 1921 gg.'

- Skrupov, Aleksandr, *Cheliabinsk. XX Vek*, Cheliabinsk: Tatiana Lur'e 2000.
- Skvoz'gody: *Cheliabinskii metallurgicheskii kombinat. Istor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ChMK, 1994.
- Slavko, Tatiana, *Kul'tskaia ssylka na Urale, 1930–1936*, Moscow: Mosgorarchiv 1995.
- Smirnov, German V. (Ed.) *Krovavii marshal. Mikhail Tuchachevskii 1893–1937*, St Petersburg: Korona 1997.
- Sobolev, Eduard Alekseevich, *Konstruktorskoe biuro: Sud'by liudei i mashin*, Cheliabinsk, 'Vsemi' 1997.
- Sollankin, A.G., M.V. Pavlov, I.V. Pavlov & I.G. Zheltov, *Sovetskie tiazhëlye artilleriiskie ustanovki 1941–1945 gg.*, Moscow: Eksprint 2005.
- Sollankin, A.G., M.V. Pavlov, I.V. Pavlov & I.G. Zheltov, *Srednii tank T-34 939–1945*, Moscow: Eksprint 2005.
- Souvarine, Boris, *Aperçu historique du bolchevisme*, Paris: Plon, 1935, and later editions with foreword by the author, Paris 1977, 1985 & 1992.
- Souvarine, Boris, *Souvenirs sur Panaït Istrati, Isaak Babel, Pierre Pascal*, Paris: Gérard Lebovici 1985.
- Speranskii, Aleksandr V., *V gornile ispytanii: Kul'tura Urala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Ekaterinburg: UrO RAN 1996.
- Stepanov, Denis Andreevich, 'Donos kak sposob vzaimootnoshenii cheloveka s vlastiu. (Po materialam dokumentov 1920-kh–1940-kh gg. OGACHO)', term paper in the 11th grade, School No. 59, Cheliabinsk 2003.
- Strawson, John, *Hitler as Military Commander*,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 Sun, Youli,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 London: Macmillan 1993.
- Sutton, Antony C., *Western Technology and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0 to 1945*,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 Svirin, Mikhail, *Stal'noi kulak Stalina. Istorii sovetskogo tanka 1943–1955*, Moscow: Eksmo/ Iauza 2006
- Telitsyn, V.L., *Skvoz' ternii 'voennogo kommunizma': Krestianskoe khozhaistvo Urala v 1917–1921 gg.*, Moscow: RAN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1998.
- Thurston, Robert W. *Life and Terror in Stalin's Russia, 1934–194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optygin, Aleksei, *Lavrentii Beria. Neizvestnyi marshal gosbezopasnosti*. Moscow: Iauza/ Eksmo 2005.
- Treadgold, Donald W. *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Government and Peasant in Resettlement from Emancipation to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Triandafillov, Vladimir Kiriakovich, *The Nature of the Operations of Modern Armies*, [1929], edited and with foreword by Jacob W. Kipp, London: Frank Cass 1994.
- Trotsky, Leon, *Communism and Terror (A Reply to Karl Kautsky)*, New York: Workers Party of America 1922 [and later editions].
- Trotsky, Leon, *My Life*, transl. from Russian, New York: Scribner's 1930.
- Tulinskii, Sergei Vladimirovich, *Iuzhno-Ural'skii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1943–2003. Istoricheskii ocherk*, Cheliabinsk: IuUrGU 2003.
- Turova, Elena Pavlovna, 'God 1914. Voina. Cheliabinsk i cheliabintsy', *Neizvestnyi Cheliabinsk*, vol. 1, 1996.

- Ural koval Pobedy: Sbornik—spravochnik*,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Izdatelstvo 1993.
- Ural: Vek dvadtsatyi. Liudi, sobytiia, zhizn*, (ed.) A.D. Kirillov, Ekaterinburg: Ural Politicheskii 2000.
- Ural v panorame XX veka /The Urals in the 20th Century's Panorama*, (Ed.) Venjamin V. Alekseev, Ekaterinburg: The Urals Section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 Ushlik, I.A., 'Borba s ugovnoi prestupnostiu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Iuzhnyi Ural v sudbe Rossii. Materialy nauchnoi konferentsii*, Cheliabinsk, n.p. 2003.
- Usoltseva, N.L. 'Mediko-sanitarnoe obsluzhivanie trudiashchikhsia ChTZ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1–1945 gg.)', *Industrializatsiia v SSSR: Uroki istorii*, Cheliabinsk: Cheliabinskii pedagogicheskii universitet 2003.
- Ustiantsev, Sergej V. & Alla V. Pislegina, A. Ch. Fakhretdenova, *Uralvagonzavod, Elita rossiiskoi industrii / Ural Car-Making Works: An Elite of the Russian Industry*, Ekaterinburg start 2001.
- Utan heder: En bok om ohederliga debattörer & högerns rådsla för förändring*, ed. Aron Etzler, Stockholm: Röd Press, 1999.
- Valeiev, Rafkat R. 'O proizvodstve tankov i samochodno-artilleriiskich ustanovok na Cheliabinskom Traktornom zavode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oenna-istoricheskii zhurnal*, 2003.
- Veprev, Oleg & Viacheslav Liutov, *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 Tri veka na Iuzhnom Urale*, Cheliabinsk: Iuzhno-Ural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2002.
- Vernidub, Ivan, *Boepripasy Pobedy. Ocherki*, Moscow: TsNIINTIKPK 1998.
- Volkhin, Aleksandr I., 'Borba organov NKVD-GUGB Urala i Sibiri s antisovetskoi agitatsiei i propagando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OENnyi KOMmentator*, Ekaterinburg, no. 1, 2001.
- Volkhin, Aleksandr I., 'Poisk povstancheskih organizatsii organami NKVD-GUGB, borba s terroristicheskimi aktami i banditizmom na Urale i v Sibir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VOENnyi KOMmentator*, Ekaterinburg, no. 1, 2001.
- Volkman, Hans-Erich (Ed.), *Das Russlandbild im Dritten Reich*, Cologne: Böhlau 1994.
- Volkov, Evgenii, *Pod znamenem belogo admirala: Ofiterskii korpus vooruzhennykh formirovani A.V. Kolchaka v period grazhdanskoi voiny*, Irkutsk: Sarma 2005.
- Voznesenskii, Nikolai A. *Voennaia ekonomika SSSR v period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7], Moscow: Ekonomicheskaja gazeta 2003.
- Warum Krieg mit Stalin? Das Rotbuch der Anti-Komintern*. Berlin: Niebelungen-Verlag 1942.
- Werth, Alexander, *Russia at War, 1941–1945*, London: Barrie & Rockliff 1964.
- Werth, Nicolas, 'Repenser la grande terreur: L'U.R.S.S. des années trente', *Le Débat*, November-December 2002.
- Wheatcroft, Stephen, 'From Team-Stalin to Degenerate Tyranny', in E.A. Rees (ed.) *The Nature of Stalin's Dictatorship: The Politburo, 1924–195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Winchester, Jim. *Tanks and Armoured Fighting Vehicles of WWII: The World's Greatest Military Vehicles, 1939–1945*, London: Amber Books 2003.
- Zadirskii, K., 'Tukhachevskii v Cheliabinske', *Vechernii Cheliabinsk*, 13 September 1989.

- Zaltsman, Isaak & G. Edel'gauz, 'Vspomianiza uroki Tankograda', *Kommunist*, 1984, no. 16.
- Zemskov, Viktor Nikolaevich, *Spetsposelentsy v SSSR, 1930–1960*, Moscow: Nauka 2003.
- Zima, Veniamin Flodorovich, *Mentalitet narodov Rossii v volne 1941–1945 godov*, Moscow: IRI RAN 2000.
- Zhuravlëv, Sergei Vladimirovich, 'Inostrantsy v sovetskom obshchestve, 1920–1930-kh godov', *Trudy Instituta Rossiiskoi Isstril RAN, 1999–2000*, Moscow 2000.
- Zhuravlëv, Sergei Vladimirovich, 'Malenkie ljudi' i 'bol'shaia istoriia'. Inostrantsy moskovskogo Elektrozavoda v sovetskom obshchestve 1920-kh – 1930-kh gg. Moscow: Rosspen 2000.
- Zhuravlëv, Sergei & Mikhail Mukhin, 'Krepost sotsializma': Povsednevnost' i motivatsiia truda na sovetskom predpriatii, 1928–1938 gg. Moscow: Rosspen 2004.
- Zolotyë stranitsy Iuzhnogo Urala, Chellabinsk: URSIB 2000.
- Zubkova, Elena Iur'evna, *Poslevoennoe sovetskoe obshchestvo: Politika i povsednevnost, 1945–1953*, Moscow: Rosspen 1999.
- Zubkova, Elena, 'Die sowjetische Gesellschaft nach dem Krieg: Lage und 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 1945/46',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7), no. 3, 1999.

索引

A

阿尔扎马斯-16 (萨罗夫), 241, 256, 258
爱德华·卡尔, 38, 279
爱沙尼亚, 219, 220
安东·卡尔格伦, 63
奥尔忠尼启则, 42, 89, 98, 108-109, 122, 134, 288
奥尔忠尼启则机械制造厂, 44, 77, 206, 244
奥廖尔, 192, 194, 251, 262
奥伦堡, 12-13, 15, 17-18, 20-21, 23
奥索维亚欣 (志愿防卫组织), 154-156

B

巴巴罗萨行动 (计划), 2, 9, 162-164, 170-171, 173, 205, 263, 300
巴卡尔钢铁厂, 41, 221-222
巴黎, 1, 36, 78, 111, 118, 272
巴林顿·摩尔, 136, 143
白军, 4, 20-22, 24-26, 28-30, 33, 43, 68, 261, 275-276, 295-296

鲍里斯·苏瓦林, 1, 273
鲍里斯·约凡, 221
贝利亚, 6, 8, 136, 143-145, 147-149, 176-177, 246, 269, 301
彼得格勒, 12, 14, 16-18, 22, 31, 98, 172
彼尔姆, 22, 66, 68, 129, 146, 175-176, 205, 227, 236, 269
表演性审判, 40, 71, 101, 130, 133, 135, 140
波茨坦, 262
波兰, 9, 28, 68, 120, 131-132, 136, 140, 146, 148, 162, 170, 220, 227, 296
波罗的海, 148, 219, 224, 227
柏林, 118, 153, 163, 198-199, 236, 262, 288, 300, 303
布哈林, 32, 45, 68, 126, 129, 133, 141, 278
布罗多卡尔马克, 2-3, 231, 275
布琼尼, 1, 28, 272

- G
- 车里雅宾斯克-40, 6, 239, 241, 256, 258
- 车里雅宾斯克-70, 6, 256
- 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 221-222, 224, 253
- 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建设局, 222-224
- 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 10, 197, 236, 239, 256, 309
-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 4, 6, 8, 75, 77-78, 80-81, 83, 90-91, 95-99, 101-102, 104, 106, 108-110, 115, 118-123, 134, 137, 157-161, 164, 166, 175, 177-179, 181, 183, 185, 197, 208-209, 216, 229, 241, 243, 246-247, 249, 252, 258, 266, 268, 288, 310
- D
- 大清洗, 8, 23, 33, 46, 51, 67, 101, 117, 125-128, 131, 133, 135-140, 142-145, 147-149, 154, 176, 227, 240, 251, 263, 266, 270, 275, 292-293, 296, 301
- 大屠杀, 137, 172
- 大乌拉尔计划, 40
- 弹药人民委员部, 134, 163, 167, 206
- 德国, 1-2, 9, 19, 28, 31-33, 38, 41, 53, 64, 77, 95-96, 104-106, 109, 112, 114-115, 118, 123, 128, 132, 136, 139-140, 145-147, 152-154, 159, 162-164, 168, 170-174, 180, 184, 186, 191-196, 198-201, 203-205, 208, 221, 223-227, 234-236, 243, 245-246, 251, 262-263, 265, 268-269, 277, 282, 289, 291, 299-302, 307, 311
- 德国国防军, 170, 173, 186, 192-195, 198, 204, 263
- 德米特里·科柳申科, 13, 15
- 德裔苏联人, 221-225, 261, 265, 307
- 邓尼金, 276
- 底特律, 78, 96-97, 99, 101, 107
- 第二个五年计划, 42, 44, 67, 90, 121
-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40, 160
-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 40
- 第三个五年计划, 95, 142
- 第五纵队, 140-141
- 第一个五年计划, 6, 41-42, 44, 46, 66, 70, 77, 95, 280, 288
- 动员计划, 8-9, 44, 119-122, 158, 163-164, 166-168, 174, 177, 179, 203, 241, 299
- 杜多夫, 183
- E
- 鄂木斯克, 2, 22
- 恩格斯, 253
- 恩斯特·亨利, 152-153, 297
- 二月革命, 15, 18, 23, 68
- F
- 法国, 5, 9, 22-23, 75, 114, 120, 154, 162, 170, 190, 234-235, 267, 273-274, 283, 299-300
- 《凡尔赛和约》, 234
- 芬兰, 140, 146, 158, 160, 164-165, 219, 223, 234

- 弗拉基米尔·莫吉利尼科夫, 15, 17, 20, 275
- 弗雷德里克·贝克, 125
- 伏尔加河, 5, 34, 38, 94, 130, 147, 173, 203-206, 222-223, 274-275, 302
- 伏龙芝, 21
- 伏罗希洛夫, 38, 52, 130, 139, 155, 160
- 伏罗希洛夫工厂, 115
-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24
- 富勒, J. F. C., 114
- 富农, 2, 32, 36, 44, 50, 52-54, 56-57, 59-61, 69, 102, 126, 130-131, 139-141, 146, 178, 226-227, 264-265, 272, 281-282, 295
- G
- 高尔察克, 22-24, 26, 28-31, 68, 72
- 高尔基汽车厂, 163
- 高尔基市(今下诺夫哥罗德市), 77, 100, 132
- 高加索, 50, 94, 106, 173, 203
- 戈尔巴乔夫, 149, 263, 265
- 戈培尔, 162
- “公开性”, 5, 10, 127, 149, 263, 273, 297
- 构成主义, 75-76, 80
- 古拉格, 52-53, 57, 60, 104, 117, 125, 127-128, 130, 135, 137, 142-143, 146-149, 175, 212, 214, 219, 223-225, 228, 233, 246-247, 254, 256, 270, 273, 289, 293, 295, 307
- 国防人民委员部, 110, 121, 163-164, 167, 189, 219
- 国防委员会, 97, 164, 174, 176, 189, 195, 199, 214, 228, 245
- 国家计划委员会, 39-40, 120, 163, 167, 174, 207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7, 23, 46-47, 52, 54, 56, 98, 116, 224, 275, 281
- 国家资本主义, 64
- H
- 哈尔科夫, 9, 17, 21, 40, 96, 104, 109-110, 116, 118, 121, 132, 138, 158, 163, 175, 177, 182-183, 189, 192, 197, 206, 208, 212, 236, 245, 261
- 哈萨克斯坦, 44, 206, 223, 256
- 海因茨·古德里安, 9
- 赫鲁晓夫, 117, 126, 128, 149, 174, 283, 297, 301
- 红军, 2, 4, 9-10, 18-19, 21-23, 25-26, 28-31, 33, 53, 57, 65, 68, 71, 76, 110-112, 114-117, 121, 125, 134-135, 137, 139, 151, 154, 157-158, 161-162, 165, 170-171, 173, 178, 180, 184, 186, 189, 191-194, 198, 201, 203-204, 212, 215-216, 220, 223, 225-227, 232, 235-236, 261, 275, 277, 291, 303
- 华沙, 28
- 火箭炮, 206, 215, 305
- J
- 机械拖拉机站(MTS), 51, 70, 95, 98, 130, 226, 234, 243
- 基洛夫, 76, 127, 160

- 基洛夫工厂, 9, 56, 122, 137-139, 160-161, 164-166, 174-175, 180-185, 187-189, 196, 209, 211-214, 217, 229, 231-232, 235-236, 242-243, 246-247, 251, 302
- 极权主义, 77, 266, 285
- 集体农庄, 4, 47, 49-55, 58, 60-61, 69, 72, 94-95, 98, 101, 213, 223, 226, 228-230, 233-234, 240, 261, 272
- 计划经济, 7, 44, 123, 141
- 季诺维也夫, 31, 101, 126-128, 130
- 加里宁, 108
- 加米涅夫, 127
- 捷尔任斯基, 30, 92, 160
- 捷克军团, 18-21, 23-24
- 捷克斯洛伐克, 19, 105, 154
- 军工综合体, 4, 10, 239, 258, 263, 301, 309-310
- K
- 卡尔·拉狄克, 126, 135
- 卡冈诺维奇, 68-70, 172, 284
- 卡拉巴赫, 58, 227
- 卡拉干达, 41
- 卡缅斯克, 44, 58, 220
- (卡齐米尔·)洛文, 90, 98-99, 101, 109, 135
- 卡特彼勒公司, 96, 98-99, 107
- 科柳申科工厂, 78, 84, 206, 215
- 科佩伊斯克, 42, 46, 56-60, 96, 225, 227, 282, 311
- 科廷, 118, 160, 174, 183, 185-186, 194-197, 243, 298, 310
- 克什特姆, 58, 215
- “口径”工厂, 207
- 库尔干, 2, 30, 33, 66, 205
- 库兹巴斯, 104
- (库兹马·)伦丁, 66-70, 91, 130-132, 137, 293
- 库兹涅茨克, 41, 66, 83, 288
- L
- 蓝军, 32-33
- 劳改营, 40, 52-54, 57, 73, 117, 125-128, 130, 136-137, 140-143, 146, 149, 212, 214, 222-225, 233, 246-247, 253, 256, 270, 273, 275, 282, 293, 295-296, 307, 311
- 冷战, 2, 6, 10, 126, 138, 164, 239, 241, 256, 258, 263, 300, 302, 309
- 立宪民主党人, 13
- 两栖坦克, 175, 197, 243
- 疗养院, 90, 106, 197, 233
- 列宁, 9, 13, 15, 22, 24, 32-33, 40, 42, 53, 64-65, 76, 87, 96-97, 115-116, 118, 121-122, 126-127, 137-138, 160, 164-166, 173-175, 180-186, 197, 203, 206-208, 211-212, 216, 221, 236, 239, 243, 245, 251, 253-254, 261, 269, 274-276, 278, 283, 292, 299-300, 306, 310
- 罗伯特·康奎斯特, 125
- 罗斯福, 234, 302
- M
-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5, 41-42, 49, 58-59, 61, 66, 75, 77, 86-87, 102,

- SMK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 托木斯克, 42-43
 160, 165
 T-10, 165, 197, 243-244, 311
 T-12, 110
 T-24, 110-111
 T-26, 115, 175
 T-28, 116-117, 121-122, 139
 T-29, 122, 291
 T-34, 112, 114, 116, 118, 170,
 175, 177, 183-185, 187-191,
 193, 196, 301
 T-35, 116
 T-40, 175
 T-100, 165
 豹式, 192, 196
 费迪南德式, 201
 虎式, 192, 194, 196, 199
 克里斯蒂, 111-112, 122, 290
 猎豹式, 201
 猎虎式, 201
 三号坦克, 184
 四号坦克, 170, 184
 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 175, 186, 206,
 246, 302
 “特殊定居者”, 50, 54, 58-61, 225-
 227, 261, 341
 图哈切夫斯基, 25-29, 31, 68, 116,
 118, 126, 277
 土耳其, 7, 153, 234
 托洛茨基, 7, 19, 24, 30-32, 68-69,
 100-101, 128-130, 132-133, 135,
 147, 190, 272, 277-278, 288
- 拖拉机 (牵引车)
 S-2, 167, 178-179
 S-4, 158
 S-60, 242
 S-64, 243
 S-65, 109, 158, 167, 178-179, 196,
 242
 S-65G, 109, 178
 共产国际, 158
 斯大林涅兹 -60, 101, 111
- W
- (瓦西里·)布柳赫尔, 16-17, 21
 万国收割机公司, 96, 98
 威廉·亨利, 6, 178
 文化宫, 75, 80, 92, 210, 253, 257
 沃尔特·克里斯蒂, 112
 沃兹涅先斯基, 73, 174, 251
 乌法, 18, 20, 22, 24, 26, 34, 42, 44,
 67, 68
 乌克兰, 31, 37-39, 42, 50, 54, 57,
 61, 94, 121, 137-138, 160, 171,
 173-174, 183, 203, 208, 219-220,
 227, 246, 263, 272, 277, 300
 乌拉尔, 2-6, 8-10, 12-20, 22-24, 26-
 33, 37-42, 44-54, 56-57, 59-61,
 65-66, 68, 70, 73-74, 83, 88, 90,
 94, 96, 101-102, 104, 108, 119,
 128-130, 133-135, 141-142, 145,
 160, 169-170, 173-175, 177-178,
 180, 182, 184-185, 189, 199-200,
 203-208, 216-217, 223, 225, 227-

- 228, 231-233, 235-236, 239, 241, 244-245, 249, 255-256, 262, 264, 266-267, 269, 274-275, 277, 281-282, 289, 296, 299, 301, 303, 305, 307, 309, 312-313
- 乌拉尔车辆制造厂, 177, 189, 301
- 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 175, 177
- X
- 西班牙内战, 154, 160, 164
- 西伯利亚, 1, 2, 8, 13-14, 19-26, 28-29, 35, 41-43, 45-46, 52, 54, 56, 59, 70, 83-84, 106, 173-174, 199, 204-206, 223, 225, 261, 272-275
- 西伯利亚大铁路, 2, 25, 29, 42
- 希特勒, 1, 152-154, 162, 170-172, 203-204, 220, 235, 263, 300-301
- 下塔吉尔, 5, 9, 68, 70, 102, 129, 174-175, 177, 189, 196, 205, 208, 224, 289
- 夏尔·贝特兰, 75
- Y
- 雅戈达, 128, 141, 295
- 亚历山大·贝克, 200
- 亚历山大·布鲁斯金, 109, 133
- (叶夫多基姆·)瓦森科, 14, 16, 21
- 叶若夫, 8, 128, 130, 132-133, 135-136, 146-147
- 伊尔库茨克, 29
-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 239, 256, 258
- (伊萨克·)扎尔茨曼, 137-138, 181-182, 185, 195-197, 209, 218, 242-243, 246, 248, 250-252, 294, 302, 308, 310-312
- (伊万·)诺森科, 243, 250, 302, 311
- 意大利, 104-105, 164, 219, 224-225, 234, 262, 273, 302
- 英国, 1, 22-23, 38, 96, 98, 105, 114-115, 120, 130, 153-154, 173, 204-205, 274, 299, 302
- 影子企业, 174
- 原子城, 6, 239, 250, 255, 263, 266, 313
- 原子弹, 239-241, 248, 256, 258
- 远东, 19, 84, 141, 145, 234
- 约翰·斯科特, 86, 137, 274
- Z
- 泽斯·霍格伦, 125, 147
- 张伯伦, 6, 37, 178, 302
- 政治犯, 13, 33, 102, 143, 149, 224
- 中国, 1, 22-23, 29, 105, 116, 235, 291
- 中型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 158-159, 166, 302
- 中亚, 207, 220, 223
-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 66, 96-97, 104, 122, 131, 134
- 朱可夫, 185
- 专制, 3, 105, 128
- 兹拉托乌斯特, 2, 14, 19, 26, 29, 31, 42-43, 58, 68, 105, 216, 220, 233
- 最高国民经济会议, 96, 104



“苏联，苏联”系列

主编 杨成

苏联的外宾商店

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

增长率的背后

（从农场到工厂）

苏联教师的日常生活

☆坦克格勒

莫斯科有高楼

塔什干

红色边界

主编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曾先后供职于外交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华东师范大学。长于欧亚区域国别研究，学术成果六次获得省部级奖励。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法国塞尔奇-蓬图瓦斯大学（现塞尔奇-巴黎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访问教授与合作研究员，现为四种国外学术期刊的编委。

相关阅读

《苏联崩溃的原因及教训》

Tankograd: The Formation of a Soviet Company Town: Cheliabinsk, 1900s–1950s

车里雅宾斯克位于乌拉尔山脉南部深处，曾经是俄国东部边境的一个小型防御工事。19世纪，乌拉尔地区成为重要的采矿和冶金中心，城市获得发展。斯大林时期，车里雅宾斯克成为拖拉机生产中心。苏德战争期间，这里的工厂承接前线撤离的设备和人员，迅速转向军用，为红军制造了上万辆主战坦克，如著名的KV系列重型坦克和T-34中型坦克，因此有了“坦克格勒”（坦克城）这一别号。

全书围绕内战、工业化、“二战”及冷战初期几个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介绍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等工业企业的发展，对该地如何从一个农业主导的落后地区迅速转变为军工重镇，又转而成为核工业秘密城市的历史进行了繁简有度的梳理，特别对其特有的经济军事化现象及备战计划细节有所发覆。作者也讲述了车里雅宾斯克居民的故事，以及城市的文化和建设情况，描绘了历史巨轮下技术官僚、工人、农民乃至囚犯的百态人生，为读者深入理解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战时经济动员和社会生活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

《坦克格勒》不仅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苏联工业城市在半个世纪内的演变记录，其价值更在于通过独特的档案视角，对苏联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实证且有修正意义的学术分析，是“档案革命”后涌现出的苏联研究中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承认的重要著作。

